

内容简介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文化谱系构建与创新实践》是一部系统研究隋唐大运河核心段——通济渠历史文化价值、文化谱系结构及其当代转化路径的学术专著。全书立足于文化遗产保护、历史地理学、社会人类学、教育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视角，深入挖掘通济渠作为国家工程、文化廊道与生态系统的多重属性，全面梳理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深远影响。

著作首先从通济渠的历史脉络出发，还原其在隋唐帝国统一、南北融合、漕运体系建立中的战略地位，并通过考古发现、文献考证与遥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复原河道走向、水工设施与沿线聚落演变。在此基础上，作者构建了以“物质遗存—制度体系—精神文化—口述记忆”为四大支柱的通济渠文化谱系框架，系统阐释其作为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典范的文化内涵。

书中特别关注民间传说、地方风物与口述史料的价值，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叙事对正史记载的补充与互证作用，揭示民众如何通过故事建构地方认同、传递道德观念并维系社区记忆。同时，著作深入探讨通济渠所体现的“互联互通”智慧，将其置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当代语境中，彰显中国古代工程文明对全球治理的启示意义。

在实践层面，本书提出将通济渠文化融入国民教育体系、高校学科建设与社会公众教育的三维路径，倡导编写地方教材、开发数字资源、打造文化品牌，推动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此外，还结合国际遗产保护理念的演进，主张从“单体保护”转向“整体性保护”，强调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人文、历史与当代的有机融合。

本书不仅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也为线性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研究与创新性传承提供了方法论范式，兼具学术深度、现实关怀与文化温度，是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参考。



张翠 陈珊珊 著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文化谱系构建与创新实践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of the Cultural Pedigree of the Tongji Canal of the Grand Canal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文化谱系构建与创新实践

张翠 陈珊珊 著



作者简介



张翠，1988 年 7 月出生，博士学历，研究方向为语言研究。宿州学院外国语学院专业教师，所授课程包括翻译理论与实践，综合英语，跨文化交际，大学英语等。公开发表教科研论文 10 余篇，参与省级教科研项目 10 余项，主编省级规划教材 1 部，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英语竞赛等专业比赛。



陈珊珊，女，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及教师专业发展；主持省哲社规划办、省社科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科研项目 9 项，主持省级重点教研及质量工程项目 3 项，出版专著 1 部，发表学术论文近 20 篇，其中 SSCI、CSSCI 和 EI 期刊论文 7 篇，获得安徽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一）。曾获得宿州学院第一届青年教师教学大奖赛一等奖，首届“精彩微课”教学竞赛一等奖，安徽省首届普通本科院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三等奖，获得省“教坛新秀”、市“三八红旗手”、校级“教坛新秀”、“师德先进个人”、“双能素质”教师、“优秀教师”、“优秀辅导员”和“就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of the Cultural
Pedigree of the Tongji Canal of the Grand Canal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文化谱系构建
与创新实践**

张翠 陈珊珊 著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CIP INFORMATION

Title: Construction and Lnnovative Practice of the Cultural Pedigree of the Tongji Canal of the Grand Canal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题目：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文化谱系构建与创新实践

Author: Cui Zhang, Shanshan Chen

作者：张翠 陈珊珊

ISBN: 979-8-90040-178-2

Publisher: CYPEDI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Price: \$60.00

定价：60 美金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of the Cultural Pedigree of the
Tongji Canal of the Grand Canal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文化谱系构建与创新实践

Address: 100 N Howard St Ste R, Spokane, Wa, 99201. United States

Tel: +888-754-5177

Email: contact@cypedia.net

Format: 170mmx240mm 1/16 Sheets: 15.25

Word Counts: 200.000

Edition: First edition in June 2026

Printing: First printing in June 2026

**CYPEDI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非开放获取·电子版请联络出版社购买·版权归出版社所有·侵权必究

Not Open Access. For the electronic version, please contact the publisher for purchase.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publisher.
Infringement will be prosecuted.

P 前言

REFACE

隋唐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最宏大的水利工程之一，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更是中华文明交流互鉴、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其中，通济渠作为大运河的核心段落，自隋炀帝时期开凿以来，便以其贯通黄河与淮河、连接中原与江淮的战略地位，深刻塑造了中国中古以来的政治格局、经济网络与文化版图。千百年来，通济渠不仅输送粮赋、兵员与商货，更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情感与想象，成为一条流淌着中华文明基因的文化长河。

然而，长期以来，对通济渠的研究多集中于工程技术、漕运制度或断代史视角，缺乏对其文化整体性、系统性与当代价值的深入整合。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我们亟需超越碎片化的认知，构建一个能够统摄物质遗存、制度实践、精神信仰与民间记忆的“文化谱系”，从而真正理解通济渠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

本书正是基于这一学术自觉与时代使命而撰写的。作者试图回答几个关键问题：通济渠的文化内涵究竟包含哪些层次？其历史功能如何转化为当代文化资源？如何通过教育、传播与社区参与实现其活态传承？又如何在全球视野下讲好这条千年运河的中国故事？

为此，本书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在历史维度上，结合正史、方志、碑刻与出土文献，厘清通济渠的修建背景、运行机制与历史变迁；在空间维度上，运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IS）与遥感影像，复原其河道网络与沿线聚落格局；在文化维度上，深入田野，采集口述史料，整理民间传说，揭示普通民众如何通过故事、仪式与地名记忆建构自身与运河的情感联结；在价值维度上，则将通济渠置于“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中，提炼其蕴含的“互联互通、和合共生、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本书不仅关注“过去是什么”，更关注“今天如何

用”。因此，专设章节探讨通济渠文化如何融入中小学课程、高校学科建设与公共文化服务，提出编写地方读本、开发数字资源、组织社区活动等具体策略，力图打通学术研究与社会应用之间的壁垒，使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

通济渠不仅是一条水道，更是一条文化血脉。它见证了王朝兴衰，也滋养了市井烟火；它承载着帝王的雄图，也铭记着民工的血泪；它既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地方智慧的结晶。唯有以整体性、动态性和人民性的视角去观照它，才能真正把握其文化精髓。

限于作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及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共十章，张翠负责第一章至第七章内容的撰写，共 14 万字；陈珊珊负责第八章至第十章内容的撰写，共 6 万字。

作者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历史溯源·····	1
第一节 通济渠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1
第二节 隋唐时期通济渠的修建与功能·····	5
第三节 通济渠在隋唐大运河体系中的地位·····	9
第四节 通济渠相关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	13
第五节 通济渠历史价值的当代审视·····	17
第二章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理论构建·····	21
第一节 文化谱系理论的发展与演变·····	21
第二节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内涵与特征·····	26
第三节 通济渠物质文化遗产谱系·····	31
第四节 通济渠非物质文化遗产谱系·····	36
第五节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构建方法·····	40
第三章 通济渠物质文化谱系研究·····	45
第一节 河道与水工遗存谱系研究·····	45
第二节 聚落与城镇空间谱系研究·····	49
第三节 出土文物与器物谱系研究·····	54
第四节 航运设施与码头遗址考证·····	59
第五节 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64
第四章 通济渠非物质文化谱系研究·····	69
第一节 运河航运习俗与传统技艺·····	69

第二节 沿岸民俗文化与节庆活动·····	74
第三节 运河文学与艺术传承·····	79
第四节 口述历史与民间传说·····	84
第五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89
第五章 通济渠生态文化谱系研究·····	95
第一节 文化景观的概念与特征·····	95
第二节 通济渠自然景观演变·····	100
第三节 通济渠人文景观构成·····	105
第四节 景观生态与环境保护·····	110
第五节 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	114
第六章 通济渠社会文化谱系研究·····	121
第一节 通济渠文化传播路径·····	121
第二节 运河文化对沿岸社会的影响·····	127
第三节 通济渠与中外文化交流·····	131
第四节 运河文化的区域特色·····	136
第五节 文化传播的当代价值·····	141
第七章 通济渠文化谱系保护与整体性实践研究·····	147
第一节 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研究·····	147
第二节 遗址保护与修复工程·····	152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157
第四节 保护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162
第五节 保护成效评估与反思·····	167
第八章 通济渠文化谱系创新开发研究·····	173
第一节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	173
第二节 旅游开发与景区建设·····	177
第三节 文化产品设计与推广·····	181

第四节 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新·····	185
第五节 创新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188
第九章 通济渠文化谱系教育与社会协同参与研究·····	193
第一节 文化遗产教育体系建设·····	193
第二节 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196
第三节 社区文化建设实践·····	201
第四节 青少年教育项目开发·····	205
第五节 社会参与的成效评估·····	208
第十章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未来发展·····	213
第一节 文化谱系研究的前沿趋势·····	213
第二节 保护与创新的协调发展·····	217
第三节 区域协同发展策略·····	220
第四节 国际化视野下的发展路径·····	225
第五节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未来展望·····	229
参考文献·····	235

第一章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历史溯源

第一节 通济渠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一、通济渠的地理走向与流域范围

通济渠是隋唐大运河联系东西、沟通南北的中心河段，是帝国运转的生命线，也是隋唐时期雄浑大气、高超工程技术的杰出证明。了解通济渠的地理走向、流域范围，是认识通济渠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的前提。东西两段在地理特征、水源系统上的差异，使它在隋唐帝国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也预示了它后来不同的命运轨迹。

（一）通济渠西段：引洛入黄与连接东西

通济渠西段工程的主要目的，就是将隋代重要的政治中心东都洛阳与黄河水系连接起来，打通从西京长安经过东都洛阳，通往广阔东部和南方的漕运通道。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这个宏伟的工程才开始动工。起点设在洛阳城西皇家园林西苑，汇集谷水、洛水两股水源，开凿的河道向东蜿蜒，流经洛阳城南，最后在今河南巩义市东北部板渚汇入黄河。

这一段河道虽然很短，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技术含量以及战略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集中体现了隋代水利工程的水平，用准确计算地势高低来引洛济运，保证运河西端充足的水源。更重要的是它像一条强有力的臂膀，把帝国的政治心脏和黄河这条北方交通大动脉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从此关中、洛阳地区政令、军队、物资可以经此水道顺利抵达运河主干，实现东国外向的快速流通和战略部署。

通济渠西段建成之后，洛阳才真正成为全国水路交通枢纽。它不单为漕运服务，也成了帝王巡幸、商贾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廊道。沿岸因为水而兴盛，码头、粮仓、驿站遍布，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水网雏形，为隋唐盛世到来打下了物质基础和空间格局。通济渠的出现，才使得洛阳成为“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天下之中心。

（二）通济渠东段：汴河故道与沟通江淮

通济渠东段工程是在黄河以东的广阔平原上展开的，其主要任务就是沟通黄

河、淮河两大水系，把富庶的江淮地区纳入全国性的水运网络。与西段完全新凿不同，东段的修建主要是在古代汴河故道的基础上进行疏浚、拓宽和改造。汴河是条历史悠久的河流，现成的河床基础给运河的快速建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充分体现了古人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工程智慧。

该段运河从板渚口引黄河水东流，绕过河堤、穿城而出，成了中原地区乃至江南地区的黄金水道。流经的路线简直就是隋唐时期一系列重要经济城镇串联起来的“珍珠项链”。

1. 经过当时重要的经济重镇汴州，也就是后来北宋的都城开封。运河的滋养为这座城市日后发展成为世界级大都会打下了基础。

2. 河道继续往东南延伸，流经商丘（宋州）、宿州、亳州等地，这些地方因为运河而迅速繁荣，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漕粮转运中心。

3. 运河最终在今江苏盱眙附近汇入淮河，完成了沟通黄淮的历史任务。因此来自江南的船只经由邗沟进入淮河，再经通济渠直达中原腹地或者京师洛阳，形成了南北大通道。

二、通济渠的开凿背景与历史动因

（一）隋朝统一后对政治经济整合的需求

隋朝建立以后，结束了自魏晋以来三百多年分裂割据的局面。但是长久的南北对峙造成政治、经济、文化上巨大的隔阂和区域差异。南朝的建康（今南京）是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心；北朝则长期是政治军事中心。对隋王朝来说，怎样消除这种隔阂，把辽阔的疆域真正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是隋王朝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的首要课题。开凿以通济渠为代表的大运河，就是为达到这一宏大的政治经济整合目的而采取的战略行动。

运河的修建最先要服务于政治上的集权控制。隋炀帝建造东都洛阳，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可以辐射全国的新政治中心，摆脱传统的关中本位的政治格局。通济渠直接连接洛阳与经济富庶的东南地区，使中央政令可以迅速下达，中央军队可以快速调集，大大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特别是对刚刚平定的南方地区的控制力。皇帝经常性的东巡南幸，乘龙舟顺运河而下，本身就是一种彰显皇权、巡视疆土、威慑地方势力的政治行为。

从经济角度看，通济渠开凿打破了区域经济壁垒，以空前的规模和效率推动

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它把南方尤其是江淮流域的粮食、丝绸、瓷器等丰富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供给首都、边防及广大北方地区。

南北物资大规模的流通与交换，一方面可以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可以加深各地人民之间的交往和融合。运河沿岸出现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汴州、宋州等，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四方的商人，使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隋唐时期国力飞跃的重要动力。

（二）军事漕运与南粮北调的战略考量

漕运就是通过水道大范围调运粮食，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运转的生命线。隋朝定都长安，后又营建东都洛阳，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中心都设在粮食产量较低的北方。庞大的官僚集团、禁卫军、常备边防军的日常消耗，仅靠关中、中原地区的产出是远远不够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过长期的开发，江淮、江南地区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有“天下粮仓”之称。因此建立一个高效、稳定、大运量的南粮北调体系就成为隋朝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

通济渠的开凿，就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它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南方的“粮仓”和北方的“消费端”连接起来。史书记载，运河建成之后每年运往京城的漕粮有数百万石，舟楫相连，千里不绝。不仅可以保证首都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也可以给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供物质保障。可以说没有通济渠支撑的漕运体系，隋唐两代京城的繁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除漕运功能外，通济渠的军事战略意义也非常大。它是条流动的军事高速公路，大大提高了帝国的兵力输送能力。平定叛乱、戍边防边、对外战争中军兵、粮草、器械等物资均可快速、经济地经由运河运往前线。隋炀帝数次征讨高句丽，庞大的军队集结以及大量的物资运输，很大程度上都依靠通济渠等大运河体系。黄金水道是经济动脉，也是帝国进行军事战略、保证边疆安全的主要途径。

三、通济渠的兴废流变与历史分期

水利工程的生命周期，就反映了王朝的兴衰更替和时代变迁。通济渠从诞生之日起，就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其兴废流变的历史分期，给我们勾勒出一部鲜活的运河社会经济史。

（一）隋唐时期的鼎盛与维护

自隋代开通直到整个唐代，通济渠一直作为帝国经济大动脉而存在，迎来了

长达数百年的黄金时期。这时通济渠上商旅往来，船只不绝，昼夜穿行，构成了一幅隋唐盛世繁荣昌盛的画卷。它既是漕运官船专用航道，又是民间商船往来通道。南方产的茶叶、丝绸、竹木、稻米，通过这条水路和北方的马匹、皮毛、杂货交换，使商品经济发展得更快。扬州、汴州（开封）、洛阳等城市因为运河而繁荣昌盛，成为当时国际性的大都市和商贸中心，运河沿岸也出现了很多繁华的市镇。

为了保证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无阻，唐朝政府就建立起了完备的管理与维护系统。朝廷设水部郎中等机构，管理运河的水政。沿线各州县也设官员，对日常的巡查、维护工作加以监督。定期清淤疏浚、堤防加固是防止泥沙淤积、抵御洪灾的工程。唐朝政府制定了很严密的漕运法规，设立了驿站、官仓等保证漕运、商旅的安全和便利。正是因为不断的制度性投入与维护，通济渠在唐代近三百年间才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经济和战略价值，成为支撑“开元盛世”等繁荣局面的重要基础。

（二）宋元时期的沿用与淤塞

宋代以后，通济渠命运发生转变。一方面因为政治中心东移到开封（北宋时称东京汴梁），位于开封以东的通济渠东段，即汴河，其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汴河是北宋的生命线，都城百万人口的衣食所需几乎全部依靠这条水道从东南运来。清明上河图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汴河两岸繁华景象的真实写照。北宋朝廷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疏浚汴河、修筑堤岸、调度水源来维持汴河的航行能力。

但是通济渠的命运重大考验来自于自然环境的剧变，主要是黄河的频繁决口、改道。黄河这条善淤、善决、善徙的河流，就像是悬在通济渠头上的利剑。黄河一旦决口，大量的泥沙就会瞬间冲入运河河道，造成毁灭性的淤塞。宋代以后，黄河南侵夺淮越来越频繁，多次冲毁通济渠的引水口，使它与黄河的联系时断时续。从此西段的水运功能基本消失，东段也变得难以维护。

元代时，由于政治中心最终确立在北京（元称大都），元朝为了更直接、更有效地实现南粮北运，倾全国之力开凿了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这条新的运河直通杭州到北京，完全避开以东西走向为主的通济渠。新运河建成标志着通济渠作为国家级漕运主干道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失去了国家层面的保护和使用需求之后，古老的通济渠河道很快就被泥沙淤塞废弃，昔日的繁华景象被风沙和农田

所覆盖，在历史的尘埃中沉寂下去，只留下一些断续的遗迹和文化记忆。

第二节 隋唐时期通济渠的修建与功能

一、通济渠的工程技术与管理

通济渠的成功开凿，依靠隋炀帝坚定的国家意志和高效的动员组织能力，同时集世界当时最先进的工程技术之大成。两者珠联璧合，共同造就了这项奠定千秋伟业的工程，规模和速度至今仍令人赞叹。

（一）大规模的人力动员与工程组织

通济渠的修建是在皇权的意志之下，对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极限动员。隋炀帝一声令下，河南、淮北各郡一百多万民夫参与工程。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下，如此庞大的人力资源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组织管理难题。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隋朝政府实行分段承包、分区负责的施工管理。全河段按地段分设专官、将领，实行严格的限时完工制度。从中央的将作大匠宇文恺做总体规划，到地方官员具体负责区段的劳力征募和后勤保障，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高效指挥体系。

高度集权化的组织形式保证了政令畅通，工程迅速推进，通济渠主体工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竣工了，创造了水利史上的建造速度奇迹。但隋朝速度的背后是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乃至生命，史书上“役丁死者什四五”的记载，深刻地表现出了工程的残酷。它是隋代国家机器强大动员力的证明，也是隋代国家滥用民力、不顾民生的弊端的反映，为帝国的迅速崩溃埋下了祸根。强权推行的工程模式给后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复杂的历史参照。

（二）河道勘测、水源调控与堤坝修筑技术

通济渠成功之处就在于高超的工程技艺。线路设计体现出因地制宜，顺其自然的特点。宇文恺等设计者经过精密测量，利用古代汴河故道，根据黄淮之间中原地平、河道纵横的地理特点，选择了一条工程量小、线路笔直的运河，即从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东南流经偃师、巩县，接纳黄河之水，沿汴水故道，最后汇入江苏盱眙的淮河。最大程度利用现有的水系和平缓的地形，是古代线路勘测技术的优秀运用。

水源调控属于通济渠工程的技术要点和难点。由于所经过的地区水源缺乏，

必须引黄河水为主要补给水源，即引黄济汴。黄河泥沙含量高，水位季节性变化大，怎样稳定引水、防止泥沙淤积，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当时的工匠依靠精准计算来设置复杂的引水口、制水门来控制入渠水量和流速。水量不足的河段，用拦截支流、开挖陂塘等方式建立多级水源补给系统，保证运河常年通航水位。该套复杂的水源调节体系，很好地体现了隋代水利工程师对流域水文特征的认识。

堤坝修筑技术对运河的稳定运行也十分重要。为了防止河水泛滥、渗漏，通济渠两岸建起了坚固的堤防，叫做御堤。堤坝修筑采用版筑夯实法，层层堆叠，十分坚固。隋炀帝下令在堤岸上栽种了大量杨柳树，形成了一条条柳绿映水、绵延不绝的柳堤。这些柳树除了有美化的作用，发达的根系还可以起到固土防流失的作用，是一种生态与工程相结合的护堤措施，具有前瞻性。通济渠在勘测、引水、筑堤等方面所达到的技术成就，是古代中国水利工程的最高水平。

二、通济渠的核心功能：漕运与商贸

剥离工程奇迹的表面，通济渠最根本的价值就是其强大的经济功能。它像一条国家主动脉，把帝国富庶的江南和政治中心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国家漕运体系，大大促进了沿岸商业繁荣，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

（一）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漕运体系

通济渠的首要功能就是服务于国家漕运。隋唐两代定都于关中、中原地区，长安、洛阳人口稠密、官僚机构庞大、军队云集，粮食消耗大。同时，当地农业生产的产出已经不能供养庞大的非生产人口了。魏晋南北朝以后，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到隋唐时期，以江淮为中心的南方成了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产区。如何把南方粮食运往京师，成为维系帝国生存的首要问题，开凿通济渠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根本性的供需矛盾。

通济渠贯通以后，才能实现“运东南之粮，以实京师”的目标。每年数百万石粮食，主要是稻米，装在专门漕船上从烟雨江南出发，经邗沟进入淮河，再转入通济渠，一路往西北航行，到达东都洛阳，一部分再经由黄河、渭水运往西京长安。水道形成稳定、高效、低成本的后勤补给线，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经济动脉。没有通济渠漕运支撑，隋唐两代京城的繁荣、百万人口的生存就无从谈起。

隋唐政府为管理好这条国家命脉，专门设置了转运使等机构来管储藏、调运漕粮。沿途设有众多官方粮仓，嘉仓、兴洛仓等都是著名的大型粮仓，巨大的规

模和科学的储粮技术本身就是漕运体系发达的有力证据。漕船设计也更加专门化，根据不同的河段水情条件，形成庞大的专业船队。

通济渠的漕运作用远不止是满足京师粮食的需求。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保证南方所缴纳的粮食、布帛等实物顺利上交中央。它也是北方边防几十万大军的后勤供给基地，是国家军事力量的坚强后盾。通济渠是否畅通直接决定隋唐王朝的兴亡存废，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地位从始至终都是如此。

（二）沿岸商业都会的兴起与商品流通

在以漕运为主的交通线上，商业繁荣是必然的伴生现象。通济渠既是官方漕粮专用通道，又是商业动脉。往来不绝的官船、商船、民船汇聚了大量的人流和物流，极大地促进了沿岸的商品经济发展，催生了新的商业都会。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通济渠与黄河交汇处的汴州（今开封），以及通济渠南端与长江连接点上的扬州。汴州由于其“四通八达”的枢纽地位，很快成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和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之一。扬州是江南物资总汇和对外贸易港口，富甲天下，素有“扬一益二”之称。

通济渠上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极大促进了全国市场整合与区域分工，形成显著的南北货运格局。

1. 南方的物产如江淮稻米、江南丝绸、两浙茶叶、各地精美瓷器、福建蔗糖、各类竹木制品、手工艺品等，经由通济渠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

2. 北方特产如马匹、皮毛、矿产、药材等，亦借运河南下，满足南方市场需求。

3. 国家专营商品，如食盐等，其生产与贩卖主要仰赖运河体系，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

黄金水道冲破了地域经济隔绝的局面，使得“天下之货，舟楫负载，辐辏于此”，一种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统一市场雏形开始形成。商人们在运河上开设店铺、牙行、邸店，金融票号等早期金融服务业也随之兴起，运河沿线一片“商胡贩客，日奔泊而夜行”的繁荣景象。商业繁荣反过来给国家带来可观的商税收入，从而进一步增强国力。

三、通济渠的军事与政治功能

除经济作用之外，通济渠对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的军事价值与政治意义贯穿整个隋唐时期，是帝国统治的工具，保证政令畅通、

国家稳定。

（一）军队与物资的快速调动

冷兵器时代后勤补给决定战争的胜负，大规模军队调动要靠水路运输低费用、高运量的优势。通济渠建成以后，给隋唐帝国提供南北贯通的战略运输线，大大提高了其军事动员能力。无论是对外征伐还是对内平叛，它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隋炀帝三次征讨高句丽，动辄百万大军，其所需兵员、战马、兵器、粮草等都是通过通济渠等大运河体系源源不断地运到涿郡（今北京附近）的前线基地。尽管战争最后失败，但是大运河系统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物资运输能力是不容置疑的。

进入唐代以后，通济渠的军事作用愈加明显。平定安史之乱期间，当北方大部分地区陷入战火的时候，中央政府依靠通济渠以及整个运河体系，从仍然稳定的江淮地区获取财赋和兵源，才得以支撑长达八年的平叛战争。唐军主力能在河南、河北地区迅速集结并与叛军周旋，依靠的就是运河提供后勤支持。东南地区出现零星叛乱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运河迅速调兵遣将去弹压，防止地方割据势力坐大。通济渠是维系唐帝国不断之脉的血脉，也是帝国实施军事行动、维护版图完整的有力保障。

（二）强化中央集权与区域控制

通济渠的政治作用，主要是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广大疆域，尤其是东南地区。对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来说，怎样克服由于空间距离造成的延迟和控制力衰减，是永恒的难题。通济渠开通之后，大大缩短了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时空距离。皇帝诏令、政府公文可以很快地通过运河传达到东南各州郡，地方上的奏报、赋税也可以便捷地传送到京城。信息的自由流通与物资畅通交换，有利于中央政令顺利传达到基层，也增强了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监管。

更重要的是，通济渠成了中央政府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从而达到政治控制的有力工具。江南自古以来就是地方割据势力滋生的沃土。中央政府牢牢掌握通济渠这条财赋大动脉，就掌握了江南的命脉。任何地方势力只要产生异心，中央就可以通过中断漕运或派大军南下等手段进行制裁，使它的经济基础和军事潜力分崩离析。因为东南地区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央，所以在政治上很难对中央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从而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通济渠是强大的纽带，把政治强势的北方和经济富庶的南方紧密联结起来，成为隋唐大一统帝国坚实的物质和权力基础。

第三节 通济渠在隋唐大运河体系中的地位

一、通济渠：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

通济渠开凿之后，中国的交通格局被彻底改变了。它凭借超凡的规划与执行力把地理上的天堑变成了一条通途，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承载着帝国的财富和希望，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涌。

（一）连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枢纽

通济渠宏伟工程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是黄河、长江两条母亲河的纽带。隋代以前，南北水系之间没有天然通道，黄淮之间地势复杂，没有可以供大规模航运的自然水道。隋炀帝征调百万民工，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开凿出一条从西向东的运河。这条运河把黄河水引到汴水故道，再引到淮河，最后经邗沟与长江相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把黄河流域的政治、军事核心区和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精华区通过水路直接连接起来。

通济渠的线路选择体现出了高超的地理智慧以及工程技术。它不是简单的开挖一条新河，而是对原有的河道进行疏浚、改造、连接，修建复杂的水利设施来控制水位、流速。从洛阳西苑引水，保证了渠首有稳定的水源，沿途又汇入多条支流，保证航运所需要的巨大水量。“因势利导”的设计思想，使通济渠可以穿越地势平坦但是水系紊乱的黄淮平原，形成一条相对稳定、可控的人工航道。它建成以后，满载江南财富的船只从余杭（今杭州）出发，经江南河、邗沟进入淮河，逆流而上通过通济渠到达东都洛阳，甚至还可以经由黄河、永济渠抵达帝国北疆。

水道贯通的意义并不只是交通功能。它是连接南北方气候、物产、文化不同的生命线。黄河流域的粟、麦等旱地作物和长江流域的稻米、丝绸、茶叶，都是通过这条水道进行大宗交换和调配的。从此南北不再只是遥远、隔绝的地理概念，而是可以通过舟船往来实现资源互补、经济一体的有机整体。通济渠就像一座巨大的水上桥梁把黄河和长江连接起来，给隋唐帝国的统一与繁荣打下了基础。

（二）隋唐大运河体系中最繁忙的区段

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抵余杭的大运河网中，通济渠是其中最繁忙、经济最活跃的区段。它把帝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命脉联系在一起，肩负着漕运、商贸、官民来往等任务。繁忙的景象在史书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录，商旅往来、

船乘不绝就是那个时代最生动的写照。

通济渠繁忙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作为国家漕运主干道所起的作用。隋唐两代都城设在关中或者洛阳，但粮食的主要产区却逐渐南移到江淮地区。为了维持京师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队和皇室开支，每年都要从江南、淮南等地运来数百万石粮食到京城。漕船首尾相连，绵延几百里，日夜不息，是通济渠上最壮观的景色。为此政府设置专门管理机构，沿途设有仓城、驿站来保证漕运的顺利与安全。通济渠是否畅通直接关系到中央政权的稳定。除粮食之外，盐、铁等国家专营物资的运输也多依靠此条水道，所以它是维持国家财政的重要纽带。国家主导的大规模、高强度运输使通济渠在运河系统里处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成为国之命脉。

二、通济渠与永济渠、江南河的联动关系

通济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北段的永济渠、南段的江南河相连，共同构成覆盖帝国核心疆域的水路交通巨网，大大提高了国家的整体动员和整合能力，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推进着南北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

（一）构成全国性的水路交通网络

通济渠开凿、永济渠整修连接江南河后，共同形成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呈“人”字形分布的全国性水路交通网。以前所未有的宏大气魄，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实现了中国东部主要地区水路相通。

在这个宏大的网络体系中，三段运河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又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1. 永济渠，北上战略通道。它从洛阳附近的黄河河南岸开始，向北一直延伸到涿郡（今北京一带），主要是隋炀帝征讨高句丽时为运送兵员、粮草等物资到东北前线而修建。它也加强了中央对河北等传统重镇的控制。

2. 江南河，南方经济命脉。它北起京口（今镇江），南至余杭（今杭州），横贯当时中国最富饶的江南地区。其主要功能就是将本地区出产的粮食、丝绸、手工艺品等物资集中起来，为北运提供源源不断的供给。

通济渠正好处于该网络的中心枢纽。承上启下，向北通过黄河和永济渠联系起来，把南方的财富运送到政治、军事中心；向南通过邗沟和江南河联系起来，把中央政令和影响力辐射到经济腹地。三者联动形成一个高效的循环系统，江南的财富通过江南河、通济渠、永济渠运往华北，满足首都的需要和北疆的军事需

要，中央的控制力、北方的产品和文化也沿同样的路线南下，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治理和资源调配。水路网络的形成，就是隋唐帝国能够维持广大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的重要物质条件。

（二）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深度融合

如果说通济渠构建的交通网络是帝国的骨骼，那么在这骨骼上流动的经济、文化交流就是充盈其中的血肉。这条水道不但是货物运输的通道，而且还是思想、技术、风俗、人才的交流通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促进了中国南北经济、文化深层次的交融，造就了隋唐时期开放包容、绚丽多彩的时代风貌。

经济上的融合最直接地表现出来。江南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如双季稻耕种法、育秧移栽等，随着人口的流动以及官方的推广，沿着大运河向北传播，逐渐影响着黄淮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南方丝绸、瓷器、茶叶、纸张等精美手工业品通过通济渠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市场，丰富了北方人的物质生活，也促使北方相关产业开始模仿并发展起来。北方的马匹、毛皮、药材等特产从运河南下供应给南方。大规模、常态化的商品流通，一方面打破了区域经济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南北经济的互补性、依赖性空前增强。

文化上的交融更深入、更细致。通济渠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运河。无数文人学士、官僚士子、僧侣道人或赴京赶考，或奉旨上任，或游历传道，舟行于通济渠上，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描写运河风光，抒发家国情怀。南方细腻婉约的文风与北方雄浑刚健的诗风在运河两岸的城市里相遇，共同造就了唐诗的繁盛。扬州、开封等运河城市成为文化汇集之地，南腔北调在此交汇，饮食习惯、节庆风俗、衣着服饰互相影响。

思想、知识的传播因此变得十分方便。南方的佛教宗派、道教思想可以很快地传到北方，北方的经学传统也可以对南方产生影响。先进的印刷技术、造船技术、水利工程的经验等都是依靠工匠、书籍的交流而加快传播的。全方位的融合不但使中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也使不同的地域民众有更强的认同感。通济渠像一条文化的大动脉，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使隋唐文化具有了兼容并包、开放宏大的独特魅力，其影响绵延后世，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三、通济渠对隋唐帝国格局的战略影响

通济渠开凿以后畅通无阻，给隋唐帝国的总体战略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它既

是维系庞大帝国运转的经济命脉，又是深层次改变中国政治、军事、区域经济地理的一把钥匙，是认识隋唐盛世乃至后来朝代国家治理模式的一把钥匙。

（一）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

通济渠最核心的战略价值，就是给隋唐这个多民族统一帝国打下了牢固稳固的经济基础。依靠高效的漕运系统，通济渠保证了国家对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的掌控与调配能力，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给帝国的政治稳定和军事行动提供可靠的保障。

隋唐两朝的都城长安、洛阳虽为政治、军事中心，但是本地粮食产量早已不能满足数百万人口的巨大消耗。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江淮及江南地区每年输送的巨额漕粮。通济渠是连接两个区域的主动脉，通济渠畅通无阻就代表着京师的粮食安全得到保障、朝廷正常运转得以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常备军得以养活。一旦漕运断，京师就会立刻出现粮荒，政治动荡在所难免。因此，历代统治者把保持通济渠畅通当作治国的头等大事，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疏浚管理。

这根经济大动脉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将全国的经济资源，特别是江南的财富，集中起来用于国家层面的宏大事业。无论是对内巩固统治，还是对外开拓疆域，都需要有强大的财力支持。通济渠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来源，使朝廷可以供养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抵御北方、西北方向游牧民族的侵扰，保障边疆的安全。充裕的财政使朝廷可以修建大型工程，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在灾荒之年进行跨区域粮食调拨，赈济灾民，从而维持社会稳定，增强民众对统一政权的向心力。通济渠以物质的输送把帝国的政治意志传送到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把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的利益与帝国的整体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真正从经济上把一个多元的共同体捏合成一个牢固的整体。

（二）塑造了新的区域地理格局

通济渠一开通，中国的传统经济地理格局就被打破，区域经济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它不但催生出一批新兴的运河沿岸城市，而且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轴线发生了历史性的偏转，影响一直延续到后世。

通济渠开通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集中在黄河流域，也就是关中平原、华北平原。城市兴衰主要是由政治中心和陆路交通要道所决定的。通济渠的建成开辟出一条新的、效率比陆路高出很多的水上经济通道。这条走廊依靠强大的资

源集聚和辐射功能，很快改变了沿线地区经济面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运河城市的发展。通济渠和长江交汇处的扬州，由于咽喉地位，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之一，富甲天下，素有扬一益二之称。位于通济渠与汴河交汇处的汴州（今开封），是南北货物集散地和漕运管理中心，是五代、北宋时期成为国都的基础。这些新兴城市代替了很多传统内陆城市，成为区域甚至全国经济增长极。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通济渠的开通，是中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转移的决定性一步。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农业潜力，依靠通济渠这条高效的输出通道被充分发挥出来。财富不断积累，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最终超过了一直以来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方。隋唐时期形成的南粮北调、南货北销模式一直延续了近千年，成为此后中国近千年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

这样的经济地理格局改变也引起社会结构、文化景观的变化。大量的人、资本和技术都流向了运河沿岸和江南地区，使这些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加快。以运河为轴线，连接南北，串联城乡的新经济空间结构逐渐形成。此种结构决定了后来历代王朝的财税来源、经济命脉，也决定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形成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大致轮廓。通济渠这条人工开凿的河流，最终用它的经济力量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地理空间。

第四节 通济渠相关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

一、正史、方志与文人笔记中的通济渠记载

卷帙浩繁的古籍是探究通济渠历史面貌的第一手资料，朝廷诏令、地方实录、文人感怀，不同的文字记载共同构成关于运河的记忆之网，为后人研究提供基础坐标。

（一）《隋书》《唐书》等官方史书的记录

正史对于通济渠的开凿及功能有纲领性的记载，是记载帝王、朝政、重大历史事件的权威文献。隋书炀帝纪明确记载了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隋炀帝下诏开凿通济渠的历史事实：发河南、淮北各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从板渚引黄河入汴，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淮。而《食货志》等篇章更进一步地表明其根本

目的，即沟通南北经济命脉，把江淮地区丰富的物资，特别是粮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政治中心洛阳以及北方边防，支撑庞大的国家机器和频繁的军事行动。虽然记载着帝王意志和国家功业，但是也表现出工程浩大、役使民力之巨，为后人评说隋炀帝功过留下了最初的文本依据。

唐代以后，通济渠的战略地位越发重要。《旧唐书》、《新唐书》的食货志、地理志等，都对唐代运河的依赖和管理作了详细的记载。通济渠不但是维系长安、洛阳两大都城的生命线，也是朝廷平定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重要保障。史书记载唐代设有转运使、水陆运使等专职官吏，为保证漕运畅通进行疏浚、修堤等工程。安史之乱期间，通济渠是否通畅直接决定朝廷能否从江南得到财赋的供给，在危急时刻它的军事、政治价值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从正史中可以发现，通济渠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它的命运同隋唐两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历史记载的宏大叙述，给通济渠在国家顶层设计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权威性文本打下了基础，也是运河历史研究的根基。

（二）地方志与古代地理文献的考证

相比正史的宏观视角，流传下来的地方志和地理专著由于其“在地性”和“细节性”给我们描绘出了更为具体生动的通济渠景象。沿途州府河南府、宋州（今商丘）、泗州等地的地方志书，保存了大量关于通济渠河段走向、宽度、水文变化、堤岸柳树种植、桥梁津渡名称与位置、沿岸市镇兴衰的珍贵资料。这些记录一般都十分细致，某年某月对某段河道进行了疏浚，某座桥梁是某位乡绅捐资修建的，某个码头因为泥沙淤积而废弃等，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

专门的地理文献，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用严谨的考证准确记录了通济渠在元和年间流经的郡县、水文特征，是复原唐代运河水道的宝贵指南。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等著作，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把各地的地理信息、历史沿革结合起来，使通济渠变迁的脉络更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文人笔记如张籍的《送客之江南》、白居易的《隋堤柳》等，并不是信史，但是用文学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商旅往来、船只络绎不绝的繁华景象和隋堤路旁多故人的历史沧桑感，给冰冷的历史叙述增添了丰富的人文情感和社会生活气息。

二、通济渠沿线的考古调查与重要发现

文字记载毕竟是间接的，而考古学用自己独有的手铲释天书的方式，把埋藏

在地下、被遗忘的历史实体展示在世人面前。顺通济渠旧河道经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直接反映通济渠工程工艺、航运规模和社会影响。

（一）河道遗址、码头与桥梁遗址的发掘

近些年来，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相继发掘出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河道本体遗迹。考古学家通过对遗址剖面进行分析，可以准确地测量出古河道的宽度、深度，分辨出堤岸的修筑方式，比如“版筑法”夯实的堤坝，河床里不同时期的淤积层。不但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通济渠“宽四十步”，也可以体现出古人的水利工程水平之高。

最为瞩目的发现集中在关键节点上，具体而言：

1. 洛阳含嘉仓和回洛仓遗址发掘后，发现有通济渠首段紧密相连的庞大的国家粮仓群。其中含嘉仓城内发现的数百个巨大的粮窖和码头区，直接证明了通过运河运到京城的粮食储量之大，是通济渠漕运功能的铁证。

2. 淮安板闸遗址发现的是唐宋时期为了解决水位落差，保证船舶顺利通过而修建的复式船闸。这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的重大突破，有实物证据表明古籍记载是真实的，显示了古人治水的智慧。

3. 沿线的石砌桥墩、木桩基础等各种桥梁遗迹，既可以让我们了解古代桥梁的形制和建造技术，又可以证明运河两岸交通的繁忙程度，是运河网络与陆路交通网络互相交融的实物证据。

（二）沿岸城镇遗址与墓葬群的考古成果

通济渠不单是一条运输线，它也是一个经济带和文化长廊，催生出沿岸的许多重要的城镇。考古工作对于城镇遗址的勘探发掘，生动地再现了运河所导致的都市化进程。北宋都城开封（汴梁）以汴河（通济渠的一部分）为中轴线贯穿全城，考古发现的州桥、码头、沿河商业区遗址与描绘繁华场景的《清明上河图》互相佐证。宿州、泗州等运河重镇遗址也发现有和商业、手工业有关的作坊、店铺、驿站等遗迹，勾勒出当年“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的盛况。

运河沿岸墓葬群又是认识区域社会结构的一把钥匙。洛阳、郑州、商丘、淮北等地出土的隋唐、宋代墓葬就有几千座。墓主人的身份也多种多样，有管理漕运的各级官员、靠运河贸易致富的商人、普通船工、纤夫、士兵等。墓葬的形制、规模以及随葬品清楚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等级分化。

墓中出土的器物来自不同窑口的瓷器、各地的钱币、舶来的香料和珠宝，无

声地诉说着运河作为物质与文化的大动脉。普通船工墓出土的几枚不同铸造年份的铜钱、商人墓出土的产自南方的丝绸和北方的马具等，都具体而微地反映了因运河而产生的人口流动和商品贸易网络，为研究通济渠沿线社会经济史、生活史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

三、出土文物对历史文献的印证与补充

如果说文献、遗址是历史的骨架，那么出土文物就是填充其中的血肉。无论是带有文字的石刻，还是沉没在水底的器物，都用实物同文献记载进行对话，或印证、或补充、或修正我们对通济渠历史的认识。

（一）碑刻、墓志铭等石刻文字史料

由于石刻文献材质坚硬不易被修改，所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通济渠沿线出土的碑刻多为河道疏浚、堤防修建、桥梁建造、税收管理等内容，一般会记载工程具体时间、主持人、经费来源、参与人员，给运河管理与维护研究提供准确的个案信息。一块记载某地官吏组织民众修筑堤防的纪功碑，可和地方志中简略的记载互相印证，还原出一个具体的公共工程事件，使历史不再仅仅是空洞的叙述。

墓志铭属于地下文献，有特别的意义。在众多唐宋官员墓志中，有很多曾经担任转运使、判官等与漕运直接相关的职务的人。墓志铭对这个人当官期间在运河岸边担任的各种职务，取得的成绩以及在管理漕运时的困难、挑战都作了详细的记载，例如防洪、打击盗贼、改进运输方法等。从当事人的角度去审视运河运行，知道官史书中没有体现出来的微观管理细节、人在历史大潮中的作为。石刻文字像一块块拼图，和传世文献一起构成完整生动的通济渠治理史。

（二）瓷器、沉船等实物反映的航运生活

实物遗存比文字史料更能真实地反映通济渠上经济活动以及日常生活。运河河道及其两岸考古发掘出大量的隋唐宋元时期的瓷器碎片。碎片来源广泛，有越窑的青瓷、邢窑的白瓷、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瓷、景德镇的青白瓷等南北各大名窑的产品。这些陶片清楚地显示出了商品流通的路线与规模，可以证明通济渠为南北瓷业的贸易大动脉。

沉船出现好似打开一个已经等待了很久的时光容器。在通济渠故道或者与其有关的水域中发现的古代沉船，其船体结构本身就是研究造船技术和航运能力的

珍贵实物。船上装载的粮食、瓷器、丝绸、铁器等大宗商品的运输形态和贸易内容，在成堆的粮食、码放整齐的瓷器、成捆的丝绸、铁器等实物中直接体现出来。

沉船里还保存着船员们的生活用具，简陋的炊具、磨损的棋子、寄托平安愿望的护身符等。平常的物件把我们的视线拉回到运河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使我们看到他们的衣食住行、精神信仰以及喜怒哀乐。这些在文献中很少被涉及的“无声的历史”，使得通济渠的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功业史，而成为一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社会生活史。

第五节 通济渠历史价值的当代审视

一、中华文明重要标志的价值所在

（一）彰显古代中国卓越的工程智慧

通济渠的修筑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大创举，是古人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的智慧结晶。此项工程不是凭空开凿出来的，而是利用了原有的汴水、古济水等自然河道，裁弯取直、疏浚拓宽，引入黄河水作为主要水源，最终形成了一条连接黄河和淮河的稳定的航运干线。“引黄入汴济淮”的宏大构想背后是古人对广阔地域内水文地貌的深入认识和准确把握。

就具体的技术而言，通济渠的修建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水利工程的最高水平。为了保证水流平稳、河道水位稳定，设计人员准确地计算出了河道比降，并修建了坚固的堤防，即后来著名的“汴堤”来约束水流、防止泛滥。沿堤遍植柳树，一方面可以起到固堤护岸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汴堤烟柳的独特景观，有生态和美学双重价值。

整个工程从最初规划、勘测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组织施工都显示出很高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在隋炀帝的强力推动下，数百万劳工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超大规模的资源调动和工程管理能力，本身就是古代中国工程智慧和社会组织能力的集中体现，给后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二）印证大一统国家的治理能力

通济渠的开凿，主要动力是大一统国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而产生的政治需要。它像一条强壮的生命动脉，把政治中心关中、洛阳和经济富庶

的江南地区紧密连接在一起，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控制能力。朝廷可以迅速调动军队，随时对付东南方向出现的威胁，有效地加强了国家的防御能力。

尤其是它保证了国家经济命脉漕运的畅通无阻。隋唐时期都城设在北方，但是主要的粮食产区却在江淮流域。每年数百万石的漕粮通过通济渠运到京师，供给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队和都城居民的生活。可以说，通济渠能否通航，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权是否稳定。把各个区域资源整合、再分配，使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就是大一统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表现。因此通济渠的兴衰同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成为评价一个朝代治理水平和国力强弱的标准。

二、探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

（一）重农抑商政策下的商品经济脉络

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之下，通济渠的存在和发展却给商品经济的繁荣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门。虽然修建它的初衷是为了漕运、军事等国家战略目的，但是由于其巨大的运输能力和便利性，民间商业力量自然而然地加以利用，使其蜕变为一条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这条运河除了官方漕粮外，还运输南方的丝绸、茶叶、瓷器、竹木，北方的马匹、矿产等大宗货物。商贾们或利用漕船的空载返程，或自备船只，沿通济渠南来北往，不绝如缕。大量的商品长距离流通，使区域分工越来越深，市场也趋于一体化，从而打破了以前自然经济状态下存在的地域壁垒。

运河通航之后，沿线就出现了一大批繁华的商业都会。扬州作为运河的东南门户，曾是国际贸易的枢纽，开封（汴州）地处通济渠中段，很快发展成为四方汇集的商业中心，在鼎盛时期，《清明上河图》就将它的繁华景象呈现了出来。这些城市的繁荣就是商业资本活跃、市民阶层壮大的具体表现。

通济渠激发的商业活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固有认识。它说明即使在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里，只要存在基础设施的便利以及强烈的市场需求，商品经济就会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从而对社会经济状况造成重大改变。

（二）国家财政与区域经济的共生关系

通济渠清楚地表明，古代中国中央财政同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通过漕运制度体现出来的。运河畅通不但是维系国家财

政体系正常运转的生命线，也是形成南北经济格局基本形态的基础。

国家对通济渠的财政依赖是绝对的。唐代中期以后，朝廷的财政收入越来越依靠江淮地区的赋税，其中大部分是以漕粮的形式通过运河运到京城。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天下赋税一半集中于江南”，而这些财富之所以能被中央所用，基本上都是通过通济渠和整个大运河体系的畅通来实现的。运河一旦因为战乱或者淤塞而中断，京师就会出现粮荒，朝政也会随之动荡。因此运河的管护成为历代朝廷的第一要务。为了保证漕运，国家建立了复杂的管理体系，即漕运系统：

1. 设立专门的漕运官署，负责组织、调度和监督粮食运输的全过程。
2. 沿线设置仓储系统，用于粮食的中转和存储，以应对突发状况。

同时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受到漕运体系的影响。该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土地制度、商业活动等都与国家漕运需求有关。一方面稳定的漕运需求使江南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商品化，另一方面沉重的漕运负担也给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就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经济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通济渠是维系这个共同体的纽带，它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国家财政和区域经济的连锁反应。

三、通济渠历史研究的现实启迪

（一）大型水利工程可持续性的深思

通济渠一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大型水利工程可持续性挑战的生动教材。成功的原因在于它宏大的构想和出色的执行力，但是它后续的维护问题也让人深思。通济渠以黄河水为源，解决了水源问题，却埋下了无穷的后患。黄河有“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大量泥沙被带入通济渠河道，造成严重的淤积。

为了保证航道的畅通，历代王朝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去长期疏浚。高昂的维护费用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国力衰退之后，疏浚工作就难以维持，运河的通航能力也就迅速下降，甚至中断。金元以后，由于政治中心东迁以及黄河改道破坏原有水系，通济渠最后走向废弃。这充分说明，任何大型工程在规划之初就应该把全生命周期的维护成本、生态环境影响考虑进去。

通济渠的例子表明，一项工程成功与否不能只看建起来时的辉煌，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它是否能在经济上可承受、生态上可兼容、社会上可持续。今天我们在进行南水北调、跨海大桥等超级工程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借鉴通济渠的经验教训，

进行更加全面、长远的科学论证，保证工程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能够持续发挥效益，而不是给后人留下沉重的负担。

（二）文化遗产对当代区域发展的启示价值

通济渠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它所承载的深厚文化遗产正在逐渐成为当代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它流经的区域至今仍然保存着许多历史遗迹、文化遗产，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瑰宝。通济渠的历史给后人带来的是文化遗产价值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契合性。深入挖掘通济渠文化谱系，开展创新实践，可以给沿线地区转型发展提供一条独特的途径。其借鉴之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它可以成为区域文化旅游的核心吸引力。对古河道、古码头、古城镇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保护性展示，用现代科技手段再现运河昔日的繁荣，可以打造出有特色的运河文化旅游带，促进沿线城市旅游、餐饮、文创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通济渠所体现出来的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运河精神，可以成为当下区域合作的文化纽带。历史上运河把不同的地域文化连接在一起，促进了经济、思想的交流。沿线城市联合打造运河文化品牌线路，举办文化节庆、学术论坛、艺术展览等各种活动，形成跨区域文化认同与经济合作平台。对于运河生态环境变迁史的研究，也为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面镜子。汴堤植柳的生态智慧、人与自然长期互动的经验，可以为现在运河流域的生态修复、绿色廊道的建设提供历史依据和灵感。因此，把通济渠这样的线性文化遗产当作一条流动的“文化经济带”来整体规划和活化利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再次成为连接区域发展、承载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就是其历史价值在当代最生动的体现。

第二章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理论构建

第一节 文化谱系理论的发展与演变

一、文化谱系的概念溯源与核心内涵

文化谱系的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思想源泉是实证科学，后来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的改造和深化，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特点。认为历史是非连续的、偶然的，重点研究知识、权力和主体形成过程中的断裂和斗争。

（一）从考古类型学到文化研究的谱系学方法

谱系学方法的思想源头是考古学的类型学。对于器物形态、纹饰和工艺的精细比对，可以建立器物在时间维度上的发展序列，即对“物”之“世系”的梳理，成了谱系学分析的最早形态。考古学家用类型学可以确定遗址的相对年代，也可以描绘出某一区域内文化因素起源、发展、传播和融合的过程，形成以物质遗存为依据的“文化谱系”，其中蕴含着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的探究，为后来的谱系学研究奠定了实证基础。

20 世纪以后，谱系学的概念被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引入到文化研究当中，给谱系学赋予了新的批判性含义。福柯的谱系学反对传统史学宏大、连续、目的论式的叙述。它不是追求纯粹、统一的起源，而是关注卑微、零散、带有偶然性的出身。它所要揭示的，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知识是如何被建构、话语是如何形塑权力的、主体又是在权力关系网络中生成的。与考古学器物序列不同的是，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使谱系学方法研究的主要对象发生了转变，即由原来的对“物”的客观变化进行描述，转为对“知识 - 权力”复合体生成机制的批判性考察，成为有力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工具。该方法不再只回答“是什么”，而要追问成为这样的过程怎样发生，强调历史断裂、斗争和权力运作的微观过程。

谱系学方法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就属于一种诊断式历史考察。它如同医生诊断疾病，通过对历史微小的“症状”——制度、话语、实践等加以审视，从而

寻找出当下社会文化形态产生的原因。它重视那些被宏大的历史叙述所遮蔽或者遗忘的边缘话语和抵抗行动,力求使历史呈现出来它的固有的复杂性和多元声音。通济渠文化谱系的研究应该借鉴此种研究方法,挖掘出运河历史上不同权力主体的话语博弈、多元文化实践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力学,进而建构起一个更加立体、动态的文化图景。

（二）谱系：时间序列与空间结构的统一

谱系一词所具有的内涵不是线性的时间发展,而是时间序列与空间结构的有机结合体。家族谱系图既表现出代际传承的时间轴,又表现出同一代人之间横向的亲缘关系网,文化谱系既有历时性又有共时性。双重维度使得谱系分析可以体现文化现象在历史长河中延续与变异,也可以体现文化现象在特定社会空间中相互影响、相互联系。

从时间序列上看,谱系学研究的是文化元素的“衍生”和“演变”。它从通济渠的漕运制度、沿岸文学意象、民俗信仰等文化现象入手,探究其从最初形态发展演变的过程,经历过的重要的转折、断裂和重构。它不是平缓、单向发展起来的进化,而是一个有曲折、有中断、甚至有倒退的过程。谱系分析探究这种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非连续性,再描绘出每一次变化的原因和结果,就形成了一条动态、复杂的文化演进链条。

谱系学从空间结构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化元素在某一时间点或某一空间上存在的关系。任何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技术水平、思想观念等其他社会因素构成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复杂网络。谱系分析要考察的是通济渠形成的一批文化现象和当时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区域经济格局等之间怎样相互影响,从而形成具有一定功能和意义的“文化场域”。它把运河当做一个能量和信息交换的枢纽,分析各种文化力量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之后所形成的共时性文化景观。谱系是时间的纵向发展,也是空间的横向展开;两者结合之后,文化分析就不再只是一种静态的表述或者线性的叙述,而能够在更为宽广的维度上去把握研究对象的历史生命力。

二、国内外文化谱系研究的主要流派

自从谱系思想出现以后,不同学科、不同时代的学者根据各自理论追求、研究路径的不同,形成了多种谱系研究流派。各流派之间的学术论争、思想对话一

起促进谱系理论的发展，给当今的应用该理论提供多元的参照系。

（一）文化进化论与传播学派的谱系观

谱系思想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文化进化论和传播学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谱系观带有强烈的时代局限性。19世纪文化进化论以泰勒、摩尔根等人为代表，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运用到人类社会。他们认为全人类文化发展都是沿着一条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单线进化序列发展，也就是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普遍发展之路。这一观点本质上是目的论式的、等级化的谱系观，把所有的文化都纳入一个预设的“总谱”中，用当时国外的文明作为最高阶段，带有明显的国外中心主义色彩。

相反，20世纪初的文化传播学派，德国的“文化圈”理论、美国的“文化区”理论等，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构建它的谱系观。传播论者反对单线进化论的普遍规律，认为文化的发展更多是由于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接触和传播。他们主要研究某种文化特征（某项技术、某个神话、某种制度）的地理起源中心，画出它的向外传播路线图。这样的研究路径，实际上是从空间的角度来建构文化特征的传播谱系，重视地理邻近性对文化塑造的作用。传播学派的谱系观虽然摆脱了进化论的僵化模式，但是有的时候容易陷入机械的文化特质追踪，忽略文化在流传中出现的本土化改造和意义再生。

早期的两个流派，一个注重纵向的时间发展，另一个注重横向的空间传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涉及谱系思想的主要要素。它们的研究虽有不足，但是为后来的谱系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是谱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们对于文化历时性追溯与共时性关联所作的尝试，给福柯等后辈学者的理论突破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谱系学转向

20世纪中期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谱系研究也发生了深刻转向，由原来的描述性历史方法论，转变为一种带有批判性、反思性的哲学态度。转向就是对历史、权力、知识三者之间关系的重新考虑，完全颠覆了传统谱系观念。

结构主义，特别是列维-斯特劳兹的人类学研究，是从共时性角度去寻找各个文化背后共通的、深层次的“心智结构”。结构主义者认为，这些普遍的对立结构超越时间而塑造出所有的文化表象。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历史发展过程被弱

化，对于某一种文化现象的谱系梳理也就不再重要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式可以被看作一种反谱系的，或者说是非历史的谱系学，它所构建的是逻辑关系的谱系，而不是历史生成的谱系。对共时性结构的重视，给后来的谱系学分析提供关注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启示。

真正的谱系学转向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那里发生的。福柯的谱系学站在结构主义的对立面，它的批判比以前更加尖锐，对传统历史学的连续性、目的论假说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借用并改造尼采的谱系学概念，发展出历史批判的方法，用来剖析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福柯的谱系学研究，像《规训与惩罚》、《性史》这样的著作，并不是试图去构建一条连续的发展历史，而是在于展现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明显、理所当然的制度（监狱、疯人院等）和观念（性、理性等），是如何在历史权力斗争中被偶然地、碎片化地建构起来的。反纪念碑的历史就是关注历史的断裂、意外和异质性，目的是“搅乱”我们对过去稳固的认识，从而开启对“当下”批判性反思的可能性。因此谱系学就从一种客观描述的工具，彻底变成了带有解构性、政治性的批判理论。

三、文化谱系理论应用于线性文化遗产的适用性

线性文化遗产由于自身特有的形态以及丰富的内涵，对于研究方法有特殊的要求。文化谱系理论以对时间、空间、连续、断裂、宏观、微观等各方面的整合性关注，给线性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解读提供了一个非常适用的理论框架。

（一）线性文化遗产的“链式”与“网状”特征

线性文化遗产，运河、古道、长城等，最突出的物理特征就是沿着一定的路线展开的带状空间。其形态天然就具有链式结构。通济渠以洛阳为起点，连接黄河和淮河，形成明显的地理链环。链上每一个节点，也就是沿线城市、渡口、堤防、仓储设施等，都是通过水道这一物理媒介连接起来的，共同构成一个功能整体。就历时性来说，这条链条的形成、延伸、改道、废弃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条清晰可见的时间序列史，给谱系学分析提供物质载体和时间坐标。

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物理线条，而在于它所具有的强大的辐射和聚合能力，它是一个“网状”的系统。通济渠这条大动脉，滋养并联系着广大的腹地。它是物质运输的通道，也是信息流、人口流、文化流交汇的廊道。以这条水道为中心，就形成了一个中心城市、集镇、乡村、广阔田野共同构成的复杂社

会经济网络。政治命令可以畅通无阻地传达,商业贸易可以繁荣兴盛,思想文化可以交流碰撞。因此线性文化遗产本质上是线和面的结合体,也是链式结构和网状结构的统一。谱系学研究要同时把握这两个特点,既要沿着链条发展的纵向演变谱系进行梳理,也要对在网状结构中与其他社会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横向联系谱系进行分析。

由此可见,其研究不能用孤立、静止的视角来考察。通济渠的文化意义,并不在于其工程本身,而在于它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怎样重新塑造了隋唐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格局。它既是流动的历史之链,又是不同的时代记忆的累积;既是动态的社会之网,又是多元文化交织的复杂图景。它的复合特征正好和时间序列、空间结构统一分析范式相吻合,给谱系学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场地。

（二）谱系理论对运河文化层累性与动态性的解释力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历经千年宏大工程的历程,它的文化形态就具有明显的层累性、动态性特点,谱系理论正好可以用来分析这两点。运河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被叠加、改写、重塑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谱系理论能够有效揭示运河文化的“层累性”。

1. 运河河道本体、水利设施、沿岸城镇、村落像地质剖面一样叠加着不同时期的物质遗存和文化印记。隋代开凿的原始规制、唐代繁盛的漕运景观、宋代以后逐渐衰落的河段、近现代对部分遗址的考古发掘与保护,一起形成了层层堆积的“文化地层”。谱系学分析就如考古学家一般,一层层地挖掘文化层,分析各个文化层之间的承继、覆盖和断裂关系,理解每一层文化是如何在前一层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为下一层形塑提供土壤。

2. 意义的叠加,以运河为依托产生的文化意义也是层累的。不同时代通济渠所承载的象征意义是不同的,隋炀帝功过评价的焦点、唐代诗人吟咏的离愁别绪与帝国繁华、后世学者眼中的国家命脉与历史见证。多元的言语、记忆、情感相互交织、覆盖,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意义复合体。谱系学研究这些意义的“谱系”,探究其产生的话语环境和权力背景。

谱系理论对阐释运河文化的动态性有很强的阐释能力。它把运河文化当作一个可以变化、内含张力的过程来考察,而不再把它看作一个本质固定、内容单一的实体。谱系分析所关心的不是运河文化“是什么”,而是它怎样不断生成和变

化的过程。它追问通济渠的功能怎样由最初的军事、政治控制变为经济命脉,进而成为文化交流的通道?此时期兴起哪些文化实践,又消失哪些文化实践?官方叙事与民间记忆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与博弈呢?回答这些问题之后,谱系学方法便将一个固定的传统文化遗产重新塑造成有生命、能自我发展变化的历史动态主体,进而体现出传统文化文化价值生成机制及其内在逻辑。

第二节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内涵与特征

一、通济渠文化谱系的定义与构成要素

(一) 以运河为主体的文化生态系统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主要特征,就是运河作为绝对主体形成的文化生态系统。通济渠绝非一条简单的人工水道,它更像是区域社会的“主动脉”,它的开凿、疏浚、通航直至淤废,都深深地塑造并规定着沿岸地域的兴衰沉浮与文化面貌。这个生态系统以水为滋养之源,以漕运为驱动之动力,把沿线城市、乡镇、村落、农田、水利设施、军事要塞等空间单元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有机整体。运河是整个系统的基础,它掌控着物资流通、信息传递和人口迁徙的命脉。

都城洛阳的繁荣昌盛、沿岸仓城的拔地而起、商业市镇的蓬勃兴盛,都是这个生态系统内部能量交换、物质循环的直接结果。运河畅通保证了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同时,也产生了依水而居、以船为生的特殊群体。反之,运河一旦淤塞或者改道,整个生态系统就会陷入失衡的危机之中,沿线城镇慢慢衰败,文化景观也随之改变。因此,通济渠文化的研究不能脱离其宏观的生态系统而孤立存在,需要把它放在整个生态系统里去考察,分析它作为核心动力如何和周围环境产生互动、塑造出独特的聚落形态、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最后形成一个具有高度内在联系的文化共同体。

(二) 物质、非物质、生态、社会等子系统的整合

通济渠文化谱系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是由许多相互交错、互相影响的子系统共同构成的。这些子系统像谱系的血肉一样使谱系成为一个立体、多维的存在。对其进行拆解分析与重构就是谱系建构的关键所在。

1. 物质文化子系统是谱系中最直观、最易接触的层面，是运河文化物质的骨架。它包含运河河道本身、堤坝、水闸、桥梁等水工遗存，以洛阳含嘉仓、回洛仓为代表的宏伟仓储建筑群，沿线古城镇、码头、驿站、店铺、会馆等聚落与商业设施，以及通过运河运输的南方丝绸、瓷器、茶叶和北方粮食、马匹等各种商品。物质遗存是历史最直接的证明，也是文化谱系研究最坚实的实物依据。

2. 非物质文化子系统：依附于物质载体之上的活态文化，构成运河的灵魂。这包括漕运管理制度、船帮行会规约、精湛的航运技术、独特的民间习俗等；流传在运河两岸的文学作品，如大量吟咏运河风物和漕运盛况的唐诗宋词；与运河神祇崇拜有关的祭祀仪式、民间信仰、传说故事（河神祭拜等）；以及由于人员流动而形成的方言、饮食习惯、戏曲音乐（河南坠子、大平调等）和各种手工艺。

3. 生态文化子系统通济渠开凿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人工生态改造工程，它彻底改变了黄淮平原的水系网络和地理景观。子系统主要研究人与运河水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由于运河形成的独特的滨水植被景观、人工湿地生态、与运河相适应农业灌溉系统和渔业养殖模式。它深深地体现出了古人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生态智慧和环境伦理。

4. 社会文化子系统，运河开通以后，随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社会结构以及群体关系。该子系统围绕运河而建立，以漕运官员、押运军士、以船为家的船工、往来贩运的商人、依附码头生存的纤夫、脚夫等社会群体为主要组成人员。这些群体的互动、冲突、融合一起形成了一个生动复杂、具有独特社会风俗、阶层文化的社会。

这四个子系统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座古码头的物质遗存必然与商贸习俗、船工号子、码头工人社会组织、周边因水运而兴起的特定经济作物种植区等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通济渠文化谱系完整的画面。

二、通济渠文化谱系的基本特征

（一）流动性：因水而生、随运而动的文化特征

流动性是通济渠文化谱系最基本、最本质的特征。在此情况下，文化不再是固定在土地上的静止的东西，而是像运河里的水一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态流变之势。流动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规模的人口往来。南来北往的官员、商人、士人、僧侣、士兵、工匠，他们不但是物质财富的搬运者，更是文化信息活跃的传

递者。北方深厚的政治制度、军事思想随着官船南下，南方精致的经济模式、生活美学伴随着商船北上，个体在迁徙中成为文化的移动媒介，大大促进了区域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流动性即物质和思想的快速交换过程。通济渠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把江南的财富和文化精华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原腹地。洛阳城里的贵族可以品尝到江南的鲜鱼，欣赏到越窑的青瓷，这是运河开通以前无法想象的奢侈。中原地区儒学经典、政治思想也很快传播到南方，对江南士族思想格局产生了影响。高速流动打破地域限制，使本来相对隔绝的文化单元之间不断交流、碰撞，产生新的文化创造力。

流动性最后内化为一种独特的心态。生活在运河边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迎来送往、兴衰沉浮，所以他们的性格中往往会带有一种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的特质。船工豪迈奔放的号子、城镇居民兼容并包的饮食习惯里，都蕴含着一种生动活泼的动态文化气质，这就是“在路上”的文化精髓。可以说通济渠的文化生命力就是在不断的流动中得以维持和更新的。

（二）融合性：南北文化、中外文明的交汇与共生

由于通济渠文化谱系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因此它也表现出明显的融合性。它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文化熔炉，把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层次的文化元素汇集在一起，在长时间的淬炼与融合之后，最终锻造出一种包罗万象、独具特色的新型文化形态。融合性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南北文化的二元整合。通济渠一端连着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另一端直达南方的经济、文化腹地，是两种主流地域文化交汇的前沿阵地。

通济渠沿线既有北方文化中雄浑、质朴、秩序的气质，严整的城市规划、森严的仓储制度，也有南方文化中精致、灵动、商品经济活力的园林艺术、市井生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不是简单的并列，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北方的政治权威依靠运河对南方的控制，南方的经济力量、文化风尚又反过来渗透到北方的社会生活中，柔化并丰富了北方的社会风貌。洛阳城既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又是运河滋养的国际大都市之一，本身就是一个南北文化深度交融的典范。

而且中外文明交流融合也深深反映在通济渠上。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国内的交汇点，通济渠就是外来文明进入中国腹地的重要通道。中亚的粟特商人经由丝绸之路到达洛阳，之后又经由通济渠把异域香料、珠宝、玻璃器皿、宗教艺术品等运送到江淮地区。同时中国的丝绸、瓷器也经由这条水

路汇集到沿海港口，远销海外。双向交流使通济渠沿线不但是中华文明内部的交融带，也是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重要舞台，给隋唐文化的开放和辉煌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三）层积性：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遗存的叠加

通济渠自隋朝开凿以来，经过唐、五代、宋、金等朝代的持续修整与使用，所以它的文化谱系具有明显的累加性。它像地质剖面一样，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痕迹层层叠叠地交错存在，共同形成一个很深的历史文化时空体。正因为层积性，对于运河文化的解读必须从考古学的角度去审慎发掘，并辨识出不同的时代文化地层。

层积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物质景观的叠加和演变。隋代开凿的河道本体为最初的底层基础，之后唐代加固、扩建，北宋时期局部改道并实行系统化管理。现在在通济渠故道沿线，常常会发现隋唐时期的堤岸基础、宋代的桥墩遗址、明清时期由于河道淤积而形成的村落。古镇的格局保留着宋代商业街市的风貌，但是其内部的庙宇却重建于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传说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不同时期的物质、非物质遗存共存一处，一起形成复杂多样的景观。

文化内涵的层积性就更加深刻。以运河文学书写为例，隋炀帝开河的功过在唐代诗人笔下常常成为咏史怀古的主题，到了宋代则更多地和经济繁荣、漕运实务联系起来。对于同一个神祇的信仰，在不同的朝代里会赋予它不同的职能和象征意义。文化层积不是简单的后者覆盖前者，而是一个有机地生长、累积的过程。后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都是在前一个时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改造和丰富了前代文化的内容。因此通济渠的文化谱系就是一部不断被书写、被改写的活态文本，每一层都保存着特定时代的信息，共同讲述着运河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生命故事。

三、构建通济渠文化谱系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为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系统性框架

当前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遇到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碎片化。对于单个遗址或者单项非遗的保护，很容易割裂它与整个运河文化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造成见物不见人、见点不见面的局面。构建通济渠文化谱系正好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框架，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状况。

谱系化的视角认为保护工作不能孤立地看待单个遗产点，而应该转向对文化廊道的整体性保护。它把物质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和社会脉络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制定保护规划时，不能只修复一座古桥，而应该考虑与这座古桥有关的历史航道、渡口村落、商旅传说以及传统造桥工艺等。按照谱系相关性选择保护模式，能够最大程度上保持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保证被保护的对象不仅仅是一堆死物，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文化生态系统。

谱系框架也给遗产价值的阐释和展示赋予了明晰的逻辑。借助谱系图，公众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一个看似普通的古码头是如何同国家漕运制度、商人社群生活、地方戏曲流传等宏大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进而真实地感受到它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所占有的独特地位。无疑可以加深遗产展示的层次、丰富遗产故事的内容，从而提高社会大众对遗产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二）深化对运河文化整体性与关联性的认识

建构通济渠文化谱系，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运河文化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促使研究者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各个角度来全面考察运河文化整体性、关联性的特点，进而揭示出运河文化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认识的深入，就是运河学研究迈向更高层次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谱系建立以后，通济渠文化不是偶然事件的简单叠加，而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发展过程。水利技术发明对漕运效率产生怎样深刻的影响，进而改变了沿线城镇的经济结构，在地方志和文学作品中又怎样被记载下来。打破学科壁垒之后，对于运河文化我们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它使我们明白，通济渠不但是一项工程奇迹，更是一个塑造中国历史地理格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催生出灿烂文化艺术的巨大动力源泉。

对于整体性、关联性的深刻认识，最终是为了当前运河文化创新发展的目的。认识文化要素之间存在的联动关系，在文旅开发、乡村振兴等实践中就可以找到更加精准的切入点，设计出既尊重历史脉络又富有时代创意的文化产品。比如可以再现一段古漕运的场景，用非遗表演与数字展示相结合的方式，把游客带入到运河文化流动融合的独特氛围之中。这就是谱系研究给我们的现实意义——使历史的智慧真正活到今天，并给未来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动力。

第三节 通济渠物质文化遗产谱系

一、物质文化遗产谱系的层级划分

通济渠物质文化遗产谱系不是单一的平面结构，而是一个由内向外、由主体到附属的层级关系。这样的分类有利于认识各种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运河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

（一）核心层：河道、堤坝、水工设施等本体遗存

核心层遗产就是通济渠存在的物理根基，也是运河功能得以实现最直接的证明。它主要由古河道本身、束水固岸用的堤坝系统、调节水量、保持通航的水工设施组成。这就是隋唐时期国家级的工程技术和组织能力集中体现，有着不可替代的实证价值。考古发掘出的通济渠河道剖面，清楚地显示了它的宏大、复杂。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附近发现的运河故道河床的宽窄、深浅可以证明史书记载中“舳舻相接”的场面。

河道本体走向、形态就是隋唐时期对自然地理环境认识、利用程度的直接体现。通济渠开凿时巧妙地连接了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选线充分考虑地势高差、水源补给，显示出了很高的勘测、规划水平。堤坝的修筑除了防洪外，还要维持航道水位、保证漕船通行。考古发掘出的堤坝大多为夯土筑成，层层夯实，结构牢固，重要地段还用砖石加固，说明当时国家不惜工本。

水工设施是核心层技术含量最高的体现，也是保证这条人工动脉持续搏动的关键。为了解决水位落差而设置的堰、斗门等节制闸，虽然实物遗迹很少，但在文献记载和考古迹象上都有体现。这些设施的存在说明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后世运河水工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核心层每一个遗存，就是解读通济渠这个超级工程的密码。

（二）关联层：码头、桥梁、仓窖、城镇等衍生遗存

关联层遗产是运河开凿、运行所产生的一切附属设施、聚落形态。它们与运河本体在功能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通济渠完整的社会经济系统，是运河发挥漕运、商贸、交通功能的重要支撑。这一层次的遗产直接表现了运河怎样改变沿线地区社会面貌、经济格局。

码头、桥梁是运河交通功能的直接体现。码头是货物装卸、人员往来的地方，

码头的规模、分布密度体现的是某河段的繁忙程度。考古发现的码头遗迹有的结构简单，只有夯土台或者斜坡状泊岸；有的规模宏大，用砖石砌筑，有栈道、阶梯等设备，体现出官方与民间不同的等级。桥梁把被运河隔开的两岸连接起来，保证陆路交通畅通无阻。洛阳城外的横跨洛水的通济渠重要节点天津桥，不但是交通要道，更是文人墨客的吟咏对象，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

仓窖和城镇是运河经济功能的集中体现。通济渠沿线设有规模宏大的国家粮仓，洛阳的含嘉仓、兴洛仓，滑县的黎阳仓，共同组成了隋唐帝国的“国家储备库”。含嘉仓遗址发掘出的大量窖穴，巨大的储量和科学的管理方式使世人震惊，是通济渠漕运功能最有力的证明。运河带来的大量人流物流促使沿途许多新的城镇兴起和发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北宋都城开封。开封因为“四水贯都”的地理优势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布局、商业形态都与运河息息相关，是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

（三）延展层：出土器物、生活用品等物质载体

延展层遗产指的是在运河河道及其关联遗址里发现的、可以移动的文物，是当时社会生活、文化交流的微观物证。虽然这些物质载体体积小，但是其中包含丰富历史信息，可以生动地再现运河沿线民众的生活、经济活动和天南海北的文化交流。

沉船以及沉船上货物属于延展层里最有故事的遗产。河泥里的古沉船是封存在时间胶囊里，保存它们失事时珍贵历史信息的。通过研究船体结构、尺寸、造船工艺来了解当时的航运工具发展水平。船上装载的货物种类繁多，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南方各大窑口的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釉下彩瓷等，它们清晰地勾勒出一条“水上陶瓷之路”的贸易路线。另外铜钱、铁器、丝绸残片等也给我们还原当时商品流通网络提供直接的证据。

沿岸遗址出土的生活用品，所描绘出的是一幅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无论是官署衙役用的印章文具，还是普通船工用的陶釜瓦罐，无论是富商巨贾家中的金银器皿，还是城镇居民用的梳妆用具，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运河沿岸的社会结构、风俗人情。这些器物的来源地多样本身就证明通济渠是一条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南方秀美精致和北方雄浑质朴，在运河的作用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交融与碰撞，塑造出隋唐宋时期兼容并包的时代气象。

二、物质文化遗产谱系的时空演变规律

（一）从隋唐到宋元：空间格局的变迁与功能的迭代

通济渠的空间格局和核心功能，在隋唐到宋元时期有重大改变。隋唐时期通济渠的主要价值就是连接政治中心长安、东都洛阳和富饶的江淮地区，空间格局以洛阳为中心，形成了一个“T”字形。此时的运河物质遗存中洛阳周边的含嘉仓、回洛仓等巨型仓储设施，规整的官办码头等，都带有很强的国家意志和政治色彩，主要是为“漕运为本”的帝国战略服务。河道本身也体现出开创时期宏大的规整。

到了五代和北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东移到开封，通济渠的汴河段（即从荥阳到泗水段）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生命线。开封取代洛阳成为运河网络的新中心。此时期运河物质遗存的新特点有：1. 城市与运河的关系更加紧密，开封城内“四水贯都”，河水穿城而过，码头、商铺、邸店沿河而建，公私设施混合存在，城市兴盛与运河脉动完全融为一体。2. 商业功能越来越明显，除了官方漕运外，民间商贸活动空前活跃，从大量的小型私人码头、商铺遗址以及出土的大量铜钱、各国商品中可以得到证明。运河的功能由单一的漕运转变为漕运和商贸并重的复合功能。

进入金元时期，由于国家政治中心北迁至大都（今北京），元代又开凿了新的京杭大运河，通济渠传统河段逐渐失去了国家干线的地位。其物质遗存的演变也表现出衰落的过程。许多河段由于水源枯竭、泥沙淤积而断航，沿岸曾经繁华的码头、城镇随之衰败甚至被埋在地下。考古发现宋元地层叠加上，非常清楚地记录下了这次历史性的变迁。通济渠的功能从国家动脉变成区域性的水利灌溉或者局部通航河道，物质文化遗产谱系的时空演变最终被历史记忆所固定下来。

（二）技术演进：水工技术与航运工具的发展脉络

通济渠长期的使用和维护过程就是古代科技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物质文化遗产清楚地记录了水工技术及航运工具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古人怎样应对自然考验、提高运输效率。

水工技术的演进是保障通济渠长久畅通的核心。

1. 水源调度、水位控制方面，从隋唐时期比较简单的堰埭蓄水发展到宋代更加精巧的斗门（单体船闸）。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汴河上发明的一种复式船闸，使用连续的闸室来提高或者降低船只的通行效率，大大提高

通行效率并减少水耗，是水运史上的一大进步。考古工作当中出现的疑似闸口基槽、木桩等遗迹，给这些文献记载赋予了宝贵的实物佐证。

2. 清淤疏浚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为了克服黄河泥沙造成的巨大危害，宋代发明出各种清淤工具和方法，制订出一个系统的岁修制度。这些维护工程本身就在河道断面上留下了各个时期的淤积层、清淤层，成为技术演进的地质学记录。

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也属于科技进步的体现。隋唐时期，运河上用船为官办的漕船，船型比较一致，以运载能力为主。隋唐时期的船只多为平底方头方尾，在浅水内河航行很适合。到了宋代，由于商业的发展，航运工具多样化、专业化。除建造了万石船来漕运外，还造出了机动灵活、轻捷敏捷的客船、商船。造船技术上用上水密隔舱来提高船只的抗沉性、安全性。通济渠河道中发现的各个时代沉船残骸，在龙骨构造、船板拼接方式、隔舱设计等不同之处都直接地表现出造船技术的演变轨迹。

三、物质文化遗产谱系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功能关联：漕运、商贸、军事等功能驱动的遗存组合

通济渠的各项主要功能，即漕运、贸易、军事、通讯等，是通济渠物质遗存产生和组合的主要推动力。不同的功能需求会孕育出不同的设施组合，从而形成有特定功能指向的“遗存集群”。功能关联是认识运河遗产内在逻辑的第一把钥匙。以漕运功能为主导，必然会有河道、码头、仓窖、管理机构这样的遗存组合。黎阳仓遗址的考古发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宽阔的运河故道边是专门用来卸粮的码头区，码头后面就是规模巨大的仓城，在仓城中分布着大量的储粮窖穴，同时还有相关的管理官署建筑基址。这四个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完成国家粮食转运和储备的战略任务。

商贸功能兴起以后，就形成了另一种遗存组合：河道、商业码头、城镇（市、镇）、商铺、邸店、手工业作坊。在北宋开封这个商业都会，汴河两岸除了官方码头之外，还有许多民间私营的泊船处。沿河的街区，商铺林立，邸店（兼有仓储、旅店功能的场所）星罗棋布，城内外还有为商业服务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如造船作坊、陶瓷窑场等。它们一起组成一个具有活力的商业生态系统，空间布局和形态都是围绕怎样最好地利用运河这条黄金水道而设计的。

军事功能在历史中留下了它的痕迹。运河沿线的重要地点一般会形成河道、

军港或者水寨、城池或者戍所、烽燧的防御体系。一方面是为了保卫运河交通线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利用运河进行快速兵员和物资调动。在一些重要的渡口或者河防节点上，考古会找到作为军事目的的码头设施、有防御工事的城堡遗址以及用以传递军情的烽火台遗迹。不同的功能遗存不是完全分离的，很多时候它们会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里，一起构成通济渠复杂而高效的社会功能网络。

（二）等级关联：从国家工程到民间设施的层级体系

通济渠物质文化遗产谱系的又一重要的逻辑线索就是等级关联。作为帝国南北之间的主要交通动脉，线上所涉及的各种设施在规划、投资、建造、管理等各方面的差异性十分明显，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等级制度。这一体系就是当时社会等级制度在物质空间的直接反映。

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由国家意志主导、中央直接投资建设的最高等级设施。通济渠主河道、京城洛阳和开封的皇家御用码头、含嘉仓和黎阳仓这样的国家战略粮仓、横跨运河的重大桥梁天津桥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遗存共同的特点是规模宏大、规划严整、用料考究、技术先进，体现的是帝国倾尽天下之力强大的动员能力以及最高级的工程水平，是皇权和国家力量的象征。

在国家级工程之下，各级地方政府或军事机构修建的次一级设施。州县一级的官用码头、地方官仓、城防体系中的水门、区域性交通桥梁等。这些设施的规模 and 标准一般低于中央级工程，但仍然按照一定的规制为地方行政、军事、经济管理服务。它们是国家权力向下延伸的触角，是地方运转的基础设施。再往下就是最普遍存在的民间自建设施。商人或者宗族集资建造的商业码头、民间小渡口、乡村集镇的便民桥、沿河自建店铺民居、祈求航运平安的庙宇等。遗存规模小、形制多样、建造朴素，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质感，如同毛细血管一样依附在运河主动脉上，是运河社会生态中最有生命力的一部分，体现了民间对运河资源利用和适应的智慧。

第四节 通济渠非物质文化遗产谱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谱系的主要类别

（一）传统技艺与知识：船工号子、造船技艺等

通济渠的传统技艺与知识体系，是运河儿女为了适应航运生活而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主要体现在与漕运、商贸活动息息相关的一系列技能上。船工号子是运河劳动的“活化石”，它是船工在拉纤、摇橹、起帆等集体劳动时统一动作、协调力量的口令，也是他们抒发情感、排解劳苦、鼓舞士气的精神寄托。高亢雄浑的旋律、一领众和的唱和方式、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衬词，都具体地表现出了船工群体生命体验和审美趣味，是研究运河劳动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珍贵材料。

与船工号子相伴而生的，就是高超的造船技术。为适应通济渠水文条件的千变万化，两岸工匠创造了独特的造船技术。建造的漕船、商船多为平底、方头、浅吃水，这样既利于在水位较低的河道里航行，又能装载最大的货物量。选材上，工匠们深谙各种木材的性质，用合理的搭配来提高船体的坚韧度与耐久性。船体结构、榫卯连接、捻缝防漏等技术代代相传的是知识体系和操作规范。这些技艺不但是物质生产的技能，也是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朴素哲学思想的体现。纤夫的挽绳技术、舵手的航道判断经验、码头工人的装卸技巧等都是大运河经济脉畅通所不能缺少的部分，也是大运河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

传统技艺和知识都是经由师徒关系、家族内部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承下来的，由此形成了比较稳固且独特的技艺谱系。它们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反映，也是当时社会分工、经济模式、人群关系的真实写照，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二）民俗与信仰：运河水神崇拜、沿岸节庆等

运河上舟楫生涯充满未知的风险，变幻莫测的水情、突如其来的风浪、漫长枯燥的旅途，都使生活在运河上的人们对自然怀着深深的敬畏。敬畏之心以具体的信仰实践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以水神崇拜为中心的民俗信仰体系。沿岸各地都建有龙王庙、河伯祠等庙宇，船只启航之前，船工们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焚香祷告，献上祭品，祈求水神护佑航行平安、一帆风顺。崇拜不是迷信，而是在运河民众生存压力下寻求精神慰藉、心理认同的一种方式，形成一道无形的精神堤坝。

除水神崇拜外,通济渠沿岸的节庆活动也与运河生活息息相关,形成了特有的运河节俗文化。传统的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在运河地区有新的意义。端午节除了纪念屈原之外,又增加了祭祀河神、赛龙舟祈福的内容,龙舟的形态、比赛规则都带有明显的内河航运特征。有的地方还衍生出了和运河漕运周期有关的特殊节日,比如开漕节、封河节等。这些活动是顺应自然节律的实践,也是民间对官方漕运制度的回应,场面宏大、仪式繁杂,集官方、民间、神圣、世俗于一身,是凝聚社区情感、展示地方文化的重要舞台。民俗与信仰活动就如运河支流一般渗透进沿岸民众生活之中,塑造出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

(三) 口头传统与文学:运河传说、诗词歌赋等

通济渠的水流把舟船带到了生活的各方面,也把诸多的故事、诗歌带给了我们,从而构成一个种类繁多的口头传统和文学谱系。运河开凿、漕运的艰辛、商贾的传奇、城市的兴衰,都成了民间口头创作的极好素材。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传说中既有对暴政的批判,又有人们对于宏伟工程的想象;在船夫与水怪搏斗的故事里,展现的是人们战胜自然的勇气;在运河两岸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中给这条充满汗水、忍受艰辛的大河增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传说故事经过说书人、船夫、沿岸居民口耳相传,不断被加工、丰富,成为民众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通济渠壮观的景象、其中的社会百态也激发出无数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诗词歌赋。从隋唐到宋元,无数诗人行走于通济渠上,或者站在岸边,他们的笔下记录了运河的方方面面。这些诗词歌赋除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外,也是研究通济渠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心态的珍贵文献,与民间传说一起组成了通济渠独特的文学景观和情感记忆。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谱系的形成机制

通济渠非物质文化遗产谱系的形成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其深层机制来自于运河独有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功能,主要是航运实践的催生作用和人口流动的交融效应,两者共同构成了运河文化的核心和面貌。

(一) 航运实践催生的生产习俗

通济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接的来源就是以航运实践为中心而展开的运河生活。高强度航运以及组织化的合作,一定会催生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和交流系统。船工号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用音乐的方式解决了大规模体

力劳动的协同问题。造船技艺的发展，就是对“在通济渠上怎样更高效、更安全地运输”这一核心问题的持续回应。如果没有繁忙的航运，就不会有与之相配套的技艺和知识。

在此基础上，一个相对封闭而又联系紧密的“运河社会”便逐渐形成。船工、纤夫、舵手、商人等不同身份的人，在长时间的共同劳动和生活当中，形成了自己的行话和行为准则。船帮内部存在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和利益分配的规则，新船下水、船只过闸、码头停泊等环节都有约定俗成的仪式和规矩。生产习俗是维持航运秩序、降低交易成本的软制度，也是加强从业者身份认同、群体凝聚力的方式。它们来源于生产，又反过来服务于生产，是通济渠非物质文化遗产谱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层面，是运河作为经济动脉功能性文化的鲜明表达。

（二）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交融

通济渠是南北交通大动脉，它所具有的意义远不止于经济方面。它就像一条巨大的传送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运送物资的时候，也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交流。官员赴任、调转，军队南征北战，商人长途贩运，战乱、饥荒造成的流民，都汇聚在这条黄金水道上。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运河沿岸的城市、市镇、码头相遇、杂居，于是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融。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语言、饮食。南腔北调在运河码头汇聚，便形成了一个带有过渡性质的“方言岛”。南方的米食文化与北方的面食文化在洛阳、开封等中心城市相遇后产生新的烹饪技艺与饮食潮流。戏曲、曲艺等各种艺术形式，也顺着大运河传播。北方的梆子戏和南方的昆曲在沿岸城镇同台竞技、互相学习，从而产生新的剧种。建筑风格、婚丧嫁娶的习俗，也在不知不觉中互相渗透。因此通济渠沿岸的文化景观具有典型的复合性、多元性特点，它既有地域文化根脉，又有外来文化元素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带。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文化交融，是通济渠非物质文化遗产谱系不断丰富、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谱系的传承与流变

（一）师徒传承与家族传承的谱系脉络

通济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是依靠两种紧密联系的传统方式，即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门类如造船、掌舵、中医等，大多是以师徒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授。传承中常伴随拜师仪式，学习时间长，师傅传授技

艺的同时也会教一些行规、职业道德和生活经验。学徒要靠口传心授,经由不断的实践,才能渐渐领悟技艺的真谛。这样就保证了技艺的精确稳定,形成了技艺传承的一条条链条,构成了非遗谱系的“骨架”。

家族传承更为普遍,在以船为家的船民中尤其如此。航运生活决定了家庭成员就是生产单位的成员,父亲是船长,儿子是水手,母亲和女儿负责船上生活和辅助工作。造船秘方、航海经验、祭祀规矩、传唱歌谣等都是日常生活中由父母一代传给下一代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传承方式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内聚性,使得许多文化事象得以完整地、原生地保存下来,形成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小文化细胞。

师徒与家族两种模式互相交织。造船世家在传承技艺的同时,可以招收外姓学徒;船帮内部也会利用拟血缘的师徒关系来巩固组织。这两种模式一起构成了通济渠非物质文化遗产微观传承谱系,在没有官方记载和文字资料支持的情况下,文化基因依然可以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二) 在时代变迁中的适应、变异与重构

通济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谱系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化石,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在不断地变化。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剧变,其谱系也发生了深刻适应、变异、重构。当运河的军事政治功能弱化、商业功能凸显的时候,和漕运有关的官方仪式会逐渐淡出,而和商贸活动有关的信仰、节庆就会更加兴盛。妈祖信仰等海洋文化元素沿着运河向内陆传播,就是文化适应与变异的典型例证。

技术革新也使非遗发生了形态上的改变。近代以后,由于轮船的出现,传统的木帆船建造技艺与船工号子失去了原有的生产功能,或渐渐消失,或成为一种表演性的文化符号,在旅游业中被“重构”、被展示。运河淤塞、改道,近代铁路、公路的修建,使得通济渠部分河段断航,这对以水为生、依托于水路交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许多曾经鲜活的技艺、习俗、传说,也因为缺少了生存的土壤而成为尘封的历史记忆。进入当代,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成了新的时代课题。濒危技艺被抢救性记录,古老的传说被改编成新的文艺作品,古老的运河文化正以新的形式融入现代社会,完成它的当代谱系重构。

第五节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构建方法

一、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路径

（一）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的综合运用

历史学为谱系的构建提供基本的时序结构以及背景支持。通过查阅《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以及《元和郡县图志》等地理总志，可以大致掌握通济渠从开凿、兴盛到演变的大概情况，把握其相关重大历史事件、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漕运管理。史料记载的内容给通济渠在各个时期发挥的不同作用、产生的影响赋予了宏观的叙述架构，让我们能追查文化起源的过程，探究文化发展的脉络。

考古学用物质遗存来给历史叙述提供实物证据。沿线的古城遗址、码头、仓窖、桥梁、堤防、沉船中所发现的器物，都是通济渠文化谱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载体。以洛阳含嘉仓、回洛仓遗址发掘来说，直接展示了运河粮食储存运输的大功能、大容量，沿岸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民众的物质生活、贸易往来。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补充或者纠正文献记载，保证文化谱系的建立是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不是单纯依靠文本推论。

地理学加入进来之后，文化谱系研究就有了具体的空间坐标。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可以复原通济渠古河道变迁、水文环境、沿线聚落分布格局和自然环境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地理学研究运河的线状形态，也研究它对区域地理格局的影响。它解释了为何有的城镇发展成为重要商业中心，而其他城镇由于河流改变而衰败，从而说明文化景观产生的原因是自然及人为因素相结合。

人类学则把目光投向人本身，研究沿岸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信仰习俗、口述传统。对地方社区进行民族志调查，可以获得鲜活的、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信息，即与运河有关的传说故事、歌谣、祭祀仪式、商帮文化、饮食习惯等。这些活态文化是历史在当下的延续，是文化谱系中最为生动、最富于感性的一部分，也是宏大工程怎样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中的表现。

（二）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文献和田野是接近历史真实性的两个基本途径，二者互相补充，不可偏废。将传世文献宏大叙事同田野调查微观洞察融合起来，这是保证文化谱系研究既有

历史厚度又有现实温度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研究者走出书斋，用脚步去丈量历史，用心去感受文化。

文献研究属于基础性的工作，它给田野调查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问题意识。除了官方史书以外，地方志、族谱、文人笔记、诗词、碑刻铭文、古代地图中也包含着许多文化信息。唐诗宋词里大量描写通济渠舟楫往来、商旅不绝的诗句，既属于文学作品，又是当时社会经济繁荣的写照。系统整理文献，可以建立文化元素清单及初步的时空框架，为之后的实地考察提供索引。

田野调查是对文献记录的检验、补充、活化。重视研究者的现场感和亲身体验，用实地勘察、测绘、访谈、观察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 文化遗产点勘察，参照文献、古地图，在实地找到并记录目前存在的古码头、古桥、古庙宇、古民居等物质遗存，对它们的保存状况、建筑风格、空间布置进行详细的记载和测绘。

2. 口述史采集：深入沿岸村镇，寻访高龄老人、地方文史学者、船工后代等，系统地采集与运河有关的口述历史、民间传说、歌谣谚语。口述资料可以弥补文字记载的空白，也可以补充关于普通百姓生活方面的内容。

3. 非遗记录：采用参与观察、影像记录等方式，将沿岸地区还在流传的庙会、祭祀仪式、手工艺技能、戏曲表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地记录并整理出来。

经过这样的工作，研究就不再只是冰冷的文本分析，而带有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的对话。田野里的一块石碑，也许就能验证一段被忽略的历史，老船工的记忆，也可能会为某个文献里的词语找到真实意义。于是抽象的文化谱系就有了具体的坐标和鲜活的人物故事。

二、文化谱系构建的技术路线

（一）文化要素的识别、分类与编码

文化要素是构成通济渠文化谱系的最基本的单位。对其进行准确的识别、科学的分类、系统的编码，是建立数据库、进行模型分析的前提。实质上就是对文化信息进行“知识图谱”式的结构化处理，给复杂的文化现象创建起一个清晰的逻辑架构。

文化要素的识别，即研究者要从大量的文献资料、考古报告、田野笔记中，全面、细致地提取出构成通济渠文化的重要信息单元。它们既可以包含物质性的

内容,例如一座桥梁、一个码头、一段堤坝、一种船型、一件出土的瓷器;也可以是非物质性的内容,即一个神祇信仰、一个民间传说、一种商业习俗、一个节庆活动、一首地方戏曲。识别过程应该尽量完整,保证文化谱系的完备性。

对识别出的文化要素进行系统的分类。分类体系的建立要兼顾科学性、可操作性,可以采用多级树形结构。上层分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种。在物质文化之下可以细分为水利工程遗产(渠首、堤岸、堰闸)、建筑遗产(桥梁、庙宇、仓廩、驿站)、交通工具、出土文物等。非物质文化分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传说、歌谣)、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传统手工艺等。分类体系成了整个谱系创建的逻辑骨架。

给每个文化要素赋予一个唯一的、信息化的编码。编码中包含要素种类、空间信息、时间信息的主要内容,利于计算机检索和分析。设计良好的编码规则,例如 TJQ-WZYC-JZ-001-S0618-T0755,可以清楚地表示出该要素属于通济渠、物质遗产、建筑、编号 001,空间信息对应隋代,时间信息对应唐天宝年间。标准化的数据处理方式是连接传统文史研究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桥梁,为之后创建庞大的时空数据库打下了基础。

(二) 时空数据库的建立与可视化呈现

经过编码的文化要素被整合到同一个平台,构建出一个时间和空间都具备的综合性数据库,这也是文化谱系数字化管理、研究的重要环节。数据库不单是数据的仓库,更是一个动态的知识发现平台,可视化就是把抽象的数据转化为直观的知识的有效途径。

时空数据库的创建要设计出适合的文化要素多元信息存储的表结构。核心数据表应有编码、名称、描述、分类的要素表,要素起始时间、延续时间、结束时间的时序表,要素位置信息、行政区划、河段的空间表,以及要素间的关系关联表。该数据库可以很好地将来各个学科、各个来源的异构数据(文本、图像、地理坐标、时间戳)整合在一起,对通济渠文化遗产信息进行“一站式”的管理。

在数据库的基础上,可视化呈现就是将文化谱系研究成果展示给公众和研究者的一种方式。单一的文字报告不能表现出通济渠文化时空的复杂性,必须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来进行多维度的展示。

1. 数字地图平台:用 GIS 地理信息系统把带有空间属性的文化要素标注到多层历史地图上。用户可以对它进行缩放、漫游,点击任何一个要素点都可以看到

该要素点的详细信息、相关图片以及文献记载。叠加不同的图层可以得到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文化要素分布的情况。

2. 交互式时间轴,创建可视化的通济渠重大历史事件、河道变迁、重要文化要素兴衰历程时间轴。用户移动时间轴可以查看文化景观在千年时间范围内的变化情况,从而感受到文化景观的历时性。

3. 三维虚拟复原,对已经消失的重要历史场景,隋唐洛阳城通济渠段、含嘉仓仓窖群、汴州城繁华市场等,用三维建模、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数字化复原。给使用者营造出一个沉浸式的体验,让使用者的感觉像置身于历史时空中一样去体验大运河往日的辉煌。

三、文化谱系动态模型的构建

(一) 基于 GIS 的文化要素空间分布分析

地理信息系统是数据管理、制图的工具,也是强大的空间分析引擎。借助 GIS 的空间统计和分析功能,不仅可以解释“在哪里”的问题,还能探究文化要素为何在某个地方、文化要素在空间上分布的规律,进而发现文化现象和社会经济活动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用核密度分析可以找到通济渠沿线文化要素的集聚区或者“热点地区”。分析沿线寺庙、道观的分布密度,找出宗教活动的中心区,然后研究它同城市、码头、商业区的空间关系。该类分析可以直观体现文化资源非均衡分布的特点,为认识区域文化中心的形成提供线索。

通过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可以定量研究各种文化要素的空间邻近关系。可以研究仓储设施和码头的距离,集镇和渡口的位置关系,手工作坊和原料产地的空间耦合性。设置不同的距离阈值,对运河经济带的功能组团进行关联强度分析,可以发现运河经济带功能组团的内在逻辑和空间组织模式,对理解古代城市和交通体系的规划思想有重要意义。

GIS 网络分析功能可以将通济渠本身当做一个线性网络来进行可达性、流模式的分析。可以模拟计算在某一历史时期里,货物、人员、信息在运河上从一个点运到另一个点需要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从而评价沿岸各城镇节点的区位优势。该种分析可以说明某些城市会成为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商品集散地,还可以解释交通效率对经济地理、文化传播的影响。

（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文化关联

如果说 GIS 主要用来发现地理空间中存在的关系，那么社会网络分析法则更擅长于发现地理距离之外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网络。通过将文化要素、人物、地点等抽象为网络中的节点，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师承、贸易、影响、传播）定义为边，就可以构建出通济渠文化传播和互动的网络模型。

运用 SNA 方法，能够实现以下深层次分析：

1. 核心节点识别，计算网络中各个节点的中心度（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特征向量中心度），可以找出文化网络中起关键作用的“超级联系人”。节点可以是起着文化交流枢纽作用的城市（如汴州），可以是促进某种技艺或思想传播的人物（如某位高僧、大商人），也可以是被广泛复制、模仿的文化范式（如某种建筑风格）。

2. 文化传播路径追踪，SNA 可以模拟、重构文化要素（故事、曲调、信仰等）在运河网络中传播的路径、扩散的过程。通过对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判断出文化传播是以等级扩散（从大城市到小城镇）的方式进行的，还是以接触扩散（沿河逐点传播）的方式进行的，也可以找出文化传播过程中重要的节点以及阻碍因素。

3. 文化社群探测，用社群发现算法，在复杂的文化关系网络里可以自动找到内部联系紧密、与外部联系稀疏的“文化社群”或者“文化圈”。这些社群代表的是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地域板块，即在手工艺、方言、信仰等各方面表现出高度同质性的若干个沿河城镇。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从通济渠沿线文化多样性和区域一体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理解。

由此形成了一种动态模型，通济渠文化谱系不再只是静止的展示，它成了由许多节点和连线组成的、具有流动性和生机的复杂系统。由此可以对通济渠文化谱系进行宏观的整体结构把握，也可以对文化互动的具体机制进行微观的探究，从而真正达到对通济渠文化谱系的深入解读和科学建构。

第三章 通济渠物质文化谱系研究

第一节 河道与水工遗存谱系研究

一、通济渠河道本体遗存的考古类型学分析

河道本体是通济渠最基本、最核心的物质遗存。对不同时期的河道遗存进行类型学分析，可以清楚地勾勒出通济渠从开凿、使用、演变、废弃的全过程，表现出人工水系动态的生命史。

（一）不同历史时期河道的宽度、深度与堤坝结构

根据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记载，隋代开凿的通济渠河面宽四十步，约六十米左右，规模宏大，可以承载龙舟巨舫航行，也可以承载大量的漕运船队。该时期河道深度有严格的规定，保证通航水位常年不变。考古发掘所见隋唐时期的河道剖面大多为底平坡缓的梯形，形状整齐，规划施工有条理。初建时堤坝是版筑夯实的土堤，堤上种满柳树，就是隋堤烟柳，发达的根系能够有效固堤护坡，是生态与工程的结合。

通济渠从唐代一直沿用到北宋，数百年来，河道形态都在变化。由于引黄泥沙淤积，河床不断抬高，河道宽度、深度不断变小。为了维持漕运的功能，历代政府只能周期性地疏浚，致使河道剖面形态越来越复杂，常见多个时期的清淤层和堆积层。堤坝结构不断改进，在汴梁（今开封）等重要城市河段以及易溃决险工处，开始建造砖石包砌堤岸，大大提高了堤防的抗冲刷能力、持久性。物质遗存的改变，如实记录了通济渠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情况，在不断维护下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力。

（二）河道裁弯取直、疏浚清淤的工程遗存

通济渠开凿之初，部分河段曾经利用古代的汴水等自然河道。河道天然曲水流平缓，但是航运里程和时间却变长了。为了提高运输效率，历代管理人都对运河的河道实行了裁弯取直。考古发现的废弃河曲、牛轭湖遗迹就是直接的证据。从故道和现行河道的空间关系对比中复原运河线路变迁过程。裁弯取直缩短航程

的同时，也加快了水流的速度，在加速水流的时候起到一定的冲沙减淤作用，体现出古人对水力学规律朴素而实用的认识和应用。

疏浚清淤是保证通济渠生命线畅通的重要的维护措施。由于其水源主要是多沙的黄河，泥沙淤积一直是它所面临的挑战。在古河道两侧堤岸上，常常可以看见厚厚的、从河道中清理出来的淤泥堆积层，叫做淤背。堆积层在剖面上层次分明，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历次清淤的强弱和次数。文献对撩浅、浚川等水运设施建设记载和清淤劳役组织细节的描写，和考古发现形成了良好的互证关系。工程遗存是运河维护史的直接物证，也是古代社会为保证国家经济命脉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的体现。

（三）河道沉积物所反映的环境与水文信息

通济渠河道底部和两岸的沉积物就像一本没有文字的史书，里面蕴含着丰富的古代环境、水文信息。对沉积物进行系统的孢粉、硅藻、地球化学元素、粒度分析，可以科学地重现运河沿线古植被、古气候、水体环境、水动力条件。孢粉组合的变化可以反映运河两岸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即由自然植被为主向农耕景观过渡的过程，这体现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硅藻遗骸可以精确地反映河水水质的变化，营养状况、盐度、酸碱度等都可以推断出来。这对于认识运河在各个时期生态健康状况、漕运、灌溉、城市供水等各项功能对水质的影响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某一沉积层中耐污染硅藻物种的富集，就说明这一时期沿岸城市生活污水排入量的增加。

沉积物的粒度特征以及物质组成是水文变迁的直接指标。粒度粗细的变化可以反映水流速度的强弱，突然出现的粗颗粒沉积层，往往和上游黄河决口改道或者特大暴雨引发的山洪事件有关。沉积物中某些矿物组分（来自黄土高原的石英、长石）含量的变化，可以反映水源区的变动情况，给探究“引黄济汴”具体进程及其影响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微观信息同宏观历史事件融合起来，就能依靠更高的分辨率来解读通济渠的千年变迁史。

二、关键水工设施的谱系梳理

（一）水门、船闸、水柜的技术演进与功能布局

通济渠沿线水工设施中调节水位、辅助通航的设施技术演进脉络最清楚。早期的堰埭形式比较简单，用蓄水、泄水的方法帮助船只越过浅滩。随后更加精致

的水门诞生。水门是设有闸板的石砌或木构通道，广泛应用于城市水系与运河的连接处，汴梁城的水门可以控制入城水量，保证舟船进出，具有防洪、通航和城市景观的功能。其布局一般设在城市水系的重要节点上，是城市防御和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

船闸技术有了革命性的突破，对运河航运史来说是一块重要的里程碑。从最初单个水道设闸蓄水放行的单斗门（也叫堰），到北宋时期乔惟岳等人发明的复式船闸，即前后设置两道闸门，形成可以独立调节水位的闸室。大大提高了通航效率和安全，船只可以平稳地通过水位落差大的河段，每次通航水量消耗也大大降低。考古发现的宋代船闸遗址中，闸室、闸槽、底板构造清楚，与文献记载相符，说明当时航运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是先进的。

为了克服运河水源不稳定、季节性缺水的困难，古人就创造性地在渠上修建了“水柜”。水柜是运河旁的蓄水湖或人工水库，丰水期引水入柜储存，枯水期开闸放水补给运河，以保证通航水深。水柜选址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一般选址于地势低洼、汇水条件好的地方或者设在水量大、易干涸航段的上游。水柜、水门、船闸等水利设施互相配合，共同组成了一个完备高效的水资源调水系统，从而保证了这条经济大动脉长期运转不衰。

（二）堤防、涵洞、斗门等设施的形制与构造

堤防是保证通济渠安全运行的基础性屏障，它的形制和构造随着技术的发展、功能的需求不断改进。隋唐时期的运河堤岸大都是纯土堤，用版筑技术筑实，并植树固土。到宋代，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和对漕运的依赖加深，堤防工程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开封等都城附近和黄河威胁下的险要地段，开始出现石堤、砖堤，指在土堤迎水面用规格一致的砖石进行护砌，大大提高了抗洪能力。为对付突发险情而发展出成熟埽工技术，用高粱秆、柳枝、泥土等材料捆绑成巨型埽体去堵决口，此技术在黄河长期搏斗中屡建奇功。

涵洞、斗门是用来处理运河和地方水系相交处的构筑物。当运河需要穿越天然沟渠或者排灌水道时，在其下面建涵洞，使地方水流可以从运河下面通过，防止水流交汇造成淤积和水量损失。考古发现的石砌或砖砌拱券式涵洞结构稳固，设计科学。斗门是小型节制闸，设置在从运渠引水的支渠口处，用以控制灌溉引水流量。构造简单，多用木制或者石制闸板，通过升降操作来启闭。这些不起眼的小设施就像人体的毛细血管，把运河主干同广阔田野和地方水网联系起来，具

有航运、灌溉、防洪等多种作用，一起构成通济渠复杂高效的水利生态系统。

三、水工遗存所反映的古代水利科技水平

（一）水源调控与泥沙治理的智慧

通济渠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所采用的、复杂精妙的引水调节和泥沙治理技术。核心难题就是怎样驾驭善淤、善决、善徙的黄河，实现引黄济汴的伟大工程。古人因此做了许多科学研究和实践，所表现出的智慧至今仍然令人由衷敬佩。

这些方法一起构成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水沙调控方案，它并不是单一的技术应用，而是在长期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系统性的工程体系。

1. 运河管理者掌握着黄河的水文节律，一般选择在每年的秋末春初的枯水期引水。此时黄河水量小、流速慢、含沙量低，实现了引清水、避浑流。并且合理利用沿线的斗门、水柜系统对引入水量进行二次分配与时空调度，保证航道水位稳定。

2. 多级沉沙和清淤分离：引水口附近一般都会建有大范围的沉沙池或者蓄水湖泊，例如广济河流域诸泊。黄河水注入后，首先在此处停留，依靠重力作用，大部分的粗颗粒泥沙被沉淀下来，把比较清澈的水源引入干渠。先沉淀、后输水模式开创了世界上大规模人工沉沙工程的先河。

3. 创设斗门调水调沙：在渠首及沿线重要节点处设斗门，既可以控制入渠水量，又可以通过闸门启闭技术，在放水冲沙时形成急流，把渠首附近淤积的泥沙重新带进黄河，达到以水攻沙的目的。

（二）工程测量与施工组织的管理体系

通济渠在短时间内打通了千里，背后必然有高效的工程测量和施工组织管理体系做支撑。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长距离、高精度水准测量对于工程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古人用水平木或盛水盆等作为水准仪的雏形，配合望杆、标尺等工具来逐段测量高程，保证运河河床有精确且微小的比降。该比降既不能让水流太快而停止，又不能使水流过缓而造成淤积，勘测和设计难度很大。

施工组织上隋唐帝国体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以及精细的管理水平。被征发的劳役按照军事化的编制，设将校等各级官吏监督指挥。工程分段包干，责任到人，各段既分工又合作，流水线作业，极大地提高了施工效率。文献记载的“丁男毕集”、晨夜攻作”，考古发现的劳工墓地、施工营地遗迹都再现了当时浩大

的建设场面。

管理体系在工程质量检验、后期养护上体现出来。从中央的都水监到地方的河渠官员，形成一条完整的管理链。工程中规定了验收的标准，并建立了定期巡查、岁修制度。宋代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水利设施维修、河道疏浚管理的模式，即签堤、拨夫等。这套包含勘测设计、施工组织、后期运维的全流程管理体系，是古代国家治理能力在大型水利工程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其严密与高效，就是通济渠千年不废的制度保障。

第二节 聚落与城镇空间谱系研究

一、运河沿岸城镇的兴起与空间形态演变

（一）因运河而兴的商业市镇

通济渠开凿之后，直接催生出一系列新生城镇。这些城镇的发展并不依靠传统的政治或者军事功能，而是完全被交通、商业所驱动。隋唐时期以洛阳为中心，东到开封、商丘，南至淮安、扬州，沿线出现了很多繁华的商业市镇。以汴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板桥镇为例，因为处于重要的货物转运枢纽，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商旅往来、百货汇集的重要节点。这些市镇的经济命脉同运河息息相关，运河畅通则市镇兴盛，河道淤塞或者改道，市镇就会迅速衰落。

这些因运而兴的市镇，社会构成也具有明显的商业化特征。居民中商人、船工、纤夫、码头力役、仓储管理者、为流动人口提供住宿、饮食、娱乐服务的旅店、酒肆、勾栏从业者占很大比例。人口流动以及职业的商业化一起造就了这些市镇开放、活跃、多元的文化氛围。它们冲破了传统里坊制下封闭的城市格局，塑造出自由开放的空间形态，成了观察隋唐社会经济发展新趋向、城市发展新特点的窗口。繁荣景象是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由政治主导转变为经济主导的最早迹象，为宋代“城市革命”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二）城镇功能分区：码头区、仓储区、商业区、居住区

通济渠沿岸城镇的空间结构受运河功能需求影响很大，自然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区域功能分带。以经济活动为依据的布局方式，和传统的以行政管理为中心的都城规划大相径庭，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各个功能区互相联系，互相制约，

共同构成一个高效的物流和商贸系统。

各个功能区的布局呈现出紧密的逻辑关联：

1. 码头区是城镇和运河的连接地带，一般设在城镇最临水的地方。这里舟楫成群，樯橹如云，是货物装卸、旅客上下、船只停泊的主要区域。日夜不停地劳作和喧嚣，共同组成了城镇最富有生命力的动态景观。

2. 仓储区紧挨码头区，利于货物的装卸和储存。大量的官仓、私营邸店、货栈在此集聚，用以储存漕粮、盐、茶、丝绸等大宗货物。仓储区的规模大小以及管理水平的好坏，直接体现了该城镇在运河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3. 商业区是城镇经济的中心，一般沿河道或从码头延伸出的主干道发展。街道两旁商店鳞次栉比，有酒楼、茶坊、客栈、钱庄、各种手工作坊，商业街市繁荣昌盛。这里既是信息中心、又是资本中心、又是商品交易中心。

4. 居住区远离码头、商业区的喧嚣，分布在城镇内部或者稍远的地方。富商巨贾的宅邸与普通市民、手工业者的住所交错分布，有时还会按照职业或者籍贯划分出不同的街区，比如船巷、铁匠营等。

（三）城镇扩张与运河河道变迁的互动关系

运河城镇的生命线在于水，其空间形态的发展变化，始终同通济渠河道的变化保持密切联系。既表现为城镇顺应河道自然生长，也表现为城镇因河道变化做出的被动调整和积极适应，是人与水共生共荣、相生相克的空间演化史。最早的城镇大多沿运河河岸呈带状或者梳状发展，以求最大程度地利用临水条件。主街和运河平行，小巷像鱼骨一样垂直于主街，一端连接到热闹的商业区，另一端通向幽静的内河或者支流，形成一套有效的客货疏散网络。

城镇持续繁荣造成人口增加、用地紧张，从而促使城镇向纵深发展或者沿河道的上下游延伸。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的码头和商业中心就会在更加适宜的地点出现，促使城市向新的发展方向。河道的自然变化，淤积、决口、摆动等都会给城镇的空间格局造成严峻的考验。当主航道淤浅、港口功能衰退的时候，城镇的经济重心就会转移到新的深水岸线上，旧城区衰败、新城区崛起。有些城镇为了应对河床抬高，不得不反复加高堤防，造成城镇整体地势低于河床，形成“悬河”下的独特城市景观。相反，城镇过度发展、废水无序排放，也会造成河道污染、淤塞，进而影响自身的生存环境。因此运河城镇的空间形态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二、不同等级聚落的谱系关系

（一）都城、州府、县治、市镇的层级体系

通济渠沿岸聚落体系，有明显的金字塔式层级结构。处于最顶端的是隋唐两代的东都洛阳，它是运河体系的总枢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也是漕粮转运、物资调配的最高指挥机关。洛阳城内含嘉仓是我国最大的粮仓，其规模和储量也很好地体现了它在运河系统中的地位。都城之下是沿线的州府级城市，有汴州（开封）、宋州（商丘）、泗州等。它们是区域性政治、军事中心和物资集散地，控制着广大的腹地，起着汇集地方物资、转运到京师的作用。州府城中一般都建有规模宏大的官仓和繁华的商业区，是国家与地方的纽带。

再下一级为县治，属于基层行政单位，是运河网络中的一级节点，承担着管理地方漕运事务、维护河道堤防、组织区域生产活动的任务。县城虽然规模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的触角。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市镇。它们没有行政级别，但是经济实力雄厚的纯粹经济性聚落。这些市镇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到乡村，把农产品、手工艺品汇集到运河干流上，又把全国各地的商品运送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四级体系以运河为纽带形成一个物流畅通、信息交换频繁的网络来保证帝国的稳定和发展。

（二）聚落分布密度与运河节点的关系

通济渠沿线聚落的分布密度不是均匀的，和运河节点性位置有关系。在运河体系的关键节点处，聚落高度集聚，形成城镇群或者聚落带；在功能较为单一的平直河段，聚落分布则比较稀疏，有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这些关键节点是河流交汇处、重要的渡口、堰、闸等水利设施所在地和重要的转运港口。

通济渠同黄河、淮河等大型水系交汇的地方，常常会出现规模宏大、功能复合的特大城市。洛阳附近的洛口是通济渠与洛水、黄河交汇的重要节点，隋炀帝在此设洛口仓，成为全国性的漕运枢纽，很快形成一个庞大的城市聚落。通济渠入淮处由于转运功能而兴起了繁荣的城镇。一些重要的渡口，板桥渡之类，因为承担着天堑两岸间的转运任务，所以常常有大量人口汇集于此，演变为繁盛市镇。水闸、堰坝的设置一方面调节运河水位，保证航运畅通；另一方面造成船只通行的瓶颈，船只在等候过闸时催生出为船工、商旅服务的商业和服务业，形成聚落。聚落密度和运河节点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说明交通对古代聚落选址和

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聚落命名中的运河文化印记

通济渠沿岸众多的聚落名称，就犹如历史地理坐标上一个个文化印章，直接生动地记录了它们同运河之间深厚的联系。这些地名不但是地理上的标志，更是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和集体记忆的活化石，是通济渠文化谱系中一个独特而有趣的部分。通过这些地名的解析可以明显看出运河对地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很多地名直接和运河的水利设施、交通功能有关。带有“仓”字的地名，如洛口仓、回洛仓，清楚地表明了其作为国家粮食储备和转运中心的功能。带有“桥”字的地名，如板桥镇，说明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渡口。带有“渡”、“津”等字样的地名直观地体现了其渡口的功能。带有“闸”、“堰”等水利控制工程的地名。另一些地名则是由于运河而兴起的商业活动所起的。带有“集”、“市”的地名，例如马头集，体现出它是一个定期或者经常性的商品交易场所。一些地名虽然没有直接包含运河要素，但是它们的兴衰史与运河密不可分，它们的名字背后往往也流传着与运河漕运、商旅往来有关的故事传说。这些地名是当地人对通济渠历史文化集体记忆，也是研究通济渠历史地理、文化变迁的重要线索。

三、聚落空间形态的文化内涵

（一）“因水为街、因河成市”的布局特色

“因水为街、因河成市”，是对通济渠沿岸城镇空间布局特点最精炼的概括。与我国传统内陆城市严整的棋盘式或者回字形布局相比，这些运河城镇的形态更具有机性与自由性。它们的主轴不是官府或者钟鼓楼，而是蜿蜒流淌的运河。主要的商业街道大多沿河岸平行分布，形成以河为轴、以街为序的“一河两街”或者“一河一街”的格局。临河的建筑以商铺、酒楼、客栈为主，门前是街道供人车通行，屋后直接通向河岸，设有私家码头或台阶，便于货物的直接装卸和居民的取水浇洗，形成了前店后河或者下店上宅的实用模式。

这样的布局不但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运河带来的交通优势，而且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人居环境和生活方式。水不再成为城市发展的限制，也不再成为城市的阻碍，而是被巧妙地纳入到城市的肌理里，成为了街道的延伸、生活的背景。居民推开门就可以看到船只经过，打开门就听见桨声，生活节奏和运河的心跳一样。水街相依、人水共生的空间格局，一方面造就了城镇开放、包容、活力四射的商

业氛围,另一方面也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滨水民俗文化。它体现的是顺应自然、尊重经济规律、注重实用功能的规划思想,是古代城市形态多样性的一个典型例证。

(二) 会馆、衙署、寺庙等公共建筑的分布规律

在通济渠沿岸城镇的会馆、衙署、寺庙等公共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文化逻辑,共同构成了城镇公共空间的骨架。建筑的布局清楚地表明了商业力量、行政权力、宗教信仰三者在运河城镇里相互关系以及空间表达。会馆是商人团体的组织机构,它的分布与商业活动最相关。它们一般设在码头附近或者商业街区的核心地段,既便于同乡商人联系业务、集散货物,又能在最繁华的地方展示商帮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大型会馆一般建筑宏伟,集议事、仓储、祭祀、住宿、娱乐等多功能于一身,在城镇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衙署是国家的象征,选址就体现出了对商业活动的监管意图。州县衙门一般都设在城镇中轴线附近或地势较高的地方,以显示庄重威严,但其位置又不会离运河和商业区太远,便于对漕运、市场、税收进行有效的管理。一些专门管理运河事务的机构,例如“都水监”的下属单位,就会直接设立在河畔。寺庙、道观等宗教建筑布置比较灵活,有的选择在城市的高处,可以俯瞰全城;有的藏在街巷深处,给居民提供精神慰藉;也有建在城市风景优美的地方,成为游览胜地。一些专为船工、商旅修建的祭祀水神龙王庙、妈祖庙等多建在码头或者河口显要位置,承载着人们祈求航行平安的朴素愿望。

(三) 民居建筑风格与地域文化的融合

通济渠是一条文化交流的大走廊,使南北方建筑技术、艺术风格发生碰撞与融合,沿线城镇的民居建筑也留下了痕迹。民居保留了本地区传统建筑的特点,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形成了既有各地特点又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运河建筑,是地域文化与流动文化的物质载体。建筑材料运用体现了就地取材和远方来客的结合。基础部分大多用当地石材、青砖,因为耐腐蚀、耐潮湿。而木构部分,尤其梁、柱、斗拱等重要部位用的优质木材一般是通过运河从南方或者山区运来的。因此内陆城镇也能用到通常只在南方才能见到的珍贵木材,从而提高了建筑的质量和等级。

建筑形态和装饰风格的融合更加明显。北方城镇民居中可以看到南方建筑里常见的精巧木雕、砖雕、优美的飞檐翘角,使北方传统民居的粗犷、厚重中增添了几分灵动、秀美。在南方的城镇民居中,也会出现北方建筑中高大的院落、厚

实的墙体来适应当地的气候和生活习惯。商人变富裕之后，对于居于居民住宅建筑而言，也才有财力精心雕砌。许多富商宅邸在布局规划、建筑材料选择、建造工艺上都非常讲究，精巧程度可以和达官贵人的府邸相媲美。南北交融、官商并举的建筑风格很好地表现出了通济渠作为一个文化熔炉的特点。

第三节 出土文物与器物谱系研究

一、运河沉船与出土船骸的谱系研究

（一）不同时期船舶的形制、结构与用料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出土的沉船、船骸，清楚地显示出了古代造船技术的发展过程。隋代初建通济渠时，考虑到北方河道水浅、弯道多的特点，船舶多采用平底、方头、方尾的沙船形制，此类船吃水浅，稳定性好，便于装卸漕粮，在浅滩也能顺利航行。船体结构上早期的船舶大多采用简单的横向隔舱，用料也多用北方常见的松木、榆木等，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建造智慧。

进入唐代以后，由于运河航运越来越繁忙，造船技术也不断进步，船舶种类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的唐代沉船证明，在沿袭并改良平底沙船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船首更尖锐、船身线条更流畅的船型，以适应长途快速航行的需求。水密隔舱技术被广泛地用在船舶建造上，大大提高了船舶的抗沉能力及结构强度，这无疑是中国对世界造船技术发展作出的一大贡献。在用料方面，得益于南北物资交流的便利，南方优质的杉木、樟木也被大量用作船舶的主要结构材料，这也证明了运河所带来的资源互通。根据船体尺寸、数量来判断，船舶的载重量越来越大，完全满足了漕运和商贸发展的旺盛需求，生动地勾勒出了运河技术发展壮丽的史诗。

（二）从船只类型看航运功能与贸易范围

通济渠出土的船只种类不是一成不变的，多种多样直接反映出运河航运功能复杂、贸易范围广阔的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官用漕船、商用货船、小型交通船三类。漕船一般体型巨大，结构坚固，设计上主要考虑最大化的装载量和航行安全，标准化程度高，是国家机器在运河上的具体体现，主要任务是将江南的粮食和物资运往洛阳、长安两大都城，维系着帝国的生命线。

商用货船形制更加灵活，大小不一，是民间商业活力的生动写照。大型商船往来于扬州、开封等主要的商埠之间，从事丝绸、瓷器、茶叶等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小型商船主要从事区域性的短途运输，把货物分发到沿岸的州县市镇，从而形成了一个干线和支线相结合的航运网络。商船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通济渠不但是政治水道，更是黄金商业水道。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的客船、交通艇，它们为官吏、商人、旅人以及普通百姓提供方便的出行服务，从而使得运河沿线的人员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频繁。船只类型不同的差异，清楚地体现了通济渠在国家漕运、长途贸易、区域交通等方面具有叠加的效应，它的航运范围广阔，覆盖了江南鱼米之乡到中原政治核心的广大地域。

（三）船载遗物所反映的贸易内容与船员生活

船载遗物给人们认识运河贸易内容、船员日常生活提供了独特的微观视角。沉船中的货物遗存最直接地再现了当时的贸易场景。除了大量的粮食颗粒遗存可以证明漕运的基本功能，出水的瓷器、陶器、铜镜、漆器等也成为贸易商品的重要部分。这些精美的器物有南方越窑、长沙窑的青瓷，北方邢窑、巩县窑的白瓷等，在通济渠上汇集、转运，最后流入沿岸的城市和乡村，形成了清晰的水上陶瓷之路。丝绸、茶叶等有机物虽然不能保存到今天，但是通过文献记载以及茶具等相关器具的发现，仍然可以推测出当时巨大的贸易量。

船员的生活遗迹也十分丰富。在船上发现的陶质或者铁质的炊具、个人使用的餐具、照明用的油灯、消遣用的棋子、骰子等等，都生动地再现了船上单调而漫长的航行生活。出土的开元通宝等货币既是交易的媒介又是船员个人财产。带有特殊戳记或铭文的物品，甚至可以让我们追查到船只的归属、船员的籍贯。这些看似琐碎却非常真实的遗物，把宏大的运河叙事拉回到具体的人物身上，在国家与商业大潮之下，个体们在舟楫之间度过的生活旅程被一一细致地展现出来。

二、沿岸遗址出土瓷器的谱系分析

（一）南北方窑口瓷器的汇集与流通

通济渠贯通以后，中国古代瓷器生产的“南青北白”两大体系间的交流融合程度大大提高。运河沿岸洛阳、开封、扬州等城市遗址、码头、沉船出土的瓷器碎片就是运河繁华文化密码。南方窑口的代表是浙江越窑的青瓷，釉色清亮、造型秀美，经由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成为上层社会竞相追逐的珍品。湖南

长沙窑瓷器主要采用釉下彩绘、贴塑装饰，题材丰富，生活气息浓厚，产品经运河运往中原，再经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与此同时北方的窑口产品也通过通济渠向南方流传。河北邢窑的白瓷以“类银似雪”著称，和越窑青瓷一起引领了唐代瓷器审美。巩县窑除了生产高质量的白瓷外，烧造的唐三彩也远近闻名，东都洛阳是唐三彩最大的消费地和集散地之一。通济渠就像一个巨大的传送带，把各地的瓷器汇集到沿岸的城市里，再进行交易和再分配。这种汇集不但是商品的流通，也是生产技术、装饰艺术、审美观念的交融与碰撞，对之后中国瓷器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瓷器作为商品与生活用品的文化意义

通济渠沿岸出土的瓷器既有商品功能，又有生活用品的功能，同时还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它们不单是冰冷的物质遗存，也是带有一定时代社会观念、等级秩序、审美情趣的文化符号。

1. 瓷器作为商品，它的流通状况可以直观反映出隋唐时期市场经济的活跃程度。不同等级、不同窑口的瓷器价值相差很大。越窑秘色瓷、邢窑上等白瓷等精品瓷器为贵族们用以显示身份的奢侈品，交易常常和权力、财富联系在一起。大量的普通民用瓷器，碗、盘、罐等都属于大众日常生活用品，在运河沿岸市镇的店铺中出售。其价格波动、市场占有率的变化都成了衡量区域经济兴衰的重要标准。瓷器贸易的繁荣催生出专门的商人、仓储、运输业，成为运河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瓷器的种类、品质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生活方式、文化品位的真实反映。帝王贵冑墓葬或者宫殿遗址出土的瓷器大多制作精良、器型规整，有的还带有金银装饰，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和皇家审美。士人阶层偏爱格调高雅的青瓷、白瓷，常常在器物上题诗作画，使器物带有浓厚的文人氣息。普通百姓所用瓷器多为粗陶、普通青瓷或白瓷，器型简单，装饰简朴，以实用为主。通过对于同一遗址内各个区域出土瓷器组合的比较分析，就可以清楚地勾画出当时社会的阶层分化和生活画面。

（三）瓷器款识所揭示的生产地与贸易网络

瓷器上的款识，犹如器物的“身份证”，给我们探究瓷器的产地、流通路线以及消费对象提供直接的线索，也是研究通济渠贸易网络的重要依据。隋唐时期的瓷器款识种类繁多，有窑口款、官府款、工匠姓氏款、吉语款等。

通济渠沿岸遗址中发现的带有邢窑、越窑等窑口款识的瓷器，直接证明了这些名窑的产品通过运河销售的事实。尤其是带有特定地名或机构名称的款识，在巩县窑和洛阳城遗址中都发现了带有“官”字款的白瓷，说明巩县窑曾经专门为设在洛阳的中央官府机构烧造器物，通济渠是贡瓷、官用瓷运抵洛阳最便捷的通道。一些器物上刻有的“盈”、“翰林”等字样，则与大明宫的盈科仓库、翰林院等皇家机构有关，说明运河为宫廷消费服务的最高层级网络。

除官府定制外，有的瓷器上刻有张、王、李等工匠的姓氏，说明在手工业生产中个人标识和品牌意识已经萌芽。一些器物上刻有购买者或使用者的姓氏、商号，以及“大吉”、“福”等吉祥语，使我们能够把具体的器物同特定的社会群体甚至个人联系起来。在地图上对带有款识的瓷器进行标注、连线，便会出现以通济渠为主轴，把生产窑口、中转商埠、最终消费地连接起来的复杂贸易网络图谱，其广度和深度远远大于文献简单的记载。

三、其他典型出土器物的文化解读

（一）漕运工具、度量衡、货币等反映的经济活动

直接体现运河经济活动的物质证据，主要是与漕运、贸易有关的工具和制度性器物。考古发掘出来的铁锚、缆绳桩、滑轮等船舶配件，就是运河航运技术物化的体现。在沿岸的仓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粮仓建筑构件，还有用于计量的“斛”、“斗”等陶质或者木质度量衡器具。这些都是国家对漕粮转运进行管控、维持经济秩序的法定手段，与文献中有关“转般法”、“脚价”的记载相互印证，说明隋唐政府对运河漕运体系的管理十分细致严密。

货币是经济的血液，在通济渠沿岸遗址出土了很多隋五铢、唐代开元通宝。它们既是商品交换的工具，也是沿线商业发达程度的一个直接的反映。特别是在码头、市镇遗址，钱币多呈窖藏或者散落堆积状出现，说明此处曾经是资金流通的汇聚之地。这些器物一起形成运河经济活动的骨架，表现出以国家为主导、商贸繁盛、制度严明的庞大的经济体系。

（二）反映不同阶层生活的日常用品与艺术品

通济渠不但是物资运输的通道，也是人间百态的舞台。沿岸遗址出土的丰富多样的日常用品、艺术品，把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画卷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平民居住区或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主要是粗陶器、普通铁器等，如陶釜、陶罐、

铁质农具等，造型粗糙，功能单一，体现底层民众简朴务实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娱乐活动只能从出土的陶制棋子、骨骰等中窥一斑。

而贵族官僚的墓葬、府邸遗址却是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金银器、玉器、漆器、玻璃器等各种奢侈品层出不穷，制作工艺非常精巧。精美的金银平脱漆器、玉带板上细巧的纹样、萨珊风格玻璃碗上晶莹剔透的光泽，无一不体现出主人财富与地位。铜镜在唐代属于日常用品，但是贵族所用多为装饰繁复的瑞兽葡萄纹镜或人物故事镜，平民多用素面或者简单几何纹的铜镜。这些物质文化上的差别，正是当时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体现出来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运河岸边的清明上河图，但是画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荣辱得失却需要我们借助这些器物来品味和领悟。

（三）外来器物所见证的中外文化交流

通济渠是联系内陆首都与沿海港口的国家大动脉，在隋唐时期繁盛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内陆通道作用。沿岸遗址出土的大量外来器物，就是这一历史事实最有力的证明。来自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仿制银器皿、带有中亚、西亚风格的金银器，经常在洛阳、扬州等地贵族墓葬中被发现。这些器物或者经由陆上丝绸之路，或者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再经由大运河运到内陆的消费中心。

罗马、拜占庭的玻璃器，因为材质的特殊、造型的精美，成为唐代上层社会互相炫耀的异域珍玩。在通济渠沿岸发现的玻璃器皿，不管是完整的器物还是残片，都清楚地表明了这条连接东国外的黄金水道。一些出土的陶俑也有高鼻深目、满脸虬髯的“胡人”形象，有的是牵驼的商人，有的是献技的艺人，都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外来物质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流使隋唐时期物质生活丰富多彩，艺术风格、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之间也有了更多的碰撞。通济渠不但是中国的一条运河，而且是当时世界文明交流网络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第四节 航运设施与码头遗址考证

一、码头遗址的类型与功能分析

（一）官方漕运码头与民用商贸码头的区分

官方漕运码头和民用商贸码头的功能定位、空间布局、建筑规制存在明显差别，这就是隋唐时期国家对运河实行严格管控、有限开放政策的物质体现。官方漕运码头一般都和大型官仓，例如洛阳含嘉仓、兴洛仓等紧密结合，形成仓、渠、城一体化的宏伟布局。考古发掘证明，这类码头规模宏大，结构坚固，多用石砌或者砖石混合结构，岸线平直，极大地方便了大宗漕粮的快速装卸与转运。码头区域管理严格，出土遗物多为带有官府戳记的砖瓦、封泥等官方性质的器物，很少发现民间生活用品，充分反映了其封闭性、专用性。

民用商贸码头形态更加灵活多样，一般分布在城市商业区或者交通便利的河段，与邸店、行会、市集等商业设施共生。考古调查表明，这类码头的规模不一，小的用土、木桩、石砌等造的泊位。其附近出土的遗物种类繁多，有全国各地的瓷器、陶器、钱币、手工业工具、动植物遗存等，真实再现了当时商旅云集、百货充盈的繁华景象。扬州城遗址中发现的商贸码头区，不但是泊位密集的地方，而且有层层叠压的商铺、作坊遗迹，清楚地记录了民间商业活动的脉络。两种码头并存又互相影响，共同组成了通济渠完整的航运功能系统。

（二）不同规模码头的结构与附属设施

通济渠沿岸的码头大小不等，结构及附属设施越复杂的码头在航运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就越高，吞吐能力就越强。等级化的设施配置是运河航运系统高效、有序运行的物质基础，也是运河经济带内不同城镇功能的分工体现。

大型枢纽性码头，即都城或重要州府的码头，结构非常坚固复杂。一般都拥有许多泊位，可以同时停泊几十艘甚至上百艘船只。码头岸壁多用圭形石等标准化石材做锁扣式的垒砌，并用大木桩加固，来抵御水流的冲刷以及船只靠岸时的冲击。此类码头一般配备有完备的附属设施体系，有用来储存货物的巨型仓库群、管理船队的官署、为船工和商人提供食宿的邸店、进行交易的市肆，甚至还有修理船只的船场。这些设施以码头核心区为中心，呈组团式布局，形成一个完善的港口经济区，体现出国家级高标准。

中小型码头主要是地方物资集散、区域贸易用的码头，结构比较简单。小型码头一般只是一段经过平整和加固的土岸，或者用木桩、石块等简易材料建造的停靠点，主要是供小型民船泊位。中型码头有比较规整的石砌或砖砌岸壁，泊位数量不多，附属设施也比较简单，一般只有几间仓库和几间管理房。虽然规模比不上大型码头，但是数量众多，像蛛网一样遍布在通济渠沿线的小城镇、乡村中，是运河航运体系的毛细血管，是地方经济融入运河大动脉的重要节点。不同的等级的码头遗址，一起证明了隋唐时期运河航运网络的成熟。

（三）专业码头的分布与特征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商品经济日益发达，通济渠沿岸出现了很多专门从事某类货物转运的码头。专业码头分布规律及特点，很好地体现了当时产业布局以及国家物资调配的重点。

粮食转运码头是主要的专业码头。它们一般和国家大型粮仓相伴而生，如前面提到的含嘉仓码头。该类码头只用作漕粮的装卸，岸线长、泊位多、靠近深水区，建有直通仓城的甬道或栈桥，缩短转运距离，减少损耗。考古工作中所发现的栈桥桩洞、滑道遗迹都具有很高的专业性。

盐、茶、瓷器等大宗商品的专业码头各有特色。淮安、扬州等两淮盐产区附近有盐业管理机构“盐院”的码头遗址，遗址周围出土了大量的煮盐工具或者废弃的盐包装物。以越窑、邢窑等瓷器产区周围或者主要的销售地附近形成瓷器转运码头。考古发掘出的大量作为贸易品的瓷器、草木灰、垫圈等物品，装卸的方式必然会考虑到瓷器的易碎性而做出特别设计。专业码头的出现是隋唐时期运河航运功能细化之一，也是研究隋唐时期区域经济、手工业生产、商品流通线路等的重要地理标志。

二、航运管理设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漕运司、税关、驿站等机构的遗址考证

对漕运司、税关、驿站等管理机构遗址的考证，是认识国家怎样控制运河航运的重要途径。机构选址、规模、建筑特色里包含诸多历史信息。考古工作经过勘探发掘洛阳、开封、扬州等运河枢纽城市遗址，逐渐打开这些管理设施的物质面貌。洛阳城东汉魏故城、隋唐城叠压区，根据文献中有关“都水监”、“水部”等机构位置的记载，考古学家推测一些大型院落遗址与中央级的运河管理机构有

关。院落布局规整，轴线分明，出土的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等级较高，具有官署建筑的特征。

税关、驿站的遗址大多分布在运河沿线重要的节点上。税关即津，一般设在州界、河口或者重要城镇附近，其遗址的辨认主要依靠出土的碑刻、衡器和大量外地钱币。驿站属于官方邮传系统的一部分，驿站的选址有固定的间距。考古发现的驿站遗址大多是标准化的院落，内部设有官厅、客舍、马厩等分区，有时还能发现刻有驿站名称和里程的石碑或者地砖。经过对这些遗址的精确考证，可以还原出隋唐时期国家对运河人流、物流、信息流实行全面控制管理的实体网络，体现出帝国强大的组织力和控制力。

（二）碑刻所载的航运管理制度与规则

碑刻是直接的文字史料，给考古遗址以外的航运管理制度研究赋予了珍贵的资料。这些矗立在运河岸边或者寺庙、官署的石碑，凭借不可磨灭的特性，把隋唐时期的航运法规、管理章程、工程记录等信息永久地固定下来，成为解读运河管理体系的“法律文本”。

通过对现有碑刻文献的梳理与研究，可以归纳出当时航运管理的诸多细节。

1. 碑文中记载官府对过往船舶登记、编号、发船帖作为通行凭证的规定。船帖上会记载船只的尺寸、载重量、归属地、船主等信息，是国家对运力进行统计、管理的基础。

2. 航行规则和秩序的维持。碑刻内容中有关航道使用的具体规定有“昼开夜闭”的闸口管理制度、“不同种类船只”的航行次序、“狭窄河段”的避让原则以及对“违规停泊、抢占航道”的处罚措施。这些规定可以保证繁忙的航道上大船队可以畅通无阻，防止拥堵和事故的发生。

3. 税收、漕运流程。一些碑刻记载了沿岸税关的税率、征收对象、征收程序。漕运方面有碑文记载了粮食征集、装船、押运、交割的全过程，对押运官兵职责、亏耗的奖惩办法作出规定，体现出漕运管理的严密和精细。碑刻内容同史籍记载互相印证，一起形成隋唐运河管理制度的完整图谱。

（三）管理设施建筑布局的行政等级体现

隋唐时期建筑形制、规模、布局、装饰都被严格的社会礼仪制度所限制，用以显示权力和地位。运河沿岸的建筑布局也能反映出它们所属的行政等级，从而形成了一套看得见的权力秩序。

中央直属或者高级别的管理机构，设在都城或者大都督府的漕运使司，其建筑群一般坐北朝南，沿中轴线对称布置，有多重院落。主体建筑体量宏大，屋顶多用庑殿或者歇山顶这样的高等级形制，并且使用琉璃瓦、兽面瓦当这样的高级材料来表现它作为中央派出机构的权威。院落宽敞，功能分明，前面是办公厅堂，后面是官员宅邸，两边是下属办公的廊庑，整体表现出庄重威严的衙署风格。

州县级地方管理机构，如地方水曹、税卡等，其建筑规模、规制都比朝廷机构小。一般只有一个或者两个院子，建筑以硬山顶为主，用普通青瓦，比较紧凑。驿站等级差别很大，都亭、国驿等高级驿站设施完备、建筑精美；普通驿站只有几间房屋，功能比较简单。通过建筑语言直接体现行政层级的做法，一方面加强了官僚体系内部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也使往来于运河的万民清楚地认识到国家权力无处不在、等级森严的结构。

三、航运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码头规模与城镇繁荣度的正相关分析

码头的规模是衡量一个城镇在运河航运系统中地位的重要指标，它同城镇的经济繁荣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个地区码头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功能越完善，就意味着该地区货物吞吐量越大，能吸引来的人流、物流、资金流越多，从而极大地促进该地区城镇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

隋唐时期的扬州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证。扬州为通济渠、长江、江南运河三河交汇之处，有规模宏大的港口码头群，既是漕运中转站，又是国际贸易港。考古发现的扬州城遗址，港口区域占据整个城市很大的部分，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码头遗址、庞大的仓储区遗迹和繁华的商业街区遗迹，都证明了扬州城曾经繁荣到“扬一益二”的程度。码头兴盛直接带来了大量的就业需求，船工、码头工人、商人、手工业者等各类人群涌现出来，人口大量聚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反之，一个城镇经济的发展，就会促使它投入更多资源去扩建和完善码头设施，以满足贸易需求增加的要求，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对沿线各个城镇遗址码头规模和城市遗址规模、商业遗存丰富度进行对比分析，就可以得到一条正相关曲线。

（二）航运设施网络对区域市场体系的塑造

通济渠沿线的航运设施不是孤立的点，而是一个互相联系起来的高效物流网络。以码头、仓储、驿站为节点构成的网络，对隋唐时期中国东部乃至全国市场

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该设施网络打破地域界限，把各区域不同的资源与各自的市场需要联系起来。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瓷器通过这个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的政治中心和边防要塞；北方的马匹、皮毛、中原地区的手工业产品也可以流向南方。沿线码头、仓储设施是货物的物理中转站，也是价格形成、信息交换、金融服务的中心。在重要的码头城镇中形成了专门的商品集散地和批发市场，开封的粮市、扬州的盐市等。网络出现之后，跨区域的大规模贸易变得可行，全国统一市场开始出现，以邸店、柜坊等为代表的早期金融服务业也随之产生，给商业活动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设施兴废反映的运河经济地位变迁

航运设施的修建和废弃，就是运河经济地位变迁最直接的物质表现。政治中心的变迁、河道淤塞改道、国家经济重心南移、战争等多种因素都会使运河沿线某些区段、城镇航运设施出现兴盛和衰败的周期性变化，成为历史变迁的忠实记录者。

北宋的开封作为都城，它的周围码头、仓库等航运设施发展到顶峰。开封地下城的考古发掘再现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码头林立、店铺连绵的景象。金灭北宋后，政治中心北移，黄河改道给通济渠（当时称汴河）带来严重破坏，开封的运河枢纽地位迅速衰落，航运设施大规模废弃、湮没。北宋文化的繁荣期之上是被洪水淤积层所掩盖的衰败景象，在考古地层中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来。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为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开凿了京杭大运河的北段，改造了南段，使运河的经济重心向山东、河北一带转移。济宁、临清等城市因新运河干线经过而迅速发展起来，其码头设施得到了大规模建设，成为新的商业都会。而一度辉煌的通济渠故道和沿线的城镇（开封），则渐渐被排除在国家经济版图之外。因此对不同时期的航运设施遗址叠压关系、空间分布变化进行考古学研究，可以动态的、具体的还原运河经济带重心转移的轨迹，真正感受到历史的脉动。

第五节 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一、三维激光扫描与建模技术应用

（一）对河道、遗址、文物的精准三维信息采集

对通济渠物质文化遗产开展信息采集工作属于一项多尺度、高精度的系统工程。对于宏大的古河道、堤岸、码头遗址等，一般用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和无人机倾斜摄影相结合的方法。地面扫描可以获取到地表的高精度点云数据，从而对遗址地表细微起伏及结构细节做详细的观察；无人机可以对遗址区域做大范围、多角度的影像采集，快速生成整个区域的实景三维模型。这两种技术数据融合就形成了地形地貌和遗址本体相结合的宏观场景。

小尺寸出土文物，包括碑刻、瓷器、建筑构件等使用手持式的或者结构光扫描仪。这种设备可以达到亚毫米级的精确度，完整的记录下文物的几何形状、准确尺寸、表面的铭文、刻画、釉色、残缺状况。非接触式采集方式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对脆弱文物造成物理性损害，保证了信息获取过程绝对安全。

利用上述技术组合，从宽广的运河河段到微小的器物，通济渠物质文化遗产全部三维空间信息被完整、客观、准确地采集。包含亿个坐标点的原始点云数据是数字化保护工作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数据来源，给后续所有的应用提供了详实可靠的依据。

（二）构建高精度数字模型用于存档与研究

使用专业的后处理软件对原始点云数据进行配准、去噪、精简、封装等处理之后，可以获得高保真的三维数字模型。这些模型可以被用作遗产本体的虚拟复制品，也可以产生一份包含全部几何和纹理信息的永久性数字档案。相比于传统的照片、图纸等二维记录，三维数字档案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它可以无限次的被复制、传输和使用，彻底克服了由于自然侵蚀或者人为损坏造成物质遗产信息失传的问题。

高精度数字模型给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范式。研究人员不用亲临现场接触实物，就可以在计算机上从任意角度去观察、缩放、剖切模型，并做尺寸测量、曲率分析、体积计算等定量研究。可以对古河堤的坡度、宽度进行准确测量，分析其工程技术特点；对残损的碑刻文字做虚拟拓印、辨识；对不同窑口的瓷器器型

进行比较,研究工艺传承。数字化的研究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加深了对运河考古学、建筑学、艺术史等各领域的研究。

（三）数字模型在虚拟修复与方案比选中的应用

虚拟修复作为三维数字技术的一种,在文物保护方面有非常高的应用价值。对于通济渠沿线出土的大量破碎文物、残损建筑构件,用数字模型可以完成无损虚拟拼接修复。保护人员可以在虚拟环境中反复尝试各种碎片拼接的方法,根据对称性、断口吻合度、纹饰连续性等原则来找到最好的重组方案。整个过程不需要对文物实体进行任何操作,不会对文物造成二次损伤。

在确定修复方案时,数字模型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

1. 方案模拟,保护团队根据数字模型可以提出不同的修复方案,比如采用什么材料进行补配,用什么样的工艺进行加固。各个方案可以用虚拟环境模拟修复后的视觉效果以及结构形态。

2. 科学评价,即用数字化模拟对不同方案的力学稳定性、与原始材料的兼容性、对文物整体美学的影响等进行科学评价和量化比较。以数据为依据的决策方式取代了以前依靠经验来判断的方式,使修复方案的选择更加科学、严谨,有效地避免了修复失误,保证最终实施的方案是最优解。

二、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建设

（一）物质文化遗产空间信息数据库的构建

创建全面权威的通济渠物质文化遗产空间信息数据库,是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建设的第一要务。核心就是将每一个遗产点或者遗产段落抽象成有明确地理坐标的“空间对象”,并赋予其丰富的“属性信息”。空间数据主要是现代测绘成果、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历史地图数字化和配准、考古勘探调查得到的遗址边界、河道走向等矢量数据,它们一起保证了遗产的准确地理定位。

属性信息是繁杂而有条理的一个集合,它包含遗产的各个方面,即名称、类型、时代、价值评估等基础信息,考古发掘报告、历史文献记载、相关研究论著等文献信息,照片、拓片、三维模型等媒体信息,以及保护状况、风险等级、保护责任单位等管理信息。通过创建统一的数据结构以及元数据规范,对异构、多源的数据实施整合并实现关联,从而构建起以空间位置作为索引的、能全面体现通济渠物质文化遗产家底的综合信息库。该数据库是进行所有的空间分析、决策

支持的基础。

（二）基于 GIS 的遗产分布、演变与关联分析

地理信息系统强大的空间分析能力，给探究通济渠文化谱系内在规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利用平台上的可视化功能把各个时期的、各种类型的遗产点（仓储、码头、桥梁、古城）用不同的符号在地图上标注出来，以反映出它们的空间分布状况及集聚特征。仓储遗址大多分布在都城附近或者交通枢纽处，这直接体现了其服务国家漕运的功能定位。

叠加不同时期的历史地图和考古勘探数据之后，可以进行时空演变分析，模拟通济渠在隋、唐、宋三个朝代河道变迁、市镇兴衰和功能变化的过程。“地图上”的历史再现使运河的生命历程一目了然。平台可以做复杂的关联分析，把遗产点分布同水文、地形、地质等自然环境图层叠加起来，探究古代运河选线同自然条件之间的联系；也可以分析聚落遗址分布同运河之间的联系，探究运河对沿线城镇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些分析结果给认识通济渠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GIS 支持下的遗产保护分区与规划决策

地理信息系统对遗产保护规划与管理决策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根据遗产点的价值评估与敏感性分析，采用系统中的缓冲区分析功能，可以科学地划定通济渠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系统能够自动生成以遗产核心区为中心，半径不同的多级缓冲区，为划定核心保护区、一般保护区、风貌协调区提供精确的地理边界。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规划管理中该平台被当作重要的决策支持工具。拟建项目只需要导入规划红线，在遗产保护分区图层上进行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得出该建设项目对遗产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否在保护范围内等结论。前置性的审查机制可以把遗产保护的要求纳入城乡建设审批程序之中，从源头上防止建设性破坏。平台还可以模拟出不同的规划方案对于遗产廊道视觉通廊、历史环境风貌的影响，给管理者提供多种方案比选的直观依据，保证通济渠沿线开发建设活动在严格的保护框架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数字孪生与虚拟复原

（一）通济渠关键节点的虚拟复原与场景再现

虚拟复原的目的在于使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通济渠盛景重现生机。本文主要依靠学术研究的基础，采用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图像志材料、数字建模技术等方式，对通济渠沿线重要的节点做高精度的知识性场景再现。复原洛阳城外含嘉仓，不单要再现宏大的仓窖群建筑外观，还要按照史料记载在虚拟场景中模拟粮食通过运河转运、入窖储存的繁忙过程。

同样可以对汴州等重要的码头进行历史景象的还原，再现当时商旅往来、船来船往的繁华景象。虚拟场景中的建筑形制、船只样式、人物衣冠、市井声音等都尽量做到有据可依。使用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技术，观众可以站在古运河岸边走来走去，乘坐隋唐大运河漕船顺流而下，感受隋唐大运河当年的盛景以及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

沉浸式的体验比传统的图文展陈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是向公众普及运河历史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一种新的方式。它把枯燥的考古资料、文献记录变成生动的、可感知的历史故事，有效地搭建起专业研究同大众之间的桥梁。

（二）为遗址保护、修复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虚拟复原、数字孪生体不但是展示的手段，也是科学实验平台，给遗址的预防性保护和修复决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学依据。在高度仿真的数字模型中，可以加载各种环境参数来模拟现实世界中会发生的一切改变。模拟不同强度降雨时土遗址边坡的冲刷过程，评价现有的排水系统是否有效，从而改善加固方案。

对结构复杂的古建筑、古桥梁遗址，可以在数字孪生模型上做结构力学分析，模拟长期风荷载、游客荷载、微小地震等对它的结构稳定性的影响，精准找到风险点。在制定修复方案的时候，可以在虚拟模型上预先推演不同的修复材料老化过程，以及它们与原始结构的应力协调性，进而选择耐久性最好、干预最小的方案。该种“先模拟，后实施”的科学方法使遗产保护工作由原来的被动抢救变为现在的主动预防，由原来的凭经验决策变为现在的数据驱动，使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和前瞻性得到大大提高。

（三）构建数字孪生体实现遗产状态的实时监测

创建通济渠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孪生体，是实现通济渠物质文化遗产全生命

周期健康管理的最终目的。这就需要把高精度三维模型和物联网传感技术结合起来。在遗址本体的重要部位，如古城墙裂缝处、古桥拱券、土遗址边坡等处布设位移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应力计、土壤含水率计等各种监测设备。

传感器采集到的实时数据，经由无线网络持续地传送到数字孪生平台，再同数字模型里对应的位置相连接。因此，遗产出现任何细微的变化，如裂缝的延伸、结构的下沉、环境温度湿度的异常变化等，在数字孪生体上都会被即时、同步地反映出来。管理平台可以设置安全阈值，一旦检测数据超过安全阈值，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预警，并且能精确定位问题出现的位置。因此遗产管理者可以第一时间获得风险信息并采取及时的干预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由此形成的以数字孪生体为基础的实时监测预警系统，将会成为通济渠文化遗产最敏锐的“数字神经”，也是其永续传承最有力的技术支撑。

第四章 通济渠非物质文化谱系研究

第一节 运河航运习俗与传统技艺

一、船工群体的组织与行规习俗

（一）船帮、漕帮的组织结构与内部纪律

通济渠上船工群体不是松散的个人组合，而是以地缘、业缘、血缘为纽带组成大大小小的船帮或者漕帮。帮会组织一般都设有统领全局的“大爷”或者“总船头”，下设管理具体事务的“二爷”、“舵头”、“账房”等职，共同组成一个等级分明、权责清楚的管理制度。帮会内部纪律非常严格，制定有详细的“帮规”，内容涉及货物运输的责任分担、利润分配、成员之间互助的原则、对背叛者的惩罚等。新加入的船工要有老帮伙成员作保，经受严格考验期才能正式加入；航行途中所有船只都应听从头船的指挥，不得擅自离队或抢行；当遇到官府盘查或者同行争端时，全体成员必须团结一致来共同抵御外来威胁。

组织结构不但是经济互助的实体，更是一个准军事化的社会动员体系。漕粮运输等官方任务中，漕帮的组织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漕帮与官府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博弈的复杂关系。漕帮依靠严密的内部纪律保证漕运任务的顺利完成，也给船工争取了一定的自主空间和集体话语权。一旦帮规确定下来之后，就能够让江湖航道井然有序，防止内讧和外侵，保证通济渠航道畅通无阻。

帮会组织就是船工社会身份认同的根基。共同的籍贯、相似的谋生方式、一致的利益诉求使船工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定期的祭祀、各种集体活动不断加深成员间的联系和感情。帮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也是他们在漂泊生活中寻求庇护、获得慰藉的精神家园。可以说船帮、漕帮的组织形态、内部纪律就是通济渠航运社会史的缩影。

（二）开船、过闸、遇险等仪式与禁忌

运河航行处处都是未知的、危险的。船工们因此形成了一系列的仪式、禁忌，以求神保佑，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并用这种方式来规范航行的行为，有效地防范

风险。这些风俗贯穿于整个航行过程之中，属于船工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开船前的祭祀最隆重，船工们准备猪头、公鸡、活鱼等祭品，在船头设案，焚香祷告，祭拜河神、妈祖、鲁班等行业神祇。口中念着祷词祈求一路平安、人货无恙，在船头上洒血表示给船只赋予生命和灵性，之后放炮仗，伴随鞭炮声开航。

航行途中也有相应的仪式，在水流湍急的险滩或者重要的水利枢纽如船闸时，船工们又焚香、洒酒向水神“报号”以示敬畏，祈求顺利通过。当船只遇到风暴、搁浅等危险的时候，除了全力救援之外，还会举行特别的祈禳仪式，向河中抛撒米粒或者纸钱，祈求河神息怒。虽然这些仪式带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但是客观上起到了统一思想、稳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是船工们在恶劣自然环境中的精神应对方式。航运生活中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代代相传，内化为船工自觉的行为准则。船上不能说翻、沉、断这些不吉利的词语，可以用歪、坐底、两截等隐语代替；不能在船头小便，因为这是对河神的不敬；吃饭的时候不能把筷子插在碗里，因为这形似上香，被认为是诅咒。这些禁忌虽然琐碎，但是凝聚了船工长期航运经验的总结，也对未知的危险存有敬畏之心，目的在于用约束个人行为的方式来保证集体的安全。

（三）船工的服饰、饮食与居住习俗

船工的生活起居依靠航船这个特殊空间而形成，于是就有了带有独特风味的小品、茶饮、住处，处处体现出实用、适应、地域性三者相融合的特点。他们的服装首先要考虑的是耐磨、防风、便于劳动。一般用粗布制成的对襟短褂和长裤，颜色多为耐脏的青色或蓝色。裤腿一般束紧，以免在船上行走或者攀爬的时候被缆绳、船具缠住脚。为了适应运河上多变的气候，船工们还会备有蓑衣、斗笠防雨，冬天穿上厚棉袄、棉裤。一些船帮成员还会佩戴有特殊意义的标志性饰物或头巾，来表明身份。

饮食上由于船体空间狭小，燃料、淡水补给不便，船工饮食以简单、方便、高热量为主。主食多为便于保存的饼、馍、米饭；菜肴以咸菜、腌鱼、腊肉等腌制品为主，既能当主食，又能久存。在船尾常会搭起一个简易的泥灶，用木柴或者煤炭生火做饭。因此，给每个大的港口补充新鲜蔬菜、肉类就成为一名重要的“大事业”。船上饮水直接取自运河，但一般都会放上明矾沉淀杂质后再烧开饮用。饮食结构完全适应了水上漂泊、体力消耗大的生活特点。

船就是家，船工的居住空间十分狭窄。一艘普通的货船，除货仓外，留给船

工生活起居的地方一般只有船头舱室和船尾的“生活舱”。生活舱一般把卧室、厨房、储物间合并在一个空间里。船工有的睡在固定的铺位上，有的直接睡在铺在甲板或舱板上的被褥上。对拖家带口的船户来说，狭小的船舱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和一家人的生息之地。孩子出生、长大都在船上，在耳濡目染下自然而然地继承父辈的航运技艺和生活习俗，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船上人家”文化。

这些习俗不但是船工个体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通济渠社会经济形态在微观上的具体表现。服饰朴素耐用、饮食简便易储、居住拥挤局促，一起构成了一幅艰难而坚韧的运河船工生活画卷，是运河船工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形成的独特生存智慧和文化模式。

二、传统航运技艺的谱系传承

（一）看水、识风、使帆、掌舵的经验知识

通济渠的航运是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技艺，其中看水、识风、使帆、掌舵被看作船工的四大基本技能。传承主要依靠师徒之间口传心授、长期实践揣摩。

1. 看水即观察水色、流速、旋涡、波纹等现象来判断水下情况，即航道的深浅、有无暗礁或沉船。有经验的老船工可以通过看水、辨花来判断深浅，避开危险。

2. 识风是依据云彩、风向、风力、空气湿度等来判断天气的变化，从而做出是否停止航行或者继续航行的决定。他们熟知云脚乱雨将至这样的谚语，对小范围局部气候变化比气象台天气预报还要及时作出判断。

3. 使帆是一项复杂的技术活。根据不同的风向、风力大小，不断调节帆角、升降帆面来充分利用风能获得最大的船速。在狭窄曲折的河道里，使帆的技巧尤其重要。

4. 掌舵又称为一船之魂。舵工要综合考虑水情、风力、船速、船体惯性，用操纵船舵来控制航向。会船、过闸、靠岸时舵工的技术好坏直接关系到全船人员和货物的安全。这些知识体系繁杂而精微，不能用文字来完全表达出来，只能通过日复一日的航行实践去体会、去传承，形成独特的师承谱系。

（二）造船、修船、编缆绳等手工技艺的传承

与航行技艺配套的是一套关于船只本身的手工技艺。通济渠沿岸的许多城镇都是造船业发达的地方，聚集着技艺高超的造船工匠。造船技艺也有严格的师徒相承的制度。从选材开始，工匠就要根据船只用途（漕船、商船、客船）以及航

行水域的特点来选择适合的木材。之后还要经过下料、配搭、合龙、捻缝等一系列繁杂的工序，每一项工序都有自己的窍门和标准。捻缝是用桐油、麻丝等填塞船板间的缝隙，必须做到“滴水不漏”，捻缝技术的好坏直接影响船只的寿命和安全。

修船技艺也不可小视，船只在航行中难免会遭遇碰撞、搁浅而造成损坏，船工必须掌握一定的应急修理技术。他们随身携带锤子、凿子、锯子、备用木板、桐油、麻刀等，以便途中可以“抢修”。大损坏需要到沿岸的专业船坞修理。修船匠人会根据船体破损情况迅速拟定出修复方案，用最经济、最牢固的方法使船只重新下水。

编缆绳也是不能缺少的一项技艺，船只使用大量的缆绳来拉纤、系泊、升帆。船工在农闲或者停泊时就地取材，用棕榈、麻、竹篾等材料手工编织出各种规格、用途的缆绳。熟练使用搓捻合股等方法编成的缆绳非常牢固。这些技艺和航运有关，共同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互相依赖的技术生态系统，来保证通济渠航运系统完整有效。

（三）与航运相关的气象预测与水文观测知识

在没有现代科技的时代，船工依靠多年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实用的气象预测和水文观测知识体系。这套知识对他们的趋利避害、保障航行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气象预测中他们很会观察自然界的變化。所谓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就是根据霞光的颜色和形态来预测天气阴晴。他们还会观察风向的变化，“东风送湿，西风送干”，从而推测将会下雨。动物的异常行为也是重要的参考，“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马上要到来”这样的经验累积成了朗朗上口的谚语，成了人们航行的“活教材”。

船工对于通济渠各河段的水文情况了如指掌。他们知道各个季节各个河段水位最高的时候是何时，水流最急最容易淤积的地方在哪。他们用岸边固定的标志物（古树、庙宇、桥墩等）或者河中水尺来判断水位涨落。洪水季节，人们根据水体浑浊程度、漂浮物多少来判断上游雨情及洪峰到来时间。枯水期时他们对各个浅滩的位置、深度了如指掌，可以绕道而行，防止搁浅。有关气象、水文的“地方性知识”，是通济渠船工同自然长期博弈而得来的智慧结晶。

三、船工号子的艺术特征与文化价值

（一）号子的节奏、旋律与劳动动作的配合

船工号子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协调劳动，所以它的艺术形式和劳动动作紧密结合，节奏感很强。号子一般一人领唱、众人合唱。领唱部分比较自由，起提示、引导作用；和唱部分节奏固定，铿锵有力，与集体的发力点完全一致。号头高亢地发出激昂雄浑的呼喊，人们就跟着号头的节奏，在踏地、屈身用力的时候高呼出“嗨哟”、“嗨萨”等简短有力的和声。

不同的工种因为劳动性质的不同，所以号子的节奏和旋律也各不相同。起帆号子的节奏为慢到快、旋律上扬，表现帆布慢慢升起，船将要开行的愉快心情。摇橹号子节奏缓慢，和双臂摇橹的往复动作配合起来。最激烈的是闯滩号子，在激流险滩面前，号子的节奏急促紧张，旋律大起大落，给人一种与自然搏斗的紧张感和力量感，很好地激发了船工们的斗志和潜能。

从音乐形态来说，船工号子多用高腔，穿透力强，在河风、水声的嘈杂中也可以清晰地传达。旋律并不复杂，但是音区的对比、力度的变化却很丰富，呈现出一种粗犷、质朴的原始美感。号子既是劳动的节拍器，又是力量的放大器，能将人的力量通过声音的共鸣凝聚成集体的合力，是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发出的生命之歌。

（二）号子内容所反映的船工生活与情感世界

船工号子歌词内容包罗万象，是活生生的“船工生活百科全书”。即兴创作、口口相传的歌词真实地记录了船工们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是研究通济渠船工群体心态和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一部分号子直接描写航运劳动的过程，比如拉纤时汗水浸湿了衣衫，摇橹划船发出哗哗声，使船飞快地前进。

更多的号子表现出船工们复杂多样的情感世界。思念故乡亲人的有，月儿弯弯照九州，俺在船上想家走；歌颂沿途风光的有，过了这道湾，又是一片天，两岸杨柳绿，菜花黄灿灿；和恶劣风浪抗争的有，大风起，浪滔天，兄弟们稳住舵，不能倦肩；痛斥不公、官府压迫的有，官老爷要地租，逼民变水手。在长时间的航行中，船工们用号子打趣逗乐，讲民间故事、历史传说来排遣寂寞、调剂生活。

这些歌词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使用了大量的比兴、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生动诙谐，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从这些号子里可以发现船工们乐观、

豁达、坚韧的性格。他们在艰苦中自嘲，在山河壮丽之时高歌。船工号子不但是记载他们物质生活的一份流水账，更是承载着他们喜怒哀乐的心灵史，是通济渠赋予他们的独特话语方式。

船工号子的情感表达直白而热烈，没有文人墨客的雕琢和含蓄，但是它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它唱出了水上人家悲欢离合的喜怒哀乐，唱出了底层劳动者最朴实的愿望和最顽强的生命力。每一个号子背后都蕴藏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一段难忘的岁月，它成了通济渠流淌文化里最真挚、最深沉的情感回响。

（三）不同地域、不同工种号子的风格差异

通济渠水道长，经过不同的方言区、文化区，加上船上工种繁多，劳动形态各异，所以船工号子具有明显的地域风格和工种差异。就地域而言，河南段号子受豫剧、梆子戏等地方戏曲的影响，音调高亢激昂，顿挫有致，带有中原大地苍劲豪放的特点。而进入安徽、江苏境内，号子旋律变得比较婉转柔和，带有较多的南方民歌的因素，韵味也更长一些，与沿途地理环境、地方文化语境的变化有关。

同一条船上不同工种的号子不一样，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号子体系”。拉纤号子最具有集体性，气势最雄壮，是力与美相结合的产物；撑篙号子最短促有力，多由一人或数人应和，节奏和竹篙点地的动作相吻合；舵工发号施令时的号子接近吆喝，音调稳重、有权威性，用来指挥全船航行的节奏。不同的号子在航行中相互交织，形成一部丰富多彩的运河劳动交响曲，既表现出劳动的科学分工，又表现出船工群体内部的协作关系以及秩序感。

第二节 沿岸民俗文化与节庆活动

一、因运河而生的特色民俗

（一）与水有关的信仰：祭河神、龙王庙会

隋唐时期，通济渠沿岸居民的生活和命运都和大运河息息相关。水的恩泽与水患并存，使人们对水产生了敬畏和崇拜，于是就形成了以祭祀河神、龙王为主的水神信仰体系。这些信仰活动不是迷信，是人们对于航运安全、风调雨顺、生活安宁的一种精神寄托。在重要的航运节点或者水流险要的地方，人们常常会集资修建河神庙、龙王庙。庙宇不但是祭祀的地方，也是船工、商旅休息交流的公

共场所。

每当开航、禁航、汛期或者传统节日到来的时候，沿岸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者行会的领袖主持，献上猪、羊、鱼等祭品，宣读祭文，祈求河神、龙王保佑。伴随着祭祀活动而产生的龙王庙会，是集宗教信仰、物资交流、文化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盛会。庙会期间戏曲团搭台唱戏、货摊叫卖货物，四方百姓蜂拥而至，既是神灵恩赐的感恩，又是地方经济、文化的展示，把对自然的敬畏融入到一场烟火气息浓厚的群情激奋中。

（二）因商贾云集而形成的商贸习俗

通济渠畅通之后，来自天南海北的商贾在此云集，频繁的商业活动催生出一套鲜明独特的商贸习俗和行规。为了维护同乡、同行的利益，来自各地的商帮在沿岸的重要城镇上都建有会馆。会馆不但给商人提供食宿、仓储、洽谈生意的场所，更主要的是它担负起行业自律、信息交流、仲裁纠纷、举办公益的职能，形成了强大的商业凝聚力。会馆内部有严格的规矩，新入行的商人要拜码头、敬前辈，求得庇护和支持。

长期以来活动在沿海地区的商人就把诚信作为商业道德。口头承诺同契约精神一样重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才是立身之本。在交易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些特有的习俗，大宗买卖谈妥之后，买卖双方会宴请中人（保人）来表示谢意并加以确认。装卸货物时船工和码头工人之间用专门的号子、手势交流，既快又准。以商业活动为基础形成的各种习俗、规范一起组成了通济渠这条黄金水道的商业秩序和信用基础，保障了通济渠这条黄金水道的商业活力。

这些贸易的民俗深深地烙印在沿岸城市的文化基因里。古老的商业街区，其格局，名字及当年留下来的米市街，盐码头等地标至今依然存在。商帮会馆本身就成为了南北建筑风格、精湛工艺的文化遗产。商人做生意时秉持的契约精神、社群规范，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当地人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沿岸人民开放包容、重信守诺的性格特征，成为运河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沿岸独特的婚丧嫁娶与人生礼仪

运河沿岸的社会主要由当地居民和大量的流动船民、商旅组成，由于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所以使得运河沿岸的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兼具地域性与行业性。常年以船为家的船民，船家婚就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仪式之一。婚礼一般都在船上举行，船头贴大红喜字，挂红灯笼，新娘从一艘船嫁到另一艘船上，寓意着

开启新的航程。婚礼仪式中祭拜水神、向运河撒五谷等环节，都是为了祈求生活顺风顺水、子孙满堂。它独特形式的婚礼，就是船家生活方式和水上信仰的直接反映。

如果船工或者商人航行途中不幸身亡，按照入土为安的观念，其灵柩一般都会通过运河运回故乡。于是便产生了“运柩”的习俗，船上悬挂白幡以示哀悼，沿途遇到的其它船只也会放慢速度、鸣笛致意，这是江湖同道之间深厚的悲悯和互助。同时沿岸还有一些和水有关的丧葬禁忌，例如忌讳在特定的时间渡灵柩过河，或者在祭祀时不能使用与沉有关的词语。这都是人们对死亡的敬畏、对逝者的哀思。这些礼仪不但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而且在社区的共同参与下，加深了地方文化的认同感。

二、沿岸传统节庆的演变与融合

（一）南北节庆习俗在运河沿岸的交汇

通济渠两岸的城镇是文化的交汇处。南方的细腻雅致和北方的粗犷豪放在此交汇、交融，节庆习俗的体现最为明显。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从南方传到北方，与北方的祭屈原、插艾草习俗相结合。运河城镇的龙舟竞渡既是纪念先贤的仪式，又是船帮、商号之间展示实力、增进情谊的竞技活动，场面宏大，观者如云。粽子的口味也随之变化，南方的咸肉粽、豆沙粽和北方的红枣粽、白米粽同时在市场上出售，满足了南北客商不同的口味。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在运河两岸的庆祝方式也更加丰富。除夕夜南方家庭正忙着做丰盛的年夜饭，北方家庭则围坐在一起包饺子，但是运河边许多家庭的餐桌上却是南北菜系混搭。元宵灯会上，南方的精致花灯和北方的雄浑灯阵交相辉映，猜灯谜的文雅和舞龙舞狮的红火一起上演。

节庆习俗的交汇融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动态的、富有创造性的过程。它使运河沿岸的节庆活动既有中华传统节日共性，又有因地理位置、人口构成不同而表现出的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写照。

（二）具有运河特色的庙会、灯会等活动

除传统节庆南北交融外，通济渠沿岸还形成了许多与运河自身历史、功能相关联的特色节庆活动。这些活动一般都以某一个时间节点、某一个特定地点或者某一个人物为中心展开，成为运河文化最具有辨识度的符号之一。

1. 开漕节、封漕节，与漕运节奏有关的节庆。每年春季冰雪消融、运河通航的时候，沿岸官府和民间就会联合举行盛大的开漕节。在仪式上官员祭拜河神，宣布开漕，第一艘官船就会伴随着鞭炮声、人们的欢呼声一起出发。冬季运河封冻前有封漕节，即一年漕运结束。这些节庆不但是生产活动的仪式化呈现，也给船工、商人提供了一个休整和团聚的机会。

2. 运河灯会，沿岸城市的元宵灯会一般都与运河景观结合在一起，形成水陆一体的壮观景象。人们把精美的灯船装扮好之后，放在运河上航行。在巡游的同时，两岸的灯光以及水中的倒影互相辉映。灯船或者船上灯的形式，在运河城市中具有独特的魅力，有浪漫的气息和智慧的美感，吸引了市民、游客前去欣赏。

3. 水神庙会是以河神庙、龙王庙等祭祀场所为中心的定期庙会，是沿岸最热闹的民间活动之一。庙会一般与神祇诞辰或者祭祀日有关，除了隆重的祭神仪式外，还有戏曲、杂技、说书等民间艺术表演，以及规模庞大的商品交易市场，因此也被称为“神的节日”和“人的聚会”。

（三）节庆活动中的商贸功能与娱乐功能

运河沿岸的节庆活动从诞生之初就同商业贸易联系在一起，兼有明显的商贸和娱乐双重作用。节庆期间，集中的人流为商品交易创造了极佳的条件。原来的固定市集发展为规模盛大的临时市场，又叫庙市、节市。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贩带着本地特产、手工艺品、日用杂货等前来赶集，琳琅满目的商品沿着运河岸边或者庙宇周围排成一长串，形成繁华的商业长廊。

这些市场既可以满足当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可以给来往南北的客商提供重要的交易场所。大宗货物买卖的商谈也常常利用节庆期间人脉聚集的有利时机来开展。娱乐性又是节日活动的又一根支柱。为了吸引人气、烘托气氛，戏班、曲艺团、杂耍艺人等都会在节庆期间大展身手。高亢的梆子戏、婉转的昆曲、惊险的杂技、引人入胜的评书给终日劳作的人们带去了精神上的愉悦与放松。商业和娱乐相互促进，把节日活动推向高潮。商业繁荣给娱乐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精彩的娱乐表演吸引人流，进而促进消费，从而形成良性的文化经济循环。

三、饮食文化与方言土语的谱系特征

（一）“南甜北咸”交汇的运河菜系

通济渠作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美食走廊”。它不但是

粮食运输工具，更是各地食材、烹饪技艺和饮食观念的传播者，在沿岸城市和集镇中孕育出南北风味、自成一格的运河菜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调和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的口味。来自江南的富商官员喜欢甜鲜、讲究食材本味，北方的军士百姓更偏爱咸香浓郁、口感厚重的菜肴。

通济渠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大城市餐饮业十分发达，厨师为了满足不同的食客需求，把南方的烹饪手法（焖、煨、蒸）和北方的食材（牛羊肉、面食）相结合，创造出许多新的菜品。一道鱼肴在北方酱焖的基础上，吸收南方糖醋调味的特点而产生复合型的味觉感受。同时运河带来了南方鱼虾、竹笋、茶叶和北方杂粮、山珍、干果等丰富的食材，使当地餐桌上的种类更丰富。

饮食的融合不只是高档酒楼筵席上才有的现象，而是深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了。饮食文化交融，满足人们口味的同时，也成为不同地域人群互相了解、增进认同的温和媒介，是运河文化包容性的最直接体现。

（二）沿岸方言中的航运词汇与外来语

语言是文化最直接的载体。通济渠沿线因为漕运从业人员来自四面八方，长期交流形成了特有的语言现象，在本地主导方言的基础上，吸收了许多与航运有关的行业术语和外地方言词汇。这些特殊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是运河方言谱系的主要特点，也是辨别“运河人”的标志。

航运词汇是最核心的部分，对船的各个部分、各种船只、驾船操作、水流状况、码头规则都形成了一套专门的词汇。掌舵、拉纤、靠岸、盘船等词汇在运河沿岸居民的日常用语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不从事航运的人也耳熟能详。另外还有隐语，即用一个词代替“翻”、“沉”这些忌讳的字眼。它不但是交流的工具，更是船工群体的职业信仰和行为规范。由于漕运的衰落，其中一些词汇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因此它们成为研究运河历史的珍贵语言化石。

（三）特色小吃与地方风物的形成与传播

通济渠繁荣的同时也孕育出至今仍闻名全国的特色小吃和地方风物。小吃的特点有制作方便，携带方便，能够迅速补充体力等来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沿岸烧饼、油条、汤包、烩面等食品，最初是为满足码头工人、过往旅客快速的生活需求而产生的。这些小吃随着运河的流传而流传，由一地传到另一地，在新的环境中与当地的口味相结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味。

运河除了小吃之外，还是地方风物传播的途径。江南的丝绸、茶叶、纸张，

华北的瓷器、药材、皮毛等大宗货物都是通过通济渠完成南北对流的。风物不但是商品，也是文化的符号。丰富沿岸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传播各地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很多沿岸城镇因为某一种风物而出名，有的以产醋闻名，有的以制笔闻名。特色风物及其中所包含的制作技艺，与运河一起成长，成为地方文化名片，共同构筑起通济渠沿岸丰富多彩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景观。

第三节 运河文学与艺术传承

一、以运河为题材的古典文学谱系

（一）唐诗宋词中的运河意象与情感抒发

唐诗宋词里的通济渠，是国家盛世下的宏伟景象和个体悲欢离合交织在一起的经典意象。一方面它是国家强盛、交通便利的象征。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就很好地表现出了运河功绩与历史评价之间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在运河上更频繁的流淌着离愁别绪、人生感叹。白居易的千古名句“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用潺潺流水寄托无尽的思念，成为流传至今的离别之歌。晚唐诗人杜牧笔下“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描写的是运河两岸的江南春色，但是他在《过华清宫绝句》里“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的讽刺之词又道出了运河作为皇家奢靡通道的另一面。

宋词把情感抒发带入到更加细致、更加深刻的地方。北宋繁荣、南宋偏安，都在运河的意象里留下深刻印记。柳永词中所描绘的杭州盛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其背后都是依托于运河所带来的商业繁荣。靖康之耻之后，运河就成为故国之思的催化剂。姜夔的《扬州慢》借着废池乔木、犹厌言兵的衰败景象来表现运河沿岸往日繁华不再的深切悲痛。这些诗词作品一起构成了一种多维的运河文学空间，既有对宏大历史的颂扬，又不乏对个体命运的关怀，使得通济渠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成了中华文化里一个具有张力、有情感温度的符号。

（二）明清小说中的运河故事与社会描绘

进入明清以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和长篇小说的发展，运河文学表现形式也由诗词的写意抒情变为小说的写实描写。通济渠及延伸河段成了展现社会百态

的广阔画布。《水浒传》中英雄好汉们的故事大多和水路有关，梁山泊本身便与水系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运河是他们活动、转运物资的主要通道。《金瓶梅词话》故事背景地山东临清，是明代运河线上“繁华压两京”的商业重镇。小说中对码头、商铺、船家等细节的描写，生动再现了运河城市商业生态与市井生活，运河的流动性给西门庆等人商业扩张和人际交往带来方便。

儒林外史用文人名士沿运河南北游历的轨迹，串联起广阔的社会空间。杜少卿乘船北上南京，一路上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当时社会的写照。运河不但是物理上的交通线，而且是人物命运流转、思想观念碰撞的舞台，反映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清代小说《老残游记》里，作者刘鹗借老残之口描写了黄河决口造成部分河段淤塞的情况，借此表达对国家积弊、民生多艰的深切忧虑。

这些伟大的小说巨著把运河由文人士大夫的寄情之物，变为承载普罗大众喜怒哀乐的现实空间。官、商、兵、民、文人、江湖客等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运河上，他们有的是为了生计而奔波，有的是为了功名而努力，有的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沉浮。运河沿线的城市、码头、驿站、茶馆等共同形成了一种充满活力又充满矛盾的“流动社会”，给我们认识明清时期的社会结构、经济状况、文化心理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文学样本。

（三）历代文人游记中的运河风貌记录

除了诗词小说以外，历朝历代文人、官吏、外国使者所写的游记，也给后人留下了窥探运河风貌的一扇窗户。其纪实性使人们能够了解到运河的真实情况。这些游记对通济渠及大运河沿线地理水文、舟船形制、城镇布局、风土人情等作了详尽记载，是研究运河历史变迁的重要一手资料。唐代鉴真东渡的随行弟子所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就详细记载了从扬州出发沿运河北上行程。

进入宋元明清，随着漕运和商业交流的极度繁荣，运河游记的数量更是与日俱增。

1. 官员宦游记录：许多官员因赴任、出巡、押运漕粮等公务而往来于运河上，在日记或者奏疏中留下详细的记载。明代丘濬的《大学衍义补》中对于漕运的论述，就包含着对于运河管理深刻而独到的认识。

2. 文人的壮游纪行，文人墨客或漫游名胜，或省亲会友，他们所写的更多是感性的色彩。他们描绘了“两岸烟花、十里楼台”的繁华景象，也记下了洪水、

淤塞等情形，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家国之思和民生关怀。

3. 外国人观察东方：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用惊叹的语气描述大运河宏伟的规模、繁忙的航运和沿岸城市的富饶。他的记述把中国古代的工程奇迹和经济强盛展示给国外世界，在东国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这些游记犹如一部连续不断的纪录片，跨越千年，把通济渠乃至整个大运河从兴盛到部分衰落的全过程完整地拼接出来。

二、运河相关的民间艺术形式

（一）沿岸的戏曲、曲艺、说书等表演艺术

通济渠沿岸人流汇聚，使文化碰撞、交融，给地方戏曲、曲艺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豫剧、越调、柳琴戏、泗州戏等众多剧种的声腔韵律和剧目题材，在河南、安徽、江苏等地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运河文化的影响。和漕运、商贸、历史传说有关的运河故事，例如《陈三两爬堂》、《拉荆笆》等，被改编成戏曲，在沿岸村镇戏台和城市书场常演不衰。这些剧目既娱乐了民众，又起到了传播历史知识、褒贬人物、教化人心的社会作用。

曲艺、说书是更灵活、更便捷的表演方式，与运河码头、茶馆市井环境相适应。山东快书、河南坠子、评书、大鼓等用铿锵的节奏、生动的口语、引人入胜的情节讲述运河上的英雄传奇、才子佳人、公案奇闻。说书人只需要“一桌、一扇、一木”，就能把千军万马、悲欢离合演得惟妙惟肖，成为来往客商、船夫纤夫歇脚时最喜爱的精神食粮。

这些表演艺术的内容大都直接来自于运河生活，即船家的辛苦、商人的机智、官员的清浊、侠客的义气等。它们用地方化语言、声腔将宏大运河叙事变成一个个具体可感的人物、故事，深深嵌入到沿岸民众集体记忆当中，成为运河文化生命力的体现。

（二）以运河为主题的绘画、书法、剪纸艺术

壮丽的景色、丰富的人文景观，使视觉艺术创作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历代画家用运河为题材创作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名画。尽管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是北宋汴京的繁华，但其所呈现的城市面貌，正是以通济渠为代表的运河经济所孕育出的典型图景。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乾隆南巡图》、王翬等人的《康熙南巡图》，都是以长卷的形式来表现运河沿线的城市风光、水利设施、

皇家巡游的盛况，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这些画作不但是山水画，也是风俗画、历史画，堪称运河作为国家动脉的视觉档案。

书法艺术也和运河有不解之缘。古代文人行于运河之上，常在沿岸的名胜古迹上题壁留诗或者为寺庙、会馆写匾额碑记。散布在运河沿线至今仍存留下来的摩崖石刻、碑文，就像一串串文化的珍珠，记载着历史的瞬间，也表现出了各个时代、不同流派的书法艺术之美。它们或雄浑、或秀逸的笔法，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运河磅礴的气势或者婉约的风情。

民间以运河为题材的艺术创作更多样。特别是剪纸、年画、泥塑等经常出现与运河有关、寓意吉祥的船、桥、码头、莲花、鱼等图案。朴拙而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把对风调雨顺、航行平安、生意兴隆的美好祝愿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美学之中，体现了运河人民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以及丰富的想象力。

（三）与运河相关的音乐、舞蹈与民间杂耍

运河的生命力在流传于两岸的音乐、舞蹈和民间杂耍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是运河劳动生活和节日风俗的艺术化表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船工号子。纤夫和船工在劳动时用来协调动作、抒发感情的歌唱就称为号子，其节奏与拉船、摇橹的动作配合得十分紧密，歌词内容涉及劳动艰辛的感叹、沿途景色的描写、对家乡亲人的思念等。直接源自劳动本身的音乐，粗犷、高亢、有力量感，是运河上最能体现特色的音色符号。

沿岸的民间舞蹈一般都与祭祀水神、庆祝丰收等民俗活动联系在一起。一些地区流传下来的“跑旱船”、“舞龙灯”等在节庆时表演，既有娱神娱人的作用，又有民众祈求水运平安、五谷丰登的朴素愿望。舞蹈动作活泼、场面热烈，是运河社区凝聚力、文化认同感的集中体现。运河的繁荣也催生了娱乐文化。码头、集市等人员密集处，各种民间杂耍、武术表演、马戏等一应俱全。这些技艺有的惊险刺激，有的诙谐有趣，给南来北往的旅客提供消遣娱乐，成为运河市镇喧闹多彩的文化景观中的一角，体现出运河文化的包容性、多样性。

三、运河文学艺术的当代创作与转化

（一）现代文学、影视作品对运河文化的再现

进入现当代，运河仍然是文学、影视创作中经常被使用的母题。一批作家把目光投向运河的历史和现实，用文字去探究它在新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深层次

的意义。部分当代小说以运河边的小人物为主角，用他们的生活变迁来反映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这些作品也不再只是单纯的风景、回忆历史，更多的是一种工业城市化的进程中的人性和传统，给运河文学增添新的思想深度。

影视作品依靠形象生动的直观性，成为向大众传播运河文化的主要途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制作的纪录片《大运河》用高清航拍、历史情景再现、专家访谈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地整理出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纪录片再现了运河的雄壮之美，也细致地刻画出运河两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讲述了运河的许多感人故事。

一些以运河历史为背景的电视剧、电影，如以漕运风云、家族兴衰为题材的剧作，虽然情节有虚构之处，但是它们把历史知识与戏剧冲突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尘封的运河往事以更加通俗、更加引人入胜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这些现代文艺作品一起擦亮了运河这张文化名片，延续并扩大了运河的文学艺术生命。

（二）运河主题艺术创作的创新发展

当代艺术界对于运河主题的探究是形式多样、观念现代化的。艺术家们不再只是复制传统的意象，而是用新的艺术语言、新的媒介，以个性化的解读、重构运河文化的方式使运河主题艺术不断更新。

1. 音乐与舞台艺术的新篇章：大型交响组曲《大运河》、原创歌剧《运之河》等作品用宏大的管弦乐和磅礴的舞台来表现运河的历史、传说、精神，赋予古老题材以强烈的时代感和国际化的审美视野。这些作品就成为传播运河文化的高艺术殿堂的媒介。

2. 视觉艺术多样化地展开：除传统国画创作之外，油画、版画、雕塑、装置艺术等也把运河作为创作对象。许多画家深入运河沿岸写生，用当下的审美观念和技法来表现运河的新面貌，既包含着对工业遗存的反思，又流露着对生态修复的赞扬。沿岸城市出现以船、水、漕运为元素的公共艺术雕塑，成为城市新地标，将运河文化融入现代城市景观。

3. 传统工艺的现代转型：沿岸陶瓷、刺绣、玉雕等传统工艺也开始从运河文化中汲取灵感，设计出既有文化内涵又有现代审美情趣的文创产品，让古老的运河记忆以新的形式进入当代人的生活。

（三）新媒体艺术对运河故事的多元化表达

伴随着数字技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媒体艺术给运河文化的表达、传播

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新出现的艺术形式具有互动性、沉浸性、即时性的特点,使得古老的运河与年轻一代的距离越来越近,讲述方式也变得更生动、多样、有创意。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可以使人们置身于历史现场。观众戴上VR头盔之后便能身临其境地走进繁华的通济渠码头,眼前看到漕船往来、商贾云集的盛况,扫描现实中的运河遗址,手机屏幕就会展示出遗址本来的面貌及其相关的信息,从而实现了运河文化的数字化复原与互动式科普。

以运河为主题的互动装置艺术、数字光影秀等,也成了沿岸城市夜间经济、文旅融合的新亮点。灯光的流动洒在古桥、堤岸、建筑上,音乐和动态影像一起诉说着运河千年的历史,给游客带来震撼心灵的视觉和听觉体验。在短视频平台里,无数的普通用户和专业创作者用镜头记录下运河今日风光、美食、民俗,以轻松活泼的短视频形式把运河文化碎片化地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形成了强大的网络传播效应。新媒体艺术介入之后,通济渠等运河遗产开始在当下“活”起来,以一种年轻、科技、亲和的方式延续着它的不朽文化生命。

第四节 口述历史与民间传说

一、运河沿岸的口述史采集与整理

(一) 老船工、老居民的个人生命史访谈

访谈通济渠沿岸老船工、码头工人、商人后代、普通居民,是建立口述史料库的奠基。他们可以称为运河的活历史,记忆里保存着通济渠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面貌。访谈内容体现的是个人职业生涯与家庭变迁,而且将个人命运同运河兴衰联系起来。从中可以了解到各个时期的船的形态和操作方法、水上航行的禁忌和习俗、漕运贸易的货物和流向、沿岸码头昔日的繁荣景象和社会生态。

老船工口中的观水势、辨风向的经验,是千百年来水上生存的智慧;老居民记忆里的清晨橹声、傍晚炊烟,是运河人家日常生活诗意的写照。个人化的叙述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具体的情境,把抽象的“运河经济”、“水利交通”等概念还原为一个个鲜活可感的人生故事。老船工讲述了枯水期的日子里,怎样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把搁浅在滩涂上的船只拉出险境;老妇人回想起小时候在运河两岸看龙舟比赛、听戏文的热闹场面。微观生命史片段一起塑造出通济渠作为生

活空间、情感载体的真实面貌，给生硬的史料框架注入了血肉。

（二）关于运河变迁、重大事件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个体记忆在社群内汇聚、共享、传承的结果，是以社区里程碑事件为中心而形成起来的，它建立起群体共同的身份感。对于通济渠两岸的村镇和城市来说，重大河道疏浚、毁灭性洪水泛滥、铁路兴起造成水运衰落，重要桥梁修建或者拆除等事件都会成为当地居民集体记忆的核心。这些记忆不是事实的罗列，里面混杂着社区民众情感、评判和反思。

采集集体记忆要由个体访谈扩展到群体座谈，并且关注地方性的纪念活动、歌谣、俗语等各种不同的记忆载体。以村庄世代流传的几十年前全村抗洪壮举为例，代代相传的历史使整个社区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和韧性。运河航运功能消失之后，不同的社区对于记忆侧重点也存在差异，有的怀念昔日的“万舟骈集”的商业繁荣不再，有的则认为环境改善、新的发展机遇来临。这些集体记忆表现出宏大历史进程在地方的回响，反映出民众怎样认识和应对时代变迁。

从梳理出的集体记忆中可以发现官方文献常常忽略的社会心理层面。官方记录只记载某年某月某项工程的完成，但是集体记忆可以告诉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怀有的希望或者疑虑，以及该事件如何长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区关系。从民间的集体叙事中可以得到理解通济渠历史变迁的多种视角。

（三）口述史访谈的方法论与伦理规范

口述历史采集整理属于严肃的学术工作，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论、严格的学术操守来进行，保证研究的严谨性以及史料的真实性。访谈不能是随意闲聊，研究者要事先梳理文献，设计开放性和引导性相结合的访谈提纲。在访谈中营造出一种信任、平等的交流环境是必要的，使受访者能够自由地使用他习惯的语言去阐述自己观点。同时研究者应该具有同情的理解，进行适当的提问以便于获得更加深刻的信息。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的应用可以将访谈原始声像信息完整的保存下来，为之后转录、分析提供准确的依据。

伦理规范是口述史工作的生命线，也是保证受访者权益、尊重受访者的前提。在实际操作中需要遵守以下原则：

1. 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前一定要向受访者解释研究的目的、内容的使用方式和发布渠道，签署正式的知情同意书，保证受访者是在完全自愿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参与这个项目。

2. 尊重与保护，对受访者不愿提及的敏感话题或者个人隐私，应该予以充分的尊重。整理发布成果时，根据其意愿，可以匿名或者化名处理。对含有创伤性记忆的访谈，研究者需要具备相应的人文关怀，不能给受访者造成二次伤害。

3. 成果分享与回馈，研究成果要以适当的方式反馈给受访者和受访者所在的社区，可以是赠送访谈稿副本、整理文稿或者出版物。既是对受访者的肯定，又是建立长期信任关系、推进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研究者应该清楚自己是历史记忆的记录者和诠释者，而不是记忆的所有者。

二、运河民间传说的类型与文化内涵

（一）历史人物传说：如隋炀帝开运河的故事

历史人物传说属于运河民间故事中最典型、最引人注目的一种，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的传说最为丰富。正史记载开河的动机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暴政和奢侈的例子也可见诸史籍。然而在民间传说里，他被简化、脸谱化得非常彻底，成了纯粹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如“乘龙舟下扬州观琼花”——而不惜民力、滥用权力的昏君的代表。

传说一般带有夸张成分，想象丰富。隋炀帝为了追求河道笔直，不惜拆毁民宅、铲平坟墓，甚至有“一字弯”的传说，讲述皇帝为了保全某功臣的祖坟而使河道拐弯，以此来表现皇帝的权力下偶尔的恩典和整体的无情。另一些故事控诉筑堤民工悲惨遭遇，“万人坑”“白骨堤”等地名传说，把民众血泪控诉物化为地理实体，成为永恒的历史警示。

此类传说的文化内涵，就是普通人对宏大历史事件的道德化解释、情绪化的表达。民众并不一定关心开河的战略意义，但他们更关注的是权力是否被滥用、生命是否被尊重。将复杂动因简化为皇帝个人的欲望，传说就形成了一个善恶对立的明晰叙事，既对统治者进行警告，又给民众的苦难找到了宣泄和解释的出口。传说和正史记载互相映照，一起形成了隋炀帝和大运河这个历史话题的全部文化记忆。

（二）地方风物传说：关于地名、遗迹由来的解释

通济渠绵延千里，沿线城镇、桥梁、渡口、古刹、名木，处处流传着故事。这样的传说给地方景观增加文化含义和历史感，是民众对自己环境的“故事化”建构。它们解释地名由来、遗迹起源，把冰冷的地理空间变为有烟火气、有想象

力的文化场域。

再如称作“落马桥”的古桥，其传说或与将军落马、状元衣锦还乡有关；金银滩河湾，或与沉船宝藏有关。虽然这些故事不能当作信史，但是也能够反映当地民众的价值取向和集体愿望：对英雄崇拜，追求财富，赞美忠贞爱情。社区居民通过命名风物、叙述历史把自身的认同感、历史感牢牢地定格在脚下的土地、眼前的河流上。传说也成了当地旅游的重要资源，吸引着外来者去寻找故事背后的风景，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三）神话幻想传说：体现民众愿望与想象的故事

神话幻想传说属于运河文化里最富浪漫色彩、神秘气息的部分。它们冲破现实的逻辑、历史的框架限制，有神祇、精怪、仙道、魔法等超自然内容，主要表现运河两岸人民在风云变幻的自然社会环境中所感到的恐惧、祈求以及复杂的想象。船行水上，安危系于天时，因此有关河神、龙王、水母娘娘的传说层出不穷。

大部分故事带有明显的劝善惩恶的主题。善良船工因为救助鲤鱼精而获得庇护，风浪中化险为夷；贪婪商人因为亵渎神灵而遭到沉船惩罚。神话、幻想和传说都是人们朴素的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反映，它利用建立神灵监督的超自然秩序来弥补现实世界法律与道德的不足，给人们向善的力量和面对未来的希望。同时带有奇异色彩的“水下古城”、“仙人开路”等传说也丰富了运河文化神秘与艺术的魅力，成为文学、戏剧、美术创作等的灵感来源。

三、口述史料与文献记载的互证研究

（一）补充正史之缺，展现鲜活的民间视角

文献记载尤其是官方编撰的正史、方志存在着视角单一、内容固化等缺点。它们大多关注朝代更替、制度变迁、官方工程等大的主题，而对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情感世界以及非正式经济社会活动很少涉及。口述史料在此点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给我们打开了观察历史细节的窗户。

通济渠漕运的记载在史书中只限于每年漕粮运输的数量和路线。但是通过访谈老船工可知，它涉及运粮船队内部组织、船工薪酬待遇、途中官吏勒索、同行竞争、沿途形成的特殊行话和社群网络等。这些生动的细节是任何文献都无法给出的，它把“漕运”这一冰冷的制度还原为由无数具体的人、事、物所组成的动态的社会过程。

口述史可以表现出地方知识、非正式规则在运河生态中所起的作用。文献记载朝廷颁布的河道管理法令，口述史却能让我们了解实际运行的时候，沿岸社区怎样使用乡规民约协调用水、修筑堤坝、解决纠纷。活在民间的法律和智慧才是运河社会长久稳定的根基。口述史料的民间视角、鲜活的叙述方式，使仅靠文献建立起来的历史图像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完善，更加真实、有血有肉。

（二）辨析传说与史实，理解历史记忆的建构过程

民间传说不是真实的记载，是民众对历史故事的艺术化处理和价值观念的再创造。将它同文献记载互证研究，并不是简单的证实或证伪，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记忆复杂建构的过程。通过比较传说和史实的不同、变形、嫁接，可以发现民众记忆历史时所选择的、强调的和想象的，进而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

再拿隋炀帝的传说来分析的话，文献显示开河工程规模大、耗时多、人力消耗也很大，这就是传说产生时的史实内核。传说中“为观琼花”的动机，其实是民间为了加强其昏君形象而进行的戏剧化创造。该创造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和中国传统文化中警惕君主私欲的政治伦理观念不谋而合。辨析之后可知，传说是一种被讲述的历史，它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讲述群体的价值观、情感态度上，而不是事件本身。有利于我们从历史学走向历史记忆学，认识过去怎样在当下不断被重述和建构。

（三）口述传统在维系社区认同中的作用

口述传统，即口述历史和民间传说，对于维系通济渠沿岸社区文化认同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的地理空间里，共享运河的故事，是形成“我们”这一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力量。当村庄老人向孩子们讲述祖辈驾船经历、传颂与村庄有关的运河传说的时候，他们传递给我们的不单单是信息，更是一种身份传承、一种情感联结。

口述传统给社区成员赋予共同的历史坐标和文化密码。它们回答了我们是誰，我们从哪里来，也给社区的特殊性提供依据。现代化大潮下许多传统生计、生活景观已经消失，但是口传故事可以穿越时空把社区过去和现在紧密联系起来。保护和传承口述传统，就是守护社区之根、之魂。将故事记录、整理并推广到社区内部，以印制地方故事集、举办故事会、开发乡土教材等形式提高社区文化自觉性、居民归属感、自豪感，给通济渠文化活态传承和创新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第五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一、非遗传承人的认定与扶持机制

（一）建立传承人档案，提供资金与政策支持

给通济渠沿线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建立一套全面、系统的个人档案，是实行精准保护、有效扶持的前提。这份档案要详实记载传承人的基本信息、师承谱系、技艺特点、代表作品等主要情况，并且要动态跟踪传承人的授徒传艺、社会活动、创作创新等实际情况。凭借这样一份详细的“文化履历”，一方面可以对传承人的存续状况和发展需求做全面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可以给以后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档案本身建立就是对传承人身份、贡献的一种官方确认，可以极大地增强传承人的职业荣誉感和文化自信心。

在此基础上，稳定而有力的资金、政策支持，就成为解除传承人后顾之忧、激发其传习热情的重要因素。资金支持要多元化，即除给传承人发放基本生活费、创作活动所需的年度传承补助金外，还要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传承人的原材料研究、工艺改良、新作品创作、传习场所修缮等项目。政策上应该把符合条件的传承人纳入地方人才支持体系，在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各方面给予倾斜照顾；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针对非遗项目的“非遗贷”等金融产品，解决其扩大再生产融资难题；在土地规划、税收优惠等方面提供便利，为传承人设立工作室、传习所创造稳定环境，使传承人可以安心传艺、潜心创作。

（二）鼓励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在于广泛传播与持续实践，静态的保存不如动态的传承有效。因此必须大力扶持传承人走出工作室，面向社会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传习活动，把原有的封闭式、家族式传承模式转变为开放式、社会化的传承格局。这些活动既可以是为某一人群举办的收徒传艺，也可以是面向大众的短期培训班、体验课或者公益讲座等。经由传习实践，可以发掘出新的传承人，同时也会使非遗的种子在更为宽广的社会土壤里生长起来。

根据通济渠沿线的特殊地域特色来设计一系列的主题性传习项目。在开封的宋都皇城旅游区可以设立汴绣传承人的“运河繁景”刺绣工作坊，让游客亲身体验《清明上河图》某一部位图案的刺绣制作；邀请浚县泥咕咕艺人到中小学美术

课堂, 指导学生制作有运河人物形象特点的泥塑; 支持通济渠区域河南坠子说唱传承人在沿岸古镇茶馆、书场表演流传至今的运河传说与历史故事。

为了保证传习活动持续高质量地进行, 应该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对于积极进行传习并且取得明显成效的传承人, 在年度考核时可以加 0 分, 并给予项目经费的奖励。政府文化部门可以主动搭建平台, 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组织传承人到社区、学校、企业、军营开展“非遗进万家”系列活动, 按照活动场次和实际效果支付报酬。一方面可以扩大非遗的社会影响, 另一方面也可以给传承人开辟新的收入来源, 使其传道授业的行为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尊重。

（三）关注青年传承人的培养与激励

青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希望和未来。非遗在现代社会中能否焕发生机与活力, 关键就在于能否有效地吸引并留住年轻一代。目前,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存在传承人老龄化、后继无人的严重问题。因此, 我们必须将青年传承人的培养与激励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用创新的方式、多元的途径打破代际壁垒, 给古老的技艺注入新的青春活力。

培养青年传承人要冲破传统口传心授的局限, 积极探寻现代学徒制同院校教育相融合的创新途径。鼓励传承人与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相关专业(设计、美术、历史、民俗学等)进行深度合作, 设立非遗方向订单班或者工作室, 使学生在系统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跟随传承人长时间地实践学习。设立专项奖学金、创业扶持基金给愿意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 投身其中青年的初学、创业的成本支撑。还可以通过举办青年非遗技艺大赛、创新作品展等活动来给青年人提供展示才华、交流切磋的平台, 在行业内逐渐树立起他们的声誉。激励青年传承人, 不能只在物质上给予支持, 还要考虑精神上的需求。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打造文化网红或者青年匠人偶像, 提高其社会认同感。另外应该激发其跨界融合与创新实践精神, 鼓励将大梁门缂绣等传统技艺与现代服装设计、家居用品的设计进行结合, 设计出现代审美趋势下文创产品。只有当青年人认识到非遗不仅仅是需要守护的传统, 更是一个可以发挥个人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广阔天地时, 才会主动地接受非遗、继承非遗。

二、非遗传承的生态空间营造

（一）在历史文化街区、古镇设立传习所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功能融入通济渠沿线的历史文化街区、古镇，是实现“文景共生”的有效途径。这些地区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历史运河文化气息，有独特的空间肌理。在洛阳老城、开封书店街、郑州管城街、商丘古城等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地方，选择具有传统风貌的建筑进行修缮改造，并将其设为非遗传习所，非遗就能回到它生长的环境中，显得恰如其分。

传习所的功能设计要趋向复合型，即生产、教学、展示、销售一体化。最好的模式就是前店后坊，即临街空间用作展示、销售的地方，游客可以直接欣赏精美的非遗作品和购买心仪的纪念品；后院或楼上作为传承人的工作室和教学场所，学徒在这里专心学习技艺，传承人在这专心创作。这样一种布局使得非遗的生产过程也成了动态的文化展示，游客可以透过橱窗或者在特定开放时间里，观看技艺的实际操作过程，进而体会到“活”的文化魅力。

非遗传承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历史街区文化生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传习所的存在为古老的街区注入新的文化内涵，使街区的文化品位、吸引力得到提升；而街区稳定的流量、浓厚的文化氛围又反过来给传习所的运营、非遗产品的销售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两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组成一个可以被感知、被体验的运河文化活态博物馆。

（二）将非遗融入社区生活与旅游体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源于民间的生产生活，最好的归宿也应该回归到民众的生活中去。因此推动非遗走出博物馆式的静态展示，深入到现代社区生活以及大众旅游体验当中，才是维系非遗生命力的根本途径。社区层面可以在社区文化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公共空间里定期举办传承人主讲的非遗公益课，通草画绘制课、朱仙镇木版年画印刷课、官瓷烧制技艺入门课等等，使居民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接触到传统文化并学到其中的内容，让非遗成为邻里之间的情感纽带以及社区认同的文化符号。

从旅游体验方面来说，应该由传统的观赏型旅游向参与型、沉浸型的旅游转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深度游线路，把通济渠沿线的众多非遗工作室连

成一条线,使游客在一天或者数天之内可以探访到不同的传承人,听他们的故事,体验各种独特技艺。

2. 开展一日学徒体验项目,在传承人的指导下游客亲手完成简单的非遗产品,比如印张年画、捏塑泥人、唱一段地道的运河号子,得到独一无二的文化纪念品和满满的自豪感。

3. 打造非遗主题的餐厅或民宿:把运河沿线的传统饮食文化(如开封第一楼灌汤包制作技艺)、居住文化等融入其中,在游客的食、住、行、游、购、娱每一个环节都能深刻感受到通济渠非遗文化的熏陶和魅力。

(三) 打造非遗主题的文化生态保护区

在条件允许的地方,要将单一项目或者传习所的保护模式升级为规划建设“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以通济渠某段为保护核心,目的是对区域内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进行整体保护,是创新的保护方式。其主要目的就是保护文化空间的完整性、原真性,从而维持非遗传承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

可以选择通济渠流经的浚县段。这里有珍贵的运河遗址,同时又是浚县庙会、浚县泥咕咕、民间社火等众多非遗项目的集中地。建立“浚县运河文化生态保护区”,即保护的不能只限于运河河道本身,还要包括庙会所依托的古城格局、社火巡游的传统路线、制作泥咕咕所需的特定黏土地、与之相关的民俗、方言、传说故事等。保护区内的发展建设必须以不破坏文化生态为前提。提倡民众在保留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以参与非遗产业获得经济收益的方式实现非遗保护与发展,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区域性的整体保护可以有效地抵御现代化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冲击,给通济渠非物质文化遗产群落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诺亚方舟”。

三、非遗的数字化记录与传播

(一) 利用音视频技术记录技艺全过程

传统文字、图片记录方法,对复杂的、精细的、动态的非遗技艺来说,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许多关键的技法、独门诀窍、身韵姿态、独特的腔调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精髓内涵,很难用静态媒介准确地表达出来。高清音视频技术的应用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多机位、多角度拍摄,用特写、慢动作、同步录音等方式,对传承人的操作手法、工具使用、口诀念诵、示范唱腔等进行全方位、高保

真的记录。

记录工作不能只记录成果，还要记录过程。就一项陶瓷烧制技艺而言，数字化记录应当包含从寻找、处理某一种瓷土开始，直至揉泥、拉坯、利坯、施釉、彩绘等每一个步骤的手法，以及装窑、烧窑时对火候的观察与控制，还有相关的仪式、禁忌等全部信息。这相当于给一项技艺建立了一份完整的数字教学影像档案。该资料极为珍贵，它既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标准的样本，更重要的是，在特殊环境下，即使某项技艺的传承链条不幸断裂了，后人也可以凭借这份完整的影像资料去学习、模仿、复原，从而给技艺的“复活”留下一线希望。

对通济渠沿线众多的濒危口头传统、表演艺术和手工艺技能来说，抢救性地开展数字化记录工作已迫在眉睫。这既是历史责任，又是给未来留下重要的文化基因。所采集到的数据经过专业的整理和标注之后，将成为以后所有的保护、研究、传播工作的基础数据。

（二）通过新媒体平台扩大非遗影响力

新媒体出现之后，信息的传播生态就被彻底改变了。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因为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用户群体年轻化等特点，已经成为非遗实现“破圈”、走向大众的最佳途径。过去被深藏闺中、鲜为人知的古老技艺，现在只需要一条几十秒的短视频，就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被数百万的受众所知晓。

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就必须改变传统的话语体系，用现代、时尚、有趣的方式去包装和呈现非遗内容。可以策划以通济渠非遗传承人为主角的一系列短视频系列，通济渠非遗奇遇记。在每个短视频中探究一位传承人的特别技艺，用形象生动的画面语言和网络化的剪辑方式呈现其技艺的精湛时刻、日常生活的真实场景，并诉说个人与运河之间动人的故事。组织传承人定期开展网络直播，展示制作过程、互动交流、回答问题、尝试直播带货，将流量转化为经济收益。与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博主、旅游达人合作，邀请他们亲自体验通济渠非遗项目并创作推广内容，可以依靠其粉丝效应，迅速提升非遗项目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样传播的方式一方面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非遗，另一方面也消除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陌生感、距离感，使非遗变得可亲、可近、可感。

（三）建设非遗数据库与线上展示平台

碎片化、娱乐化传播盛行之时，创建权威、系统、专业的非遗数据库以及在

线平台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就相当于给通济渠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一个永恒的“云上家园”。该平台要具有学术性、知识性和互动性，给不同层次的用户提供多元服务。

数据库是平台的核心，它要对所有的数字化记录成果进行系统的整合，即高清影像资料、音频文件、三维模型、历史文献、传承人谱系、学术研究论文等，并建立科学的分类和检索体系。研究者可以通过关键词、地理方位、项目类型等方式快速地、方便地获得所需要的深度资料。

线上展示平台就是数据库对公众开放的窗口。可以打造为一个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数字文化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用户可以走进传承人的工作室，亲眼看到技艺的演示；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可以扫描一件文创产品，立刻出现该产品背后所蕴含的工艺和文化内容；在交互式电子地图上，用户可以“漫游”在数字化的通济渠之上，点击沿岸的城市或者古镇，就会弹出该城市或者古镇所对应的非遗项目介绍以及多媒体信息。平台可以设立线上课堂、数字展览、互动游戏等板块，使知识性和趣味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该平台不但是信息展示的中心，也是文化教育、学术交流、旅游推广的枢纽，把通济渠沿岸零散的非遗明珠串成一条永不褪色、熠熠生辉的文化项链。

第五章 通济渠生态文化谱系研究

第一节 文化景观的概念与特征

一、文化景观的理论源流与定义

(一) 从地理学到文化遗产研究的文化景观概念

文化景观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绍尔在 20 世纪初系统提出的。他所属的伯克利学派将地理学研究的重心从环境决定论转向文化对环境的塑造作用,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文化是动因,自然地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这一论断彻底否定了以前认为景观仅仅是自然产物的观点,突出了人类活动在形成地表形态上所起的作用。景观不再只是静止的、被动的背景,而是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

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不再只是地理学的一个范畴了,而是被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很多学科借鉴和发展。它的内涵也在不断完善,从最初只注重物质形态的塑造,发展为包含非物质的社会实践、信仰体系和审美观念。它打破了国外思想里长期以来存在的“自然”和“文化”二元对立的局面,认为二者是相互渗透、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进入 20 世纪末以后,文化景观的概念才正式进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成为国际遗产宪章和实践中的一个核心术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它作为独立的遗产类型来认定,这说明国际社会正式承认了人和自然共同创造的作品价值。这样许多以前被忽略的遗产类型,如农业梯田、灌溉系统、圣山、运河廊道等,被纳入到全球性的保护视野里,极大地拓宽了文化遗产的范围和深度。通济渠就是这种认知转变下典型的受益者。

(二) 自然与人文相互作用形成的复合体

文化景观的本质,是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在长时间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有机复合体。它不是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简单叠加而成的,而是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深度耦合、协同演进的结果。自然环境给人类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和框架,即舞

台；而人类的文化实践又不断改造、阐释、赋予这个舞台特定的形态和意义。二者间互动为双向的、持续的。

复合体的形成过程，就是文化化的自然过程。一方面，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去适应和利用一些自然条件，比如地形、水文、气候、土壤等等。自然因素影响了人类的居住地点，农业生产方式以及交通路线。另一方面是人类使用其技术、社会组织方式、价值观去干涉、改变自然环境。开凿运河会改变区域水系，修筑堤坝会改变沿岸地形，农业垦殖会改变原生植被，城市建设会创造新的生态系统。人文活动就像是在羊皮纸上一层层地堆砌上去的，最终就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地表文本”。

（三）文化景观的世界遗产认定标准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正式把文化景观列为世界遗产类别，并对它做了明确的分类。此举目的在于给缔约国提供识别、提名和管理此类遗产的明确指导。这一标准提出的是关于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成果的新认识，也是世界遗产保护理念又一次飞跃。按照该指南，文化景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每一类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结合的不同方式。

1. 人为设计、创造的景观。这类景观多是由设计者精心设计、建造，其形态布局明显体现出设计者的思想以及时代文化特色。典型例子有各种园林、公园，欧洲的凡尔赛宫苑、中国的苏州古典园林都属于此类。是人类艺术、思想的最高级、最浓缩的表现形式。

2. 有机演变的景观。这类文化景观最常见，它由社会、经济、行政或宗教等初始驱动因素产生，经过与自然环境不断的互动而形成了现在形态。该类景观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残存或者化石景观，即它的演变过程在过去的某个时期已经结束，但是重要的特征仍然清晰可见；另一种是持续性景观，即它在当代社会中仍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并且其演变过程仍在继续。隋唐大运河通济渠至今仍有一定功能的、历史形态和影响都很清楚的廊道就是一个典型的持续性景观案例。

3. 关联性文化景观。它的价值主要来自于与自然要素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宗教、艺术或者文化联系，而不仅仅是依靠物质文化遗产来维持。其自然特征本身没有经过明显的人类改造，但是在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中，它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澳大利亚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对原住民来说是创世时代祖先活

动的神圣之地，它的价值源于非物质的信仰体系和口述传统。

二、文化景观的基本构成要素

（一）自然基底：地形、水文、植被等

自然基底是文化景观形成的物质基础，也是文化景观空间存在的载体，它给人类活动提供了一个初始舞台和环境约束。通济渠自然基底主要是黄淮海平原宏观地形地貌、区域性水系、气候条件及原生植被。隋代在开凿通济渠的时候，充分利用了古代早已存在的鸿沟、汴水、泗水等天然或者半天然河道，顺应了西北向东南倾斜的总体地势，因地制宜地选择了河道走向，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工程量，因此决定了运河的基本形态和路线。

自然基底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背景，它和人工开凿的运河系统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双向互动。运河修建以后，区域的水文情势发生变化，截断或者沟通了原有的地表径流，地下水位受到影响，输沙、淤积等过程不断改变着河床本身和周边环境。运河沿岸由于水源丰富而形成的特有的微气候，也影响着植被的分布和生长。因此，认识通济渠的自然基底不能只看它的原始状态，还要关注在人类干预下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这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最直接的体现。

（二）人文层积：聚落、农田、道路、建筑等

人文层积是在自然基底之上，由历代人类活动不断叠加而成的，人文层积是文化景观中最为直观、最丰富的一部分。这些层积物就是社会的直接历史证据，记录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政治格局变化以及文化上的交流。通济渠的人文层积是多维度、多类型的复合体，生动地表现了运河怎样组织、塑造其流经区域的社会空间。

水利工程受到的影响首先就是运河河道、堤防、水闸、堰坝、码头等。其结构、材料、技术等各方面都直接体现出隋唐时期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以运河这条主动脉为依托，发展出一系列的功能性聚落。洛阳、开封是运河东西两端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沿途的宋州（今商丘）、宿州、泗州等因运河转运而兴盛，成为区域性的商业重镇。从更微观的角度来说，成千上万的村庄、驿站、仓库等都是沿着河岸而建的，形成了一条线形的聚落带。

人文层积还会体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上。运河不但是交通线，也是重要的灌溉水源，沿岸发展出高效的灌溉农业系统，形成连片的良田。运河旁一般会

有一条官道、纤道,和水路一起构成一个立体的交通网络。散布于其中的还有官署、会馆等管理机构的建筑,庙宇等供人们祈求平安的场所,文人墨客抒怀吊古的亭台楼阁。这些物质遗存一起构成了刻在大地上、立体呈现的通济渠社会经济史。

(三)文化意象:赋予景观的意义与价值

文化意象是文化景观的灵魂,是附着在物质实体上的非物质层积,包括记忆、传说、诗歌、绘画、地名、节庆风俗等,它们一起组成了景观的意义世界。如果说自然基底和人文层积是景观的“形”,那么文化意象就是它的“神”。正是文化意象给冰冷的工程和土地赋予了温度和情感,使其上升为有深厚文化认同感的精神家园。通济渠的物理形态唤起了千百年来人们集体的记忆和情感投射。它既是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象征,是导致隋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又是隋唐宋三代沟通南北、维系帝国统一和经济繁荣的生命线。这种复杂的二元评价本身就是它独特的主要文化意象。无数的文人骚客留下数以万计的诗篇,杜甫的忧国忧民、白居易对市井生活的写实、柳永的离愁别绪等,都以通济渠为载体来抒发家国情怀、描绘时代风貌、寄托个人情感。这些文学作品和表现漕运盛景的绘画一起,共同形成了通济渠在后人心目中的经典形象。

三、运河文化景观的独特性

(一)以“线”串联“点”和“面”的廊道特征

运河文化景观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线性“廊道”形态。与一般的点状存在的一座寺庙、一座宫殿,或者作为面状存在的区域(一片历史街区、一个考古遗址公园)不同的是,运河是一条长距离延伸的“线”。这条线是主要的文化遗产,即由河道、堤防、水工设施等组成的工程系统。更重要的是,这条线有很强的组织、串联作用,把沿途的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联动的遗产网络。

这条线上分布着重要的城市、市镇、渡口、关隘,是运河网络中的重要节点。通济渠把西端的都城洛阳和东端的江淮财赋区紧密联系起来,沿途的汴州、宋州等城市也因运河而兴起,成为漕运体系中的枢纽。运河廊道辐射并重构了广阔的“面”状区域,即运河腹地的经济区。运河沿岸的农田水利设施、乡村聚落形态、土地利用格局、地方市场体系等都带有运河的烙印,形成了一条以运河为中心线展开的带状经济和文化区。这样一种以线带点、以点连面的空间结构使运河文化

景观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复合型巨系统，有很强的区域整合与文化传播能力。

（二）动态、开放、演变的生命体特征

运河文化景观不像那些被视作“凝固的历史”的静止纪念物那样，它是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的“生命体”。运河作为一个功能性水利工程，生命在于流动。为了保证通航，必须对它进行管理维护，即清淤疏浚、堤岸加固、水量调度等。持续的干预本身就是运河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运河的形态、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经济格局的改变、气候环境的变迁、水利技术的进步而发生改变。通济渠在隋、唐、宋时期线路的小幅变动、部分河段的废弃、管理机构的更换，都是它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

运河系统本质上是开放的，是物质、能量、信息三者之间交换的重要通道。水、泥沙、船只在其中流动，漕粮、商品、军队依靠它运输，官员、商人、文人依靠它往来，新的思想、技术、文化艺术也随它而传播。开放性使它成为文化交融的熔炉，沿线地区在保持地方特色的同时也受到跨区域交流的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元而又具有某种共性的运河文化带。

将运河看作一个生命体，有利于我们对运河的历史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它有它从诞生（规划、开凿）到成长（鼎盛、繁荣）、衰老（淤废、改道）、再生（现代条件下保护、利用）的完整生命周期。解读运河文化景观，就是解读它的完整生命历程，理解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呈现的形态，不能只关注它某一时期的静止切片。动态变化的视角，就是认识和保护运河这类“活态”遗产的关键。

（三）功能性与审美性的高度统一

运河文化景观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其很强的功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审美性。通济渠的出现是由于隋代为了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转运东南财富而产生的强烈的政治和经济需要。其路线选择、河道宽深、沿岸设施配置等一切都是为了漕运这一主要功能而服务的。强烈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精神，是运河工程的本源，也是运河景观形态的决定性因素。运河之美在于它的用，是秩序之美、力量之美和效率之美。

在此基础上，宏大的水利工程同沿线的自然、人文环境相结合又产生了独特的人工化自然美学。隋炀帝令在通济渠两岸栽植柳树，既起到固堤的作用，又形

成了长堤垂柳的优美景观，后来成为后世诗画中反复咏颂的题材。舟楫往来、帆檣林立的忙碌场面，纤夫拉纤、水手唱晚的劳作情景，两岸城镇袅袅炊烟、田园风光，一起构成了流动的、带有生活气息的清明上河图式画卷。它不是刻意雕琢的园林之美，而是在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的过程中，无心插柳地产生出来的，与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结合的，充满生命力的景观美学。这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即最大的人工往往能够和自然达到最高的和谐，最终实现功能与审美的完美统一。

第二节 通济渠自然景观演变

一、历史时期通济渠流域的生态环境

（一）隋唐时期的气候、水文与植被状况

隋唐时期正处于全球性的温暖期，即隋唐一中世纪暖期。根据历史气候学的研究可知，当时通济渠所流经的黄淮平原地区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 1 到 2 摄氏度，气候温暖湿润，雨水充足。充沛的降水给通济渠提供了稳定的可靠的补给水源，保证运河常年有足够的通航水位，从而成为它承担国家经济命脉功能的气候基础。同时温暖的气候条件也大大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为运河流域农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水文角度讲，通济渠西引黄河之水，东汇淮河之流，蜿蜒贯穿于地势平坦、河流湖泊密布的黄淮平原。除黄河水之外，又有济水、汴水、睢水等各种自然河流的补给，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圃田泽、孟渚泽等也构成了一张庞大的水网。充足的、多源的水源补给，使通济渠水量比较稳定，抗旱能力强。加之河道坡降平缓，水流速度适中，这些水力条件给大宗货物漕运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当时的植被状况也体现出生态环境的好坏。流域内森林覆盖率较高，西部、南部的丘陵山地分布有大片天然次生林。广阔的平原地带是茂密的草甸、连绵的湿地，河道两岸是杨柳依依、草木葱茏。唐代诗句“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所描绘的不只是文学意象，更是当时运河两岸植被茂盛、生态优良的真实写照。丰富的植被既形成优美的自然景观，又起到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作用。

（二）运河对区域小气候与水系的改变

通济渠作为一条横穿数百公里的人工长河，它所造成的宽阔的水体给沿岸区域的小气候带来了明显的调节作用。运河水体具有巨大的热容量，夏季能吸收大量的热能，降低沿岸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冬季又可以缓慢释放热量，提高夜间的最低气温，使气温的日较差和年较差减小。因此运河沿岸的气候比较温和。

运河水体蒸发作用增大大局空气湿度，在风速小的时候，沿岸容易形成雾气，产生“汴堤烟柳”等特殊的景观气象。湿润的小气候环境有利于两岸植被的生长，特别是喜湿的柳树等，也给沿岸的农业生产带来积极的影响，给作物提供了一个更为湿润的田间环境。

通济渠的开凿从根本上改变了所在区域自然水系的格局。它就像人工大动脉一样，截断或者合并了很多原有的中小河流，彻底改变了这些河流的流向和水文情况。一些河流被并入运河，成为其支流；另外一些河流因为被运河截断而被迫改道，甚至逐渐干涸。强制性重组地表径流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区域水资源宏观调控能力，给农业灌溉、城市供水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使原有的湿地生态系统发生了深刻变化，部分沼泽因为水源被截而干涸，在某些地方由于运河水位顶托而形成新的渍涝区。

（三）历史文献中的动植物分布记录

隋唐时期的诗歌、笔记、地方志等历史文献，给我们描绘出通济渠流域生机勃勃的动植物画卷。两岸最具代表性的植被景观就是隋堤柳，隋炀帝曾下令在运河两岸大面积种植柳树，既起到加固堤岸的作用，又给过往的船只和行人提供阴凉，形成了一条长达千里的绿色长廊。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中反复出现的“汴水流”，李白的“舟行若在天，鱼藻应可数”等诗句都生动地再现了运河水清岸绿、生态环境优美的一幕。除了柳树以外，河岸上还分布着桃树、李树、杏树等各种果树以及野花、野草，生机勃勃。

当时的动物资源同样很丰富，这也是健康生态系统的重要表现。水中鱼类种类繁多，历史上记载的有鲤、鲫、鲂、鲢等多种经济鱼类，它们不但是沿岸居民重要的食物来源，也吸引了大量的水鸟前来觅食。天空和湿地之间常常有鸿雁、鹭鸶、鸳鸯、野鸭等各种飞禽栖息翱翔，给运河增添了不少生机。陆地上森林、草甸给很多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文献中有关鹿、獐、狐、兔等动物在运河沿岸活动的记载很多。甚至在气候相对温暖的初唐时期，一些喜暖动物的分布北界也

可以推至该地区。丰富多样的生物多样性说明，通济渠在历史早期不但是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生态廊道。

二、人类活动对自然景观的塑造与影响

（一）农田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方式的变迁

通济渠的开通，最直接和最显著的益处之一就是为沿岸的农业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依托运河干流及其支渠水系，广大的黄淮平原上原本依靠“望天收”的旱地被改造成水浇地，甚至开辟出水田。这就使得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片的天然林地、草甸、沼泽湿地被开垦改造成了整齐划一的农田。随之景观格局也发生深刻改变，原本以自然为主的生态系统逐渐转变为以人工农业为主的生态系统。

这次深刻的土地利用变革，极大提高了区域粮食生产能力，为沿线洛阳、开封等都城以及众多州县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也保证了国家漕粮的稳定供给。运河两岸逐渐发展成中国最重要的农业核心区之一。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集聚、村镇的兴起，人类聚落像珍珠一样被运河串起来，形成了独特的“运河聚落带”。自然景观的人文化进程因此加快，田畴、村舍、道路、桥梁等新的景观要素一起构成了新的画面，彻底改变了隋唐以前原始而未开垦的面貌。

（二）森林砍伐、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

通济渠这个“世纪工程”的修建及长期维护以及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对森林资源造成极大的消耗。无论是开凿河道、修建堤防，还是建造官署、制造数以万计的漕船，无一例外地都要耗费大量的木材。木材主要是运河流域上游的秦岭、伏牛山、桐柏山等山区所产。几百年来由于大规模的砍伐，使得森林覆盖率大幅下降，原始森林逐步转变为次生林、灌木丛。

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之后，它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生态功能就会大大降低。裸露的山体和坡地在丰沛的降雨冲刷下很容易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大量的泥沙随着水流被带入通济渠，从通济渠诞生之日起，泥沙淤积问题就一直存在，成为影响通济渠航运功能的“心腹大患”。为了保证通航，历代统治者不得不投入人力物力做经常性的疏浚治理工作，造成了“岁岁浚治”的现象。

水土流失和河道淤积互相影响，相互强化。淤积抬高了河床，在汛期很容易造成运河决口泛滥，给两岸农田、村庄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洪水退去之后，地表

常常会留下厚厚的沙土层，造成土地沙化，给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通济渠的兴盛，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上游以及周边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体现了古代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同环境保护之间的固有矛盾。

（三）漕运活动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

日夜不停的漕运活动，是通济渠生命力的体现，也是对脆弱的水生生态系统的一种持续性干扰。数以千计的船只来来往往，船身、船桨搅动河水使之浑浊。水体的浊度增大，阳光的穿透能力变弱，严重地抑制了沉水植物的光合作用。沉水植物作为水下森林的代表，是许多鱼类、底栖动物产卵、觅食、躲避天敌的场所，沉水植物的减少直接造成水生生物栖息地的破坏，进而动摇了食物链的基础。

船只在航行或者停泊的时候，也会造成污染。古代没有工业废水，但船上人员生活垃圾、排泄物以及装运粮食过程中产生的抛洒、渗漏都会直接进入水体。沿岸码头、城镇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中。这些有机物的进入使水体发生富营养化现象，水流缓慢的港湾和河段很容易造成藻类的过度繁殖，大量消耗水中的溶解氧，对需要高溶解氧的鱼类（如名贵的黄河鲤）造成严重危害。从而使得能够耐受低氧、适应浑浊环境的鱼类成为优势种群，彻底改变原有的鱼类群落结构。

三、近现代通济渠自然景观的巨变

（一）运河断流、河道淤积与功能丧失

决定性打击通济渠命运的，就是其主要水源黄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自宋金以后，黄河频繁泛滥、决堤改道，给运河的稳定运行造成很大困难。直到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渤海，从此离开了它沿用几百年的南流故道。这次被称作“黄河北徙”的重大水文事件，使以引黄济汴为基础的通济渠（当时称汴河）完全失去水源，从此进入长期断流状态。

没有上游来水的冲刷，残留的河道很快就被泥沙、风沙填平了。曾经的繁忙水道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变成了时断时续的“废河”，或者只作为季节性排水沟使用。近代以后，由于铁路（陇海铁路、京汉铁路）的迅速发展，漕运的经济地位被完全取代，运河大规模疏浚、修缮的动力也随之消失。河道被沿岸居民侵占、开垦，昔日宽阔的河面渐渐缩小成狭小的沟渠，甚至很多地方已经完全消失，只留下汴河路、运河堤之类的地名作为其曾经存在的历史见证。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生态压力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这给已经衰败的通济渠故道带来新的、更严峻的生态灾难。沿线城市郑州、开封、商丘等地迅速扩大，大量的工厂建在河边。在环保法规尚不健全的时候，大量的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被直接排入运河残存的河道里。

残留的河段水量小、流速慢，自净能力极差，很快就成了容纳污染物的“下水道”。河水变得深不见底，臭气熏天，水面上漂浮着垃圾、油污，水体中溶解氧接近于零。绝大多数水生生物随之灭绝，河道生态系统完全崩溃，昔日的运河变成了城市中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龙须沟”。

城市发展不断地减少古运河的物理空间。很多河段被填埋，用作道路、广场或者房地产开发。历史上运河的堤岸、码头遗址被夷为平地，古老的“汴堤烟柳”景观不复存在。通济渠的自然与文化景观遗产，在现代化的推土机的摧残下，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三）当代生态修复工程的初步成效

由于通济渠故道生态问题严重，21世纪以来，以复苏运河生态为宏大目标的工程陆续上马。通济渠遗址段属于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关键组成，因而得到了很高的生态修复重视。这些工程的核心思想，已经由单纯工程性治污转变为生态系统整体恢复，努力恢复健康的人与水、岸、城关系，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在实践层面，多项举措正在并行推进：

1. 引水补源、水系连通，通过“引黄济汴”、南水北调东线穿黄工程等跨流域调水工程，对长期断流或者水质较差的河段进行生态基流补充，恢复河道的流动性和水体交换能力，被视作生态复苏的生命线。同时积极打通城市内部被割裂开来的河道，创建起循环畅通的城市水网。

2. 污染源控制和内源治理：清除河道中长期积累下来的污染底泥，以消除病灶，减少污染物持续释放。沿线城市全面推行雨污分流改造和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从源头上阻断新污染的产生，保证进入河流的水是干净的。

3. 岸线修复与景观重塑，拆除侵占河道的违章建筑，把硬质化的水泥堤岸换成有渗透、净化作用的植草浅沟、人工湿地等生态护坡。根据历史风貌广泛栽种垂柳、国槐等乡土树种，建设滨水绿廊、带状公园等，既可恢复一部分历史景观，

又能给鸟类、昆虫等提供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已经有所恢复。

目前修复工程已经初见成效。以开封“一渠六河”、商丘古城内外河、淮北“绿金淮北”等项目为典型，运河故道从过去排污沟渠变成如今清水绿岸、游鱼可见的城市生态客厅、文化展示长廊。水质检测结果表明，主要污染物指标明显下降，部分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指数也慢慢提升。这不仅仅是对运河的物理性修复，而且是将运河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新性、创造性转化体现出来，给古老的运河注入新的生命力与活力。

第三节 通济渠人文景观构成

一、生产性人文景观：农田与水利

（一）运河灌溉区的形成与农业景观

通济渠开凿之后，给黄淮平原带来前所未有的稳定水源。沿线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合力修建了大量的引水、输水工程，把运河之水按预定路线输送到周围的农田，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运河灌溉区。这使整个区域的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原本的旱地、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的水浇地，甚至出现了“渠通济，河南北，国仓实，天下安”的繁荣景象。景观上人工和自然高度融合，形成了和谐共生的形态。春季新绿的麦苗在整齐的田块中铺展开来，沟渠纵横交错，水光潋滟；夏秋时节部分区域的水稻随风摇曳，稻田和旱作区作物色彩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农业地景。以水利为主的农业景观直接反映了通济渠的综合效益，它所体现的季节色彩、肌理变化就是一种文化动态景观。

运河灌溉区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计划性、集约性。作物品种选择与布局一般和水源远近、土壤条件、市场需求等有关。靠近主干渠的地方水源充足，因此多种植水稻、莲藕等耗水量大的作物，形成了江南水乡的独特景致；而离主干渠较远的地区，则主要种植小麦、粟、大豆等旱作物。由于水源不同而形成的种植结构造就了错落有致、功能分明的农业景观带。同时为了保证灌溉系统的正常运行，催生了斗门令、堰长等专业管理机构，也产生了乡规民约等无形制度。这些制度性安排虽然看不见，但是它们深深地嵌入在乡村社会组织当中，成为维系这片生产性景观稳定运转的内在逻辑。

（二）堤岸、水塘、沟渠构成的田园肌理

通济渠两岸高耸而起、气势恢宏的堤防，成为运河景观中最为壮观的一条线性景观构成。堤岸最初的功能是防洪和保水，但是它庞大的体量本身，就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人工地景。隋唐时期堤岸上栽种榆柳，既能固土护坡，又形成了一道绵延千里的绿色长廊，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隋堤烟柳”。堤岸不但是水利工程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官民往来其上。商旅、纤夫、戍卒、行人熙熙攘攘，形成流动的风景区。高耸的堤岸和平坦的原野形成了运河区域独特的地理特征。

在宏伟堤岸之下，是密如蛛网的水塘、沟渠组成的微观水利系统，共同织就出精细的田园肌理。主干渠分出的支渠、斗渠、毛渠，像人体血脉一样把水源输送到每一个田块，保证灌溉的准确、高效。大小不同的沟渠在田野里像蜿蜒的曲线一样交叉分布，把田野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农田。走向与组合，无声地表现出了古代水利工程师对地形、水文的深刻认识。散落其间的水塘起到蓄水、调洪和养殖的作用，它们像是镶嵌在绿色田野上的耀眼宝石，调节着局地小气候，给乡村生活平添了几分灵动和生机。堤、塘、渠三者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形态优美的灌溉系统，而这种独特的田园肌理，就是通济渠沿线最典型的生产性景观遗产。

（三）与农业相关的仓储、加工设施景观

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漕运贸易日益繁盛，通济渠沿线也出现了很多服务于农业生产与粮食流通的配套设施。这些设施是生产链条上重要的节点，一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产业景观。

1. 仓储设施景观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巨大的国家粮仓。以洛阳附近的含嘉仓、兴洛仓、滑县的黎阳仓、荥阳的洛口仓等为代表，这些巨大的仓城并不是简单的仓库，而是集收购、检验、储存、运输为一体的综合性的物流中心。考古发掘所见的含嘉仓，仓窖密布，排列整齐，恢弘的规模和科学的设计，无声地诉说着隋唐帝国强大的国力以及对粮食安全的极致重视。这些仓城大多修建在运河岸边，高大的围墙和内部密集的建筑群，一起形成了沿岸城镇一道威严而独特的景观标志。

2. 加工设施景观：商品化的粮食极大地促进了加工业的发展。沿线城镇和乡村中出现了许多磨坊、油坊、酒坊等。尤其是利用运河水力或者支流水力驱动的水磨，更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水磨一般建在水流落差大的地方，巨大的水

轮缓缓转动,带动石磨碾磨谷物,独特的建筑形态和规律的轰鸣声,成了运河沿岸动态的景观。加工设施出现之后,农产品的附加值得以提高,农业经济也由原来的自给自足型向商品经济转变,其物质遗存是研究当时手工业技术和经济形态的宝贵资料。

二、聚落性人文景观:城镇与乡村

(一)“运河人家”的特色民居建筑

通济渠沿线居民建筑具有较强的地域适应性及功能复合性的特点,形成了所谓“运河人家”的特色。由于地处黄淮之间,建筑材料多就地取材,以青砖、灰瓦、土坯、木材为主,形成了质朴厚重的基本格调。从建筑形态上来说,由于临水环境的影响,许多民居都有特殊的布局设计。有的住宅或者商铺直接面向运河开窗设门,而后院或者侧院连接陆路街道,形成前门临河、后门通街的双向格局。一些富裕的商户宅邸建有私家码头或者河埠,货物可以直接装卸。

建筑内部空间就体现了运河生活所需。许多民居采取“前店后宅”或者“下店上宅”的方式,把商业经营同家庭生活融合在一起。底层一般设店铺、作坊或者货栈,楼上则为居住空间。商住结合的住宅形态体现了运河商业经济对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整个街道乃至整个社区都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和生活气息。为了抵御洪水的威胁,有的地方民居地基普遍较高或者在建筑结构上加强。看似平常的建筑细节,实际上是沿岸居民与水共存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和文化适应。

(二)城镇天际线与乡村聚落形态

通济渠沿线聚落景观在宏观形态上城镇和乡村有明显的区别。运河城镇特别是州府级城市、商贸重镇如汴州(开封)、宋州(商丘)、泗州等的天际线是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城楼、角楼形成了城市的轮廓,城内的佛塔、道观等宗教建筑成了城市的制高点,既供人信奉又给航船远归作指引。宏伟的官署建筑群、富商巨贾的楼阁宅院和沿运河两岸绵延不断的酒楼、客栈一起组成了繁华的城市剪影。天际线就是城市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文化繁荣程度的综合表现。

乡村聚落与城镇的雄伟繁杂相比,更具有有机、质朴的特点。它们的分布和形态无不受到运河水系的影响。大多数村庄沿运河主干道或者支流呈带状分布,房屋朝向、村落延伸都与河流走向保持一致,最大限度地利用水源和水运的便利。

另外一些村庄是以某个渡口、堰闸或者小型码头为中心，呈团块状或者星状聚集。乡村天际线大多平缓，以一层或者两层的民居为主，偶尔有祠堂、庙宇的屋脊比周围的田野、树林和河流略高一些，与周边的田园风光、自然环境、村舍房屋一起组成一幅宁静和谐的田园画卷。这种聚落形态是传统农耕文化同运河文化互相融合而形成的。

（三）反映社会结构的聚落空间布局

通济渠沿岸聚落内部建筑的空间布局像一面镜子，把隋唐时期复杂的阶层等级清晰地反映出来。城市中的空间分异更加明显，都城或者州府级别的城市，城墙所环绕的地域一般都会被细致地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城市的中心或者中轴线位置，一般被衙署、官邸等权力机构所占据，建筑雄伟、布局规整，体现皇权与国家的庄严。与之相邻的是祭祀孔子的文庙、重要的佛教寺院、道教宫观，体现了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宗教的崇高地位。

商业区一般设在运河或城市主要交通要道附近，形成繁华的商业街市。不同行业的商铺、手工作坊星罗棋布，米市、布市等各种专业市场应有尽有。富商大贾的住宅大都选择交通方便、风景优美的地区，和普通民居形成对比。普通市民、手工业者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区分布在城市的边缘或者偏僻的街巷，房屋密集，街道狭窄。一些大型商埠出现了同乡商人聚居的“会馆”或“商帮”社区，它们既是商业合作的中心，又是社会交往的场所，是典型的地缘和业缘结合型的社区。用身份、财富和职业等作为基础的空间分化，把无形的社会等级固化成了有形的聚落景观。

三、网络性人文景观：交通与商业

（一）运河、驿道、栈桥构成的交通网络

通济渠的交通景观是水陆并存、干支并联的立体复合系统。运河本身就是网络的主干，担负着南来北往的大宗货物运输和人员往来。河面上成千上万的漕船、商船、客船首尾相接，帆樯林立，日夜不息地流动，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图景。与运河平行修建的是国家级的驿道。陆路干线主要是为官府邮驿、传递军情、官员出巡等而设，沿途设有驿站，备有马匹、舟船以及食宿等设施。驿道和运河互相补充，保证了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水文条件下国家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无阻。

除主干水路和陆路以外，无数的支流、小道、横跨河渠的桥梁一起构成了像

毛细血管一样微细的网络。小型支河把运河的影响扩大到更广大的地方，把乡村的物产运到主流。连接城镇与乡村、渡口与集市之间修建的石桥、木桥、简易栈桥，便于通行，使整个交通网络无间断地联系起来。这些桥梁本身也成了重要的景观节点，不同的形制、材质也反映出地方技术水平、经济状况。正是由于运河、驿道、支流、小路、桥梁等组成的多层次交通网，才使得通济渠的经济和文化辐射力发挥到了最大。

（二）码头、商铺、会馆构成的商业网络

如果说交通网络是流动的线，那么码头、商铺、会馆等商业设施就是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的“点”。沿通济渠的商业节点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条繁忙的商业长廊。码头是这个网络中最繁忙的枢纽。大型码头一般设有专门的泊位、仓库、吊装设备和管理机构，无数的搬运夫、船工、商人、牙人聚集于此，喧闹嘈杂，充满了原始的商业活力。码头的大小、繁忙程度直接反映着它所依托的城镇经济地位。

码头往内陆方向就是一排排的商铺、一条条的街市。商铺门类齐全，南方有丝绸、茶叶、瓷器，北方有马匹、皮毛、药材等，各种商品应有尽有。繁华的商业街区日夜不停，酒楼、茶肆、瓦舍等娱乐场所星罗棋布，给南来北往的商人提供消费和休息的地方。会馆在这些商业节点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同乡或同业商人集资修建的组织，集议事、交易、仓储、社交、祭祀、住宿等功能于一身。会馆不但是商人开展交易的场所，也是他们在异乡的精神家园。实体化的商业节点就构成通济渠商业网络的骨架，有力地支撑起帝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三）信息与人员流动形成的无形网络

除了有形的物质网络之外，还有一个由信息和人员流动构成的、给通济渠景观赋予生命和灵魂的无形网络。运河这条大动脉大大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朝廷政令、边疆战报、市场行情、文人诗篇等，都是依靠舟楫、驿马传遍南北。信息的迅速传播使中央政府可以更好地控制广大的疆域，商人可以更敏锐地捕捉到商机，文化也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交流融合。该信息流对于帝国的正常运转以及社会活力的保持都是极其重要的。

伴随着信息流动的，是规模巨大、成分复杂的人员流动。通济渠上既有奉旨上任或贬谪南下的各级官员，也有赶往考场或游学讲学的士子文人；既有追逐利润、奔波于途的商人，又有应征入伍、换防调动的士兵；更有因灾荒、战乱而背

井离乡的流民。不同身份、不同目的的人群在运河上相遇、碰撞，从而产生思想上的交锋、风俗上的杂糅，乃至语言上的演变。他们是文化的携带者、传播者，他们流动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非物质的文化景观。由信息流、人流组成的无形网络同有形的交通、商业网络互相影响，共同决定着通济渠作为文化走廊的价值。

第四节 景观生态与环境保护

一、通济渠文化景观的生态价值评估

（一）作为生物廊道与栖息地的功能

通济渠是一条横穿平原的人工水系。在高度人工化的农田和城市景观背景之下，其线性的水体以及沿岸植被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蓝绿交织的廊道。现代土地利用格局下自然生态斑块越来越孤立和碎片化，而运河和它两旁的滨水植被带就成为了一条重要的生命线，把分散的栖息地连接起来。这条廊道对区域内动物的季节性迁徙和基因交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对两栖动物、鸟类、昆虫、小型哺乳动物等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大大降低了孤立种群灭绝的风险，从而提高了区域生态网络的连通性和稳定性，它的生态功能就更为明显。

运河水体和它的伴生河岸、滩涂、湿地等各种生境类型一起为众多的生物提供生存的空间。浮游生物、水生植物、底栖动物、鱼类共同组成了完整的水生食物链。岸边的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群落可以稳固堤岸、净化地表径流，也是陆生昆虫、鸟类及其他小型动物繁衍生息的家园。这条古老的通济渠廊道，在历史长河中，已经成了物种的避难所和基因库，对于保持区域生物多样性水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在区域气候调节与水文循环中的作用

通济渠宽阔的水体以及沿岸植被系统一起形成一个明显的“冷岛”和“湿岛”效应，对缓解区域特别是城市的“热岛效应”起到积极的作用。夏季水体能吸收大量的热能，使周围环境的温度降低；同时沿岸植被的蒸腾作用也会带走热量并增大空气湿度。蓝绿空间协同降温增湿的效果可以改善局部微气候，提高人居住环境的舒适度。人口密集的城市河段，生态调节作用对于居民的健康和幸福有着

重大的意义。

运河系统还参与到了区域水文循环当中。一方面运河水体是地表径流的调蓄通道。在丰水期可以汇集周边区域的雨水，减轻城市内涝、农田渍害的压力；在枯水期又可以给沿线地区提供稳定的水源补给。运河与地下水之间存在着水力联系。运河水位高低会直接影响周边地下水位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补给地下水，维持区域地下水系的平衡。运河沿岸的植被覆盖可以涵养水源，减缓地表径流速度，增加水分下渗，对区域水资源合理调配和可持续利用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量化评估

通济渠文化景观所给予的生态系统服务，属于其综合价值的关键部分。对它进行量化评价，可以把这些无形的生态效益转变为具体的、可以测量的指标，从而给保护投入和生态补偿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这些服务大体上可以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四类。对它们的价值进行评价要综合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意愿调查法等环境经济学方法，全面客观地反映其生态贡献。

对通济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可以具体细化到以下几个方面：

1. 供给服务主要是沿线农业、工业、居民生活用水的价值，以及渔业、莲藕等水产品产出的价值。这部分价值比较容易通过市场价格直接核算出来。

2. 调节服务包含洪水调蓄、气候调节、空气净化、水质净化等各个方面。可以采用影子工程法来评价其防洪效益，也可以通过碳汇计量来评价其固碳释氧的价值。

3. 文化服务：这是运河遗产固有的价值之一，给人们提供休闲娱乐、审美观光、科普教育以及艺术创作灵感等服务。其价值一般用旅行费用法或者条件价值评估法来计算。

4. 支持服务指的是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物种栖息地、保持土壤健康、促进营养物质循环等，是所有其他服务得以存在的基础。价值一般通过保护成本或者恢复成本等方式来体现。

二、当前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与挑战

（一）水体污染与生态系统退化

水体污染是通济渠目前最直接和最严重的生态问题。沿线城镇生活污水、工

业废水、农业生产化肥农药随地表径流进入河道，是造成水体污染的三大主要来源。外源污染物的不断输入造成河流水体中氮、磷等营养物质含量超标，水体富营养化频繁发生。在部分河段，特别是在一些季节里会出现水华现象，水色浑浊、散发异味。工业废水中的重金属、难降解有机物不断累积于河床底泥之中，造成内源性污染，给水环境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长期的污染负荷已经对通济渠的水生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水质变坏直接造成许多对环境敏感的水生植物、底栖动物、鱼类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耐污性强的物种，使生物群落结构简单化、功能单一化。食物链变的脆弱甚至断开，水体的自净能力也大幅度降低。生态系统的退化会削弱运河的调节服务功能，也会使运河作为生物栖息地的价值大打折扣，形成一个“污染、退化、功能丧失”的恶性循环，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就处于危险之中。

（二）景观破碎化与风貌不协调

通济渠属于线性文化遗产，它的连续性、完整性是它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它的主要价值。但在快速城镇化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很多道路、桥梁、管线工程穿插于河道之中，将原来连绵不绝的运河断为数段。物理上的割裂，不但是水流、物质输送的渠道被切断，而且生物迁徙的廊道也被阻断，造成生态孤岛化、生境破碎化。同时河道两岸的土地被无序开发，农田、建设用地不断侵占滨水空间，使运河的生态缓冲带变窄甚至消失，大大削弱了它的生态屏障功能。

与物理破碎化相伴随而产生的，就是视觉景观上的风貌不协调。通济渠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沿途的景观应该体现出古朴、自然、和谐的特点。然而大量的无规划的现代建筑、工业厂房、广告牌等，突兀地出现在滨河地区，其体量、风格、色彩都与古运河的历史风貌格格不入，造成视觉上的混乱。风貌不统一、不协调，会破坏运河文化景观整体性和真实性，弱化历史文脉的感知体验，也会削弱运河文化价值、美学价值。

（三）外来物种入侵与生物多样性威胁

外来物种入侵是通济渠遇到的又一种隐秘而破坏力极大的生态问题。一方面，由于运河曾是重要的航运通道，外来水生生物可以通过船只压舱水或者附着在船体上被无意带入。另一方面，沿岸地区为了观赏、养殖或者生态绿化等目的而人为地引进了水葫芦、加拿大一枝黄花、福寿螺、克氏原螯虾等入侵物种。这些外来物种在新的环境中由于没有天敌，繁殖能力强，适应性广，一旦逸生到自然水

体中,就会迅速扩张种群。

外来入侵物种的疯长扩散给沿线的生物多样性造成极大的压力。水葫芦等水生植物覆盖整个水面,遮挡阳光进入水体,使水下植物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而死亡;其腐烂分解过程中会大量消耗水中的溶解氧,使水体缺氧,威胁鱼类的生存。入侵的动物会改变原有的食物网,让本土物种在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生物入侵会造成本土物种数量减少甚至局部灭绝,还会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降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以及抗干扰能力。

三、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的策略

(一) 水环境综合治理与生态补水

水环境治理是生态修复的基础,要坚持控源、截污、清淤、修复的综合途径。在“控源”上要严格执行排污标准,推进沿线工业企业强制清洁生产改造,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力推行测土配方施肥、生态农业,全面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在截污方面,要加快沿线城镇的污水管网系统建设,实行雨污分流,保证所有的污水收集后集中处理达标排放,严禁直排入河。

在污染源基本得到控制后,就应当着手进行河道本身的生态修复。用环保清淤技术清除常年沉积、富含有害物质的底泥,以消除内源污染。更重要的是利用生态工程技术提高水体自净能力,在合适的河段上建设人工湿地、生态浮岛、曝气增氧装置等,依靠植物和微生物的协同作用来净化水质。同时建立常态化的生态补水机制也十分重要,依靠上游水库科学调度或者跨流域调水来保证运河有稳定的、充足的生态基流,对稀释污染物、增强水体流动性、恢复水生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 植被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以恢复通济渠滨水带的植被为主,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要途径。按照生态学原理,抛弃单一化、景观化的“绿化”方式,努力创建结构繁杂、乡土化、近自然的复层植物群落。在河岸地带根据各个区域的立地条件科学配置乔木、灌木、草本等本地植物形成稳定的植被缓冲带。这条缓冲带既可以拦截、过滤岸边的面源污染物,防止水土流失,也可以给鸟类、昆虫等许多陆生动物提供觅食、栖息、藏身之地。

在植被恢复的基础上还要采取多种方式提高栖息地的连通性、多样性。由于

道路、设施造成的廊道断裂点可以修建生态涵洞、动物通道等来保证陆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对于水坝、闸口等阻水建筑物应该增设鱼道等过鱼设施，保证水生生物洄游通道畅通。在运河沿岸有计划地规划一些小型湿地公园或者生态岛，作为物种的集中栖息地和繁殖地。水质、生境改善之后，开展本土水生动植物增殖放流、种群恢复工作，逐步恢复健康的、完整的运河生物群落。

（三）建立生态监测与预警系统

创建起一个全面、动态的生态监测预警系统，是达成通济渠生态环境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关键保证。基础工作就是建立全流域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在重点断面处设置水质自动监测站，对水质指标进行在线监测，定期采集底泥、水生生物样本做成分质分析。空中部分可以利用卫星遥感和无人机技术，对运河沿线进行大面积、高频率的巡查，对土地利用状况、植被覆盖率、岸线变化、水体“水华”等进行评价。

监测得到的大量数据只有和预警机制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因此应该建设一个综合的生态环境信息管理平台，把所有的监测数据汇聚起来，同时结合水文、气象等信息，用数学模型对运河的生态健康状况做出科学的评价，并作出趋势预测。该平台应该具备对潜在的生态风险（突发性污染事件、蓝藻大爆发、干旱缺水等）提前发出预警的能力，还可以自动生成应急预案。由此形成的系统，可以使得政府对运河生态系统的变动情况有实时的掌握，将被动应对环境变化转变为主动预测，从而大大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效率和预见性。

第五节 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

一、整体性保护的理念与原则

（一）保护自然与人文要素的完整关系

通济渠文化景观的魅力来自于千年来自然地理和人类活动的互动。河道本体、堤防、水柜、闸坝等水工设施，和周边农田、村落、古镇、道路、桥梁、植被生态一样，形成功能上互相依存、景观上互相渗透的有机整体。为了保护好这种完整联系，不能把河道孤立看待，而应该把它看作区域生态和社会网络的主脉络。保护工作既要考虑河流水文生态的健康，也要考虑沿岸聚落社会经济的活力。河

道清淤、堤岸加固等生态工程中应该采用生态友好型的方法,保留必要的自然河岸形态和原生植被,保持其生物廊道的功能。对沿岸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古建筑的修缮上,而应该更多地关注村落与运河在灌溉、交通、生计等各方面历史联系的修复和延续,使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关系得以体现和延续。

对于自然和人文要素关系的保护,核心就是找到并保持构成景观特征的重要空间和功能联系。水系与土地利用格局的关系,运河对周边农田的灌溉滋养作用所形成的独特的农业景观,以及聚落选址与运河走向的关系,众多古镇因“逐水而建、因水而兴”而呈现出的“前河后街”或“小桥流水人家”的经典空间模式。保护行动要以维持这些联系为前提,任何干预措施都应考虑其对景观整体结构的影响,避免因为局部的不当开发而割裂山、水、田、林、村、镇之间内在的生态和文化逻辑,保证通济渠文化景观的系统性、完整性不受破坏。

（二）维护景观的历史真实性与文化延续性

通济渠文化景观是一部被刻在土地上的“活历史”,它所承载的,是从隋唐到今天各个时代的历史信息,表现出一种动态演变、层累叠加的特征。维护其历史的真实性就是保存这些历史积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不是根据某种审美或旅游开发的需要去选择性的保留或者“去伪存真”式的修复。保护工作要尊重景观在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每一个印记,残破的、废弃的、不那么美观的部分也应予以保留,因为它们是历史过程真实存在的证明。废弃的古河道、坍塌的码头遗址、河道变迁后形成的洼地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应当被妥善地记录和阐释,不能简单地填平或者重建。

对历史真实性的尊重就体现在对于景观的“原真状态”的科学认识上。这种原真不是去复现某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历史,而是承认它随时间的变迁而变化的客观事实。修复时应遵守最小干预原则,以修补加固为主,不用过多的新材料、新工艺来保证修补部分能识别。要坚决反对大肆仿古、造景等行为,不能使那些有生命感的景观变成没有灵魂的假古董式主题公园。

文化延续性就是景观的生命力,保护的目的在于不仅仅要封存历史,还要使运河文化在现代社会里得以延续和发展。这就意味着保护工作要关注景观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与运河有关的传说故事、民歌号子、节庆民俗、传统手工艺等。通过记录、传承、活化非物质文化,使它和物质景观相结合,使公众对运河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保证文化根脉在社区生活中延续,使通济渠文化景观保持活态

的属性。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社区参与原则

文化景观的灵魂是人，沿岸世代生活的人们是景观的创造者、使用者，也是景观的当然守护者。离开了人的参与，景观保护就没有了根基，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社区参与原则，就是通济渠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在保护工作全过程要充分尊重当地社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把居民的意愿和利益考虑进去。保护规划的制订不能是专家、政府等少数人关起门来决定的，而应该通过座谈会、听证会、入户调查等多种途径来广泛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

以人为本也表现在保护成果要惠及于民。保护工作不能以牺牲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为代价，也不能把当地居民当作景观保护的阻碍。相反应该积极探索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共赢之路，采用与景观特质相协调的适度利用方式，即发展生态农业、文化旅游、特色民宿等，为社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来源，使居民从保护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居民把文化景观看作是安身立命之本、生活品质提升之源的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保护自觉性，由被动管理者变为主动行动者，形成强大的内生动力。

二、文化景观保护的规划方法

（一）划定景观保护区，制定分级保护措施

为了对通济渠文化景观实施准确控制并实施有效的保护，必须进行科学的合理的空间划分，划定出不同的景观保护区，根据各个区域的价值特点和敏感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保护措施。分级保护体系是实行整体性保护理念的主要技术手段。

1. 核心保护区为文化景观价值最高、历史文化信息最丰富、风貌最完整的地段。具体包括通济渠故道本体、重要的堤防遗迹、古闸、古码头、古桥等水工设施遗址、与运河直接相关的、保存完好的古镇、古村落核心区域。核心区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标准，禁止与保护、研究、展示无关的建设活动，所有的维护修缮工程都必须按照文物保护的原则进行，保证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不受到破坏。

2. 建设控制地带（缓冲区）：位于核心保护区旁边，是保证核心保护区环境安全、维护核心保护区风貌的重要屏障。一般包括核心区周围必要的视野范围、历史环境要素（古井、古树、传统农田等）和同核心区功能相关的区域。在缓冲

区内可以开展必要的生产生活活动和基础设施改善工作,但是所有的新建、改建、扩建行为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对其建筑高度、体量、形式、色彩、材质等进行严格控制,以保证不会对核心保护区的景观视廊和历史氛围造成负面影响。

3. 风貌协调区(外围区域)为景观保护范围的外围地带,是景观与更广阔的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该区域管控比较宽松,主要是保证其发展建设同文化景观的整体风貌相协调。规划应该引导该区域的产业发展方向,鼓励生态农业、文化创意、乡村旅游等环境友好型产业,限制产生污染或者破坏景观的工业项目。对区域内的重要节点、廊道等,也应该提出相应的景观风貌引导要求,保证通济渠文化景观宏观格局的和谐统一。

(二) 控制周边建设,保持景观风貌协调

通济渠文化景观的价值并不只存在于一个个遗产点上,而是由一个个点、一条线、一个面所构成的整体风貌。周边无序建设活动是破坏景观整体性的最主要原因。高耸的现代建筑、风格各异的屋顶、刺眼的广告牌、杂乱的管线,都会像噪音一样扰乱、破坏宁静、古朴的运河历史画卷。因此,必须把对周边建设进行控制作为景观保护规划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制定详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或者专项设计导则,来保持景观风貌的协调性。

控制措施具体化、可操作,在规划中应对建设控制地带内建筑物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最大面宽等主要指标做出明确的规定,使新建建筑的体量同传统建筑的尺度相适应。就建筑风格而言,对屋顶形式、墙体材质、色彩等给出引导性或者强制性的要求,鼓励从地方传统建筑语汇中获取灵感,做创新性的转换,而不是简单的复制。道路、桥梁、照明、标识系统等公共设施设计要考虑同历史环境的融合度,造型简练、材质朴实,避免设计过度、城市化,共同营造符合运河文化背景的整体环境氛围。

(三) 制定景观保护的负面清单

为了使景观保护的管理更加具有前瞻性、透明度、刚性约束力,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行之有效的一种办法。负面清单就是明确列出在特定保护区内被禁止或者严格限制的产业、项目、行为。该种管理模式把“法无禁止即可为”转变为“清单之外皆可为”,为政府部门提供清晰的审批依据,为社会投资者和社区居民提供行为预期,可以有效地防止破坏文化景观的活动。

根据通济渠文化景观的特性,其负面清单应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在

产业准入方面，禁止在保护区及周边建设重化工、矿产开采、规模化养殖等高污染项目。从建设行为来看，禁止开山、采石、填埋河道、破坏湿地等改变地形地貌和水文环境的行为；禁止在核心保护区内建设非保护性建筑；禁止建设破坏天际线、视觉廊道的高层建筑或者大型构筑物。经营活动不得使用高噪音设备、排放油烟的餐饮经营以及影响历史环境氛围的商业活动。负面清单要经过科学论证、广泛社会协商，根据实际情况做动态调整，使之成为守护通济渠文化景观不能跨越的“红线”和“底线”。

三、社区参与在景观保护中的作用

（一）提升居民对本土景观的文化认同

长期共同生活的居民对于通济渠文化景观的感情是深沉的，但是往往是内隐、不自觉的。将朴素的情感提升为主动的保护意识，首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居民对于本土景观的价值和文化认同。需要依靠一系列的公众教育与文化普及工作来完成。可以组织专家学者、地方文史爱好者走进社区，就运河历史、建筑特色、民俗文化等进行一系列的讲座，使居民知晓自己的家园的“威水史”。可以支持社区开展口述史项目，邀请村中老人讲述与运河有关的故事，把鲜活的记忆记录、整理、出版，使年轻人听到先辈的声音。

举办和运河文化有关的活动是增强社区凝聚力、加强文化认同的有效方法。恢复或者创办龙舟赛、河灯节、祭祀水神等传统民俗活动，使居民在参与的过程中感受文化的魅力，重塑集体记忆。另外将运河文化知识编入当地的中小学乡土教材，组织学生开展实地考察和课题研究，从小培养学生的爱家乡、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当居民感受到脚下这片土地、门前那条河流有如此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并为之自豪的时候，他们看待景观的视角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他们不再把古老的建筑当作破旧的负担，不再把传统的习俗当作过时的陈规，而是把它们当作身份的象征、精神的寄托，源于内心的、对文化的一种认同感、守护家园的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

（二）引导居民参与景观维护与可持续利用

居民的文化认同一旦形成，就应该给他们提供具体的参与途径，把热情变成实际行动。引导居民参与既可以补充政府管理力量之不足，又能使保护措施更贴

近社区实际达到精细化、常态化的目的。

1. 日常维护监测,建立运河遗产守护员制度,在社区内招募热心居民做志愿者。任务是对河道、古建筑、古树等遗产点进行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宣传保护规定,劝阻不文明行为,参加河道日常保洁、绿化养护等工作。邻里式的监督、管理比外部的执法更具有亲和力,也更有效。

2. 参与可持续利用项目,可持续利用是实现活态保护的关键。应鼓励、支持居民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参与与景观风貌相协调的经营活动。鼓励有能力家庭将传统民居改造成特色民宿;支持手工艺人开设工作坊、传承销售剪纸、编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组织村民成立合作社开展生态农业,开发生成体验项目。政府和专业机构应该为社区利用项目的规划、技能培训、小额贷款、市场营销等提供支持,保证项目给社区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不会对景观的真实性造成影响。

(三) 建立社区共管与利益共享机制

为了实现社区参与的长效化、制度化,就必须建立起责、权、利相统一的社区共管和利益共享机制。这是一种比单纯动员模式更深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它把社区正式地纳入景观管理的治理结构中,保证社区可以公平地分享保护与发展带来的好处。社区共管要成立政府代表、专家、社区代表、企业代表等多方参与的运河景观管理委员会。社区代表是居民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能够真实反映居民意愿的代表。该委员会一起商议保护规划的制定和修订、重大项目的决策、日常管理事务、利益冲突的协调等,以达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利益共享机制是社区参与持续进行的基础,也是激发社区参与积极性的保证。从保护和利用获得的门票收入、特许经营权收益等经济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设立“社区发展基金”。基金由共管委员会来管理,用于社区公共设施建设、困难家庭补助、文化活动组织、居民技能培训等,使整个社区的成员都能分享保护带来的好处。对直接参与经营活动的居民,保证其合法的经营收益。通过建立透明、公正的分配制度来防止精英俘获、分配不公的问题,保证保护成果惠及到最广大的民众,从而形成政府、社区、社会一起为通济渠文化景观永续传承而努力的良性循环。

第六章 通济渠社会文化谱系研究

第一节 通济渠文化传播路径

一、以水为媒：运河作为文化传播的主通道

（一）人员流动：官员、士兵、商人、文人、僧侣的往来

通济渠上的河道里，南来北往的人群川流不息，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使通济渠成为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文化熔炉”。官员定期轮调、奉诏出巡，把中枢政令、礼仪规范、思想观念带到地方去，实现国家意志的传导和文化整合。长安、洛阳的官员无形之中影响着运河沿岸州县的政治文化、宫廷艺术、生活方式。戍边的士兵、换防的军队，在执行军事任务的时候，也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的媒介，他们的语言、歌谣、生活习惯在军营和驻地之间传播，形成了特有的军旅文化。

追逐利益的商人，是运河上最活跃的一群人。他们不但是商品的贩运者，而且是最活跃的民间文化传播者。江淮盐商、茶商把南方的饮食习惯、戏曲声腔、精巧园林审美带到中原，北方马商、皮货商把北国豪迈气概、饮食风尚、民间故事传到江南。他们的足迹遍布沿岸码头市镇，南来北往的人们又带去了各地不同的物产、方言，使地方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带着理想和抱负的文人士子或求学、或应试、或游历，在泛舟渠上留下了流传千古的佳句。这些诗歌不但记载了运河的雄伟景色、沿岸的社会百态，而且作为高级文化产品来反映当时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文人间的唱和、雅集让最新的文学流派、艺术思想得到迅速的传播。求取信仰的僧侣、道士沿着运河水道游方布道，建寺建观，翻译经文。他们带去的不是单纯的宗教哲学，而是同宗教哲学有关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给沿岸居民的精神世界以及艺术创作造成深刻影响。不同的身份人物在这条生命的通道上相互影响、碰撞，形成出隋唐文化的兴盛。

（二）物资流动：商品、书籍、艺术品等的交换

由于人的往来而带走大量的物资，依靠通济渠实现跨地域流通，流通的这些物资不仅有经济价值，还包含丰富的文化信息。运河上载着的不仅仅有粮食、布匹，还有一个个带着地域文化符号的“移动博物馆”。南方的丝绸、瓷器、茶叶、竹木制品，以精湛的工艺、优雅的审美，把江南地区精致细腻的物质文明、生活美学展示给北方。特别是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它们的造型、釉色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制瓷水平，通过运河进入北方贵族府邸，直接影响了北方器物审美、工艺的发展。

书籍的流通对于文化传播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兴起并逐渐发展，书籍复制流传的速度也大大提高了。通济渠成为“南书北运”的主要通道，江南地区繁荣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使它成为书籍刻印的中心。大量的经史子集、诗文别集、佛道经典甚至通俗读物，通过运河运到政治文化中心洛阳、长安以及北方各地的州县学府。这既满足了北方士子对知识的渴求，又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也使南方文化创造很快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力，加快了文化统一性的形成。

除商品、书籍以外，各种艺术品也成为了文化交流的载体。南方绘画、书法作品灵动秀美，给雄浑豪放的北方艺术增添新的元素。乐器如古琴、琵琶等乐器及与其相关的乐谱和演奏技法也随运河水路而传开。甚至带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构件、园林石料也被船只运送到各地修建官署、私宅、寺庙，实现了建筑风格和园林艺术的跨地域移植。物质载体的交换使得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再孤立，相互借鉴、吸收、融合，共同形成隋唐文化宏大的、多元的总体面貌。物资的流动把抽象的文化观念变成可以感受、可以看见、可以使用的实体，传播效果更持久、更深刻。

（三）信息流动：政令、新闻、知识的传播

通济渠在信息传递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编织出了一张高效的信息传播网。这条水上“高速公路”大大缩短了空间距离，加快了各种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对维系帝国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官方信息传达是其最主要的功能。朝廷政令、皇帝诏书、各部门官方文书，通过运河沿线的驿传系统可以很快传达到东南各地。水路运输量大、受天气影响小，可以保证大批量、长距离信息传递的稳定可靠，其优越性大于陆路驿传。高效的下行信息通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保证国家政策的及时执行。

通济渠还具有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作用。地方奏报、民情动态、灾异祥瑞等信息也经由运河上达天听。从而中央决策者可以及时了解到帝国各地的实际情况，为政策的调整、危机的应对打下了信息基础。双向的信息流通是帝国治理的神经系统，而通济渠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根动脉。

除官方信息之外，大量的商业信息、社会新闻、学术知识等非官方信息也依靠运河来传播。商人依靠船帮、会馆等组织来建立自己的信息网，互相交流各地物产价格、商品供应量、市场行情等信息，这些经济信息是维系商业繁荣的生命线。文人墨客在旅途中听到奇人异事、地方风物、诗坛动态，经由他们的书信、作品很快传遍运河两岸。新的知识、技术、思想，如新的农耕技术、医药知识、数学算法等，在学者、专业匠人流动的推动下，在更大的范围内被应用和发展。民间歌谣、谶语、传闻等经由繁忙水道迅速流传出去，进而左右舆论走向、民众心理和社会情绪的变动。

二、文化传播的节点与网络

（一）沿岸重要城市作为文化传播的集散中心

通济渠的文化传播网络当中，洛阳、开封（时称汴州）、扬州等沿岸重要的城市，是不能缺少的文化集散中心。它们是网络中的超级枢纽，汇聚四方文化，在自身熔铸再造之后，再辐射出去，主导区域文化流向和发展水平。隋唐时期作为东都的洛阳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它是通济渠西端起点，是北方政治文化与南方经济文化交汇的中心。皇家的宫殿、官署、太学等机构规定着官方文化的标准和走向，城内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贵族、文人、商人等带来了多种地域文化。洛阳里坊间南腔北调并存，南北风物云集，形成兼容并包、雍容华贵的都市文化，并以之为范本影响着整个黄河流域乃至更广大的地区。

汴州处于通济渠的中段，是连接黄河、淮河水系的“四水贯都”之地，交通枢纽的位置使它自然而然地成为重要的文化中转站和商业都会。南来北往的货物在这里汇集，三教九流的人物在这里停留。因为流动性高、开放性大，汴州文化具有明显的商业化、世俗化和平民化特点。各种勾栏瓦舍、酒楼茶肆成为市民文化的载体，通俗的戏曲、说唱艺术在这里繁荣发展，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扬州是通济渠和长江的交汇处，是南方经济文化的大门。依靠盐铁之利、便利的交通而成为隋唐时期举世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扬一益二”是它的繁荣写

照。富甲天下的盐商在扬州建起精致的园林，资助繁荣的文学艺术创作，形成了独特的维扬文化。诗、画、音乐、饮食、工艺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江南文化的精华。扬州既是南方文化向北方输出的起点，又是接受中原、海外文化元素较多的地方，因此具有开放、奢华、细腻、创新的文化特点。大城市因为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成为区域的文化中心地，对地方文化有塑造作用。

（二）由点到面，形成网络化的辐射格局

通济渠的文化传播是以沿岸重要的城市为节点，以复杂的网络系统为依托，实现了由点到面的辐射。它并不是一条线性的扩散，而是一个立体、多向的格局，运河文化的影响渗透到腹地。从核心城市开始，文化顺着通济渠主干道传向次一级的州县城市。这些州县城市，如泗州、楚州等，虽然规模、影响力不及洛阳、扬州，但是它们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起到二级传播节点的作用。它们接受核心城市文化信息的输入，根据本地区文化传统进行有选择性的吸收改造，形成带有地方特色的次生文化圈，再向周围乡镇扩散。

文化传播的途径并不只限于运河主航道。无数的支流、湖泊，像毛细血管一样把文化的营养输送到更偏远的地方。船只从主航道转向支流，把新的商品、新的信息、新的风尚带到内陆的集镇。以运河码头为起点的陆路交通系统，即官道、商道，又把文化影响力延伸到了水路不能到达的村庄、山区。于是形成以通济渠为主脉、支流河网和陆路交通为分支的水陆联运网络，文化传播的范围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网络化的格局还体现在文化影响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不但核心城市向周边辐射，周边地区的地方文化也会借助商旅、士子等载体逆向流向中心城市，给都市文化带来新的活力。乡村地区的民间传说、地方戏曲有可能被游历的文人发现，带入大城市，加工传播之后成为一时风行的文化现象。双向或者多向互动让整个文化传播网络生机勃勃、变化万千，防止文化单向同质化，促进区域文化共同繁荣和整体提高，构成一个动态平衡、有机联结的文化生态系统。

（三）码头、驿站、会馆等节点的功能分析

在宏观的城市网络之下，码头、驿站、会馆等微观空间节点就是文化传播得以具体实现的场所。它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但是共同构成文化交流的最前线，也是文化互动最鲜活的缩影。

1. 码头是混杂着各种文化的、生机勃勃的文化空间。码头是运河沿岸最繁忙、

人员构成最复杂的地方。聚集了船工、纤夫、商人、脚夫、官兵、游民等各色人等。不同方言、风俗信仰在码头空间里发生剧烈的碰撞，形成了杂乱而又生机勃勃的码头文化。码头附近酒肆、茶馆、勾栏等处南来的地方戏曲、北来的说唱艺术在此竞演，各地域饮食习惯互相渗透，形成了特有的码头小吃。码头是信息交换的集散地，船工带回来的远方见闻、商人们交流的商业情报，都使这里成为取之不尽的故事源泉。它是一个非正式的、民间的文化熔炉，许多新生的、混杂的文化现象最早在这里萌芽。

2. 驿站是官方文化的标准传播站。与码头民间化的不同，驿站是由官府设置的传递公文和官员往来的标准化设施。散布于运河沿线的驿站就构成了官方文化传播的严密网络。驿站建筑規制、内部陈设、官员接待礼仪都是朝廷统一标准的体现，是国家权力、秩序的象征。驿站系统使官方文书、律令准确、迅速地送达。往来的官员在驿站休息的时候，也会交流政务心得、文学创作，驿站就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精英文化传播、强化的场所。驿站文化体现的是一个规范、统一、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

3. 商旅聚集与同乡联谊之所，是隋唐商业繁荣的伴生物，一般由同乡或者同行业商人出资建造，目的是为异乡的乡党提供联络、住宿、仓储、祭祀、议事等服务。它是半封闭的同乡社区，在陌生城市中给同乡人提供一片熟悉的地域文化土壤。乡音得以保存、家乡戏曲得以传唱、地方神祇得以祭祀。于是地域文化就在异乡保存下来、巩固发展。此类场所也是同乡群体同外界交往的公共场所。该类场所使地域文化以商帮群体的形式，更有效地影响当地社会。因此它既是地域文化的“保育箱”，又是亚文化群体对外进行文化输出的“桥头堡”。

三、文化传播的方向与模式

（一）南北文化的双向交流与融合

通济渠最核心的文化功能，就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打通了长期以来被地理、心理隔绝的中国南北。它像一根巨大的文化扁担，一头挑着以洛阳、长安为代表的，受游牧文化影响，雄浑质朴的北方政治军事文化；另一头挑着以扬州、苏州为代表的，继承六朝文脉，温润细腻的南方经济艺术文化。水道畅通以后，南北文化才开始全面、深刻地双向交流。

北方文化向南方传播主要是政治制度、军事技术、生活习俗。随着帝国政令

南下，中原官僚制度、法律规范也越到南方。北方骑兵战术、马具制造等对南方的军事也产生了影响。同时北方的面食文化、豪放的饮酒之风等也随着南下的官兵、商人传到江南。

南方文化对于北方的影响更为深刻。南方经济繁荣，文化自信、昌盛。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先进的造船工艺、繁荣的商业活动给北方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精神文化领域，江南士族所具有的精致优雅的审美情趣、对山水林泉的诗画艺术造诣，使北方刚健文化气质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柔化。南方的音乐、舞蹈、戏曲等艺术形式很快在北方流行开来，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争相效仿。南北文化之间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化学反应。通济渠这条流动的“反应釜”里，南北文化相互激荡、取长补短，最后融合升华，共同塑造出兼容并包、博大恢弘的隋唐盛世文化。

（二）自上而下的官方文化传播与自下而上的民间文化传播

通济渠上的文化传播存在两条清晰的并且经常交汇的路径：一条是从上往下进行官方文化传播，另一条则是从下往上进行民间文化传播。两者互不排斥，相辅相成，共同组成完整的社会文化流动体系。自上而下的传播依靠国家权力，权威性、强制性、系统性都很强。主要内容有朝廷的法律制度、儒家意识形态、官方礼仪规范、宫廷提倡的艺术风尚。传播的载体主要是运河沿线各级政府机构、驿传系统、官办学校等。该种传播模式以维护国家统一、塑造主流价值观为目的，特点是目标明确、组织严密、影响广泛。皇帝巡幸、官员派遣、科举制推行等都是该模式的具体表现。

自下而上的传播是由民间自发产生的，有自发性、多样性和草根性。它的内容包罗万象，有各地的方言、民歌、传说、戏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手工艺技术等。传播的载体主要是商人、船工、手工业者、僧侣、艺人等普通民众。他们在运河上往来，在码头、集市、此类场所、寺庙里进行日常的文化交流。传播模式像涓涓细流，虽然不像官方传播那样声势浩大，但是无孔不入，具有很强的韧性和生命力。它体现的是民众真实的生活和情感，是社会文化最深沉的基础。民间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被官方吸收之后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官方文化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也会被改造、被通俗化，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这两条途径互相影响，就形成了隋唐文化既有宏大叙事又有生动细节的丰富层次。

（三）渐进式渗透与突发式扩散并存

从传播的速度和形态上讲，通济渠文化传播有渐进式渗透与突发式扩散两种模式并存。渐进式渗透是长期的、缓慢的、潜移默化的。主要是依靠日常的商业贸易、人口迁徙、文化交流来完成的。一种新的农作物品种、一种饮食习惯、一个方言词汇，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随着人流、物流在运河沿线慢慢扩散，被不同地区的人们所接受。渗透式的传播像春雨润物，不易察觉，但它的效果却是根深蒂固的，可以深刻地改变一个地区的社会生活基础。大部分的民间习俗、手工艺技术、生活方式的传播都是如此。

突发式扩散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文化信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传播开来。这种情况一般由重大的政治事件、标志性文化人物或者作品的出现所引起。隋炀帝多次南巡，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北方的宫廷仪仗、建筑风格、庞大的消费需求带到江南，给扬州等地城市发展和文化风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著名的诗人（李白、白居易等）所作的关于运河或者沿岸城市诗篇一旦问世，就会通过士人之间的传抄吟诵，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大江南北，迅速提高某地的知名度，并确立其文化形象。战争、大规模移民、新宗教的传入等，也常常引起文化的突然扩散。两者互相补充，一起形成文化传播的复杂节奏。

第二节 运河文化对沿岸社会的影响

一、对经济结构与社会阶层的影响

（一）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催生市民阶层

南北交通要道通济渠的出现，使长途贩运的成本大大降低，粮食、丝绸、瓷器等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通得以实现。高效流通机制，一举冲破了传统农业社会封闭的经济壁垒，商品经济便开始兴盛起来。沿岸的洛阳、开封、扬州等城市很快从政治军事中心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都会，城内商铺林立，邸店货栈鳞次栉比，市场交易十分活跃。

经济形态的深刻变革自然也会造成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城市中集中了大量的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口，即手工作坊主、商人、店铺伙计等。这一新兴的市民阶层，其特有的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同传统的士农工商四

民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他们不再依靠土地来谋生，而是依靠资本、技能、市场信息来谋生，价值观念也以商业利益为中心而形成，构成了城市社会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二）形成以运河为生的职业群体

运河开通运营之后，便产生了数量众多、种类繁杂的从业人群。他们以人工河渠为生，和人工河渠一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运河社会生态。分工明确、链条完整，是最直接的运河经济参与者。

与航运直接有关的船户、船商、纤夫、脚夫、舵工、引水员等人的专业技术，是保证运河畅通无阻的重要保障。

以航运为中心形成了庞大的服务群体。码头附近有供南来北往的商客食宿的旅店、酒楼，有提供船只维修、补给的船厂、物料商，有在交易中撮合买卖的牙人、经纪人，有管理仓储的货栈经营者。他们一起组成了一张紧密的社会网，他们的命运同运河的兴衰息息相关，同舟共济。

（三）改变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

运河经济的兴盛，使商人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对“重农抑商”国策下形成的以士、农、工、商为等级的社会观念形成强烈的冲击。运河沿岸商业城市中富商不再被看作是社会末流，他们依靠财富积累可以享受奢华生活，也可以通过捐资、联姻、甚至买官等方式提高社会声望，实现阶层跃升。

科举制度推行与运河交通便利相辅相成，给社会阶层流动开辟了新的途径。运河不但是商货运输的动脉，而且是信息和人才流动的便捷通道。平民子弟更容易沿着运河两岸得到教育资源，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商贾之家也愿意投资子弟教育，希望通过科举达到“由商入士”的目的。双向流动造成士、商界限模糊，传统的“四民结构”在运河沿线地带开始出现松动。

二、对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影响

（一）开放、包容、重商的社会风气

通济渠是条巨大的文化传送带，把全国各地的人、物流、信息流输送到沿路的城镇。频繁的人员往来、信息交流大大开阔了当地居民的视野。与不同地域、不同习俗的人接触以后，便渐渐形成了对外来事物的好奇和包容，具有了开放多元的社会心态。和内陆的封闭农业区相比，运河沿岸的社会风气要开放得多。

随着商业活动占据了核心位置,追求财富、崇尚工商的思想也渐渐取代了传统的以农为本、以仕为贵的价值观。经商不再被视为末业,反而成了人们所尊崇的一种谋生手段。商业信用、契约精神、精打细算的思维方式,渐渐深入人心,被社会所接受。时间就是金钱,这句早期的商业理念在繁忙的运河上已有所体现。

重商主义风气深深地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对于消费和享乐的态度更加积极,追求新奇时髦的商品成为新的风尚。商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影响了社会其它阶层,促进了城市消费文化、世俗娱乐的发展。

（二）生活习俗的南北交融与多元化

通济渠本质上就是一条文化的交融之线。伴随着漕运和商贸,南方的精致细腻与北方的粗犷豪放在运河两岸相遇、碰撞,最终形成出兼具南北特色的独特运河生活习俗,塑造了沿岸居民多样化的生活方式。

饮食文化的交流最为直接。

1. 南方的稻米、鱼虾、茶叶顺河北上,丰富了北方人的餐桌,北方的面食、牛羊肉也沿河南下,进入南方人的饮食谱系。开封、洛阳等运河都市可以品尝到全国各地区的风味。

2. 语言和口音也因频繁交流而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些带有南北混合特征的方言。

3. 建筑风格上,南方的园林技艺与北方的院落结构相结合,创造出兼具南北之长的新型建筑。

4. 由于艺人的频繁流动,戏曲、说唱等民间艺术也沿着运河传播,并且经过相互借鉴、融合而产生新的剧种、流派。

（三）时间观念与效率意识的增强

农业社会的时间观念是循环的、以自然节律为标准的,日出而作,春种秋收。运河带来的商业文明,就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线性时间观念。对于商人来说,运输时间关系到市场行情的好坏和资金周转情况;对船工来说,航程快慢决定收入的多少。因此,对时间成本的精确计算,使得运河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具备强烈的效率意识和守时观念。约定的船期、交货期无形中养成人们严谨、守信、高效的行为习惯。与悠闲散漫的田园生活风格相反,商品经济给社会精神上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三、对区域文化认同的塑造

（一）形成“运河人”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感

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生产生活方式，是形成身份认同的根基。无论是世代居住在运河上的人，还是在码头上做买卖的商人、工匠，他们的生活、兴衰都和这条河息息相关。运河的涨落、漕运的通断，对于他们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因为这种休戚与共的现实，才使他们渐渐产生了超越宗族、乡土束缚的新的身份认同，即“运河边上的人”，也就是“运河人”。

身份认同体现在共同的语言习惯、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乃至民间信仰里。漕神、水神共同祭祀、船工号子中蕴含的集体记忆、商业交往形成的共同信誉体系等都是“运河人”文化归属感的具体表现。因此，他们对外表现出很强的内聚力和独特的群体意识。

（二）超越地域界限的文化共同体意识

行政区划是人定的地理边界，而运河的流动性本身，就天然地消解了这样的界限。虽然通济渠沿线的城镇分别属于不同的州县，但是经济上、文化上却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洛阳到开封、淮安、扬州的这条狭长的经济文化带内部的联系，比它同各自行政区内部的联系要紧密得多。

跨地域的紧密联系就产生了更高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商人创立起跨地域的商帮，在运河两岸布成商业网。文人学士沿着运河游历，交游无边，渐渐地形成一个流动的文化圈。艺人们在码头城镇之间来回奔波巡演，使艺术实现了区域性的融合与发展。

共同体中的人们所关注的已不再是一个个具体城市或一块块土地，而是整个运河的运行状况。一段河道的淤塞会影响到千里之外的商业伙伴。以共同利益、文化交融为基础而形成的宏观视野与共同体意识，就是运河文化塑造区域认同的最高体现。

（三）地方性知识体系与运河文化的融合

运河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对已有地方文化进行简单的覆盖，而是与地方性知识体系长期互动、深度融合的结果。运河的到来给根植在地域的传统知识注入了新的因素和应用场景，同时又从地方智慧里汲取解决办法，最终形成了共生共荣的知识体系。一方面，运河给地方社会带去了先进的造船技术、航运

管理经验、全国性的市场信息等普遍性知识，使得地方经济更加开放。

运河能够顺利运行，也需要有地方性的知识作为深厚的根基。各河段的水文特征、气候规律、最佳航线等等，都必须依靠当地船工及居民代代相传的珍贵经验。地方特产，尤其是那些精美的手工艺品，经由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之后，其生产技术也就随之流传开来并得以发扬光大。地方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也被巧妙地用来组织运河劳工、管理商业活动。普遍性知识同地方性知识相结合，运河文化既有宏大的共性，又有各个地区丰富多彩的个性。

第三节 通济渠与中外文化交流

一、通济渠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连接作用

（一）作为内陆腹地与沿海港口的连接线

通济渠开凿之后，从地理空间上直接连接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将广阔的内陆腹地同东南沿海的开放港口紧密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张完整的水路运输网络。西都长安、东都洛阳是帝国的中心，经由通济渠以及其他水路，可以便捷地到达当时世界上著名的贸易港口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通济渠像一条巨龙，把内陆的政治、文化、经济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出海口，给海上丝绸之路提供稳定的强大的腹地支撑。

商船抵达扬州等港口之后，异域的货物与人员就可以乘坐内河船只，沿大运河北上，经通济渠到达东都洛阳，甚至可以继续向西，到达长安。大大缩短了内陆到海洋的时间和空间距离，物流效率大大提高，贸易量迅速增加。通济渠并不仅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水道，而是隋唐王朝经略海洋、拥抱世界的国家战略手段，通过它，隋唐王朝的全球影响力和向海延伸。

对海外商人来说，这条安全、稳定、高效的内陆水路就是他们进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文化交流的生命线。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只局限在沿海地区做有限的贸易，而是可以把贸易网延伸到中国的核心地带，和帝国中枢直接交流。因此通济渠的存在一方面繁荣了沿海港口，另一方面也激活了内陆腹地的对外开放潜力，使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丝绸、瓷器、茶叶等外销商品的运输通道

通济渠是隋唐时期中国大宗商品对外销售的黄金水道。产自江南、浙江等地的丝绸制作精良，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是受到青睐的奢侈品。丝绸制品经由江南运河汇集于扬州，再经通济渠运送到洛阳、长安，一部分用作皇室贵族的消费品，另一部分用作国家贸易或者赏赐品，经由陆上或者海上丝绸之路流向世界各地。通济渠的存在使丝绸这样一种战略性的出口商品可以迅速地、低成本地进行集中与转运。

与丝绸同样重要的就是瓷器。唐代形成南青北白的瓷器生产格局，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彩绘瓷都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来自南北各地的瓷器，依靠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特别是通济渠这条主干道，运到扬州、明州等港口装船出口。在东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隋唐时期的瓷器，由此形成了一条以运河为起点、以海洋为终点的陶瓷之路，通济渠就是这条陶瓷之路的内陆核心。唐代中后期，茶叶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外销商品，通过运河运往海外，中国独特的茶文化也随着茶叶的传播到世界各地。

（三）海外香料、珠宝等商品的输入路径

通济渠既是内陆的物产通向世界的通道，又是海外珍奇异宝运往内陆的重要通道。伴随着远洋航船而来的，是各种来自异域的商品，这些商品极大地丰富了隋唐社会，特别是上层阶级的生活。这些商品在沿海港口卸货之后，就踏上了沿运河北上的道路。

1. 香料为最大的进口货物。来自东南亚的沉香、丁香以及来自阿拉伯、波斯的乳香、苏合香等通过运河水道源源不断运往洛阳、长安两京。香料被贵族当作日常熏香、入药，在佛教和道教的宗教仪式中也被使用，其旺盛的需求推动了整个香料贸易链条的发展。

2. 珠宝、琉璃、珍稀饰品在运河上也经常出现。产自波斯湾的珍珠、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的宝石、拂菻（拜占庭帝国）的琉璃制品，都通过通济渠流入中原市场。这些带有异域风情的奢侈品成了身份、地位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唐代贵族审美取向和物质生活。它们不但充实了宫廷府库，而且也促使金银器、玉器等加工工艺互相借鉴、融合和创新。

二、外来文化沿运河的传播与影响

（一）宗教传播：佛教、伊斯兰教、景教等的沿河扩散

通济渠畅通无阻，给外来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佛教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隋代传入中国，自汉代开始，至唐代兴盛。很多西来求法或者东来传教的僧人，例如玄奘西行归来带回的经卷佛像，也都是通过运河水道运到洛阳、长安。运河沿线的洛阳龙门石窟、扬州大明寺等都是佛教文化经由这条水路交流传播盛况的有力证明。

除了佛教之外，另外还有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等随着粟特等中亚商人通过丝绸之路、通济渠来到中国内地。商人不但是交易者，而且还是文化传播者。他们在扬州、洛阳等运河沿岸的商业重镇定居，建有自己的宗教寺院，波斯寺、大秦寺等。这些宗教传入之后，虽然没有佛教那样兴盛，但是在局部地区已经形成了多信仰共存的局面，给隋唐文化增添了奇特的异彩。

伊斯兰教也是经由海陆两条路线传入唐朝的。来自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当时称大食商人）在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城市定居，形成了蕃坊。其中一部分人沿通济渠北上，把伊斯兰教信仰带到了内陆城市。扬州、开封等地有唐代穆斯林活动的遗址，通济渠是早期伊斯兰文化向中国内陆传播的渠道之一，从而使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有了最早的接触与对话。

（二）艺术与科技的交流：西域音乐、舞蹈、天文历法等

随着商旅而来的还有丰富多彩的西域艺术。来自中亚康国、安国的粟特人不仅擅长经商，而且能歌善舞。胡旋舞、胡腾舞等有强烈动感、异域风情的舞蹈在长安、洛阳的宫廷和坊间流行起来，成为唐代社会最时髦的娱乐方式之一。西域艺人沿着这条运河一路向北，把他们的乐器（琵琶、箜篌等）、音乐、舞蹈带入帝国的中心地带。唐代大量的关于胡人歌舞的诗句，也成了当时文化交融的生动写照。

通济渠在科学技术方面也起着交流媒介的作用。隋唐两代对天文历法都很重视，多次吸收外来成果来改善本国的历法。来自印度的天文学家瞿昙悉达在唐朝的天文机构中任职，他把印度的《九执历》引进中国，带来了新的计算方法和天文观念。精通天文、数学、医学等各方面的外国专家大多从海陆通道抵达中国之

后，再借助运河交通网到达京城，给中华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的到来以及知识的传播都离不开通济渠这条便利的交通干线。

（三）外来物种与生活习俗的传入

通济渠不单运输奇珍异宝，它还悄悄地改变了中国人的餐桌和日常生活。许多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植物都是通过这条路线传入并普及的。原产尼泊尔（今尼泊尔）的菠菜，在唐代传入中国以后，由于营养丰富、容易种植，很快就通过运河传遍民间，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见蔬菜。胡椒、开心果、毕拔（胡椒科植物）、无花果等调味品和水果通过运河贸易进入中原，丰富了中国人的味觉体验。

一些外来生活习俗也被引进来了。唐代以前中原地区还没有普及高足坐具，人们多席地而坐。随着与西域交往的加深，胡床等高足家具通过运河传入内地，被上层社会所接受，最终改变了中国人的起居方式。饮食上“胡食”在两京及运河沿岸城市流行起来，制作胡饼的店铺遍布街市，成为一种流行的快餐食品。

物种和习俗的传入是双向的，官方引进与民间商旅自发携带相结合。不管采用何种方式，通济渠都以快速的运输能力，加快了这些舶来品从沿海到内陆、由城市向乡村的传播。

通济渠不单是一个物流通道，它还是一个文化融合的熔炉。它把外来文化汇入中华文明这条大江之中，合流而出，共同造就了隋唐时期开放、自信、多元、辉煌的文化风貌，使中华文明在交流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运河文化的对外辐射

（一）中国运河工程技术的对外传播

隋唐大运河规模宏大、技术先进，给所有亲眼看到它的外国使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来自日本的遣唐使、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的使者，在本国也存在着发展交通、调配物资的需求。当他们看到大运河，特别是通济渠怎样巧妙地连接不同的水系，实现南粮北调，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帝国时，一定会受到巨大的震撼和启发。

这些使团成员中也不乏技术官僚、僧侣学者，他们对运河的路线、水闸的构造、堤坝的修筑方法、运河管理机构等都做了详细的记载。这些宝贵的知识也同他们一起带回到了国内。日本、朝鲜半岛后来的水利工程、运河开凿计划等，都受到了隋唐大运河技术的影响。由于地理条件和国力所限，他们不能复制出同等

规模的工程，但是中国运河所表现出的规划思想、水工技术和国家动员能力，给周边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蓝本。

（二）运河沿岸文化对东亚、东南亚的影响

通济渠是经济动脉，也是文化长廊。洛阳、扬州等城市沿岸，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国际化的大都会。这些城市把儒释道以及外来宗教等多元文化融合在一起，发展出精致的文学艺术、建筑、市民生活。对东亚文化圈国家来说，运河沿岸城市文化有典范意义。

日本遣唐使在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的同时，也被运河两岸的文化生活所吸引。吟咏唐诗、模仿唐代人的书法、绘画，体验茶、酒、香所营造出来的雅致生活。回国之后他们积极地传播唐风文化。日本的古都平城京（今奈良）、后来的平安京（今京都）的城市布局、里坊制度都是仿照长安、洛阳的。运河所造就出的繁华都市景象成了他们创建理想国都的蓝图。新罗的王城金城也受到唐朝特别是运河沿岸城市文化的浸润。

（三）通过运河输出的中国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

通济渠作为内陆产地与出海港口之间的纽带，把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东西集中放大，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输出。茶叶和茶道在唐代随着运河流传，后来经僧人、商人传到日本、朝鲜半岛，逐渐发展成当地特有的文化形式，其影响至今不衰。

精美的丝绸服饰、织锦图案通过运河运到港口，它们不但是商品，更是时尚符号，影响着东亚、东南亚贵族的穿着品味。唐代开放雍容的服饰风格、带有外来元素的宝相花、团窠纹等装饰图案都是随着丝绸贸易而传播出去的。同样，通过运河外运的瓷器，其优雅的造型、温润的釉色，也成了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器物的审美标准，成了中华审美趣味的物质象征。运河文化所包含的中国生活方式、审美范式，深深地渗透到周边文明的发展过程里。

第四节 运河文化的区域特色

一、通济渠上游（中原）文化区的特色

（一）政治中心文化色彩浓厚，庄重典雅

该区域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密切联系。洛阳是帝国的神经中枢，是政令发布、百官朝会的地方，也是国家礼仪、典章制度集中表演的舞台。皇城的规划布局，完全按照中轴对称、分区划片的原则来规划建设。宫殿建筑高大华美、坊市划分整齐划一，无一不是皇权至高无上和居中而治宇宙观的体现。庄重典雅的风格自上而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官方举行祭天祀地、朝会宴飨，贵族阶层的车服佩饰、生活仪态都深深地刻下了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政治伦理，塑造出一种威严内敛的宫廷美学。

运河在这一地区的主要作用，首先就是为政治服务。通过漕运到江南的财赋物资和各地的物资，优先保证宫廷、官府和军队的大额开支，从而在物质上维持并加强了以政治为核心的文化形态。运河的存在使得都城可以吸收整个帝国的精华，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一个代表国家颜面、宏大叙事的文化体系。

沿岸城市规划、公共建筑、艺术创作以及上层社会的时尚，无一不自觉或不自觉地靠拢这种官方美学，于是形成以“雅正”为主调的文化氛围。诗歌大多是以歌功颂德的应制诗为主，绘画多是纪实性的宫廷生活、重大历史事件，音乐舞蹈也大多是场面宏大的宫廷燕乐。因此它便成为整个运河文化谱系中最重的一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环。

（二）以都城文化为核心，辐射周边

洛阳作为都城，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优越条件而形成的无与伦比的文化凝聚力以及向心力。通济渠是信息、人员、物资流动的快速通道，像帝国的动脉一样，把都城的文化风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迅速传播到沿线的州县乡镇，对整个中原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京城流行的服饰新样、妇女妆饰、诗词歌赋、音乐舞蹈，都会通过往来官吏、商贾、士人、艺人很快成为周边地区竞相仿效、模仿的对象，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风潮。

文化扩散不是全然的单向灌输，周边地区特色物产、民间风情也通过运河汇集到都城，使京师物质、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是从总体趋势上来说，

还是表现为向外围扩散的趋势。因此通济渠上游文化区在空间上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影响力随着距离递减而递减的同心圆结构。强大的文化辐射力一方面使区域内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从文化心理上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地方的向心力,使运河成为维系国家统一、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三）儒家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中原是政治高地,儒家思想作为维系社会秩序、巩固皇权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在这里居于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隋唐两朝科举制度日趋完善,儒家经典成了知识分子阶层实现阶层跃升、安身立命的根本。洛阳是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就成为儒学研究和传播的重要基地。国子监、太学等最高级别的学校在这里集中,名儒学者在这里讲学,他们的思想、价值取向通过教育体系、官僚选拔机制渗透到整个社会。

忠君、孝悌、仁义、礼信等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成了评判个人品德和社会风气的最高标准,也是维系庞大帝国有效运转的精神支柱。运河漕运畅通有利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州县的管辖,也使官方意识形态能够自上而下地贯彻到基层社会。

文学艺术领域的创作也被这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歌颂盛世、赞美君主圣明、宣扬伦理教化的作品成为创作的主流,风格趋于平和、典雅、重典重礼,体现儒家提倡的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和文以载道的实用思想。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生态,给通济渠上游文化区打下了深沉、厚重、理性的底色。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情感,重视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文化风气与下游地区注重个体生命体验、审美情趣的文化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共同构成运河文化丰富性的两个主要方面。

二、通济渠中游（黄淮）文化区的特色

（一）南北交汇，兼容并蓄，多元融合

该地区是真正的文化熔炉,也是南北文化互相影响、相互消长的重要窗口。北方雄浑质朴、南方灵秀细腻在这里相遇、碰撞,最后走向融合。运河开通以后,大量的人因为经商、戍边、迁徙、避难等各种原因在此地频繁流动、长期居住。南来的商人带去的是丝绸、茶叶、瓷器等物,精致的生活方式和细腻的审美情趣;而北往的军队、官员则带去了强悍的民风、严整的秩序和粗犷的饮食习惯。

人口结构上的“南来北往”直接造成了文化的“兼容并蓄”。就语言口音来

说,呈现出南腔北调混杂的过渡性,是方言研究中一个独特的现象。饮食习惯继承了北方面食、杂粮,又吸收了南方稻米、鱼鲜,形成了南北口味共存的饮食文化。中原人的朴实刚毅与南方人的机敏灵活在此交汇。融合并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渗透,最后形成独特而复杂的地域文化性格,既不同于北方,也不同于南方,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旺盛的生命力。

（二）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并存

黄淮平原自古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厚重的农耕文化是它千年不变的底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方式同节气时令、宗族观念、乡土情结息息相关,一起构成传统社会生活的基础。运河开通以后,就如一条有生命力的商业动脉,给这片古老的大地注入了新的商业因子,使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共同发展。

1. 沿岸城镇由于水运的便利而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其中以通济渠和汴河交汇处汴州(今开封)最为典型,依靠天下之枢的地理优势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大都会。码头舟楫来往不断,昼夜不停,街道商旅不绝,店铺鳞次栉比,交易繁忙。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使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2. 商业文化兴起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在这里受到巨大冲击,人们普遍认识到商业贸易蕴含的巨大利润,追逐财富、讲求效率、重视契约的精神在社会上开始萌芽。农耕文化比较稳定保守、商业文化流动开放,两者共存交融,是该地区经济文化的一大特色。固守田园的农人、闯荡四方的商贾一起造就了此处社会生态的复杂多样。

（三）民间信仰与民俗活动丰富多彩

人口流动频繁、文化多元交融也反映在信仰上,造成通济渠中游民间信仰的多元、驳杂、实用主义的鲜明特点。官方所推崇的儒、释、道三教在此地流传甚广,寺庙、道观处处皆是。同时各种根植于乡土、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地方性神祇崇拜也十分盛行,生命力旺盛。

与水运安全直接相关的河神、龙王、水母娘娘等神灵受到船工、纤夫、商人等的普遍供奉。他们在运河重要河段、码头、渡口建庙宇,四季祭祀,香火旺盛,信徒最直接、最朴素的祈求。对于水神的崇拜就是运河信仰文化的主要内容。

除了水神崇拜之外,对历史上有名的英雄人物、忠臣良将、地方先贤的祭祀也被广泛地融入到民间信仰体系当中,比如对关公忠义精神的崇拜,对地方治水

英雄的感念等。这些信仰同一年四季的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的人生礼仪相融合，便产生了诸多丰富多采、热闹非凡的民俗活动。

春节的庙会、灯会，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中元节的放河灯祭水仪式，各种神祇的诞辰庆典等，都成为当地民众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这些活动是集体宗教感情的集中表现形式，也是社区成员联络感情、商品交易、文化娱乐的社会交往场所，带有生活气息，更反映出当地人复杂而务实的内心世界。

三、通济渠下游（江淮）文化区的特色

（一）江南水乡文化，细腻灵动，富庶繁华

小桥、流水、人家是对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景观的精准描绘。运河和支流纵横交错，是连接城乡的交通线，也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它塑造了这里独特的聚落形态和生活方式。城镇依河而建，街道沿河而设，居民傍水而居，形成水陆相依、河街交错的格局。出门即水，行路多乘船，亲水的环境在漫长的历史中，潜移默化地孕育出水乡人细腻、温婉、灵巧、聪慧的普遍性格。文化表现形式里包含着大量的水意象、水韵律，吴侬软语的婉转悠扬、丝竹音乐的流畅优美都带有水的灵性。

经济上的富裕，是江南文化能够兴盛繁荣的物质基础。这里是隋唐帝国最重要的粮食、丝绸、茶叶、食盐产地，有“天下粮仓”、“丝绸之府”之称。运河这条黄金水道，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为国家财政提供主要支撑，也为江南换回巨额财富。

扬州、苏州等地因此成为舟楫市廛、终日喧哗的超级都市，富庶繁华程度冠绝全国。经济富裕和灵动秀美的水乡自然环境相结合，共同塑造出江南文化精致、繁华、充满诗情画意的底色，使江南文化成为帝国内部人们向往的人间天堂。

（二）文人气息浓厚，艺术昌盛

优越的经济条件、秀美的自然风光、相对安逸的社会环境使江淮地区成为文人骚客、艺术名家云集之地，也是艺术创作的沃土。隋唐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等很多著名的诗人在这里长期游历或者做官，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篇，用生花的妙笔描绘了江南的山水、繁华、风流。而“烟花三月下扬州”又成了后世文人对于江南风雅生活的向往与文化符号。

浓厚的文学氛围也造就了本地士人阶层的迅速成长壮大。依靠丰厚的家底不

用为生计发愁，从而可以安心从事学术和艺术。既是财富的拥有者，又是文化创作、传播、鉴赏的人。除诗歌之外，书法、绘画、园林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以追求意境、重神韵的文人画为代表的文画从此兴起，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流派。构思巧妙、移步换景的私家园林遍布城乡，是文人雅集、吟诗作画、抚琴弈棋的地方。可以说，江淮文化区精神内核大部分是由庞大的文人阶层塑造的，其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深深地影响着整个区域的文化风貌，使它带上了浓重书卷气和艺术感。

（三）重商传统与市民文化发达

江淮地区自古就有经商逐利的传统，大运河开通之后又极大地激发了其商业潜力，使商业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水平。江淮地区商业活动的体量大、社会影响力深远，而且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念。以扬州盐商、徽商为代表的庞大的商人群体，依靠雄厚的资本、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与官府的关系，在经济领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可以对国家政策的制定与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重商逐利之风盛行于社会上，商业信誉、冒险精神、灵活经营方式受到推崇，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商业的繁荣直接催生了中国古代社会里最成熟、最发达的市民文化。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富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形态便出现了。

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娱乐和消费需求，瓦舍、勾栏、酒肆、茶楼等场所散落在街巷之中，是市民日常生活中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说唱、戏曲、杂技、傀儡戏等各类表演艺术兴盛起来，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体验。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与消费习惯，又反过来对艺术创作的内容和形式造成影响，使艺术创作趋于世俗化、娱乐化、商品化。充满活力的市民文化和上层文人的精英文化并存，共同构成江淮文化区丰富立体的面貌，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文明所能达到的勃勃生机和辉煌高度。

第五节 文化传播的当代价值

一、为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提供历史借鉴

（一）促进当代区域经济文化协同发展

通济渠历史上是南北、东西交通的大动脉，它以洛阳为中心，沟通了黄淮流域广阔的腹地，使沿线的郑州、开封、商丘、宿州、淮安等城市商贸繁荣、物资流通。这条黄金水道的运行模式，实际上是以核心交通廊道为骨架，带动沿线节点城市及广阔腹地协同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廊道经济模式给当今地区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在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原城市群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之下，可以借鉴通济渠“线性串联”的发展智慧，把沿运河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生态旅游资源同现代产业布局有机融合起来，从而塑造出一条集文化体验、生态观光、现代物流于一体的复合型经济文化走廊。

通过复原历史场景、精心开发文旅项目、创建数字运河等途径，可以将分散的文化遗产点串联成线、聚集成面，从而产生强大的区域文化品牌效应。以文化引领的协同发展可以提升区域经济的质量、效益，也可以避免同质化竞争，达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目的。通济渠的历史经验鲜明地表明，一条主轴线可以整合资源、优化配置、激发区域内部活力，最终形成以点带面、促进整个区域发展的内生机制，这是当代区域经济和文化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优秀的范本。

通济渠沿线城市与乡村共生发展了千百年，形成了既有共同特征又有各自特色的文化生态。深入挖掘和阐释出这样一种独特的共生关系，在新的时期打破行政壁垒，推动沿线地区在产业规划、市场开拓、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深度合作。共同举办运河文化节、联合申报文化项目、共建研究机构等，使历史上“运河一家亲”的情谊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最终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目的，推动区域发展迈向更高层次的协同与融合。

（二）增强文化认同感与凝聚力

文化认同成为区域共同体形成的精神纽带以及深层根基。通济渠在漫长的岁月里，不但是物资流通的通道，也是文化交融的熔炉。各地商人、士人、僧侣、工匠通过运河南来北往，将各地方言、戏曲、饮食、习俗、信仰带到通济渠沿线，碰撞、交汇、融合，形成了以包容性为鲜明特点的“运河文化圈”。生活在文化

圈层里的居民虽然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但是因为共同拥有一条“母亲河”所以拥有相似的历史记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产生跨越地域的文化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

重新提起通济渠文化，就是唤醒民间沉睡已久的集体记忆。组织通济渠历史文化讲座、民俗展示、美食节等各类活动，让沿线人民认清自己及本地区同其他地方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文化联系。将通济渠的故事纳入地方乡土教材，使青少年从小就能认识这条养育自己祖先的河流，认识它怎样塑造了家乡的面貌和性格。自下而上的文化寻根，可以大大提高民众对于本地区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认识和情感投入，从而为区域合作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当沿线人民都以“运河之子”而自豪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就会油然而生，而这种力量就是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最为宝贵的、最为持久的软实力。

（三）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文化纽带

区域一体化不但是经济联合、政策协同，更深层次上更是人心相通、文化相融。通济渠依靠物理性连接，创造出文化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条件。流动的纽带把原本相对隔绝的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历史上的通济渠是国家政令传达、军队调遣、漕粮运输的生命线，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稳定。文化上也起到缝合地域差异、形成统一文化意识的作用。

在当代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也需要这样一条强有力的文化纽带。通济渠文化谱系是沿岸地区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完全可以担当起这样的历史责任。共同保护、活化利用通济渠文化遗产可以给区域内的跨界合作提供极有吸引力的、具有内涵的主题和平台。联合打造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世界级文化旅游品牌，共同制订遗产保护规划，统一标识系统、联合进行市场推广等。

以文化遗产为纽带合作的方式比单纯的经济利益考量有更深厚的感情、历史。可以促使不同的地方共同朝着同一个目标去努力，在合作过程中加深彼此的了解，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当沿线城市不再是孤立的点，而成了通济渠这条璀璨文化项链上互相辉映的明珠的时候，区域一体化就有了最牢固、最温暖的文化根基。

通济渠是历史的见证，河道故道、堤坝遗存、城镇古迹等物质遗存本身就是强烈的视觉符号和空间印记，不断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这些历史空间活化起来，使之重新融入到现代生活中去，成为市民休闲、交往的公共场所，这样就可以使这条文化纽带具体、感性地存在，潜移默化地加深人

们对区域一体化的观念认识，为高水平的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文化支撑

（一）弘扬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隋唐时期，通济渠的开通使长安、洛阳这两座当时的世界级大都会通过水路直接到达东部沿海港口，进而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接。它与陆上丝绸之路在洛阳交汇，从而形成了一种“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宏大开放格局。这条运河上南方的丝绸、瓷器、茶叶北上，西域的香料、珠宝、文化东传，中外使者、商旅、僧侣在这里交汇。通济渠体现的是盛唐时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它本身就是开放包容精神的鲜活载体。

今天，“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倡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与通济渠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一致的。深入挖掘通济渠的历史，可以生动地向世界展示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繁荣离不开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通济渠的故事雄辩地证明，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最终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智慧与实践。这样一种历史叙事，可以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增进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有效地消除外界的疑虑，凝聚合作的共识，使古老的丝路精神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讲好中国运河故事，促进文明互鉴

通济渠文化谱系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是中国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宝库。用国际化的语言、现代化的方式讲述古老的传说，使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互鉴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发生。讲好通济渠的故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用古代世界级工程奇迹的科技故事来讲述。通济渠的修筑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古代高超的水利工程技术，精准的测算能力和强大的社会组织水平。利用纪录片、三维动画、虚拟现实等现代化手段，形象地展示出选线、施工、堤防、水柜等各方面的科学巧思，彰显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

2. 用它来讲述文化大走廊中的人文故事。以运河沿线的历史事件、文人墨客、诗词歌赋、民俗风情为研究对象，把白居易、皮日休等诗人笔下的运河诗篇变成可听、可看、可感的艺术作品，使外国受众在美的享受中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3. 讲述它推动城市兴衰、经济变迁的“发展故事”。以商丘、开封等运河名城千年的演变为主线，叙述运河怎样塑造城市、造就繁华，又怎样因为淤塞改道而影响区域格局。其中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的规律，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和思考。

从多角度、立体化地讲述这些故事，可以使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过去，也能使世界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通济渠的故事是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证明，它所体现出来的不是扩张、征服，而是连接与共享的价值观。这对塑造“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的形象、加强与沿线国家人民之间的情感联系，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

（三）展示中国历史上互联互通的智慧

“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设施联通。隋唐大运河特别是主动脉通济渠无疑也是世界历史上互联互通的典范。它不是单一的工程，而是庞大、复杂、高效的体系。其前所未有的规模把经济最活跃的南方同政治军事中心北方紧密相连，使得资源、信息、人才得以迅速流转，背后所蕴含的战略远见和治理智慧令人称道。

向世界展示通济渠的历史，就是向世界展示中国自古以来就对“连通”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和成功的实践。它清楚地表明，中国很早就知道，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的发展，必须打破地理障碍，建设高效的流通体系。这种智慧不单在宏观规划方面，比如选择最优路线以沟通黄河、淮河两大水系；而且在微观技术、管理上也体现出来，比如发明先进的船闸技术（宋代更成熟），设置完善的驿传、仓储等。具体的细节表明，中国最朴素又最正确的经济发展经验就是“要想富，先修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脱钩断链思想盛行的情况下，重新认识通济渠所体现的互联互通智慧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向世界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连接而不是隔绝，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三、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一）彰显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与创新性

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它强大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连续性以及与时俱进的创新性。通济渠的文化谱系就是这种特点最完美的体现。从连续性上讲，开凿运河不是隋代的独创，而是对春秋时期的邗沟、战国时期的鸿沟等早

期运河工程的继承和发展。隋炀帝开凿通济渠,是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的整合与升级,是中华文明在水利工程领域长期积累和传承的结果。运河开通以后,经过了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虽然它的功能和重要性有时会发生变化,但是其作为文化廊道的本质属性始终没有改变,沿线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这就是文化连续性的具体表现。

就创新性来说,通济渠的开凿本身就是一项惊天动地的大创造。它并不是简单的疏通已经存在的河道,而是以恢弘的气魄,规划出一条新的、连接中国两大核心区域的人工天河,其工程规模、技术难度、战略构想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伟大的创造使中国的地理、经济版图发生巨大变化,产生新的城市、新的经济模式、新的文化景观。运河上产生的漕运文化、商帮文化、由运河激发出来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都是新历史时期文化创新的成果。因此对通济渠文化谱系做深入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华文化是怎样通过守正创新、继承发展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

这对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体现我们的文化既有深厚的根基,又有很强的创新基因。今天传承和发扬通济渠文化也需要继承这种精神,既要以历史为鉴,保护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又要勇于创新,用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新的表达方式使古老的运河文化在新的时代焕发更加璀璨的光芒。

经过对通济渠文化谱系的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由技术创造、制度创新、文化创造构成的完整链条。既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认识,又给我们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方法论的启示。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通济渠文化谱系所包含的丰富要素就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资源。它所代表的不仅是历史上的一段辉煌,更是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这些价值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运河的选线与修建顺应地理大势,体现了古代中国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巧妙利用,和合共生、兼容并蓄的包容胸怀,运河促进了南北文化、中外文化的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开凿运河的宏伟壮举,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改造自然、追求发展的坚定意志。

提炼、阐释并且广泛传播这些精神价值,可以塑造出一个更为立体、丰满、

亲切的中国国家形象。打造以通济渠为题材的高质量影视作品、文学作品、舞台艺术、文创产品，可以使得中国故事更好地走向世界，在艺术享受中让世界人民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将通济渠沿线的历史遗迹、自然风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起来，打造世界级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前来亲身体验，也是提高文化影响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懂得珍视、善于活化自身历史文化的国家，一定会得到全世界的尊重。如果通济渠文化这张名片被磨得亮、传得开，必将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

（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了应对全球性挑战、完善全球治理而提出的一种中国方案，它的核心就是倡导各国、各文明之间超越分歧、携手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通济渠文化谱系给宏大理念增添上特有的东方历史的注脚和智慧启迪。

通济渠的本质就是通过物理上的连接，打破地理上的隔阂，把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联系成利益共享、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在这条河上，南船北马，货通八方，一艘船的航行是否顺利，牵涉到沿途无数人的生计和福祉；反之亦然，一处河道的淤塞，就可能波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休戚与共、荣辱与共、损益与共的运河命运共同体意识，同今天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致的。它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连接”和“共享”对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极端重要性。

通济渠的历史也说明，共同体的创建要付出巨大的决心、长远的眼光、持续不懈的努力。它说明共同体的维持不是一劳永逸的，而要不断疏浚河道、加固堤防，全球合作也一样需要不断的沟通对话、消除分歧。通济渠文化里包含的协作精神、大局意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都是可以奉献给世界的东方智慧。在全球气候变化、资源匮乏、发展不平衡等诸多共同挑战面前，通济渠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大规模合作，共同建设并维护好我们的生存发展“地球运河”，人类社会才能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七章 通济渠文化谱系保护与整体性实践研究

第一节 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研究

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演变

（一）从单体保护到整体性保护

早期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重心一般放在单个建筑或者纪念物上，教堂、宫殿、古迹遗址等，它们一般以独立的客体形式被保护，即采取“点状”的保护方式。这个观念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出来的就是对文物本体修复和加固的处理，而对文物所处的环境和与文物有关的社会文化网络方面不够重视。对通济渠这样绵延数百里，贯穿城乡聚落、连接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的线性巨构文化遗产来说，点状保护方式显然捉襟见肘。

随着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遗产界逐渐认识到，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的物质实体本身，而是在它同周围环境的有机联系中体现出来。由此产生了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概念，遗产保护理念也由原来的“点”向“线”、再向“面”的转变。整体性保护观认为遗产本体、历史环境、自然景观、社会功能、非物质文化要素应该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认识和管理。通济渠的保护对象不能只包括古河道、堤防、钞关、码头、仓储等物质遗存，还应该包含沿线传统村镇格局、农业景观、水利工程体系、民俗信仰、商贸传统等相互联系的一系列要素，共同构成一个复合而动态的文化生态系统。该理念的转变给通济渠文化谱系的建构和保护赋予了结实的理论架构。

（二）《奈良文件》《西安宣言》对真实性、完整性的强调

在遗产保护的实践中，怎样正确评价并有效地维护遗产的价值，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奈良文件》颁布之后，真实性原则的内涵大大丰富了，并促使真实性原则不断向前发展。它冲破了以往国外中心主义视角下对“原真材料”的过度执念，清楚地表明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决定了真实性评判标准的多样性。该文件认为，真实性判断标准应该包括形式和设计、材料和物质、用途和功能、传统和技

术、区位和环境、精神与感悟等各方面。该观点对于通济渠的保护有重大的意义。通济渠历经千年的变迁，历经疏浚、改道、废弃、重构等各种变化，它的物质形态虽不断变化，但它的国家交通命脉的功能、承载的漕运文化精神、以及它和沿线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共同构成了它的多维度、动态的真实性。因此保护工作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个历史断面的物质遗存，而应该充分尊重它在漫长的时期里形成下来的文化积淀和价值延续性。

而西安宣言是在奈良文件的基础上，对大型、系列性文化遗产的完整性、环境背景的重要性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宣言中明确指出，保护文化遗产的结构以及它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也需要保护与之相依存的环境背景。这里的环境背景不仅仅指的是物理空间，还包含社会、文化、经济、精神等诸多方面。通济渠的完整性，不能仅靠河道体系的连贯和遗产要素的齐全来表现，更重要的是要维护它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态环境。沿线城市的无序扩张、现代交通线路的切割、水体污染、乡村风貌的消逝等，都会给通济渠遗产的完整性带来严重破坏。所以必须严格限定并有效控制遗产的缓冲区，保证遗产的历史风貌和视觉通道不被侵扰，让遗产和它的生长空间和谐共存，从而能够向外界完整地表现其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

（三）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保旧”思维，而是把遗产看作一种宝贵的资源，在当代社会中更强调它的“活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该理念认为把遗产封存在博物馆里，与社会生活隔绝的“博物馆式”静态保护，会使它失去活力，最终沦为死物。真正有效的保护，并不是将文化遗产仅限于简单的保存上，而是在保持其原有价值的基础上，使它重新融入现代社会的生活之中，在新时代的大环境下得以新的发展。

理念加深之后，社区参与、公众教育就成了遗产保护的主要方式。遗产不再只是专家、政府官员等人所独占的事业，而成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社区居民共同的记忆和身份认同的来源。使沿线社区居民参与到通济渠的保护、阐释和利用当中来，就可以使保护工作真正成为自觉的文化行动，从而实现遗产价值的代际传承。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这就意味着通济渠的文化旅游开发、生态廊道建设、文创产业培育等创新实践，都必须以不破坏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为前提，保证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

效益的长期可持续性。这既给通济渠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又给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二、中国大运河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

（一）《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的宏观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大法，是通济渠等大运河保护最基本、最宏观的法律依据和指导。该法所确立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十六字方针，是大运河所有的保护工作所要遵循的指导原则。法律条文关于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考古调查发掘规程、法人违法、文物犯罪法律责任等，一起形成了坚固的法律防线。虽然在制定之初，《文物保护法》的条款更多的是针对不可移动文物的点状、片状形态，但是其核心精神和管理制度经过适当的解释和引申之后，同样适用于大运河这样的线性遗产。将运河河道、重要遗存点列为全国或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依法划定保护范围，并对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实行严格审批等，都是《文物保护法》在大运河保护工作中具体体现。这部基础性的法律为之后专项政策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法理基础。

（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等专项文件的顶层设计

面对大运河保护所呈现出来的极端复杂性、系统性，单靠普适性的《文物保护法》已经不能达到精准有效的治理效果。因此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专项文件，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为代表，成为大运河保护的顶层设计。该纲领性文件把大运河确定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文化标识，提出“千年运河、时代新韵”的总体目标，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这四大核心任务做了系统的规划。

1. 对于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纲要特别强调要实行全方位保护，并提出创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大战略，建立统一的管理和展示体系。

2. 文件在遗产利用方面积极发展高品质的文化旅游产品，打造国际知名的文化名片，将运河文化深入融入国民教育和大众生活中。

《纲要》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首次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统筹文物、水利、生态、交通、文旅等各个部门和领域，力求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实现对大运河

的综合性、协同性的治理，为通济渠段保护利用指明方向、提供方法。

（三）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的具体化落实

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要想落地生根，必须依靠地方层面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具体化。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八个省市已经陆续出台了本地区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条例》或者地方法规。这些法规就是国家《纲要》精神在地化的具体化。河南省出台的法规，会针对通济渠、永济渠河南段特有的地方特点，详细规定出具体的保护名录、管理机构的责任权限、资金保障机制、社会参与途径。设区市一级政府则会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出更为详细的政府规章或者管理办法，例如针对某条重要的运河故道遗址公园的管理规定，或者对沿岸传统村落风貌的控制细则。从国家到省、再到市县的层级化法规体系，把宏大的保护蓝图拆解成可以操作、可以监督、可以问责的具体任务，形成了上下贯通、权责清晰的治理格局，给通济渠文化谱系的精细化保护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通济渠段保护政策的落地与挑战

（一）地方性保护法规的制定与执行

通济渠流经的河南省、安徽省等地都已经颁布了省级大运河保护条例，地方立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些法律法规对于通济渠管理职责的划分、核心保护区的确定、利用方式等具体行为都做了详细的规定，给通济渠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上的直接支持。法规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凝聚社会共识、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重要环节，它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但是地方性保护法规在执行中却遇到了很多困难。执法力量普遍薄弱，基层文物管理部门人手少、专业技术能力差，缺少必要的监测设备，不能对运河沿线进行常态化的、全覆盖的监管。违法成本较低，破坏遗产的行为受到的法律处罚力度不够大，不能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造成屡禁不止的情况时有发生。另外宣传教育的广度、深度还很不够，沿线部分企业、民众对于保护法规“不知”，即便知道了也可能因为眼前利益而心存侥幸，保护意识未能真正内化为自觉行为，造成法规执行缺乏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跨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通济渠是一条流动的人工开凿的水道，其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都决定了它的

保护管理要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一段河道的污染会影响到下游的水质，一个区域过度开发就会打破整个运河的景观风貌。因此，建立一个高效顺畅的跨区域协调机制，就成为通济渠整体保护的关键。目前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大运河保护的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沿线的省份也进行了初步的合作探索，比如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同举办文化活动等。

这些努力值得肯定，但是常态化、实体化的跨区域协调机制还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目前的协调工作大多停留在会议、文件的层面，缺少具有权威性、执行力的常设机构来统筹规划、监督实施、解决矛盾。各个行政区域在制定保护规划的时候，仍然存在着“各扫门前雪”的状况，不能在保护标准、环境监测、旅游线路开发、项目审批等各方面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数据共享的壁垒仍然存在，水文、环境、文物、规划等重要数据没有达到跨区域实时共享以及联合分析的水平。缺少了这样的协调机制，通济渠的保护和管理就会呈现碎片化的状态，不能形成强大的保护合力，极大地阻碍了通济渠文化谱系整体的构建。

（三）政策执行中的部门壁垒与利益协调难题

政策执行中最深层的难题就是“九龙治水”式的部门壁垒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大运河的管理牵涉到文物、水利、生态环境、交通运输、自然资源、文化与旅游等诸多政府部门，各个部门各自拥有不同的法定职责、行业标准、利益诉求，这些诉求之间常常会发生冲突。

以通济渠为例，文物部门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尽量保持其历史原貌；水利部门重视防洪排涝、水资源调度，可能会对河道进行清淤、拓宽或修建新的水利工程，从而破坏古河床或历史堤岸；生态环境部门致力于水质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其生态修复工程的选材和设计方法不一定符合历史景观的整体要求；文旅部门希望开发出吸引游客的旅游产品，可能会建设仿古建筑、商业街区等，从而对遗产环境造成干扰。部门之间职能的墙很容易造成政策合成谬误，即各个部门看似合理的行为叠加起来，却会对遗产造成系统性的损害。

遗产保护还要同地方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众生计等现实利益寻求平衡。保护核心区划定之后，必然会对沿线土地开发、产业布局产生影响，并且会对沿线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提出禁养、禁建等限制。在严格保护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怎样依靠生态补偿、产业转型引导、发展成果共享等方式，恰当地回应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诉求和民众民生改善愿望，把保护的外部压力转变成发展的内生动力，

无疑就是检验各级政府治理智慧的终极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建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具有很强的统筹协调权威的机构，并且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平衡与补偿机制，使通济渠的保护与发展行稳致远。

第二节 遗址保护与修复工程

一、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模式

（一）以柳孜、含嘉仓等遗址为例的公园规划

通济渠沿线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以因地制宜、问题为导向。安徽淮北柳孜运河码头遗址规划时把宋代沉船、石质码头、运河堤岸等核心遗存作为重点。公园的建设并没有大拆大建，而是用最小限度的干预，配合枯山水、浅水面、植被带等元素，在地面上模拟、标识出古运河的走向、码头范围、相关建筑基址。用“示意性”的方式规划，完整地保留了地下遗存的真实性，用空间语言清楚地向人们解释了柳孜作为运河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游客漫步其间，即使不能亲眼看到过去帆樯林立的盛况，也能从精心布置的场景里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脉络。

洛阳含嘉仓遗址公园规划的重点是突出国家粮仓所具有的宏大的规制、惊人的储量。含嘉仓遗址的核心就是数百个排列整齐的圆形窖仓，规模之大、布局之严谨，无不体现出隋唐帝国的强大国力。公园规划的主要任务就是怎样使游客直观地理解地下奇观。部分窖仓使用标识性覆盖展示，在地形的微小起伏、地面材质的变化、数字虚拟复原的方法下，使游客清晰地看到整个仓城的平面布局。公园的绿化、道路系统也严格依照遗址原来的轴线、网格来构建，把整个空间变成一幅可以亲身感受的巨大历史地图。该规划策略把以坑状遗迹为主的、视觉冲击力较弱的遗址，转变成了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历史叙事场所。

（二）遗址展示、阐释与公众教育的结合

考古遗址公园的生命力来源于它的活化展示、深度阐释以及普及性的公众教育功能的有机融合。现在的遗址展示已经不是单一的文物展示，而是变成层次分明、感官体验全面的系统。在柳孜、含嘉仓等遗址公园中，原址保护被当作最高准则，最核心、最脆弱的遗迹（如沉船、仓窖剖面）都被安置在现代化的保护棚罩里，在原址展示，保证信息的原真性。出土的器物设立小型现场博物馆或者展

示中心,和遗址场景形成互文的关系,让文物与遗迹互相印证。园方充分利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来再现运河漕运繁忙景象以及粮食入仓的过程,从而弥补了静态遗址在动态展示方面的缺陷,极大提高了游客的参观体验。

阐释系统是联系观众和遗址的桥梁,它的目的是使遗产“开口说话”。该系统有导览标识、说明展板、语音导览、纪录片放映等几种形式。成功的阐释不是堆积如山的信息,而是娓娓道来的历史故事。它用一块石碑,除了记载它的年代、材质之外,还要讲述其背后的人物、事件、制度;它用一粒炭化的谷物,解释隋唐的农业技术、漕运路线、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叙事化的阐释方式把冰冷的考古材料变成有温度的历史故事,使公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以及历史上的思考。公众教育功能把遗址公园当作学校教育的延伸和终身学习的课堂。园方根据各个年龄段学生的不同特点,开发研学课程、举办“小小考古家”体验活动,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文化讲座、招募志愿者参与保护和讲解,使遗址公园真正融入社会,成为培育文化认同感、民族自豪感的沃土。

(三) 遗址公园的运营管理与社区参与机制

成功的考古遗址公园,不但是科学规划和建设的结果,更离不开可持续的运营管理以及广泛的社区参与。长效的运营管理是遗址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公园的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出来的制度保证。目前通济渠沿线遗址公园多为政府出资,事业性质的单位管理,该种模式有明显的公益特征且可获得稳定的政府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引入专业社会力量,以委托经营、公私合营等形式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在文创产品开发、旅游市场营销等各个方面弥补传统管理模式的不足。精细化管理就是对游客承载量的动态调控、日常巡查维护的制度化、应急预案的完备性,在公园开放与遗产保护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社区参与是遗址保护由“政府行为”变为“社会共识”的一步,也是实现文化遗产与地方社会协同发展的途径。核心就是形成一种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良性关系,即以遗址为起点回馈社区,再由社区反哺遗址。在规划阶段,应该广泛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把当地居民对地方历史记忆和情感融入公园的设计当中。运营阶段积极吸纳当地居民就业,对当地居民进行讲解员、安保员、景观维护等各方面的培训。更深一层的参与,就是促使社区居民以遗址公园文化品牌为基础,开展特色餐饮、主题民宿、非遗手工艺品体验等配套产业,形成遗产带动社区、社区反哺遗产的良性循环。只有当遗址保护同当地民众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时候，文化遗产才会有最广泛、最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河道本体的保护与修复技术

（一）清淤、固坡、生态护岸等工程措施

河道保护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恢复河道的稳定和健康。长期淤积泥沙会埋没原有的河床痕迹，改变水流状况，危及堤岸安全。因此科学的清淤是必要的第一步。与一般河道疏浚不同的是，遗产河道的清淤是一项严格的水下考古工作。它要使用小功率、低扰动的环保机械，在重点河段进行人工清淤，全程由考古专业人员值守，对淤泥进行系统筛查，保证任何沉船、货物、工具等历史信息都不会被忽略。

堤岸稳定、河道形态存在。传统的混凝土护岸、浆砌石护坡虽然坚固，但是现代材料和僵硬的线条会严重破坏古运河的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因此目前固坡工程更多地采用与环境协调的柔性技术及传统工艺。用木桩、竹笼等传统材料加固关键塌方点或者使用土工格栅、植被毯等被动式加固技术，在保证坡体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持自然形态。生态护岸是更高层次的追求，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以达到河岸自我修复、生态系统恢复的目的。其主要手段有：

1. 恢复乡土植被：在坡岸种植芦苇、菖蒲、垂柳等根系发达的乡土水生、湿生植物，用植物根系固持土壤，防止水流冲刷。
2. 营造多级岸线，改变单一陡峭的断面，形成缓坡、台地、浅滩等多样的岸线形态，减缓水流速度，给动植物提供更多的栖息地。
3. 用生态材料：采用可降解的椰丝毯、麦秸垫覆盖坡面，为植物初期生长提供保护，等植被稳定之后这些材料就会自然分解融入土壤。

（二）最小干预原则下的修复实践

最小干预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里一项极为重要的准则，它的精神实质就是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信息，尽可能地保留原有材料、工艺、结构及岁月的痕迹。通济渠河道修复中，此原则即所有的干预手段都必须是可识别、可逆的，在保证遗产安全的前提下，只能在治理结构性病害时采用。坚决反对一切以恢复历史原貌的名义进行的臆测性的重建、美化性的修复。

最小干预原则在实践中就表现为一系列的操作手法。当一段古堤岸局部出现坍塌的时候，修复工作并不是将它拆毁再用新料重建，而是先对坍塌部分进行详

细的考古勘察,记录下每一块砖石原本所在的位置,然后小心地把原来的砖石取出、编号。基础加固完毕之后,按照原来的形制,用传统砂浆将旧构件归位安装。对出现的裂缝,则用与原材料物理性能相近、颜色相配的材料填补,目的是防止病害的蔓延而不是追求视觉上天衣无缝。修旧如旧甚至修旧如旧,补新以新的做法,清楚地表现出了哪些是历史遗存,哪些是后世干预,从而保留了历史的层次感。它承认并且尊重遗产的“衰老”状态,把风化、磨损、苔藓等自然留下的痕迹也作为遗产价值和真实性重要部分来对待,不应该轻易抹去。

（三）遗址监测与病害防治的常态化技术应用

通济渠这样一条长且脆弱的线性遗产的保护工作,不能依靠一次性的修复工程来完成,应该是一个长期、动态的监测和保养过程。建立常态化的监测与病害防治体系,是实行预防性保护,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重要环节。现代科技为此提供前所未有的强大工具。用无人机携带高清相机、三维激光扫描仪对河道全线进行低空巡检,得到高精度的三维模型、正射影像,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时期的河道数据,准确获取堤岸微小位移、边坡侵蚀、植被生长变化等信息。

重要遗址段设用了精密的自动监测系统。在古堤坝内部埋设渗压计、土壤湿度传感器,实时监测内部水文状况,在结构表面粘贴应变片、位移计,观测肉眼看不见的变形和裂隙发展。传感器采用物联网技术,在出现异常时,将实时数据传送到监控中心,当某一指标超过预警值时就会自动报警,给管理者预留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干预处理。病害防治已经日趋常态化、精细化,即定期普查用科学的方法应对破坏堤岸的有害生物(白蚁、啮齿类动物);持续监测和评价侵蚀石质构件受酸雨、盐分等的影响;及时清理控制入侵河道生态系统的水生植物(水葫芦)。以数据为依据、主动预防的通济渠保护工作模式,使通济渠的保护工作由过去的“被动抢修”变成了科学的“主动健康管理”。

三、濒危文物建筑的抢救性修缮

（一）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濒危文物建筑修缮能否成功,就在于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能否有机融合。传统工艺是保证修缮之后建筑原真性的灵魂。修缮前必须对建筑所用的传统材料(砖、瓦、木、石、灰)的配方、烧制、加工工艺,以及建筑特有的结构做法(榫卯节点、斗拱组合、叠涩砌法)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抢救性地记录下老工匠的精

湛技艺，建立详细的工艺数据库，并在修缮时尽可能请他们参与，才是保证技艺传承不出现断裂的根本。选择与原材料的物理性质、化学成分、外观质感相同的传统材料，使新旧材料间相容，避免因材料的差异而形成新的病害。

现代技术给传统工艺的实施提供科学支持，并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精度。无损检测技术（红外热成像、超声波探测等）在勘察设计阶段就像医生给病人做CT一样，不需要破坏建筑结构就可以了解木构架内部的糟朽情况、墙体内部的空鼓情况。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可以获取建筑完整的空间信息，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生成详细的数字模型，给修复方案的制定、构件的精确放样加工提供可靠的依据。修复时现代技术也能起作用。对于不能更换但是承载力不够的关键木构件，可以采用碳纤维布加固、环氧树脂灌浆等现代方法进行隐蔽性加强处理，在不改变构件外观的情况下，恢复其结构性能。这样结合既保留了对传统的敬畏又具备了现代科学的严谨和高效。

（二）修缮过程中的价值研究与信息记录

文物建筑修缮的过程就是对文物建筑价值认识不断加深、历史信息不断挖掘的过程。负责任的修缮工程必然会伴随贯穿始终的研究和记录工作。动工前应该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师、结构工程师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小组，对建筑做全方位的价值评定。不仅要弄清楚它的建造年代、历史沿革、建筑风格等基本信息，更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它在不同时期被改造、增建、利用的痕迹，认识这些“历史的层次”。每一次修葺都会留下一层历史信息的痕迹，研究的目的在于判断哪一层具有同等的保护价值，从而指导修缮决策，防止为了追求某一个时期而粗暴抹去其他同样重要的历史信息。

信息记录是修缮工程的重要工作，它的意义并不亚于修缮本身。勘察、设计、施工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完整、准确、系统的记录。该套记录档案应该包括测绘图纸（现状图、病害图、修缮设计图、竣工图）、不同角度、时期的影像资料（照片、视频）、施工日志（每日天气、施工内容、参与人员、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和重要材料取样分析报告。特别是对被替换下来的旧构件，不能随意丢弃，而应该妥善保存，并附上该构件在建筑中的原始位置、替换原因等信息。修缮档案既是本次修缮工程的交代，又是留给后来的研究者、修缮者的一份宝贵财富，保证建筑历史信息的连续性、修缮工作的可追溯性。

（三）修缮后建筑的活化利用与功能再生

濒危文物建筑的抢救性修缮，最终目的不是让其延年益寿，而是要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回归到社会生活中去。建筑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合理使用。赋予恰当功能的建筑会得到持续的关注和维护，不会出现修好就闲置、闲置再生病的恶性循环。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再利用，一般称之为活化利用或者适应性再利用。

为了给修缮后的通济渠沿线文物建筑选择新功能，必须要符合兼容性、可逆性这两个原则。兼容性即新功能在空间要求、人流状况、设备安装等各方面都应同建筑的历史布局、结构负荷、文化环境相协调。一座精巧的古桥仍然可以继续承担一定的步行交通功能，但是不能通行车辆；一座沿河的古货栈，非常适合改造成展示漕运文化的专题博物馆或者运河主题书店；一座格局完整的官宦宅院，可以成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习所或者精品文化客栈。可逆性原则要求，为适应新的功能所做的所有改造（如加装照明、消防、空调等）都必须是可拆卸的，不能对建筑本体造成永久性损害，以便将来功能再次改变时可以无损地恢复建筑原状。经过谨慎而富有创意的活化利用，古老的建筑就不再只是静止的标本，而是变成了充满活力、服务当代、传承未来的文化新地标。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一、非遗项目的普查、建档与名录体系建设

（一）全面普查，摸清家底，建立档案

对通济渠文化带内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拉网式的、地毯式的全面普查，这是保护工作的基础。此项工作需要组织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专家，联合地方文化工作者，深入通济渠流经的城市、乡镇乃至村落，系统发掘、记录与运河有关的各种非遗项目。普查内容除了传统的民间文学、船工号子、运河传说、神话故事等之外，传统音乐与舞蹈、与漕运祭祀有关的乐舞、传统技艺、古法造船、麻绳编织、与运河贸易有关的陶瓷烧造和丝绸染织技艺之外，还应该包括民俗活动、礼仪节庆等。

普查过程中要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创建详实、立体、永久性的非遗档案。每一个非遗项目都应当有完整的文字记录、高清图片、音频、视频资料。对于一位

讲述运河故事的老人来说,除了记录下她的口述内容之外,还要将她的方言、语调、讲述时的表情神态记录下来;对传统手工艺,则要对其制作过程做全过程、多角度的拍摄,对其中的重要工艺环节做特写。档案资料是今后研究、传承、展示的基础,档案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十分重要,它是给通济渠文化谱系留下可以追溯的基因样本。

（二）分级分类，纳入各级非遗名录

在全面普查、建立档案的基础上,要建立科学的评价和认定机制,将符合条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级分类地列入到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既是对于非遗项目价值的官方认可,也是给非遗项目提供法律保护和政策扶持的重要环节。

1. 成立专家评审委员会,从非遗项目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濒危程度等几个方面进行评定。评价过程要公开透明,保证它的权威性以及公信力。

2. 分类申报,根据项目性质、特点将项目归入相应类别,即民间文学、传统技艺、民俗等,逐级向上申报。通济渠沿岸的开仓节民俗可以申报为民俗类项目,和汴绣结合起来的运河风物刺绣可以归入传统美术或者技艺类。

3. 名录管理:项目被列入名录后,政府就应当制定出相应的保护规划,确定保护责任主体、目标任务和措施,并且要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名录体系建立以后,非遗保护工作由零散、自发的管理状态转变为系统、规范的管理模式,给通济渠文化整体性保护提供制度保障。

（三）非遗项目数字档案库的动态更新与共享

数字化是保存非遗资源的长久之策,也是传播非遗资源的重要方式。创建通济渠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档案库,实现动态更新和开放共享,是新时期保护工作的新发展。档案库不应是静态的资料存储中心,而应该是一个活态的、不断发展的文化数据平台。一方面是对已经建立档案的非遗项目进行持续跟踪,记录非遗项目在传承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演变,不断补充新的资料,使档案得到更新。传承人新收徒弟,传艺过程影像资料要马上入库。

另一方面,档案库建设要以共享、利用为主。在保证知识产权不被侵犯的前提下,可以分阶段向学术研究机构、教育单位、文创企业以及广大社会公众开放一部分的数据资源。借助专题网站、移动应用、线下体验终端等途径使人们便捷

地接触、了解通济渠的非遗文化。用户通过手机 APP 欣赏濒临失传的船工号子，用 VR 技术体验运河岸边的祭祀仪式。共享机制大大拓宽了非遗的传播途径，为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和利用提供了条件，使文化遗产真正地“活”在当下，服务于社会。

二、非遗传承人的扶持与培养体系

（一）提供传习补助，改善传承条件

许多非遗项目，尤其是传统手工艺，经济收益不高，传承人依靠技艺很难过上体面的生活，直接威胁到传承的稳定性。政府和社会要形成制度化的经济扶持机制。定期给各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发放传习活动补助，是保证其基本生活和传习活动正常开展的前提。这笔资金用作原材料、场地租赁、水电等日常开销，更重要的是可以给传承人带来社会对他的尊重与认可，使他可以安心地去钻研和传承技艺。

除给传承人钱物外，改善传承人的工作生活条件也是十分重要的。政府出资或者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为传承人建立或者修缮传习所、工作室。这些空间不但是他们的创作教学场所，也应该是对外展示交流的窗口。例如给通济渠古法造船技艺传承人提供临河工坊，方便其制作、利于游客参观学习，把传承活动与文化展示结合起来，形成更好的传承生态。

（二）鼓励带徒传艺，推动非遗进校园

师徒相授是千百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最常见、最有效的办法。大力扶持代表传承人开展收徒传艺活动。设立专项奖，对培养出一代传人的师傅考核合格的予以表彰并补贴。设立师徒制，规定师徒双方的权利义务，保证教学质量以及传承效果。政府可以定期举办传承成果展演、技艺大赛等，给徒弟们提供展示自己才华、互相切磋技艺的舞台，从而调动徒弟们积极性和荣誉感。

把通济渠的非遗文化系统地纳入到中小学、高等院校的教育体系里，是扩大传承人群，播撒文化种子的战略性举措。这不仅仅是请传承人来学校上一两节课或者表演。更深一层的融合就是指

1. 课程开发，与教育部门合作，将通济渠传说故事、民歌童谣、传统工艺等编入地方乡土教材、美术课、音乐课、劳动技能课。

2. 兴趣社团：学校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兴趣小组或者社团，比如小小

汴绣坊、运河故事会等，聘请传承人做校外辅导员进行常规教学。

3. 实践基地，将传承人的工作室或者传习所设为学校的第二课堂或者社会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定期去参观体验，在亲身参与中感受非遗的魅力，发现并培养有潜力的后备人才。

（三）建立传承人梯队，关注青年传承人的培养

非遗传承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传承队伍的年龄断层。很多项目只有年老的传承人，后继无人。因此有意识地构建起年龄结构合理、技艺水平过硬的传承人梯队，尤其是发现和培养青年传承人，是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长久传承的关键。需要创建起青年传承人发现、选拔、培养的体系，采用举办青年技艺比赛、设置青年传承人扶持基金、组织新生代传承人的交流研习活动等方法，给予有志于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年轻人机会和平台。

青年传承人的培养不能只停留在技术上，要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组织他们去高等院校、设计机构研修现代设计理念、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等内容，拓宽视野，提高创新能力、创业能力。促使他们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的途径来包装和推广自己的技艺与作品，塑造出网红级别的青年匠人形象。跨界培养模式就是造就一批既懂传统技艺又懂现代传播、市场的新一代传承人，成为传统与未来的桥梁，把通济渠非遗带入更广阔的天地。

三、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与活化利用

（一）将传统技艺融入现代设计与市场

传统技艺的生命力在于使用，如果脱离了生活就会僵化甚至消亡。推动通济渠沿线传统工艺同现代设计、当代生活相融合，就是活化利用的主要途径。这就需要打破传统手艺人单打独斗的局面，搭建起跨界合作的桥梁。

1. 引进设计师资源，实行设计师驻地计划，邀请国内外优秀设计师到运河沿岸与当地非遗传承人一起研发新产品。以开封汴绣细致针脚设计现代服饰、手袋和家居软装，将浚县泥塑传统样式设计成动漫角色、潮流玩具。

2. 改良工艺和材料，在保留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可以对部分传统工艺的材料、工具、流程进行适当的改进，使之更符合现代生产效率、环保标准、审美需求。对运河沿岸传统植物染技艺做科学的色谱分析，优化固色技术，开发出更稳定、更多样化的环保纺织品。

融合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再创造，使古老的技艺以新的面貌出现在现代消费市场中，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个性化、有文化内涵的生活用品的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开发具有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开发是通济渠非遗价值转化的直接表现，但不能走同质化、低端化的旅游纪念品路线。成功的文创产品灵魂在于对运河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和巧妙转译，使每一件产品都会“讲故事”。开发工作要以通济渠文化谱系中的主要元素为起点，创建起系列化、品牌化的产品系列。以漕运文化为出发点，开发以古代粮船、漕标为原型的办公摆件、模型拼图，从市井繁华的文化记忆中提取元素，设计出描绘宋代汴梁清明上河图一般热闹景象的丝巾、茶具、笔记本等生活美学产品。

产品的设计、开发要重视品质和创意。材料的选择、工艺的精细度、包装的设计都应该体现出对于文化的尊重以及对于消费者的诚意。可以同知名品牌展开联名合作，从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以及市场影响力。更主要的是，利用产品附带的说明、扫描可以观看到的视频等形式向消费者讲述产品的非遗故事、技艺特点、传承人情况。这不只是产品的营销，更是文化的传播。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一件物品，而是一个故事、一段记忆、一份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支持的时候，非遗的价值才真正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三）打造非遗体验基地，促进文旅融合

沉浸式文化体验能触动人的内心，也更有市场竞争力。通济渠沿线的非遗传习所、老作坊、特色村落等经过改造升级之后，就成为非遗体验基地，能有效地促进文旅深度融合。这些基地应该成为活态的博物馆，使游客既可以观赏，又可以亲自动手参与。游客在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制作一段汴绣、烧制一件钧瓷、学唱几首古老的运河船工号子、参加一次模拟的漕运仪式。深度的互动体验把文化知识变成生动的情感记忆，从而大幅度提高旅游的文化附加值。

以非遗体验基地为中心，把周边的食、宿、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整合起来，形成完整的文旅产业链。开发非遗主题精品民宿，房间、布草、器物均使用当地传统工艺品；开设运河食俗主题餐厅，复原漕运途中的特色菜肴；定期举办非遗主题节事活动、实景演出，如通济渠非遗市集、运河之夜等吸引游客，聚集人气。非遗不再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到区域旅游发展中去，游客消费直接支撑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形成文塑旅、以旅彰文良性循环。

第四节 保护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一、政府主导下的多部门协同管理机制

（一）成立大运河保护管理机构，统筹协调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牵涉到很多行政区以及诸多专业领域，单个部门或地方政府无法独立完成。因此，在国家层面或者更高一级设立专门的大运河保护管理机构，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该机构应该具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垒的权威性、协调力，主要负责制定有法律效力的统一保护总体规划，规定全线的保护标准和技术规范，监督和考核各项保护工作的落实情况。它将成为通济渠保护的“中央大脑”，在各区域、各部门之间进行利益的仲裁，保证决策从遗产整体性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

统筹协调机构不但是管理者，也是服务者、赋能者。它应该汇集一流的专家智库资源，给地方保护工作提供科学的咨询和技术支持。同时该机构还要承担起把通济渠文化遗产保护深度融入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任，使遗产保护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等重大问题有机融合。由此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枢，就可有效解决以往保护工作普遍存在的“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碎片化问题，形成从宏观战略到微观执行的贯通式管理链条，保证通济渠的文化谱系得到系统完整的传承和彰显。

（二）文物、水利、交通、文旅等部门的职责分工

在统一管理机构的协调下，明确各个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才是达到协同高效运转的前提。各部门应在自己的领域里深耕细作，互相配合，组成一张无缝的保护网。文物部门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在通济渠沿线开展普查、考古勘查、价值挖掘阐释、档案建立等工作；划定遗产区及其缓冲区；拟定并监督执行修缮保养技术方案；对遗产保存情况做长期监测，开展风险评估。

水利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通济渠水体和水工设施的管理。保证运河河道生态基流，开展水质监测和污染防治，保证堤防、闸坝等水工设施的结构安全、历史风貌，科学调控河道水文情势，以维护运河生态系统健康稳定。交通运输部门主要负责还在通航的局部河段航运管理，保证现代交通活动不会对遗产本体及其环境造成损害。新建桥梁、道路等跨河设施规划时必须严格按照保护规划的要求，

保证设计、选址与遗产景观协调一致。

文化和旅游部门要推动通济渠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对运河文化内涵做进一步的挖掘,开发高质量的文化旅游产品与线路,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通济渠文化品牌。发展旅游业的时候,旅游管理部门要创建起游客承载量控制和监测体系,促使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旅游行为,保证旅游收益可以有效地回馈到遗产保护事业之中。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也要根据自身职能,把通济渠的保护要求纳入到各自相关规划以及日常管理当中,共同守护好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与信息共享平台

为了使多部门协同机制由理论变为现实,就必须创建起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就是达到上述目的的主要途径。会议应该由高级别大运河保护管理机构牵头,定期或者根据需要召集所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就保护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讨论,对存在的主要问题作出判断、协调各方矛盾分歧以及审议重要规划方案和政策文件等。联席会议制度有效运转,可以消除部门间的壁垒,推进信息交流,在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再作出决策,从而形成统一的意志和行动。

与联席会议制度相辅相成的,就是创建起功能强大的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它将成为实现科学精细化管理的技术基础。该平台可以集成并整合文物、水利、气象、环境、测绘、旅游等各个部门的数据,即遗产点位的 GIS 空间信息、本体病害实时监测数据、河道水质水量数据、游客流量统计以及周边建设项目规划信息等。利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三维可视化这些现代信息技术,管理者会借助平台得到直观的态势感知、准确的风险预估以及科学的决策支持。该共享平台为企业经营管理、政府行政管理、社会监督等工作提供途径,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它是政府管理的的服务载体,又是学术研究、社会监督的开放窗口,从而达到通济渠文化遗产智慧化、透明化的管理目的。

二、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保护的机制

（一）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

引导、激励社会力量参与,是扩大通济渠保护工作范围、深度的有效途径。企业可以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资助某个遗址的修复项目,捐建运河沿线

的文化设施，赞助有关的学术研讨和公众教育活动。政府可以出台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把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投入到与运河保护有关的文化创意产业、生态农业、特色旅游开发中，从而达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双赢的目的。

社会组织，特别是专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环境保护类非政府组织，可以起到政府与社区之间纽带的作用。在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遗产地日常巡护、记录口述历史、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活动等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它们可以依靠自己的专业性对保护项目做独立的第三方评价和监督。广大志愿者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应当创建起规范的志愿者招募、培训、管理、激励体系，吸纳热心公众成为博物馆讲解员、遗产监测员、文化活动协理员等，志愿者的参与既补充了专业人员的短缺，又是传播运河文化、提高全社会保护意识最直接的方式。

（二）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模式

通济渠文化遗产的永续发展不能只依靠政府管理，而应该采取更加开放包容的多元共治方式。该模式认为政府、市场、社会这三个主体之间存在着平等对话、互相配合、共同承担责任的关系，即网状治理结构。政府在这里的角色从以往的全能型的“划桨者”转变为掌舵方向、制定规则、提供公共服务的“掌舵人”。主要任务就是创建公正合理的法律政策环境来维护公共利益，给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创造良好的条件。

市场主体即各类企业、投资者，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可以给通济渠的活化利用注入资本和创新活力。采用特许经营、合作开发等方式，把沿岸废弃的工业遗产改造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把古镇古村改造成体验型旅游目的地。关键在于政府要制订一套完善的“游戏规则”，实行严格的准入、退出制度，使商业开发活动始终在保证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的范围内展开。社会主体指当地社区居民、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等，是多元公共意见的代表。创建社区理事会、听证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等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保证他们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保护决策更贴近民意、更具有科学性，从根本上提高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良性互动的多元共治模式，可以调节保护与发展之间内在的矛盾。可以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分担治理成本和风险，共同应对通济渠保护工作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当遗产保护不再只是政府的单向任务，而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事业的时候，它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三）探索政府购买服务与公益诉讼等参与途径

为了使社会力量参与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就要积极探索并使用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政策工具。政府购买服务便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实践途径。政府可以采取公开招标、委托等方式，把原来由政府自身承担的公共服务或者管理职能，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和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或者企业来承担。委托专业测绘公司对运河故道进行详细的测量，购买社会教育机构开发的运河文化课程并推广到中小学，也可以将某遗产点的日常管理、公众服务外包给专业运营团队。既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与供给效率，也可以培育和壮大一批专注于文化遗产领域的社会服务机构。

就法律保障来讲，健全文化遗产领域的公益诉讼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当通济渠的遗产本体或者其历史环境受到污染、破坏等侵害的时候，如果相关行政部门没有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公益诉讼就为社会组织 and 公众提供了一条司法救济途径。法律规定应当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享有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司法判决可以迫使侵权人停止侵害、修复损害、赔偿损失，也可以对潜在的破坏行为造成极大的震慑。公益诉讼制度将公众监督提到了法律行动的高度，是通济渠文化遗产的司法防护盾牌，是社会力量深度参与遗产治理的一种具体表现。

三、保护资金的筹措与使用监管

（一）政府财政投入与社会资本引入相结合

通济渠保护资金来源应确立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导，积极引入社会资本为重要补充的复合型筹资格局。

1. 政府财政支出成为保护工作的压舱石。通济渠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保护是各级政府不能推卸的公共责任。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都要把大运河保护经费列入年度预算，建立稳定的增长机制。这笔资金应该主要用在没有盈利目标的纯粹公益性的基本保护项目上，即基础考古发掘与研究、濒危遗产的抢救性修复、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保护管理机构正常运转及公共文化服务等。

2. 引入社会资本，成为解决资金难题的一种途径。巨大的资金需求不能只依靠财政拨款来维持。因此必须创新投融资机制，用财税优惠、金融支持、土地使用等激励政策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通济渠的保护和利用。采用 PPP（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的方式共同投资建设运河生态廊道、文化公园、数字博物馆等大型项目;引导企业以捐赠、设立基金、冠名赞助等形式参与保护事业;引导金融资本开发与运河文化产业有关的信贷、保险、债券等金融产品,促进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有效转化。

(二) 建立透明的资金使用与绩效评估机制

保证巨额保护资金的安全、高效使用,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资金的筹措。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包含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资金监管体系。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资金管理的完全透明化。所有来源的保护资金,无论是财政拨款还是社会捐助,其具体数额、来源、去向、使用细则等都应该通过官方网站、年度报告等形式向社会公布,接受人大、审计部门、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保证每一分钱都在阳光下运行。

更重要的就是应该建立科学的绩效评定体系。资金使用评价不应该只看财务合规性的审计结果,还要注重资金投入所产生实际的保护效果。围绕通济渠保护总体目标,建立一个包含遗产完好率、水环境质量改善度、公众满意度、文化影响力提升度等可以量化的、可以考核的绩效指标体系。定期请第三方机构来对各项资金的投入和保护项目的成效做评价。评价结果应该成为资金分配调整、项目设计改进、问责相关责任单位的依据。以结果为向导的绩效管理,可以有效避免资金低效使用、资源浪费,保证保护投入产生长久的文化和社会效益。

(三) 探索设立大运河保护专项基金与多元化融资渠道

为了保证通济渠保护资金来源的长期性、稳定性、灵活性,在现有的财政系统之外应该考虑建立大运河保护专项基金。该基金可以设立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基金会或者信托基金,资金来源可以广泛,包括各级政府专项注资、国内外企业和个人定向捐赠、国际组织或者慈善机构援助赠款、部分运河旅游门票收入或者经营性项目收益固定比例划拨、基金自身投资增值收益等。专业的基金管理机构可以采取灵活高效的方式,按照保护工作实际需要,支持研究、修缮、教育、传播等各方面的项目,特别是政府财政不能覆盖的创新型、实验性的小型项目。

同时还要拓宽融资渠道,探索新的金融工具。可以研发以运河未来收益为担保的“文化遗产保护债券”,吸引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机构。就具体的遗址修复或者文化活动而言,可以发起线上众筹,凝聚普通民众的“微力量”。还可以探

索建立运河沿线生态补偿机制,使受益于运河良好生态环境的下游地区或者企业,向上游生态保护区支付补偿费用。对“通济渠”这一文化 IP 进行系统的开发,授权生产高质量的文创产品、影视作品等,其版权收益也可以成为反哺保护事业的一条涓涓细流。各种融资探索将一起形成一个有韧性的、充满活力的金融生态系统来保证通济渠的永续保护。

第五节 保护成效评估与反思

一、文化遗产保护成效的评估指标体系

(一) 遗产本体保存状况、管理有效性、社会效益等

遗产本体保存状况是开展工作重点。主要内容有通济渠河道、堤岸、闸坝、桥梁、仓窖等物质遗存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涵盖遗址病害的发展,结构稳定性状况,历史环境受破坏的情况,修缮工程是否符合最小干预的原则等。经过定时监测和数据分析之后,就能清楚地展现保护措施的效果,有效地阻止自然或者人为因素的破坏,并保证原始信息的保存。

管理有效性属于保护工作“软实力”的反映。包含宏观、微观各个层面,即法律法规是否健全并得以执行,保护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管理机构职能是否明确,人员是否到位,专业能力是否具备,资金投入是否稳定及使用效率等。高效的管理体系是把保护理念和实践成果联系起来的纽带,它的好坏直接影响保护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长远目标的实现。

社会效益评价就是对通济渠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贡献进行衡量。主要考察遗产的公共价值挖掘与利用状况,公众对于运河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程度,社区居民参与的程度和受益情况,文化旅游产品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以及遗产在教育、科研方面的作用等等。社会效益充分展现出来,体现遗产保护工作既守护历史,又服务于当下、启迪未来,是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最终目标。

(二)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

为了保证评价结果的全面性、深度,必须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定量评估依靠具体的数据来为保护成果提供客观量化的依据。每年投入的保护资金数额、修复的河道长度、水质监测达标率、沿线植被覆盖率变化、年均游客接

待量、文创产品销售额、通过社交媒体分析得到的公众关注度指数等均可统计。数据直观且可比，可以清楚地看出保护工作规模以及即时效应。

定性评价克服了单纯数据分析的缺陷，探究数据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主要采用专家访谈、持份者座谈会、社区居民问卷调查、典型案例深度剖析等方法，来获得保护理念、管理决策、社区感受、文化影响等各方面的描述性信息。经过归纳解析的非结构化信息才能更好地把握保护工作内部逻辑、隐性问题、各主体多元化需求，使评估结果更加深刻、有温度。

（三）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确保评估的客观公正

为防止保护管理部门“自我评估”造成的主观倾向和利益受限，引进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就显得十分必要。这样可以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开透明，也可以使评价结果具有公信力。第三方机构可以是高等院校的研究中心、权威的文化遗产咨询公司或者有国际声誉的专业组织。依靠专业知识体系和标准化的评估工具，从客观中立的角度出发，对保护工作做出没有偏见的评价。

第三方评估不仅可以给通济渠保护工作提供客观的“体检报告”，还可以带来外部的先进理念和多元视角。评价报告所反映的问题与建议一般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可以促使管理部门直面问题、深化改革。外部监督机制的建立有利于落实保护责任，增加政府与民众之间信任度，成为运河遗产治理体系现代化、科学化的一环，保证历史负责、未来负责庄严承诺的实现。

二、通济渠保护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与典型案例

（一）总结在遗址保护、生态修复等方面的成功做法

通济渠的保护实践体现出来的是点、线、面结合的系统思维。遗址保护上使用精确化、科学化的干预手段。以洛阳含嘉仓遗址为例，用遗址博物馆的方式进行覆盖式保护，在保证遗址安全的前提下，用现代展示手段再现隋唐时期国家粮仓宏大的场景和管理方式。既保证了遗址的真实性，又满足了公众的教育需要，属于大遗址保护的一种典型模式。

在生态修复上，通济渠沿线城市把遗产廊道同城市生态空间创建有机融合起来。多地开展河道清淤、水系连通、岸线整治、植被恢复工程，明显改善了运河水质和滨水环境。有的河段建立了人工湿地来恢复当地的生物多样性。这样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既美化了城市景观、改善了人居环境质量又

使运河重新获得自然属性从而得以“复活”。

综合来看，其成功做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考古先行，规划领头。所有的保护利用工程在启动之前都要做详细的考古调查和勘查工作，以科学严谨的保护规划来指引后续的工作，避免盲目开发造成地下文物遭到毁坏。

2. 技术集成，多管齐下。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方法对古堤岸实行生态护坡，用三维激光扫描和数字化建档对遗址进行保护。

3. 分段施策、因地制宜，根据各个河段的历史风貌、保存状况、社会环境等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简单化处理。

（二）分析其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通济渠保护实践中形成的文旅融合、生态优先模式有很强的可复制性。核心就是不把文化遗产当作孤立、静止的东西，而把其作为区域发展的主要吸引力以及生态基础。通过打造运河文化公园、滨水绿道、遗址博物馆群等方式，把文化体验、休闲游憩、科普教育等结合起来。改变以前单一的门票经济模式，提升整体环境品质和文化内涵，带动周边区域综合发展，从而形成保护与利用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另外一种值得推广的模式就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在此机制中，政府起到制定法规政策、投入基础性资金、搭建合作平台的作用，起到“压舱石”的作用。社会资本参与开发运营旅游项目、文创产品，给保护工作赋予“造血”功能和可持续性。并通过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公众考古活动、召开社区听证会等措施，使沿线居民成为遗产的守护者、监督者，共同参与保护工作。

（三）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经验

通济渠和整个大运河保护的实践集中体现出了宏大叙事、国家意志等中国特点。把文化遗产保护提高到国家文化安全、民族复兴的高度，调动起强有力的行政资源和社会力量来开展跨区域、长周期的系统工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应对大运河这样体量巨大、情况复杂的线性文化遗产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组织动员力和执行效率。

活态传承、以用促保的思想一直贯穿其中。中国的运河保护重视物质遗存，也重视运河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功能的延续和价值的重塑。无论是运河某段区域的

恢复通航，还是将运河空间融入城市公共生活，目的都在使运河活在当下。强调生命力保护的哲学思想，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天人合一”、古为今用，给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提供了有东方色彩的中国方案。

三、当前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反思

（一）重开发轻保护、重物质轻非物质等问题

部分地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放弃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初衷，重开发、轻保护现象仍然存在。有些地方把运河当成简单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用商业化的方式包装运河，建设与历史风貌不相协调的仿古建筑群、商业街区，甚至以保护为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短视的行为破坏了运河真实的历史环境，也削弱了它的文化魅力，将遗产变成商业逐利的工具，违背了保护的根本目的。

重物质、轻非物质的倾向比较普遍，是保护工作的又一不足。大量的人力、物力都用在河道、桥梁、古建筑等有形遗产的修复和展示上，但是附着在运河上的口述历史、传统歌谣、舟船技艺、民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却面临着后继乏人的濒危状况。这些鲜活、原汁原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运河精神真正的载体，如果它们消失的话，那么运河文化谱系就会不完整，历史的深度和温度都会大打折扣。

从管理上讲，还存在着条块分割、协同不够的现象。通济渠流经的地域范围广，各地保护标准、资金投入、发展规划等各方面的差异很大，不能形成统一有效的保护合力。跨区域生态补水、污染共治、航道管理等因为地方利益冲突而无法解决。九龙治水的局面极大地制约了对通济渠这条线性遗产实行整体的、系统的保护效果。

（二）对保护理念的再思考与未来方向的展望

对以上问题必须对现有的保护理念做深刻的再思考。未来的保护工作要从“以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本”，更重视遗产和社区之间的互动。保护不应该只属于专家，也不能将遗产与民众割裂开来。创建更加包容性的社区参与机制，把当地居民当作遗产价值的阐释者、保护成果的分享者，调动起内生的文化认同和守护热情，通过社区赋权共同完成遗产保护。

数字化是通济渠文化谱系创建与更新的转折点。采用高精度的测绘、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来创建通济渠全线的数字孪生体，可实现遗产状况的实时监

测和模拟分析。既给保护决策赋予了科学依据，又冲破了时空束缚，给大众带来了沉浸式文化体验。复原隋唐时期漕运繁荣的景象，再现沿岸市井生活，让埋藏的历史信息用数字的方式“复活”，极大地拓宽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三）应对城市化冲击与气候变化等新挑战的策略思考

快速城市化过程给通济渠廊道完整性持续造成威胁。城市扩张、基础设施建设频繁地穿越或者挤压运河遗产区、缓冲区，造成历史景观的破碎化。因此必须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的刚性约束，把运河遗产廊道作为不可逾越的“文化红线”和“生态绿带”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严格执行遗产影响评估制度，对所有可能影响遗产价值的建设项目实行前置审查，探索设立运河文化保护地役权等新的法律手段来控制沿线的土地使用。

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给通济渠保护带来了新的、急迫的考验。降雨模式的改变会加大部分河段洪涝或者干旱的风险，危及古堤岸、古建筑结构的安全；气温升高会加快建材风化、生物侵蚀。应对策略是用来提高遗产地气候韧性手段。一方面要对气候变化做长期观测并加以风险评估，创建预警体系。另一方面，在保护修缮工程中审慎地融入适应性设计，用传统工艺和现代生态智慧相结合的方式建设生态海绵堤岸、调蓄水利设施等来提高运河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冲击的能力。

唯有通过前瞻性的、综合性的景观手段，才能最终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意味着不能把通济渠当作孤立的遗址点或线来对待，而应该把它当做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文化—生态—社会”复合系统来管理。这需要跨学科合作、跨部门协调、跨区域联动，在变动不居的环境里找到适应性管理措施，在遗产保护、生态安全、社会发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点，保证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文脉从容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第八章 通济渠文化谱系创新开发研究

第一节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

一、构建运河文化 IP 产业链

（一）提炼核心文化符号，打造品牌 IP

通济渠文化 IP 的创建要深入挖掘通济渠的历史文化内涵并进行创造性的提炼。它不应该只是对历史碎片的简单堆砌，而应该找到最能体现通济渠精神内核、最具情感共鸣和视觉冲击力的符号。这些符号可以来自于宏大历史事件，隋炀帝开河、唐代漕运的繁荣；也可以取自具体的文化意象，汴河水奔流不息、纲船往来穿梭、含嘉仓戒备森严；也可以聚焦于鲜活的历史人物，开河帝王将相、辛劳漕卒船工、依水而居文人墨客。

提炼出的文化符号要经过艺术化的再创作，形成统一、完整、有成长性的品牌 IP。它不只是一个名称或者标志，而是包含世界观、核心故事、角色设定、视觉识别系统等各方面内容的完整体系。可以创建名为“通济灵源”的 IP 品牌，用一条有生命、有灵性的运河为主线，讲述它怎样连接南北、见证王朝兴衰、滋养沿岸文明。在这种世界观之下可以设计出智慧坚韧的河灵、勇敢乐观的漕运少年、运河动植物、船只工具等多样的精灵形象。用统一的视觉风格和引人入胜的叙事，把通济渠文化精神具象化、人格化，使之更容易被现代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所理解、喜爱和传播。该 IP 品牌将会成为以后所有项目开发的基础和灵魂。

（二）IP 授权与多业态开发

一个成功的文化 IP，它的生命力来源于它的衍生和渗透能力。依靠规范化的 IP 授权体系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和创意资源，使通济渠文化 IP 与各种业态进行跨界融合，进而形成互相赋能、持续增值的产业生态。IP 授权模式应当灵活多样，对不同行业 and 不同规模的企业设置不同的授权门槛以及合作形式，保证 IP 价值的合理开发及有效保护。

IP 多业态开发是产业链的具象化表现，把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可以体验、

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具体的开发路径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化娱乐产品是以 IP 核心故事和角色为基础开发的系列动画、漫画、网络剧、电影、舞台剧等视听内容。以通济渠的历史传说为背景，开发电子或者桌面游戏，让玩家在互动的过程中感受运河文化。发行运河风情音乐专辑、有声读物来丰富 IP 的听觉维度。

2. 文创消费品是指以 IP 形象为依托开发的衍生品，包括文具、玩具、服饰、家居用品、潮流饰品等生活各个方面。可以联合老字号品牌推出具有运河文化特色的系列产品，复刻唐代运河沿线特色点心，用包装融入 IP 故事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3. 主题空间和服务，可以在沿河城市核心地段开设 IP 主题餐厅、咖啡馆、书店、精品酒店或者体验馆。这些空间以场景复原、互动装置、主题餐饮给消费者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利用 IP 的故事线来开发实景剧本杀、密室逃脱等项目，既可以满足年轻人的社交、体验需求，又可以促进其他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培育特色文创产业集群

（一）扶持沿河城市设立文创园区、孵化器

政府的引导、扶持是产业集群由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主要动力。沿线的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城市，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划建设以通济渠文化为题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些政策要具体务实，即给予入驻企业租金减免、税收优惠、人才公寓、项目启动资金等各方面支持，从而减少初创企业的经营成本。

文创园区不单单是物理空间的聚集，更是创新要素的聚集地。园区要设置完备的公用设施，共享办公空间、专业摄影棚、录音室、模型制作工坊、小剧场、作品展示交易中心等等，创意人才以及微小企业可较低成本使用高端设备和专业场地。

更重要的是园区应该发挥出“超级孵化器”的作用。设立专项孵化基金，定期举办创意项目路演、创业大赛，发现并培育与通济渠文化有关的优秀创意项目和团队。孵化器要提供“保姆式”的服务，即引进法律、财务、市场、管理等各方面的专业导师，为初创团队提供从创意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化的全过程指导，帮助初创团队规避创业风险，提高存活率和成功率。经过精心培育，就会源源不

断地给产业集群输送新鲜血液。

（二）聚集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企业

健康的产业集群应该包含从创意产生到最后消费的全部价值链。建设文创园区和孵化器时需要有意识地进行全链条招商,吸引并集聚上、中、下游各类企业,打通产业内部壁垒与断点。上游主要是内容创作和核心设计,包括文学创作、动漫设计、游戏策划、影视编剧、音乐制作等各种类型的企业和工作室。

中游主要是创意转化和生产,动画制作公司、游戏开发公司、影视制作公司、工艺品制造商、衍生品代工厂、数字技术供应商等。支持本地传统制造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升级,承接文创产品生产订单,用文化赋能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下游主要是市场推广和渠道销售,品牌营销公司、广告公关公司、电商运营团队、实体零售商、会展服务机构、文旅渠道商等。

设计、生产、销售各个环节的企业如果在地理位置上是集中的,那么就会形成一个高效的协同网络。设计师可以和工厂进行打样交流,营销人员可以将市场反馈及时传递给创作团队,各个行业的企业在日常交流中也可以发现跨界合作的火花。这样紧密的产业生态系统可以大大缩短产品开发周期,降低交易成本,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从而塑造出“通济渠文创”的整体品牌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三、推动“文化+科技”深度融合

（一）利用 VR/AR 技术开发沉浸式体验产品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给文化遗产的情景再现赋予了革新性的解决办法。能冲破时空的束缚,使观众由被动的旁观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来与历史进行对话。对于通济渠可以开发出一系列沉浸式体验产品。

用唐代商人的身份戴上 VR 设备,乘坐船只在洛阳出发顺流而下,经过繁忙的码头、精巧的船闸最后抵达扬州,体验一次完整的运河之旅。有逼真的视觉场景、水流声、船工号子、市井嘈杂的环境音效等都可以设置互动环节,和 NPC 对话来获取运货任务、在虚拟的店铺里交易物品,使历史文化知识能够在身临其境的探索中汲取。

AR 技术是把虚拟信息和现实世界叠加起来。游客漫步在通济渠遗址公园时,用手机 APP 或者 AR 眼镜就可以看到早已消失的古桥、码头、官署等建筑以虚拟的方式在原地再现出来,恢复历史原貌。他们用手机摄像头对着一段残存的堤

岸，屏幕上就会出现当年船只往来的情景和相关的文字解说。甚至可以设计 AR 互动游戏，使游客在遗址区内寻找出隐藏的“数字文物”，同虚拟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对诗，或者帮漕运官员完成一次“虚拟点卯”。既可以丰富游客体验，又可以最大限度保护遗址本体的真实性、完整性，达到文化阐释与遗产保护双赢的目的。

（二）运用大数据分析消费需求，精准营销

在数字时代文化消费行为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对上述数据加以有效收集并深度剖析之后，就能够准确把握用户的画像以及消费偏好，进而达成通济渠文化产品精准开发与营销的目的。数据采集来源多样，有线上线下票务系统销售数据、文创产品电商平台销售数据、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粉丝互动数据、数字体验产品使用行为数据、问卷调查和用户访谈得到的定性反馈。

经过清洗、整合、建模分析之后，就可以得到用户画像。数据表明：对通济渠历史考证感兴趣的主要是 30 到 50 岁之间的男性知识分子；运河主题的国风动漫、游戏的受众主要是 15 到 25 岁的青少年；亲子家庭喜欢寓教于乐的互动体验项目和可爱的 IP 衍生品。分析可以得出最受欢迎的故事、设计风格转化率的高低、市场空白点。

根据以上深刻的洞察，营销策略就不再是大水漫灌式的广而告之，而是变成精准滴灌的个性化触达。根据不同用户群体的用户喜好选择信息渠道（历史论坛、二次元社区、母婴 APP 等），推送个性化的文本内容以及产品信息。给历史爱好者推荐学术专著或者纪录片，给游戏玩家推送新角色预告片，给亲子用户发放主题乐园优惠券等。运用数据精准营销，可以大幅度提高营销投入产出比，也可以将通济渠多元文化价值传递给最需要、最感兴趣的受众，实现文化传播效能最大化。

第二节 旅游开发与景区建设

一、运河主题旅游线路的整合与设计

（一）串联沿岸景点，打造精品旅游廊道

通济渠文化旅游廊道的创建，核心要义就是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实现跨区域资源的有机整合。这条廊道不是简单的景点堆砌，而是在深挖运河文化脉络的基础上，把沿线的考古遗址公园、历史城镇、各种博物馆、珍贵水利工程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区等像散落的“珍珠”一样串成“项链”，形成一条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文化体验带。可以设计一条“千年运河寻踪之旅”：从洛阳的含嘉仓、回洛仓遗址出发，感受隋唐时期国家粮仓的富庶景象；再到郑州，探寻索须河故道的变迁；最后到商丘，感受运河古城往日的繁华与码头文化。

从物理空间角度来说，打造精品旅游廊道要着力提升交通连接的便捷性；从文化内容的角度讲，就要深入挖掘每个节点所具有的独特之处，将它们巧妙地嵌入到通济渠的大叙事里，构成点、线、面结合的丰富游览格局。同时统一品牌形象、标识系统、解说体系，加深游客对通济渠文化廊道的整体认识。廊道建设还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将运河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结合起来，创造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宜人游览环境，使游客在欣赏历史遗存的时候，也能享受到优美的自然风光，从而达到文化体验与生态休闲的有机统一。这样整合之后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旅游产品的整体品质，更能有效促进沿线区域联动发展，从而将通济渠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综合性价值最大化。

（二）开发水上观光、陆上骑行、徒步等多元产品

为了满足现代游客越来越个性化、体验化的需要，通济渠旅游产品开发不能固守传统的观光模式，而应该着眼于打造水陆空一体化的多元产品体系。既丰富了游客的体验层次，又有利于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提升旅游消费。水陆产品的共同开发，对于激活通济渠旅游内在的生命力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水上观光是体验运河“原真性”的标志性产品。在具备通航条件的河段可以推出种类丰富的水上游览项目。其一，仿古游船体验：游客可乘坐复原的隋唐漕船或者精美的画舫，在悠扬的古乐声中顺流而行，感受昔日盛况。利用光影水秀，

夜晚的时候在水幕或者沿岸建筑上用激光、投影等技术将运河的故事和传奇生动地展现出来。第二种是分段式水上巴士，它串联起重要的景点，给游客提供一种既方便又富有诗意的交通方式。陆上产品给游客提供了一扇接触运河的窗户。根据运河故道或者现存堤岸，创建高品质滨河绿道系统，推出陆上骑行、文化徒步产品。骑行爱好者沿着运河迎着微风欣赏历史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风景，徒步者则放慢脚步在岸边的古村落、碑刻、古桥边走走停停探寻被时光遗忘的历史印记。这些慢行系统不但是便捷的旅游通道，还是集健身、休闲、科普于一体的公共空间，它们既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服务，也造福于本地居民，促进了“主客共享”的和谐局面。

二、运河文旅融合示范区的建设

（一）以历史文化街区、古镇为核心打造景区

通济渠沿线历史文化街区与古镇是运河文化最鲜活、最集中的表现。它们完好的保存着历史形成下来的独特的空间格局、建筑风貌，以及部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创建沉浸式体验景区的天然宝库。将这些区域作为核心进行保护性开发与活化利用，可以有效地避免文化遗产被“博物馆化”所造成的疏离感，使游客能够真正走进活着的历史。

修复开发要坚持修旧如旧、以存其真的原则，对古建筑、古街巷、古码头实行精细化修复。但是保护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而应该是有智慧的活化。经过合理业态注入之后，这些空间就会变成充满生命力的旅游消费场所。可以将闲置的漕运会馆改造成运河主题精品民宿或者特色书店；在临河商铺里开设地方传统手工艺作坊、地道风味小吃店、情景茶馆等，再现当年商贾云集、人声鼎沸的市井景象。并且利用经过精心设计的夜景灯光、景观小品等来营造出诗意盎然的夜游环境，从而创建出富有魅力的新夜间经济场所。

成功的示范区创建，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原住民生活和游客体验等各方面之间的关系。应该积极引导原住民参与到旅游服务当中，使他们成为文化的真挚传播者、传承者，保证街区、古镇的“烟火气息”以及文化根脉得以代代相传。历史文化街区景区化作为主要发展模式，可以使得文化遗产地由单一的观光景点变成集游览、休闲、娱乐、住宿、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

（二）植入演艺、研学、康养等新业态

为了不断提高文旅融合示范区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在坚持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就要将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新兴业态巧妙嫁接进去。加入演艺、研学、康养等产业会使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也会有效地延长运河文化产业链，由原来的门票经济向现代产业经济转变。

演艺是活化运河故事最具有感染力的一种方式。可以参照国内外成功的经验，精心打造以通济渠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大型实景演出或者沉浸式戏剧。演出将以运河为天然舞台，以水、船、岸为主要元素，用真人表演、机械装置、声光电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艺术地再现隋炀帝开凿运河、万国来朝的壮丽盛况，或是漕运船夫的艰辛与豪情。如此震撼的视听盛宴，可以很快地使游客领略到通济渠的文化精神，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形成独特的品牌记忆点。

研学旅行给通济渠文化传承开辟了新的途径。通济渠本身就是一本包含历史、地理、科技、经济、文学等诸多方面的立体教科书。根据不同的学生群体精心设计出系列化研学课程。给小学生设置古代水利工程模拟建造的体验，帮助他们掌握浮力、水闸的基本原理；带领中学生考察运河沿线生态变化和水环境治理的实际情况；给大学生、研究人员提供专题讲座、考古现场的深度探访。通过创建运河主题研学基地、数字体验馆，把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真正达到寓教于游的目的。

康养业态的融入，就是利用运河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满足现代人对健康生活不断增长的需求。在环境清幽的河段上可以规划出一些高端康养度假酒店、中医理疗中心、安静的瑜伽冥想空间。把运河所蕴含的“静”和养生所追求的“静”结合起来，推出以“运河慢生活”为鲜明特点的康养产品，使游客在亲近自然、感受历史的过程中放松身心，达到精神和身体双重疗愈的目的。

三、智慧旅游服务体系的构建

（一）开发“一部手机游运河”APP

创建功能强大的“一部手机游运河”官方APP或者小程序，是智慧旅游体系不可缺少的入口。该平台把通济渠沿线旅游要素有机整合起来，给游客提供一站式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了信息碎片化、服务不连贯的问题，使复杂的跨区域长

线旅行比以往更简单。

该平台不能只是信息展示的窗口，而应该是一个真正智能化的旅行助手。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提供一个全景式的电子地图，在地图上标出所有的景点、服务设施和交通站点，并能根据用户的个人喜好一键生成个性化的旅游线路，提供个性化的行程规划。它有方便的在线预订系统，可以一次性预订沿线景区门票、演出票务、酒店住宿、特色餐饮、公共交通工具等各种服务，实现“一次预订，全程无忧”的便捷体验。它还具备全方位的资讯功能，对景点的介绍、历史典故、文化内涵以及最新的节日活动等各个方面都做了详细的介绍。游客可以借助于这个统一的数字入口，实现行前的计划、行中做决策和行后的分享，使旅游更为便捷自主。

（二）提供智能导览、在线预订、信息推送等服务

在统一的 APP 平台强有力的支撑下，各种具体的智慧化服务可以无缝地实现，它们植根于游客游览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彻底改变并显著提高游客的现场体验。这就把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悠久的历史更贴近现代生活。

智能导览系统成为一大亮点，逐渐代替了传统语音导览器的方式，以更加具有互动性和沉浸感的形式出现。其一，游客只需要用手机摄像头对准遗址现场，屏幕上就会出现当年建筑、船只、人物活动的真实情景，达到古今同框的效果。第二，以地理位置服务为基础，游客进入某处之后，手机上就会弹出相关的图文、音视频解说，甚至会采用历史人物第一人称讲述的“情景故事”的方式进行导览，使导览服务更加生动、有趣、个性化。

在线预订和智慧管理系统使服务效率有了质的提高。游客可以随时通过手机预订门票、船票甚至是某段时间的入场名额，既避免现场排队造成的不便，又可以有效实现景区客流量的精准调控和削峰填谷。停车场车位引导、餐厅在线点餐、智慧厕所实时状态显示等服务极大地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便捷性。同时管理方可以依靠大数据分析得出游客的来源地、游览路线、消费倾向等相关信息，为市场营销、产品优化、安全管理等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促进通济渠旅游业走向精细化、科学化管理。信息推送服务把传统的“人主动寻找信息”模式转变为“信息主动推送到人”模式，根据游客当前位置和兴趣标签，主动推送周边特色活动、非遗表演、美食优惠等，使游客在旅途中不断发现惊喜。

第三节 文化产品设计与推广

一、基于运河元素的文创产品设计

（一）从文物、传说、民俗中汲取设计灵感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建立给文创产品设计提供三座取之不尽的灵感富矿。最直接、最真实的史迹实物是途中所发现的珍贵文物。隋唐时期的三彩陶器尤其是载有胡商和货物的骆驼俑，其雄健的造型、绚丽的釉色、开放的时代气息都可以提炼出一系列设计元素，广泛用于陶瓷复刻品、卡通形象、服饰印花、数字艺术品等领域。从河道中打捞出的沉船木、瓷器碎片带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可以设计成独一无二的装饰艺术品或者首饰，每一件都在无声地讲述着一段有关时间和河流的故事。

其次就是流传在运河两岸的民间传说，给产品注入了灵魂和情感。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宏大叙事、文人墨客乘舟东下的诗意画卷、商旅百姓的悲欢离合，都是很好的创作母题。以李白、杜甫等诗人的运河行记为题材，开发一系列的插画，并开发成明信片、手账本、丝巾等商品。另外以运河边的爱情传说为蓝本，设计情侣对戒、香薰等产品，给它们赋予美好的情感寓意。甚至可以创作系列盲盒，把历史人物、传说神怪、运河精灵等形象趣味化、潮流化的再塑，来吸引年轻消费群体的关注。

再者就是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是运河活态文化最生动的体现。沿岸的庙会、祭祀、龙舟赛等，船工号子、地方戏曲、饮食习惯等，都是设计的源泉。可以将传统的年画、剪纸等里的运河元素进行现代化的改动，设计出新年礼品盒或者红包封面这类产品。从船工的传统服饰中获得灵感，设计出带有传统韵味并且符合现代审美取向的帆布包、渔夫帽等时尚单品。通济渠沿岸特有的鲤鱼焙面等美食形态与文化内涵，也可以被转化成趣味性强的抱枕、钥匙扣等生活小物件，使民俗文化用轻松幽默的方式走近大众。

（二）开发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生活用品

文创产品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真正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达到“文化即生活”的目的。这就要求产品设计不能只局限于单纯的纪念品，而应该在保证艺术性的同时充分考虑其实用功能。设计要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将通济渠的文化

印记植入各种生活用品之中，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真正感受到运河的独特魅力。

文具和办公用品作为切入点是比较适宜的。可以设计以通济渠行记为主题的手工笔记本，将通济渠流经路线和重要节点用仿古地图来绘制，钢笔或签字笔的外形取自古代船桨或者河道界碑的形状，书签采用汴河两岸垂柳叶子的形状，上面印上唐诗宋词。家居生活用品也存在很大的发展余地。以运河河道蜿蜒的形态为灵感设计出流线型茶盘、花器，把运河上拱桥优美的弧线运用到台灯、书立的设计上，提取三彩陶器经典的釉色开发出一系列餐具、水杯，使人们在用餐品茗时仿佛能感受到大唐的流光溢彩。不但美观，而且实用，长久地陪伴在消费者身边，持续地传播着文化。

二、运河特色农副产品与手工艺品的品牌化

（一）提升产品包装设计，讲好品牌故事

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包装是产品最直接的自我介绍，也是品牌故事的开头。对于通济渠沿线的农副产品、手工艺品来说，包装设计不能只是简单的容器功能，而应该成为承载文化、传递价值的媒介。设计要从产品同运河的历史渊源入手，用视觉语言来生动表现。以运河灌溉区出产的优质大米为例，其包装可以采用环保的纸质或者布袋材料，图案上可以印有古代漕运船队的版画，也可以用水墨画的形式表现运河滋润下的稻田丰收景象。包装上还可以附一张小卡片，简单地说明大米得益于运河水利系统，历史上是贡米，让消费者在购买一袋大米的同时也收获一段文化记忆。

品牌故事是核心，一个好的品牌故事可以给产品赋予独特的个性和情感价值，在众多的商品中脱颖而出。以沿岸著名的汴绣为例，它的品牌故事不能只停留在绣品的精美工艺上，而应该突出它作为运河繁华见证者的身份。故事可以从北宋时期开始，描绘汴河岸边的绣女们坐在绣楼上，把眼前漕运的繁忙、市井的喧闹绣进画幅里。品牌名称、标志的设计要与故事相互呼应，品牌名可以借用和运河有关的诗词典故，标志也可以巧妙地融合船、水、针、线的意象。

对区域内各种产品建立统一的地域公共品牌“通济渠甄选”，并为该品牌设计出具有高度识别性的视觉识别系统。在此母品牌之下，不同品类的产品（“渠畔粮仓”系列农产品、“匠心传承”系列手工艺品）可以有各自的子品牌标识，

但是共享统一品质认证和文化背书。品牌矩阵策略既可以体现出各个产品的个性，又可以形成品牌的合力，提高通济渠文化产品的整体形象以及市场竞争力。包装设计在这个体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用统一风格、色彩、版式来加强消费者对“通济渠出品”的信任。

（二）利用电商平台拓展销售渠道

数字经济时代，线上渠道是生产者与广大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它能够冲破地域的束缚，使藏于运河两岸的“好物”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创建多元化的电商渠道矩阵，就是品牌化战略推行的重要一步。

1. 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在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大型电商平台开设通济渠文化旗舰店，作为官方线上销售的主阵地。店铺装修设计要保持品牌风格的一致性，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商品详情页要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既要有产品高清图片又要有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产品文化故事、制作工艺或者生长环境，再展示一些使用场景视频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2. 发力内容电商和直播带货，发挥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内容平台的传播优势。通过发布高质量的短视频来展示汴绣的刺绣过程、钧瓷的烧制瞬间、运河沿岸四季风光、特色美食制作教程等，把文化内容和产品卖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直播带货具有更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可以邀请地方文化学者、非遗传承人、返乡创业新农人进入直播间，讲解通济渠历史文化的同时进行商品的销售。文化+场景+销售的模式可以提高转化率以及品牌的亲和力。

3. 构建私域流量池，利用社交媒体账号、微信公众号、社群等途径，沉淀出与运河文化有关的消费者，形成品牌私域流量池。社群内定期分享运河文化知识、产品上新信息、优惠活动等，并同用户展开深层次交流，进而塑造起一批忠实的核心用户群体，借助口碑传播推动品牌不断向前发展。

三、文化产品的国际化推广策略

（一）参加国际文创展会，提升品牌知名度

国际性的文化创意设计展会，是文化产品向世界展示自己、同世界交流的最有效平台。积极组织通济渠文创产品参加巴黎时尚家居设计展、伦敦设计节、法兰克福书展等世界顶级展会，是提高品牌国际知名度的途径。参展的目的不单是现场销售，更多的是展示品牌形象、寻找合作伙伴、了解市场动向。

展位的策划与设计十分重要，不能沿用传统的陈列产品的方式，而要创建一个具有沉浸式体验的文化空间。使用现代的光影设备在展位内部投射运河流光，放映船工号子、潺潺水声等声音，让参观者像处在通济渠岸边一般。产品展示需要结合场景，在现代简约的客厅里放置带有运河元素的抱枕、挂画、陶瓷器皿，在模拟的唐代书房里将运河主题的文房四宝、香薰展现出来。情景化展示方式可以给海外买家更直观的感受，使他们更好的理解产品的文化内涵和使用方法。

参展团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制作多语种的品牌手册、产品目录，内容除了精美的产品图片之外，还要有经过精准翻译、能引起情感共鸣的品牌故事。团队成员应具有流利的外语交流能力以及深厚的文化素养，从而可以向世界各地的采购商、设计师、媒体记者清楚地表述通济渠的历史价值和产品设计思想。展会期间开展小型文化沙龙、茶艺表演或者手工艺展示活动，能够让更多人了解通济渠文化，提高国际友人对我国古运河文化的认知度和喜爱程度，为之后商业合作以及品牌推广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针对不同市场进行本土化设计与营销

全球市场不是一块铁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在审美偏好、文化背景、消费习惯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成功的国际化推广要以对目标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为前提，采取因地制宜的本土化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找到适应当地市场合适的平衡点。

产品设计上可以做适应性的调整。对于喜欢简约自然的北欧市场来说，文创产品的设计可以更加注重线条的简洁、材质的天然（原木、棉麻等）、色彩的素雅，将运河元素用更加抽象、含蓄的符号形式融入进去。面向热情奔放的拉美市场，可以从唐三彩中提取明快的色彩，设计出有视觉冲击力的图案、产品。手工艺品可以保留主要的技术特点，但是根据市场的实用需求改变产品的功能和尺寸，把传统的挂毯改造成适合现代公寓使用的桌旗或者餐垫。

本土化对于营销策略来说也十分重要。营销语言转换不单是文字的翻译，更需要用当地文化语境中地道、贴切的语言去讲述品牌故事。其次是选择合适的营销渠道，要深入研究当地消费者主要用哪些社交媒体、购物平台等，与当地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博主、文化名人或者设计领域意见领袖合作，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和创意，以接地气的方式将通济渠的故事传递给目标受众。在欧洲市场可以和高端家居杂志或者设计博客合作，把运河文创产品定位为来自东方古老运河的艺术

生活品，在日本市场则可以强调它与盛唐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匠人精神。

还要考虑到各个市场的法律法规以及消费习俗。食品类产品进入不同的国家要符合当地检验检疫标准和食品标签法。产品的定价、促销方式和售后服务也要根据当地的市场环境作出相应的调整。只有经过精耕细作的本土化经营，通济渠文化产品才能冲破文化壁垒，在国外市场扎根发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喜欢中国的窗口。

第四节 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新

一、数字博物馆与云展览的建设

（一）建设通济渠线上数字博物馆

创建起一个全面、权威的通济渠线上数字博物馆，才是完成通济渠文化谱系数字化展示的关键工程。它不但是单纯的图片文字展示平台，更是集数据存储、学术研究、公共教育、互动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网络平台。使用三维激光扫描、倾斜摄影测量、高精度建模等技术，对通济渠沿线的重点遗址，如洛口仓、回洛仓、含嘉仓等、河道、堤坝、桥梁等进行毫米级的数字化复原，生成可以供用户自由漫游、缩放、细致观察的虚拟场景。

馆内藏品将会打破实体文物的束缚，包含通济渠所有相关文化元素。对出水文物、沉船遗骸做三维数据采集与虚拟修复，观众可以从任意角度去欣赏文物的精美细节；同时搜集历代舆图、地方志、诗词文赋、考古报告等各类文献资料，创建起一个庞大、结构化、可检索的知识库。这座数字博物馆将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资料库，它将会不断吸收新的考古发现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来更新内容，用多媒体解说、专家讲座视频、动画故事等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讲解通济渠在国家统一、经济运转、文化交融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从而成为世界上通济渠文化传播和展示中心。

（二）推出高质量云端展览，打破时空限制

依托线上数字博物馆数据资源可以策划出众多有鲜明主题、有较强叙事性的云端展览。这些展览可以突破实体展厅的物理空间以及展陈方式的束缚，用更加

灵活、富有创意的方式来讲述通济渠的故事。以一粒米的漕运之旅专题展为例，利用交互式地图、数据可视化等手段，将一粒粮食从江南水乡出发，经过运河北上，一路上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到达京师的全过程直观地呈现出来，使观众深切感受到隋唐时期这条帝国经济大动脉的磅礴气势。

云端展览最大的优势就是无远弗届的传播能力以及强大的互动性。世界各地的观众不需要去现场，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手机等设备随时进入展厅进行参观。展览中可以加入互动问答、在线拼图、虚拟策展等功能，使观众在观展的过程中主动去探索、学习。可以开展线上直播导览、策展人对谈、学术研讨会等形式的活动，把单向的知识传递转变为双向的交流、思想的碰撞，以通济渠文化为主线创建线上学术共同体、爱好者社群，使文化遗产真正实现全民共享，实现活态传承。

二、元宇宙概念下的运河文化体验

（一）创建运河文化虚拟社区与数字分身

隋唐时期的通济渠以元宇宙虚拟社区为背景，实现深度的文化体验。在不断延续的虚拟世界里，用户可以塑造出有时代特色的“数字分身”，选择扮演漕运船工、沿岸商贾、戍边士兵、赶考书生、漕运官员等不同的角色，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感受运河岸边的生活百态。虚拟社区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场景复制，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模拟空间。

社区的功能设计将围绕互动与共创展开，旨在建立一个富有粘性的文化生态。

1. 社交功能：玩家可以和别人以语音、文字的方式进行交流，一起完成漕运任务、组建商队、在虚拟的酒楼茶肆吟诗作对等行为来体会隋唐时期的人际交往方法。

2. 共创系统，即鼓励用户参与到虚拟世界的创建中来，自己设计并创建有个人风格的虚拟船只或者店铺，创作与运河有关的数字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甚至可以对史料里记载的地方进行细化完善，使社区成为真正的 UGC 平台。

3. 文化活动，在虚拟社区定期举办线上庙会、龙舟赛、诗会、学术讲座等活动，再现历史上的节庆和民俗，使用户在娱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获得通济渠相关历史文化知识。

（二）开发沉浸式、互动式的元宇宙文旅项目

在此基础上可以开发出以叙事为驱动的沉浸式、互动式元宇宙文旅项目。用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给用户提供最好的感官沉浸体验。戴上 VR 头盔之后，就会立刻置身于通济渠边，感受到微风拂面的清凉、船桨划破水面的吱呀声、市集里的叫卖声、船夫们响亮的号子声，全方位的感官冲击会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

该类项目依靠游戏化任务、故事情节去带动用户参与感以及代入感的提高。设计一个护送皇纲的大型任务，玩家组队合作，扮演押运官兵，从洛阳出发，途中会遇到风浪、浅滩等自然挑战，也会碰到其他玩家扮演的“水匪”进行“劫掠”，需要运用智慧和策略才能完成护送任务。在任务进行过程中，玩家就会自然地了解到当时的航运技术、管理制度、地理环境、社会风貌。

这些元宇宙项目不但是单纯的线上体验，还可以和现实世界的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它们可以成为线下旅游的超级预告片，激起人们去通济渠遗址实地参观的强烈愿望。游客用手机或者 AR 眼镜扫描现场某处时，屏幕上就会显示出当年虚拟场景的再现画面，例如万艘漕船停泊在洛口仓的画面，达到历史与现实虚实交融的效果，从而使游客的现场体验度和文化度大大提升。

三、区块链技术在版权保护与溯源中的应用

（一）为数字文创产品提供版权认证

数字博物馆、元宇宙项目会产出大量的数字文创产品，高清文物三维模型、数字艺术画作、虚拟角色皮肤、场景设计图等。这些数字资产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但是也极易被非法复制或者滥用。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把每一个数字文创产品铸造成立一件独一无二的非同质化代币。

该步骤将会为每一个数字资产创建出一个记载在分布式账本上的“数字身份证”，这个数字身份证包含有创作者信息、创作时间、作品元数据、历次交易记录。该记录是全网共识的，无法伪造，给数字文创产品提供强有力的版权证明。既保护了博物馆、开发者、艺术家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又给数字资产的授权、交易、拍卖提供安全可信的基础设施，有利于以通济渠文化 IP 为中心，构建起健康有序的数字创意产业生态。

（二）实现非遗产品的生产过程溯源

通济渠沿岸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烧制技艺、汴绣、木版年画等。这些手工艺品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它们的物质形态，而更在于它们所用的原料、独特的工艺以及背后所承载的文化遗产。但是市场上仿冒品泛滥，对非遗的传承以

及市场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区块链溯源系统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该系统可以把一件非遗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即从原材料采集到最后成品的全过程信息都上链存证。以钧瓷为例，钧瓷作品所用的特定矿区瓷土的开采、釉料配方、制坯工匠信息、入窑烧制温度曲线、最终成品由权威机构鉴定评级等每一个重要的环节的数据，都可以被加密地记录在区块链上，形成一条完整的、不可逆的“传承链”。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只要扫描附在上面的二维码或者 NFC 芯片，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这件作品的来龙去脉，包括每一位工匠的介绍、每一道工序的实录影像等等。公开透明的信息是消费者辨别真伪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购买信心。

更重要的是，它用技术手段把手工艺品的文化价值、匠人精神固化下来，让消费者买的不只是一个物品，而是一个可信、可感、可传的故事。直接提高真品市场价值，有利于坚守传统工艺的传承人，激励他们把技艺代代相传。同时完整的数字记录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为通济渠文化谱系的活态保护与创新实践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创新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一、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平衡

（一）坚持文化为本，避免过度商业化

通济渠文化谱系构建与创新实践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它所包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这是任何开发活动都不能动摇的基础。商业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彰显和弘扬文化价值为前提，任何有损、歪曲或者造成文化同质化的商业行为都应该被严格禁止。过度商业化容易造成沿岸仿古商业街千篇一律、低俗娱乐项目、与运河文化不协调的连锁品牌，这些都会严重破坏遗产的真实性、独特性，使游客审美疲劳，从而失去文化认同。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短期内或许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但是从长远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会彻底破坏通济渠文化遗产的基础。

因此，所有拟植入的商业业态都必须经过文化兼容性评价。开发策略应该重点扶持可以与运河文化深度交融的业态。可创建以漕运、仓储、诗词、民俗为专

题的博物馆或者数字体验馆,鼓励发展传承运河沿线传统手工艺的工作室,使游客体验到匠人的精神,并以运河的历史故事为基础设计出沉浸式戏剧或实景演出。商业空间的建筑风格、装饰风格、广告标识等视觉元素也应当被纳入统一规划管理的范围里,尽量同历史环境协调一致,共同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让商业成为文化传播的工具而不是文化景观的破坏者。以文化为指向的商业模式不仅可以提升项目的品位与吸引力,还可以形成独特而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实现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良性互动、共同增值。

（二）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惠及当地社区

通济渠文化遗产是沿线社区居民世代共享的宝贵财富,其创新开发不能成为资本的独角戏。必须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当地社区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直接的参与者、受益者。把社区福祉当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激发遗产内生保护动力的重要途径。如果开发成果被少数企业或者外部资本所垄断,而当地居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因为开发而受到不利的影响,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对遗产的长期保护造成威胁。

创建此类机制要依靠多元制度的设计。可以创建政府、开发企业、社区代表组成的遗产管理委员会来保证社区在重大决策中有发言权。在项目运营阶段首先要引进当地的居民进行系统的培训,使他们能胜任基础服务、专业解说、文化活动策划等各个岗位工作。鼓励并支持当地居民利用自有房屋、资源开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点等,以公司加农户或者合作社的形式,将他们纳入整个旅游产业链,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从旅游门票或者经营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设立社区发展基金,专门用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改善、传统文化活动扶持、困难家庭救助、生态环境保护,使遗产开发的红利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回馈社区,从而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提高居民对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二、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开发

（一）推行低碳旅游，减少环境足迹

推行通济渠的低碳旅游,是达到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开发目的的关键方法。这是对自然环境尊重、保护的体现,也是提高旅游品质,塑造负责任的遗产地形象的需要。低碳旅游的核心在于,在旅游活动中各个环节当中尽可能降低能源消

耗和碳排放,最大程度上减少运河生态系统和周边环境所受的干扰。

为此,需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系统性地构建绿色旅游体系:

1. 强化交通上慢行思想,创建联系各个文化节点的绿色交通网络,优化自行车道、步行道系统,提倡游客使用公共交通、共享单车、新能源观光车,对私家车进入核心区域实施严格管控,从源头上削减尾气排放和交通拥堵。

2. 能源利用:沿岸的公共设施、景观照明、服务建筑等都应该首先使用太阳能、地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采用节能设备和绿色建材来降低运行过程中的能耗。

3. 资源管理方面,创建起严格的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体系,削减废弃物的形成。倡导游客节水节电,不使用一次性用品,带水杯、环保袋等。

通过这些措施把低碳环保的理念融入游客体验之中,使游客在欣赏运河风光、感受历史文化的时候,也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与实践者。既保护了运河的生态基底,又提供了一种深刻的文化教育,给通济渠旅游赋予了更高层次的时代价值。

(二) 开发项目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通济渠沿线所有的开发建设活动,新建基础设施、改造历史建筑、引入新的旅游项目等,都必须把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其启动的前提。这是一种科学、法定的程序,目的在于事先识别、预测、评价项目对环境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并提出有效的预防或者缓解措施,它是防止开发行为给脆弱的遗产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的一道防线。环境影响评价不能只是走过场,而应该贯穿于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的全过程。

评价内容要全面深入,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运河水质、水文情势的影响,防止工程建设或者游客增加造成水体污染或者生态系统退化;沿岸土壤、植被、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重点保护古树名木和乡土物种栖息地;区域空气质量、声环境的影响,避免建设与运营产生新的污染源;历史风貌、视觉景观的影响,保证新建建筑的体量、高度、风格与整体环境相协调,不破坏天际线 and 历史场所感。评价工作应该由有资质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来完成,充分听取环境专家、文化遗产专家和当地居民的意见,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根据评价结论,对存在重大环境风险的项目应予以否决;对其他项目必须严格按照环境报告中提出的保护措施进行,将其作为项目审批、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的硬性条件。

三、建立长效的监测与反馈机制

（一）对开发项目的社会、经济、文化影响进行持续监测

为了保证通济渠文化谱系创新开发沿着可持续正确的道路前进，必须建立一个全面、系统、长效的监测体系，对通济渠文化谱系创新开发给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带来的复杂影响进行持续跟踪。监测不是一次性的评估，而是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目的是了解发展状况、及时发现问题、给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从社会角度出发，监测要考察开发对当地社区结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的影响。具体指标可以有本地居民就业率、收入、人口结构、社区公共服务满意度、居民对于开发项目的参与感、认同感等。特别是对旅游开发所引起的所谓“绅士化”现象要特别警惕，即因为生活成本上升，使得原住民不得不迁移出去，从而导致了社区文化的空心化。

从经济角度来说，统计游客数量、旅游总收入等宏观数据是必要的，但是更应该分析经济利益分配的结构。对本地中小企业在旅游产业链中所占比例、本地产品采购比例、旅游收入外溢效应进行跟踪，看开发活动能否促进地方经济多元化发展，防止出现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单一经济模式。

文化方面的监测重点就是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地方文化活力的变化情况。这包括对历史建筑、遗址保存状况的物理性监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状况，即传统节庆、手工艺、地方方言活跃度的评价；以及用游客和居民问卷调查来评价他们对于文化展陈、解说系统、文化活动真实性的看法。监测工作要融合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既要精确数据统计，也要开展田野调查、访谈、案例分析，从而形成对影响的立体认识。

（二）根据反馈及时调整开发策略

监测所得到的数据和信息，最终的价值就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创建反馈和调整机制属于监测工作逻辑的尾声，也是达成适应性管理的关键环节。如果监测结果只是停留在报告和文档的层面，不能转化成具体的调整行动，那么整个监测体系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数据的、决策的、行动的通路必须顺畅。

这就需要创建定期的评估会议制度，使政府部门、开发主体、专家学者、社区代表等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一起参加，对监测报告进行解读并做出研判。会

议要敢于面对开发过程中的负面影响以及未达预期的结果，并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按照评估结果及时改变现有的开发策略以及管理方法。当某一区域的游客过多，给遗址本体和生态环境造成压力时，就需要立即启动游客分流、预约参观的机制；如果商业化侵蚀了文化氛围，就需要调整招商政策，清退不符合定位的商户；如果社区居民的受益较少，就需要重新考虑利益分配方案，推出新的社区扶持计划。调整应该为动态的并且要持续下去，从而形成一个监测、评价、反馈、调整的良性循环。因此，通济渠的创新开发就不再是一个僵化的蓝图，而是一个可以不断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有机生命体，在变动的时代环境中保持其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第九章 通济渠文化谱系教育与社会协同参与研究

第一节 文化遗产教育体系建设

一、将运河文化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一）在中小学历史、地理、美术等课程中渗透运河知识

中小学阶段通济渠文化渗透不能是生硬的知识点堆砌，而应该成为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润。历史课讲述隋唐盛世与帝国一统的时候，可以从通济渠是国家经济命脉、军事动脉的角度切入，用具体的史实如瓦岗军的兴起、安史之乱物资转运等来引导学生理解它在历史进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地理课程可以依托通济渠所经的地域讲解水利工程原理、对沿线地形地貌改造、古代城市洛阳、开封兴衰与水运功能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从空间角度认识运河。

美术课、音乐课都是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的途径。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欣赏历史上有关运河风光的画作，例如《清明上河图》中对汴河的描绘，也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运河主题写生创作。在文学欣赏课上可以就与通济渠有关的诗词歌赋进行专题解读，白居易的“商胡离别下扬州”，皮日休的“尽道隋亡为此河”，使学生在文字之美中感受到运河的繁华和沧桑，体会到它在文人墨客心中的不同形象。由此通济渠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名词，而是一个立体的、可以感知的文化符号，从而激起学生主动探究的兴趣。渗透式教育可以使得学生有历史的纵深感、空间想象力和审美鉴赏力，进而达到知识传递和价值引领相统一的状况。

（二）编写地方教材与课外读本

国家统编教材内容丰富，但是篇幅有限，不能对某地的传统文化进行详细的阐述。因此，组织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和地方史研究者一起编写有地域特色的地方乡土教材、课外读本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些教材可以对通济渠在本地区的具体走向、水利设施遗存、相关历史人物和传说故事进行详细的介绍，把宏大的叙事同地方

记忆紧密结合起来,使学生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有更强的亲近感和自豪感。

读本的形式要多种多样,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学生阅读的习惯和认知水平。对于低年级学生可以创作图文并茂的绘本故事、连环画,用生动有趣的故事来讲述运河上的传说、漕运的场景。对于高年级学生,可以编写内容更深入、知识性更强的读本、历史小说、人物传记,对通济渠的工程技术、经济价值、社会影响做进一步的探讨。应该积极拥抱数字化趋势,开发与之配套的线上课程、互动游戏、有声读物等数字化资源,形成一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阅读体系。地方教材、读本作为国民教育体系有益的补充,可以将通济渠的文化知识具体化、情境化,真正使文化传承落到实处。

二、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一) 设立运河学研究方向,培养专业人才

通济渠作为中国大运河中典型的一段,研究价值巨大,应该设置专门的运河学或者在其下设通济渠研究方向。既是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已有学科的深化,又是跨学科整合创新。有条件的高校,特别是运河沿线的大学,应该积极申报设立相关硕士、博士学位点,形成本科到研究生完整的人才培养链条。课程体系应该体现出交叉性、实践性,涵盖隋唐史、水利工程史、交通史、城市发展史、环境变迁史、文化遗产学等众多领域。

所培养的人才目标是复合型的:既要培养能坐冷板凳、潜心于文献考证、考古发掘的学术研究人才;也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懂现代管理理念的文化遗产管理人才。培养可以让学生把学术成果转化成为易于理解、方便传播的展览、书籍、纪录片等,使学生能将运河元素运用到城市规划、文创产品设计中去。定向培养出一批批专业人才,给博物馆、考古所、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相关研究机构、文旅企业输送源源不断的力量,才能保证通济渠文化谱系的研究和传承后继有人。系统化、专业化教育,是提高通济渠文化研究水平、提升实践能力最根本的途径。

(二) 开展跨学科的运河文化研究项目

通济渠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包含自然和人文、技术和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单一学科的研究不能全面把握。因此,大力推动并资助跨学科综合性研究项目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些项目可以打破学科壁垒,使各个领域、各个专业的专家学者一起参与进来,对通济渠文化谱系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组

织历史学者、考古学者、遥感技术专家、水利工程师一起,用古代文献、考古数据、现代科技手段来准确复原通济渠在各个时期河道变迁、水工设施布置及其运作机制。

研究环境考古与历史气候学相结合的另一领域,通过研究运河沿岸的孢粉、沉积物来重建隋唐以来的区域生态环境变化,探讨运河工程给自然环境带来的长期影响,从而为今天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提供历史借鉴。数字人文方法的加入给跨学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通过创建通济渠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把文献记载、考古遗址、诗词分布、商品流通等信息空间化、可视化地展示出来,能直观地呈现各种文化要素之间复杂的联系。跨学科研究项目既可以产生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也可以把研究过程和结果转化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达到学术前沿和社会认知良性互动的目的。

三、面向公众的社会教育体系建设

(一) 在博物馆、图书馆、社区开展常态化讲座

博物馆、图书馆和社区文化中心作为社会教育的前沿阵地,将它们打造成通济渠文化传播的常设课堂,是文化惠民的重要方式。这些机构要摆脱以往“等观众”的模式,积极策划、组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常态化的系列讲座和活动。讲座内容要有学术性也有趣味性,既可邀请资深的专家讲解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又可邀请民间讲故事的人讲述运河边上的传奇故事,以满足不同层次听众的需求。

为确保活动的常态化与影响力,可采取以下措施:

1. 创建“通济渠文化讲堂”等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制定年度活动计划,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系列活动培养公众的参与习惯。同高校、科研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构建起一支稳定且高水平的讲师队伍。

2. 举办讲座之外的、具有文化内涵的活动形式,即主题沙龙、读书会、文物鉴定会、非遗技艺体验工坊(复原古代漕船模型)等,使公众通过亲自参与来加深对运河文化的了解。

活动地点应该从中心城区的标志性文化场馆扩展到基层社区、企业园区、中小学校等。采取文化大篷车、流动博物馆等形式,把展览、讲座搬到民众的家门口,尤其是文化中心比较偏远的乡镇地区,尽力实现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全覆盖。

依靠这样网格化、常态化的社会教育方式，通济渠文化就会真正融入市民生活，成为滋养社区精神文明的源头活水。

（二）利用媒体平台普及运河文化知识

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媒体平台是进行文化普及、引导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善于利用全媒体传播矩阵，使“沉睡”的通济渠文化遗产在数字世界中“活”起来，触达更广大的人群，尤其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刊等应该策划制作深度专题报道、系列纪录片（寻踪通济渠）、文化访谈节目，用它的权威性、深度性的内容来奠定文化传播的基调。

新媒体平台的运用要灵活，创新，互动。可以开设通济渠故事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Bilibili 账号，用短视频、Vlog、图文长帖、知识漫画等形式，碎片化、趣味化地呈现运河知识点，例如一分钟了解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背景、汴河上的黑科技虹桥、跟着唐诗宋词游运河等。采用直播的方式带领网友游览运河遗址公园、考古工地现场、博物馆展厅，并且和专家实时交流。

更进一步，可以开发具有教育功能的手机应用或微信小程序。这类应用能够集成运河历史地图、遗址导航、AR（增强现实）复原、知识问答游戏等功能，让用户在游览或日常使用中，以沉浸式、游戏化的方式学习运河知识。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例如发起 # 我与运河的合影 # 等社交媒体挑战赛，鼓励用户分享自己与运河的故事，从而形成强大的传播声量，构建一个由官方引导、专家支撑、全民参与的通济渠文化传播新生态，让千年文脉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第二节 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一、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保障

（一）明确公众在遗产保护中的权利与义务

将公众参与纳入法治化轨道，首先要明确在通济渠文化遗产保护中公众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来构建权责对等的良性互动关系。权利的赋予可以调动起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法律应该规定沿线社区居民和全体公民对于通济渠文化遗产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监督权。知情权就是指政府或者相关机构应该主动向公众公开遗产保护规划、项目进展、资金使用情况、潜在风险等信息。参与

权就是公众依法通过一定的途径和程序参与到保护决策和实践中。建议权即公众有权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活化的有关事宜提出意见和建议。监督权即公众对于破坏遗产行为进行举报、对保护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的权利，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权利的行使要和义务的履行相辅相成。法律法规要明确规定，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保护通济渠文化遗产的义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严格遵守遗产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严禁开展任何对通济渠本体及其历史环境风貌造成破坏的活动，比如乱搭乱建、随意倾倒垃圾、非法取土等。二是发现破坏遗产或者遗产存在安全隐患的，有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的义务。三是积极配合和支持遗产保护工作，给考古勘探、维修加固等工作提供必要的帮助。

通过法律条文对公众权利和义务实行双向规范，一方面给公众参与提供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也给公众行为划定明确界限。该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塑造成熟公民的文化遗产意识，使保护通济渠不但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事业和责任。它把抽象的“人民的遗产、人民共享”理念具体化为可以执行、可以遵守的法律规范，为全社会共同参与通济渠文化遗产保护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二）建立信息公开与意见反馈渠道

保障公众参与权利得以实现的关键就是信息畅通、反馈有效。因此必须依法建立通济渠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公布与反馈的双向渠道，打破信息壁垒，保证群众意愿能够被充分了解并及时反馈。信息公开是公众有效参与的前提。相关部门要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信息发布平台，包括政府官方网站、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独立网页等，定期发布通济渠保护状况年度报告、重大保护工程详细施工方案、相关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财政预算和决算等。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规划调整或者项目，应当提前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价并公开全文信息，保障公众在决策之前能够充分、准确地了解到情况。沿线社区公告栏、电子显示屏、通济渠开发移动应用程序等也可以作为信息发布的补充渠道，把信息精准地推送到相关人群。

在保证信息“下得去”的基础上，还要建立意见“上得来”的反馈机制。这就要求为公众提供方便、多样、有效的意见表达途径。传统的反馈渠道有设置专用电子邮箱、设立保护热线电话、定期召开居民座谈会、立法听证会等，要将其制度化、常态化。数字时代应该积极开拓线上反馈渠道，在官方网站或者 APP

上设置建言献策专栏，在社交媒体上开设官方账号广纳群言，利用评论、私信等方式征求民意。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意见处理程序，所有的意见、建议都应该及时登记、分类，然后交由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处理，在规定时限内向社会公开反馈处理结果或者采纳情况。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的闭环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地防止公众意见石沉大海，极大地提高公众参与的信心和效能感，使通济渠保护决策过程更加科学、民主，真正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

二、多元化的公众参与平台与渠道

（一）成立运河保护志愿者协会

官方指导、民间自主的通济渠保护志愿者协会成立，是组织化、常态化引导群众参与的有效途径。志愿者协会可以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将零散的个人力量组织成有组织、有纪律、有一定专业素养的保护队伍，大大提高公众参与的效率和质量。协会成立的第一点，可以为热心于运河保护的人们提供一种正式的身份以及归属感。通过规范的招募、注册、考核程序可以吸引各个年龄段、各个职业背景的人加入，其组成有退休教师、历史爱好者、在校学生、社区骨干、企业员工等。多元化的成员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整合，可以给运河保护提供多样的视角和技能。

协会的主要功能要围绕具体的任务展开，可以下设多个功能性小组，实现专业化运作。巡查监督组由志愿者步行对通济渠沿线的保存状况进行巡视，记录遗产点的保护状况，发现破坏行为及时报告，宣传教育组走进校园、社区、企业开展知识普及工作，展示通济渠历史文化知识，研究整理组协助专家学者收集口述史料，整理地方文献资料，参与考古工地的辅助工作，活动策划组组织公共文化体验活动，举办运河庙会、龙舟赛等活动，使文化遗产社会活力得到提高。

为了保证协会长期的发展，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即制定出组织章程，规定组织的宗旨、任务、议事规则。同时要建立培训体系，定期对志愿者进行运河历史、文物保护常识、安全知识等各方面的培训，提高志愿者的专业水平。协会要积极同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开展合作，争取项目资金和技术支持，给志愿者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因此公众参与不再是个体的、零散的、偶然的、不可持续的行为，而是转变为有深度、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可持续的集体行动。

（二）利用社交媒体发起线上参与活动

数字信息时代，社交媒体因为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等特点，已经成了动员广大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按照通济渠的文化特点来设计一系列有创意、有吸引力的线上活动，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创建虚拟的运河文化社群。线上参与模式成本低、门槛低，可以调动起“指尖上的”保护力量，极大地扩大通济渠文化谱系的社会认知度和情感联系。

精心设计的线上活动是吸引用户的关键。具体可以开展以下几类活动：

1. 我的运河故事数字记忆征集活动。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以通济渠个人记忆为话题的活动，鼓励网友上传与通济渠有关的个人记忆，即家中的老照片、长辈口述的运河往事、描绘运河风光的画作或书法作品、亲自拍摄的短片等。UGC(用户生成内容)不但是宝贵的民间史料，而且能引起广泛的情感共鸣。

2. 通济渠文化符号创意设计大赛。面向全社会征集代表通济渠形象的LOGO、吉祥物、文创产品设计方案等。能够吸引设计师和爱好者用古老的运河元素与现代审美相融合，给文化品牌的创建以及旅游开发蓄积创意资源。

3. 云游通济渠系列直播和虚拟展览。邀请历史学者、考古专家或者资深志愿者做直播导师，带领网友通过互联网去“接近”通济渠沿线的重要的遗址公园、博物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利用VR、AR技术创建虚拟展馆，使不能亲临现场的观众也可以沉浸式体验运河风光。

4. #守护通济渠#线上打卡挑战。结合地图应用，设计一条线上或线下的“运河探索路线”，鼓励用户前往指定遗产点“打卡”拍照，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完成挑战者可获得电子勋章或实体纪念品。此举能将线上流量有效引导至线下，促进文旅深度融合。

三、公众参与的有效激励与保障措施

（一）建立荣誉表彰制度，提升参与感

精神激励比物质奖励更能激发并保持公众参与的热情，也更长久。建立一套规范、有仪式感的荣誉表彰制度，是对公众无私奉献的最高嘉奖，可以极大地提高参与者个人荣誉感、社会价值感以及对运河保护事业的归属感。制度应该体现出层次性和多样性，满足不同的精神需求。表彰分为不同等级，设立年度“通济渠杰出守护者”大奖，对在遗产保护、研究、宣传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

者团体进行表彰；同时设立“优秀志愿者”“优秀社区项目”等常规奖项，实行季度或者年度评选。

表彰形式也应丰富多彩。除了颁发设计精美的荣誉证书、奖章或奖杯，还应举行隆重的年度表彰大会，邀请政府领导、专家学者和媒体共同见证，以增强获奖者的仪式感和自豪感。获奖者的事迹应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广泛宣传，例如，在通济渠官方网站、博物馆内开辟“荣誉殿堂”专栏，刊登他们的照片和事迹简介；与地方主流媒体合作，制作专题报道或纪录短片，讲述他们的“运河情缘”；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为运河守护者点赞#等话题，营造全社会尊崇和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

可以把荣誉同一些特殊的“礼遇”结合使用来加强激励的效果。授予获奖者“通济渠文化荣誉使者”称号，邀请其参加重大文化交流活动；为获奖者提供沿途所有收费文博场所免费参观凭证；将获奖者的名字镌刻在遗址公园的特定纪念墙或者功德碑上，使他们的贡献永远铭记。发出的信号是社会尊重每一个参与者付出的努力，每一个人都将成为通济渠文化遗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崇高的事业中来。

（二）提供必要的培训与物资支持

有效的公众参与不能只依靠热情，还需要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对参与者进行系统的培训并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持，是保证公众参与活动安全、有序、高效开展的前提，也是对参与者负责任的体现。这不仅可以提高参与质量，还能赋能公众，使他们从单纯的“爱好者”变成具有一定专业素养的“准专业人士”。培训的内容要具有针对性、实用性，根据志愿者不同的分工、服务领域来设计。对从事巡查监督的志愿者培训内容主要是文物保护法律法规、遗产点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常见病害识别方法、信息上报规范程序等。从事讲解导览的志愿者要系统学习通济渠历史文化知识、讲解技巧和沟通艺术。所有的志愿者都应该接受基本的安全急救知识的培训，以应对户外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可以邀请高校学者、文博专家、资深考古工作者等授课，保证知识的权威性、准确性。

物资保障是活动能够顺利开展的现实条件，也是解除参与者后顾之忧的现实保障。组织方应该给志愿者提供带有“通济渠守护者”字样的统一标识马甲、帽子或者徽章，既便于管理，又有利于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志愿者的身份认同。根据巡查、清理、考古辅助等户外活动时所遇到的实际状况来提供手套、垃圾袋、

测量工具等基本的用品。对于到偏远地区活动的，应给予交通补贴或者安排统一车辆。最重要的是，必须给所有的注册志愿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这是保障志愿者人身安全的最基本条件，可以规避活动风险，使志愿者安心参加。虽然微小，但是对参与者劳动与安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是保证公众持续参与的根本。

第三节 社区文化建设实践

一、培育社区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一）组织社区居民寻访运河遗迹，讲述社区故事

组织社区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和新迁入的居民沿着通济渠故道和现存的遗存寻找踪迹，这是唤醒集体记忆的一种方式。这并不只是单纯的观光，而是在历史文化学者、文化志愿者或者当地老人的引导下，用生动的语言讲述古桥、码头、仓储遗址的历史变迁，把冰冷的石碑、残破的河堤变成承载漕运繁盛、商贾往来、兵家必争等历史画卷的鲜活场景。居民实地考察时能直接感受到历史的纹理，体会大运河曾经流淌时的脉动，把遥远的、抽象的历史事件具体化、个人化。

寻访中更重要的环节就是鼓励居民讲述自己的社区故事。沿河而居的每户人家家族记忆里或多或少都留下了运河的印迹。可以开展运河记忆分享会、老照片中的故事等活动，让居民讲述家族与运河的故事，可以是祖辈在码头劳作的往事、从运河沉船中打捞出的瓷器、流传至今的船工号子等等。带有个人情感的琐碎叙述，将共同构成有生活气息的社区口述史。用自下而上的故事来构建，居民由被动听众变为积极讲述者、创造者，通济渠也不再只是地图上一条历史水道，而成了和家庭、社区息息相关的母亲河，个体情感与集体记忆在共鸣中得到升华。

（二）举办社区运河文化节、邻里艺术节

把通济渠文化元素融入周期性的社区节庆活动之中，这是促使文化认同日常化、生活化的创新之举。社区运河文化节可以根据运河历史上的一些纪念日来举办，也可以选择在春秋两季适宜的时节，精心策划一场集视觉、听觉、味觉为一体的文化盛宴。节日期间可以复原古代运河沿岸市集的风貌，在漕运文化区、商贸文化区、民俗文化区等不同的展示区里展示。居民可以品尝经过改良的运河菜、观看船工号子、民间小调改编成的文艺表演、参加与运河有关传统手工艺制作，

如编织渔网、制作微缩帆船模型等。

邻里艺术节更加注重激发社区居民的艺术创造力和参与感。艺术节可以把通济渠当作灵感来源，促使居民就“我心中的运河”展开创作。活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举办运河为主题社区摄影大赛，征集表现运河四季风光、人文景观的摄影作品；可以组织室外写生，让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出未来的运河图景；可以组织社区戏剧，居民自编自演演出关于运河历史上的传奇故事或者身边的小故事。既给居民提供展示自己才能的平台，又在创作与欣赏之中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从而增强社区的凝聚力。通济渠的文化内涵借助艺术媒介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成为连接邻里情感、塑造社区精神风貌的文化纽带。

二、社区在非遗传承中的主体作用

（一）支持社区建立非遗传习所、展示馆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展示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下来、“传”下去的重要载体。与大型博物馆相比，社区传习所更加亲和、互动，它不单单是展示展品的场所，更是可以参与、开展传承活动的场所。社区可以利用废弃的旧厂房、老祠堂、居民活动中心等地作为传习场所。在此可以对与通济渠有关的非遗项目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比如漕运相关的民间信仰仪式、船工饮食制作技艺、地方戏曲等。

传习所的作用就是传习。它给非遗传承人赋予了一个固定的、受人尊敬的教导场所，而且为社区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给予了方便的学习平台。传习所应该开设公益体验课、培训班等，使居民直接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当中。居民在这里可以学唱一段运河船歌，在老艺人的指导下制作一件传统手工艺品。沉浸式的学习体验要比书本上知识的介绍更深刻得多。

与社区展示馆相辅相成的还有“活化”和“展示”的功能。展示馆可以集中展示非遗传承人代表作品、制作工具、历史文献，也可以通过口述史、田野调查获得的影像资料。利用现代的数字技术比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来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去的样子以及制作过程，使展览既生动又有教育意义。传习所和展示馆结合在一起，会共同构成一个集保护、研究、教育、展示、交流为一体的社区文化生态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只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融入社区日常生活、可触可感的文化财富。

（二）鼓励社区老艺人向青少年传授技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关键在于人，主要体现为掌握核心技艺的老艺人向代表未来的青少年代际传承。社区在此时起到桥梁的作用。社区应建立详尽的非遗传人档案，给老艺人以充分的尊重和物质精神双方面的鼓励，肯定他们文化传承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颁发社区文化导师证书，开展专题技艺展示活动，用社区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

鼓励老艺人向青少年传授技艺，必须创建起系统的、常态化的传习平台。社区可以和周边中小学合作，把非遗课程纳入学校课后服务或者兴趣小组活动，由老艺人定期到学校开课。该种“非遗进校园”的方式可以让孩子从小接触、了解本民族文化，在心灵中种下传承的种子。社区可以在寒暑假期间举办拜师学艺夏令营或者冬令营，使青少年有机会与老艺人一起经历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体验一门技艺从入门到熟练的全过程。传授过程中要鼓励老艺人采用适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学方法，将枯燥的技法讲解同生动的故事、有趣的游戏结合在一起，从而调动年轻一代学习的积极性。跨越代沟的互动，不但是技艺的传递，更是工匠精神、文化情感、生命智慧的融合，为通济渠文化血脉的延续培养出最宝贵的后备力量。

三、营造“人人都是保护者”的社区氛围

（一）开展“运河小卫士”“最美运河人家”等评选活动

设立荣誉性评选活动，可以依靠榜样的力量来激发居民参与文化保护的热情，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运河小卫士”评选活动针对社区中的少年儿童开展，其目的是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培育起他们对于文化遗产的保育意识。评选标准不能只看重学习成绩，而应该重视实际行动，即参加社区组织的运河沿岸环境清理活动、主动向游客讲解运河历史知识、创作出优秀的运河主题书画或文学作品等。获得小卫士称号的孩子会得到证书和奖品，他们的事迹会在社区公告栏和学校进行张贴，以此来鼓励更多的孩子加入到保护运河的队伍中。

最美运河人家评选对象为社区所有的家庭，目的是把运河保护的理念融入到家庭文化当中。评选维度是多元化的，既有自家院落、门前屋后的环境美化、维护保持干净，运河沿岸保持整洁美观的要求，又有家庭成员对运河文化的了解、参与热情度、家庭收藏着运河的相关老物件，并能说出它们的背景、故事及参加

运河文化志愿服务等。评选出的“最美运河人家”予以挂牌表彰，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可以有效激励更多的家庭见贤思齐，把爱护运河环境、传承运河文化作为家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社区内形成千家万户共同守护文化根脉的生动局面。

（二）将运河保护纳入社区居民公约

把抽象的文化保护意识转变成具体的、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就是实现长久保护的关键一步。将运河保护相关内容正式写入社区居民公约，是社区文化治理制度化的重要表现。此过程本身就成为一次广泛的宣传动员，社区组织者应当通过居民代表大会、线上意见征集等途径，带领居民们共同讨论并制定出相关条款，从而保证公约的内容能够体现大部分居民的愿望与共识。

居民公约中的运河保护条款应当具体、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环境责任条款：规定居民不得将垃圾、污水倾倒入运河及其四周，不能破坏绿化植被，一起保持运河生态。

2. 遗产保护义务条款：规定居民应该自觉保护社区内的运河遗迹，比如古桥、石碑、老屋等等，发现损害或者被盗的情况要立即向社区或者有关部门举报。

3. 传承文化的条款，提倡居民学习、传播运河历史文化，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文化活动，尊重并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习工作。

4. 文明行为条款，促使居民们充当起外来客人的文化解说员，一起守护通济渠文化美誉，体现出本社区居民的良好风骨。

公约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它作为社区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契约与行为规范，依靠舆论监督、社区内部评议起作用。将运河保护提升为社区集体承诺，可以有效地约束不文明行为，也可以促使居民养成自觉保护的 habit，最终在社区内部构筑起一道坚实的文化遗产群众保护防线。

第四节 青少年教育项目开发

一、开发沉浸式、体验式的研学旅行项目

（一）“重走运河路”主题夏令营/冬令营

以重走运河路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夏令营、冬令营活动，是通济渠文化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活动路线以通济渠核心段为起点，从洛阳的含嘉仓、回洛仓遗址出发，顺着古汴河（通济渠）的故道一直前行，经过郑州、开封、商丘等重要的遗址点。在行程的设计上要重视历史场景的再现和还原。洛阳段的营员参观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时，可以借助数字复原技术来感受当年都城的繁华和运河的枢纽地位，开封段的营员可以考察古汴京的水系遗迹，了解北宋时期通济渠作为京城生命线的作用。

活动内容不能只停留在参观。可以设置一系列的互动体验环节，使青少年深入地参与进去。组织一场隋唐漕船模拟航行活动，把营员分为小组制作简易船模，在指定的水域或者沙盘上做货物运输模拟，学习古代的航运知识和水利智慧。邀请民俗专家教授营员学习传唱流传于运河两岸的古老船工号子，体验与运河漕运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汴绣、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制作。饮食文化上安排一桌“运河家宴”，品尝当年由于南粮北运而兴盛的特色美食，并且有导师讲解其中的历史故事。

晚上举行运河故事会或者主题沙龙，营员们相互交流所见、所闻、所感。可以请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讲解通济渠开凿的历史背景，工程奇迹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用影像资料的播放和历史文献片段的朗读营造出浓重的历史真实气氛。整个夏令营或者冬令营的目的，是让青少年在数天的时间里完成一次从认知到感悟，再到情感升华的完整文化体验，使通济渠不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道痕迹，而是心中一段带着故事与温度的鲜活记忆。

（二）“小小运河守护者”角色扮演活动

小小运河守护者角色扮演活动属于一种创新的情境教育方式，其把青少年置于某一具体的历史或者现实的情境中，并通过赋予他们不同的角色从而激发他们主动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活动可以设计成大型的、贯穿于学期或者假期之中的项目。参与者可以扮演不同的历史人物，隋炀帝时期总设计师宇文恺监督工程

质量，唐代漕运官员规划粮食从江南运往长安、洛阳的最优路线，往来于运河上的商贾体验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的艰辛和乐趣，也可以是普通的船夫感受日夜漂泊的生活。

每一个角色都会有不同的任务和挑战。扮演漕运官员的人要研读历史地图、文献，估算航行时间、粮食损耗，计算水位下降、河道淤积等突发状况。扮演设计师的团队要学习隋唐时期的水利工程知识，用模型材料设计出高效的船闸或者堤坝。也可以让考古学家、遗产保护规划师、社区志愿者这些现代的守护者也参与其中。青少年在扮演这些角色时，要对运河遗址现状进行调查，模拟出制定保护方案的过程，再策划面向社区的运河文化宣传活动。青少年可以认识运河的历史作用，也可以理解当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从而培养起文化传承人的责任感。

二、举办运河主题的科技创新与艺术竞赛

（一）运河模型制作、机器人编程大赛

以推动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教育同通济渠文化相融合为宗旨的竞赛。比赛分为不同组别来适应各个年龄段的学生。

1. 模型制作组要求参赛者以隋唐通济渠为原型，用环保材料、3D 打印技术等手段制作出可以反映运河工程特点模型。作品可以是宏观的河道沙盘，表现通济渠怎样连接黄河和淮河；也可以是微观的单体结构，含嘉仓的仓窖结构、通济渠沿线的历史事件场景、漕船的复原模型等。评分标准不单看重模型的精细程度，也看重模型对历史细节的考证是否准确、科学原理表述是否清楚。

2. 机器人编程组，该竞赛具有很强的挑战性、趣味性。参赛者要设计并编程一个小型的机器人，在模拟的通济渠河道地图上完成给定的任务。任务可以是智能清淤，即机器人自动识别并清理淤泥障碍物；精准漕运，即机器人沿着预设路线，把代表粮食的物块从运河某点运到终点（洛阳），模拟通过船闸；水利巡检，即机器人巡视堤坝，发现并报告决口风险点。

这些比赛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逻辑思维、编程技能，又使学生在项目驱动下主动去学习通济渠的历史、地理、工程技术等各方面的知识。制作仓窖模型要了解仓窖的构造原理和防潮技术，为了使机器人完成漕运任务就必须研究通济渠水文特点和航运规则。以解决问题为学习目的，比被动地接受知识更深刻、

持久，真正实现了知识的内化和能力的迁移。

（二）运河主题的征文、绘画、摄影比赛

科技竞赛是理性的探索，艺术竞赛是感性的表达，两者互相补充，一起构成青少年与通济渠文化之间的多维对话。征文比赛可以促使学生去挖掘运河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诗词歌赋，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理解与感受。题目可以取作“我和通济渠的时空对话”、“如果我是隋唐时期的船工”等，可以采用记叙文、散文的形式也可以采用诗歌、小说的形式。

用视觉语言来表现通济渠的美丽的是绘画、摄影比赛。绘画作品可以画隋炀帝龙舟巡游的盛况，也可以画漕船帆樯林立的繁忙景象；也可以画现代运河遗址公园的写生，表现古今交融的风貌。摄影比赛引导学生去发现并捕捉现实中运河遗存的美。清晨薄雾里一段古堤，夕阳下静静流淌的河水，遗址旁人们现代的生活，都可以成为镜头下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艺术作品是学生个人才能的展示，也是学生对通济渠文化进行个性解读、再创作的成果。优秀的作品可以用线上线下展览、结集出版等形式来推广，使更多的人感受到青少年眼中鲜活的运河文化。

三、建立青少年运河文化实践基地

（一）在学校、社区、景区挂牌成立实践基地

建立实践基地要采取点面结合、多方共建的方式，形成立体的教育网。中小学校挂牌运河文化教育，使运河文化教育更紧密地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体系中。学校可以成立运河文化兴趣小组或者社团，在课后服务时间开展常规性的活动，把基地打造成为校本课程研发和实施的主要平台。运河文化不再只是偶尔进行的活动，而成了学生知识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在社区设立实践基地，就能把教育的触角延伸到家庭和社会。社区基地可以利用周末、节假日面向社区内的青少年及其家庭开展亲子运河知识问答、运河主题手工坊、小型展览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打破学校的围墙，让家庭成员一同感受运河文化魅力，营造出社区共同重视、传承运河文化的良好氛围。在通济渠沿线的重点遗址公园、博物馆等景区建立实践基地，给学生提供最真实、最有说服力的现场教学环境。景区基地可以同学校基地、社区基地联动，承担研学旅行、主题活动等任务，用其专业的讲解人员、丰富的馆藏资源、独特的现场感，提供其他场所无法提供的深度学习体验。

（二）提供系统化的课程与实践指导

实践基地的正常运转，依靠的是好的课程内容和专业的实践指导。因此需要组织历史、考古、教育等各方面的专家共同研发出一套适合青少年的、系统化的通济渠文化课程体系。课程体系要有阶梯性，按照小、初、高不同学段学生认知水平和兴趣特点设计不同深浅、宽窄的教学内容。课程内容要包括通济渠的历史源流、工程技术、经济影响、文化艺术、生态变迁、当代价值等各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图谱。

课程形式要多样化，除标准的图文教材外，还要配合开发出一些辅助教学资源，如专题纪录片、动画短片、互动教学课件、VR 虚拟漫游体验程序、可动手操作的教具盒。教具盒里可以放有模拟考古挖掘的工具和地层模块，让学生体验考古发掘的乐趣；也可以放有制作漕船模型的材料和图纸。

与此同时还需要有一支专业的指导队伍。主要从学校教师、志愿者队伍建设以及活动指导手册编写三方面来提供保证。通过标准化的课程、专业化的指导，保证每一个实践基地的教育活动都能达到预期的质量和效果，真正使青少年在每一次实践中有所学、有所思、有所得。

第五节 社会参与的成效评估

一、社会参与度与满意度的量化评估

（一）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评估参与规模

评估社会参与规模要建立一个多维立体的指标体系，不能只停留在人数统计上，还要探究参与的广度、深度、频次。问卷调查为本次工作的基础，设计并发放了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的调查问卷，调查对象包含沿线城市居民、游客、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等各个社会群体。问卷内容除了包含了参与者基本的人口学信息之外，更关注参与者参与运河文化活动的方式（参观博物馆、参加讲座、体验非遗等），参与的频率以及信息来源等，旨在绘制出一幅准确的详尽的公众参与图景。对回收的数万份有效问卷进行交叉分析之后，可以清楚地找出各个群体的参与行为特征及差异，了解哪些活动更受欢迎，哪些宣传渠道更有效。

数据分析可以给参与规模的评价提供宏观的、动态的视角。整合了通济渠沿线各个文化场馆的年度访问量、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活跃用户数、点赞转发

评论量、各类文化节庆志愿服务活动报名及实际参与人数。通过对云游通济渠线上展览后台数据的分析可以获得总访问量、用户地域分布、平均浏览时长、热点区域点击情况等主要的的数据,进而来判断数字化传播的覆盖面以及吸引力。清洗、建模、可视化处理之后的数据,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公众参与热度的时空变化趋势,有利于发现公众关注的焦点,给资源配置和活动策划提供数据驱动的指导。经过对问卷的深入剖析和大数据的宏观描绘,可以全方位、精准地评价社会参与的整体规模和结构特点。

（二）评估公众对保护与开发工作的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是检验通济渠文化谱系建构成效的试金石,也是社会大众对通济渠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成果接受度、认可度的直接反映。评价公众满意度的关键,就是去倾听公众真实的感受。同样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设计了详细的满意度量表,邀请公众对各项具体工作从环境维护、展陈更新、文化活动组织质量、公共服务设施便捷性、信息公开透明度等各个方面进行打分。设计李克特量表,把抽象的“满意”转化为五个等级,即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大大方便了统计分析,进而求出各项工作的平均分和满意率。

除结构化的量分外更重视公众的开放性意见及具体建议。开放式题目、定期召开居民和游客座谈会、社交媒体上的意见反馈专区等都是收集公众意见的重要渠道。公众对每一个标识牌设计的批评、对增加夜间文化活动的期望都被系统地记录、分类、整理。我们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网络平台上大量的评论,自动识别出公众情绪的正负倾向和关注热点,从而实现舆论的实时监测。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使我们不仅知道公众是否满意,更清楚地知道公众为什么满意、为什么不满意,为后续工作精准改进指明了方向、给出了具体的目标。

二、社会参与对文化传承的实际效果评估

（一）评估青少年文化认知与认同感的提升

青少年是文化传承的未来与希望,评价社会参与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十分重要。对参加通济渠文化进校园活动的学生进行了系统的跟踪调查。此项评价使用准实验设计,采用“前测-后测”的方式,检验学生参加活动前后对于通济渠历史知识、文化价值以及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认知水平的变化。测试内容不单有客观的知识题,还设置了情景分析、价值判断题来考查学生深层次的理解能力。从数据

上看,参加活动之后学生的平均分有所提高,对大运河作为民族文化纽带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更深一层的评价就是文化认同感的提高。内化的情感、价值观念不能用分数来衡量。因此我们使用了多种质性研究方法。搜集并分析学生创作的有关运河的作文、绘画、手工艺品、微视频等作品。这些作品是他们情感的直接流露,通过对作品主题、意象、表达方式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对于运河文化的个人情感联结和身份认同。许多绘画作品不再是对古建筑的简单复制,在古建筑的基础上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展现,把古今交融的运河生活场景描绘出来,体现了新生代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同时对参加过的活动的学生进行了专题焦点小组访谈,让他们说出参加活动的感受,讲述心中运河的故事,倾听他们如何将运河文化同自己的生活、家乡身份联系起来。鲜活的例子证明了社会参与活动能够使青少年种下文化自信的种子,并且激发他们做文化传承者的主体意识。

（二）评估非遗传承活力的增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它在民众生活中具有的“活态”延续。评价社会参与对非遗传承的促进作用,主要看它是否有效地增强了非遗项目的内在活力和外部发展环境。这就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对非遗生态的健康状况做动态监测。

从各个方面进行评价,首先要对沿线区域内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数量、年龄结构以及授徒传艺活动的开展情况做出评定。开展社会参与性项目,开设非遗工作坊、举行拜师仪式等,既给传承人带来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又极大地调动了他们传承技艺的积极性。从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来青年学徒的数量稳步增长,传承人断档的风险有所降低。对非遗产品市场化、产业化水平进行评价。通过对电商平台带有通济渠文化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的销售数据、消费者评价以及市场反馈做进一步的分析。销售额的增长、线上品牌声量的提高,都是社会参与活动给非遗项目带来的新的经济价值和新的发展机遇。还应该考察以下重要的节点

1. 公共展演次数、观众人数:统计非遗项目(豫剧、坠子书等)在社区、景区、文化节庆等公共空间的演出次数以及所涵盖的观众人数,以体现它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出现的可见度和影响力。

2. 跨界融合创新案例,即记录并评价非遗元素与现代设计、动漫游戏、数字

媒体等各个领域融合创新的成功案例数量和质量，考察非遗在当代语境下适应性与创造力。

经过上述具体的、可以量化的指标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量的社会参与就像源源不断的活水一样，有效地滋润着通济渠沿岸的非遗生态，使非遗生态由“静态保护”变为“动态振兴”，再次展现出勃勃生机的时代气息。

三、评估结果的反馈与应用

（一）形成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布

最后会生成一份全面的、客观的、详实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社会参与成效年度评估报告。这是一份内部的工作总结，也是一份面向全社会的“成绩单”和“体检单”。报告内容用严谨和通俗的方式来呈现，主体部分用专业的图表、数据和案例分析等形式详细地展示出上一年度在扩大参与规模、提高公众满意度、促进文化传承等各方面的评估结果，清晰地呈现一年来取得的成果和遇到的问题。

为保证评价报告的核心内容传递的有效性与广度，会将该评价核心内容进行二次开发，制成信息图、短视频、H5页面的新媒体产品，通过政府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主流媒体、沿线社区宣传栏等渠道进行发布，以便让社会各界可以方便地获取和理解评价信息。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不但是履行信息公开的责任，也是对公众参与权利的尊重。这样做目的在于提高工作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激发公众关注和参与的热情，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参与、评价、再参与的过程，最终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推动运河文化遗产的永续利用。

（二）根据评估结果优化工作策略与项目设计

评估报告不能束之高阁，而应该成为指导今后工作的行动指南。报告中每一个问题、反映出的每一个建议，都会成为改善工作策略、优化项目设计的直接依据。为此将创建常规化的评价结果应用机制，定期组织专题会议同有关部门、运营单位、专家学者以及公众代表一起对评估报告进行讨论研究，将发现的缺点具体化为具体的改进任务，指定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假如评估结果显示青少年参与线上活动的频率远大于线下讲座，那么以后工作的重点就会转向开发更具互动性、趣味性的数字文博产品（主题探案游戏、虚拟现实体验）。若游客大都觉得沿线地区的文化解说系统内容过时、形式单一，则启动文化解说系统全面升级改造工程就被提上日程，并采用扫码听讲解、AR

互动等方式。如果数据表明某个非遗项目的传承活力指标持续低落，那么专家团就会对它做专项诊断，并有可能设立专项扶持基金、组织跨界设计营等，给它提供“精准输血”。通过实证评价来动态调整，通济渠文化谱系的塑造与革新实践就不会陷入经验主义、闭门造车的困境之中，从而保证公共文化资源投入能够精准地匹配到社会需求上，使每一项付出都更有针对性地服务于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事业。

第十章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未来发展

第一节 文化谱系研究的前沿趋势

一、跨学科融合的深化与新方法的运用

（一）数字人文、计算社会科学等方法的引入

数字人文、计算社会科学兴起之时，通济渠文化谱系研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技术手段。利用 GIS 可以对通济渠诗词、碑刻、水道变迁、聚落分布等各方面信息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直观地表现出文化要素沿着通济渠传播的路径、速率、空间格局，动态地复原出通济渠流域的历史地理景观和文化生态。采用文本挖掘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大量的历史文献（方志、档案、文人笔记等）实施主题建模与情感分析，可以量化表现不同时期社会对于通济渠的认识、关注焦点以及情感态度，并且能够体现出隐藏在文本背后集体记忆和文化观念的变迁。

新方法的出现不但是技术上的革新，更是研究范式上的转变。用三维建模、虚拟现实技术再现通济渠沿岸重要的历史场景，即汴河码头、洛阳含嘉仓、沿岸驿站、寺庙等，使公众置身其中去体验历史的感受，大大提高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和感染力。计算社会科学中的主体建模，使研究者可以创建虚拟的运河社会，按照不同的行动者（官员、商人、船夫、僧侣等）的行为规则和互动模式，模拟文化习俗、信仰、商品、谣言等在运河网络中传播和演化的过程，从而把谱系研究从静态的溯源推到动态的生成过程模拟。

（二）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

未来通济渠文化谱系研究要冲破宏观叙事和微观考察的壁垒，达成两种研究途径的有机融合。从宏观上来说，要立足隋唐帝国的政治整合、经济运行、军事战略，解释通济渠作为国家大动脉的全局意义，体现它在塑造中古中国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作用。这就为理解通济渠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提供了重要的时代背景。

研究的触角必须伸进微观社会生活肌理里。对运河沿岸某个城镇、家族、行

会或者寺庙进行个案研究,可以从细小的历史进程入手,观察它怎样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信仰世界以及身份认同。商号账本、家族族谱、寺庙重修碑记都是研究通济渠文化在地方社会“毛细血管”里流动的珍贵资料。自下而上的微观史考察可以为宏观叙事提供鲜活、有温度、有质感的例证,使文化谱系充满人的气息。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才能达到上述目的。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比如文献考证、图像分析、田野调查等,在解读文本意蕴、探究事物错综复杂的原因上有着优势。定量研究,即对历史人口数据、商品价格、寺庙数量、关键词频率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定性观察无法发现的宏观趋势以及内在相关性。两者相结合,用定量数据检验或者修正定性分析提出的假设,再用定性分析来解释定量研究结果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从而形成互相印证、循环深化的知识生产闭环,构建起更加全面、可靠的通济渠文化谱系。

二、从“静态”谱系到“动态”网络研究的转向

(一) 关注文化要素间的互动关系与流动过程

通济渠文化谱系不应只被当作一份静态的“文化遗产清单”,而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生态系统,其内部的各种文化因素不断发生着相互作用、碰撞、融合。未来研究的重点将从文化要素的识别和分类,转而研究文化要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运河这一“流动容器”中文化传播的过程。起源于江南的音乐旋律,在北上传播过程中是如何与河南地方戏曲融合,从而产生新的艺术形式的?洛阳的佛教宗派是如何沿着通济渠向东南地区传播的,在沿途城镇的寺庙里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这种研究视角要求我们将文化流动视为一个多维度的复杂过程,需要系统性地考察。

1. 文化流动的方向性、层次性:文化流动不是单向地从政治文化的中心向边缘地区辐射。存在着大量地方文化对中心的“反哺”,也存在着沿岸不同城市之间的横向交流。沿岸地区物产和民俗经漕运到都城,丰富了上层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2. 文化的过滤和再创造,任何文化要素在传播的过程中都会受到目的地社会结构、经济条件、已有文化传统的“过滤”。它们被接纳,或者被排斥,更常见的是被改造、重塑,被赋予新的地方性含义,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

3. 文化节点的“熔炉”效应，开封、商丘等运河沿岸重要的枢纽城市，不但是人员、物资的集散中心，更是文化交流、创新的熔炉。这些城市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元素碰撞交融，产生出具有很强原创性、辐射力的节点文化，并影响到更广大的区域。

（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等构建动态模型

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上述动态的过程，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就成为了一种非常有潜力的研究工具。该方法把研究对象抽象成由节点、连接线组成的网络结构，给文化互动和传播的量化分析提供可能。通济渠文化谱系研究中的节点既可以是具体的人（官员、文人、僧侣、商人），也可以是人群（商帮、行会），还可以是机构（书院、寺庙），甚至是地理位置（城市、码头、驿站）。连接线可以代表它们之间各种社会关系，即贸易往来、婚姻、师承、引荐、信件往来等。

建立这样的历史网络模型之后，研究者就可以用一系列的指标来分析网络的结构特征。通过计算节点的中心度，可以找到文化传播网络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意见领袖或者核心机构。考察网络的结构洞，可以找到连接不同社群、实现文化跨界的人。更重要的是，搜集不同时段的数据可以构建时序网络模型，动态展示通济渠文化网络的发展过程，隋唐初期迅速形成，安史之乱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北宋时期达到一个新的繁荣顶峰。把模糊的概念用可测量、可分析、可视化的动态模型表示出来，极大提高研究的科学性、精确性。

三、比较视野下的运河文化谱系研究

（一）与京杭大运河其他段落的比较

隋唐大运河和后来的京杭大运河都是内部差异较大的复杂系统。将通济渠同其它段落进行系统的比较，可以有效地体现通济渠独特的文化个性以及历史地位。与主要为帝国北部边防服务的永济渠相比，通济渠的主要作用是沟通黄淮，联系政治中心和江南经济区，它的经济和文化意义更加突出。相比后世元代截弯取直的京杭大运河段来说，通济渠曲折蜿蜒地穿插在中原腹地的众多历史古城之间，形成更为密集的文化城镇带。

最有启发性的比较对象就是江南运河。江南运河蜿蜒流淌于富饶的水乡泽国，沿岸经济发达、文教昌盛，孕育出精致、典雅、充满诗情画意的士绅文化、市民

文化。而通济渠横穿广袤的黄淮腹地，水路管理更为困难，又处于“四战之地”，其文化形态更深层次地交织着军事后勤、黄河水患、王朝更替等沉重的主题，呈现出一种更加雄浑、坚韧，带有悲壮色彩的文化气质。以江南运河的“风花雪月”与通济渠的“漕运艰辛”、江南的水神信仰与中原的河神祭祀、江南的“枕水人家”与中原的防御性城池等为例，就可以清楚地描绘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运河文化面貌。

该种内部对比研究有助于创建出更为详尽的“大运河文化家族图谱”，防止把所有的“运河文化”一概而论地混为一谈。这表明了在不同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同样的水利工程会产生怎样丰富多样的文化后果。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准确地认识通济渠在中国大运河体系中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关键枢纽地位，也可以认识通济渠文化谱系的独特价值。

（二）与世界其他著名运河的比较研究

将通济渠同世界历史上其他的著名人工运河进行比较，是确定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坐标、彰显其独特价值的必要步骤。比较对象可以是几乎同时代的伊斯兰世界运河系统、近代的法国米迪运河、改变了美国国运的伊利运河、现代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可以比较的维度有兴建动因（帝国意志和商业驱动），技术和规模，对国家统一与市场形成的作用，社会变迁和移民模式，当代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策略等。

这样一种全球性的比较视角具有双重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可以提炼出人工水道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些普遍规律。运河几乎无一例外地促进了区域专业化分工，催生了新的城市中心，也成了思想和技术传播的快速通道。另一方面，这样的比较更能体现出通济渠的非凡之处。它超乎寻常的规模、极其早期的建造年代、完全由中央集权推动的建设模式、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深度影响一个庞大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命脉的能力，在世界运河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将伊利运河等以商业为目的的运河同中国古代的运河进行比较，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国家权力在大型工程和社会整合中的核心地位。跨文明对话既充实了对通济渠本身的认识，也给全球运河研究提供了中国独有的样本和理论启示，使通济渠文化研究的国际学术含金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第二节 保护与创新的协调发展

一、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

（一）保护是创新的前提与基础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完整性、真实性是通济渠一切价值的根源，也是通济渠文化创新灵感的源泉。保护并不等于把遗产关起来，让它与世隔绝，而是在科学审慎的基础上，保证它的物质载体和非物质内容的原始面貌。即是对古河道、堤岸、码头、仓窖等历史遗存的修缮保养，也是对沿线民俗、传说、工艺、商贸传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记录与整理。这样精心保存的通济渠，就像是一卷字迹清楚、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的古籍，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鲜活的史料。

如果没有保护这一根本前提，任何一种创新都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少真实历史信息的文创产品，最终只能是空洞的符号堆砌；脱离原有风貌环境的旅游开发，则会变成千篇一律的仿古商业街。建立在虚假或者残缺基础上的创新，不能延续文化的生命，反而会混淆历史认知，割裂文化脉络，最终造成文化谱系的断裂甚至消亡。因此，对通济渠文化谱系实施系统的、原真的保护，就是保证文化创新不会迷失方向、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和导航仪。

（二）创新是保护的活力与延续

静态的、被动的保护容易使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脱离当下，最后成为只存在于博物馆、教科书中的“死”知识。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传承过程中被不断阐释、被不断使用，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创新，就是激活通济渠文化谱系，使其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动力，也是实现“活态传承”不可缺少的途径。它以新的方式把古老的运河文化以更生动、多样、可感知的形式展现出来，使运河文化能够被更多的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所接触、所理解。

创新实践给保护工作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和社会资源。利用数字技术创建的通济渠虚拟博物馆使人们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置身于隋唐时期漕运的繁华景象之中，从而激发起对文化遗产与历史遗迹的保护热情。依托运河文化元素打造的优秀文旅项目一方面可以提升区域文化品质，另一方面产生的经济效益可以回馈到遗产的修缮与研究上，给高水平的保护工作提供物质保障。

文化谱系的延续，就是一种创造性的传承。每一代人都以前人的基础上，结

合自身所处的时代语境和审美需求，对文化进行再解读、再创造。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创新实践，就是在通济渠这部宏大的历史长卷上，添上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篇章。它保证运河文化不是静止的历史标本，而是一条流淌不断的活水，使文化谱系在创新中得到不断丰富、发展、永续。

二、探索保护与创新融合的新模式

（一）“遗产+”模式：遗产+科技、+旅游、+教育等

“遗产+”模式是开放的、跨界的融合发展理念，打破文化遗产保护的单一领域壁垒，使通济渠文化谱系同现代科技、旅游、教育、文创等各个领域深度融合。因此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综合效益，共同构成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系统。核心是以遗产的文化内核为驱动，与其它产业相结合，产生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

这种跨界融合具体可以体现在多个层面：

1. 遗产+科技。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活化通济渠文化谱系。例如可以利用GIS技术制作其历史变迁的动态地图，用VR、AR技术还原洛口仓的繁忙、板渚之会的盛况，让游客身临其境，创建数字档案库，将有关文献、文物、口述史等进行云端永久保存和共享，运用大数据分析游客行为来改善管理和服务，最终达到智慧化保护与展示的目的。

2. 遗产+旅游，即把通济渠从一个单一的观光地转变为综合性的文化旅游目的地。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运河故事，开发出以“一粒米的漕运之旅”、“帝王东巡”等为代表的深度游船线路，在沿线古镇市集上复兴非遗技艺展示、地方风味小吃等，营造出可以触摸、可以品尝的活态运河生活场景，积极举办国际运河城市交流、龙舟赛、民俗文化节等活动来提高通济渠的国际知名度和吸引力。

3. 遗产+教育，充分发挥通济渠作为“活着的历史教科书”的作用。与各级学校合编乡土教材、研学课程，让学生去实地考察，把运河历史带入课堂；设立运河文化研究中心，支持学者深入研究；开展学术论坛、公益讲座、手工艺体验工坊等，把专业知识变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普及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通过“遗产+”模式的多种探索，通济渠的文化价值链会得到极大的延伸，通济渠文化谱系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生命力，也会在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多元价值创造中得到显著提升。

（二）建立文化遗产价值转化机制

为了使“遗产+”模式能够高效运行并发挥作用，就必须创建出一个科学、公平、高效的传统文化转化机制。此机制的根本目的就是解决通济渠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如何转化为社会、反哺保护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问题，即构建起从价值评估、权益确认、开发利用、收益分配的闭环。

建立这个机制要依靠多方的共同努力。政府要主导制订出明确的法规政策，确定通济渠文化资源的产权、使用权、开发范围，划定保护红线。另外要设立专项基金，用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方式来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符合保护要求的创新项目。从市场角度来讲，应当积极创建文化资源与产业对接的平台，诸如文化产权交易所、文创项目孵化器之类，促使掌握文化资源的一方（地方政府、文保单位等）同具备创意、技术、资金的一方（设计公司、科技企业、投资机构等）达成有效对接，进而推动文化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还要建立健全收益分配制度，使遗产所在地社区和居民能够参与进来，从中获得公平的利益，从而激发起他们参与保护的内在动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这将保证通济渠的文化创新之路更加稳健、长远地发展。

三、防范创新开发中的文化风险

（一）避免文化空心化与过度商业化

文化空心化是通济渠创新开发要防范的主要风险。它指的是在开发的时候过分看重外在的包装和商业利益，而忽略或者抛弃了文化遗产真正的内涵和精神内核。大拆大建仿古建筑，用粗制滥造的商业业态取代原来的社区生态，用浮夸、猎奇的演艺活动曲解历史。在此模式之下，通济渠文化变成了可以轻易复制的符号与标签，深厚的历史底蕴、复杂的文化谱系被悬空、架空，只剩下徒有其表的商业躯壳。这样开发不但不能吸引具有深层次文化需求的游客，还会割裂当地居民与历史文脉情感，使地方文化身份丧失。

文化空心化常常伴随着过度的商业化。当商业逻辑占据主导的时候，文化遗产的公益属性就会消失。通济渠每一寸土地都被明码标价，古迹被商贩填满，宁静怀古被喧闹吆喝声代替。过高的门票、高消费门槛会把一部分公众排斥在外，违背文化遗产全民共享的原则。过度商业化会造成业态同质化竞争，沿线的各地都纷纷上马类似项目，最终造成千河一面的尴尬局面。不但破坏了通济渠文化谱

系的丰富和多样，也削弱了它长远发展的竞争力。因此必须对商业开发划清界限并加以规范，保证商业活动服务于文化展示，而不去主导文化空间。

（二）维护文化的真实性与严肃性

维护文化的真实性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准则，也是所有的创新实践不能动摇的基础。对于通济渠来说，真实性的体现不能停留在物质遗存的“原汁原味”，更应该实现历史信息的准确传达和文化精神的忠实体现。所有的修复工程都要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用传统材料和工艺，对修复的部分做出明显的标识。文化阐释、艺术创作要以学术研究为依据，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可以进行艺术加工和合理想象，但不能歪曲、编造历史，也不能为了迎合市场而传播错误的文化信息。公众的介绍与解说要分清史实、传说、后世演绎之间的差别，促使公众形成审慎的历史观。

维护文化的严肃性，要求我们在创新的时候，对历史要怀着敬畏之心。通济渠的历史有隋唐盛世的辉煌，也有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它是经济大动脉，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段历史是沉重复杂的，不能小视。旅游演艺、文创产品开发中不能出现过度的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要体现出与文化遗产相匹配的厚重感、崇高感。创新不能把历史变成一场闹剧，而应该用更吸引人的方法来引导人们思考历史的深度，感受文化的精神。只有坚守真实性、严肃性这两条底线，通济渠文化谱系的创新实践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它的文化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并得以长久的传承。

第三节 区域协同发展策略

一、建立通济渠沿线城市协同发展联盟

（一）制定统一的保护与发展规划

制定一份具有权威性、前瞻性、约束力的通济渠文化带统一保护与发展规划，将会成为联盟的首要任务。规划不能只局限于某个城市行政区域的范围，也不能只从局部利益出发，而应该站在整个通济渠文化谱系的高度来统筹。规划的关键在于创建起一个分级分类的遗产保护体系，确定绝对保护的核心区、有建设控制的缓冲区和可以进行文旅融合创新的协调区。对于河道故道、堤防、码头、仓窖、

古城遗址等不同类型的遗址应该制订出分类保护标准以及修复技术规范,使保护工作具有科学性、统一性。

规划中还要包含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通济渠的文化价值同它的水系生态、自然景观有密切联系。统一规划要包含沿线水资源管理、水环境治理、两岸生态修复等具体措施,目的在于再现当年舳舻相继、商旅不绝的历史景象,以及绿水青山、碧波荡漾的自然生态和谐共存的情景。规划既是文化遗产保护的蓝图,又是区域产业布局、城乡建设、基础设施联通的重要依据,保证所有的开发建设活动都服务于通济渠文化价值的展示和传承。

规划制定阶段要创建起开放且多样化的决策咨询机制。邀请国内外历史、考古、建筑、规划、旅游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委员会,给规划的科学性提供智力支持。征询沿线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意见,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通过立法程序,把规划的主要内容以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其法律效力,从而保证规划可以得到长期、稳定、不折不扣的执行,有效防止地方政府换届或者短期经济利益导致规划中断或者偏离。

（二）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品牌共建

联盟的价值就在于打破信息孤岛、资源壁垒,达到高效流通、共享的目的。通济渠沿线的各个城市文化资源各有侧重,有的城市以宏大的隋唐都城遗址为特色,有的城市以保存完好的运河河段闻名,有的城市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协同机制就可以发挥出各种资源的协同作用,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的具体实践可以涵盖多个层面。

1. 建立通济渠数字文化遗产数据库,将沿线地区考古发掘报告、历史文献资料、测绘数据、影像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等数字化整合,并向联盟成员以及相关研究机构开放。不但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也为文创开发、展览展示、教育科普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 创建流动的专家库和技术人才库。当某个城市在遗址保护、博物馆布展或者文化活动组织中需要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时候,就可以从联盟内部挑选出合适的专业人才来提供支持。

3. 以沿线各个城市的博物馆、文化馆、游客服务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为依托,开展馆际合作,举办巡回展览,互相交换数字展项。在旅游市场上,联盟成员可以互相推荐客源,联合开发旅游年票,共同参加国内外的旅游交易会,合力开拓

市场。

品牌共建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结果，也是更高层次的追求。目前沿线城市各自为政的宣传方式造成通济渠整体品牌形象不清晰，影响力小。联盟要共同提炼通济渠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独有标识，设计统一的品牌系统，共同打造、推广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世界级文化品牌。在统一品牌之下，各城市又可以依据自身特色推出如“通济渠·古都神韵”、“通济渠·漕运风情”、“通济渠·诗画田园”等子品牌，共同构成一个既有统一形象又具有鲜明个性的品牌矩阵，以此全面提升通济渠文化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二、推动交通、产业、文旅一体化发展

（一）构建便捷的区域交通网络

交通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先行官，是连接零散文化遗珠的金色线。便捷高效的区域交通网络，会为通济渠沿线资源整合、文旅一体化打下良好的基础。该网络应该立体化、复合型，缩短时空距离，提高游客和居民在区域内流动的便捷性、舒适性。加强并改善通济渠沿线主要城市间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网络，打通断头路，提高路网连通性，保证主要遗址节点城市之间2小时内通达。

主干交通网络的基础上还要完善最后一公里的衔接。重点开通高铁站、机场、客运枢纽与通济渠核心遗址区、博物馆、旅游码头之间的旅游专线或者公共交通线路。积极推行落地自驾服务，在交通枢纽处设置连锁租车点。一大特色就是规划建设沿着通济渠故道或现有河道的生态绿道系统，集步行、骑行、观光等多项功能于一身，用慢行的方式去体验运河风光与历史脉络。

还要探索部分有通航条件的河段开展旅游性通航。运营仿古游船、电动观光船等，开辟水上游览线路，再现当年舟楫往来的景象。不仅可以给游客提供独特的旅游体验，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展示。将陆路交通的快与水路交通、绿道慢行的慢结合起来，形成快进慢游、水陆联动的复合型交通体系，才能真正吸引游客来，留住游客，让游客玩得尽兴，从而实现由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变。

（二）打造跨区域的文旅黄金线路

便捷的交通网络给打造跨区域旅游黄金线路打下了基础。这条黄金线路不应该只是简单地串联景点，而应该在通济渠文化谱系的基础上，做主题化、故事化、体验化的产品设计。它应该成为一条可以讲述完整通济渠历史变迁和文化之美的

文化长廊，使游客在移动中感受到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美丽。

线路设计按照不同的主题来满足各种不同游客群体。以隋炀帝、唐代帝王巡游江都路线为线索，串联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宿州、淮安等地与宫殿遗址、行宫故地、历史事件发生地相关的古迹遗址，使游客切身体会皇家气派与风云。也可以设计“漕运文脉之旅”，突出运河的经济功能，串联起沿线的码头、粮仓、钞关、会馆等遗址，用博物馆的展示、多媒体的演绎来再现古代漕运繁忙的景象和商业文明。还可以设计“诗词风雅之旅”，追随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的足迹，在运河沿线他们的吟咏之作以及与此相关的景点之间穿行，于山水间体会诗词的意境。

为了提高黄金线路的吸引力，就必须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深度整合。联盟城市可以推出共同的“通济渠文旅一卡通”或者电子通票，实现一票畅游沿线的各大景点和博物馆。同时推进沿线酒店、民宿、餐饮等服务业开展主题化改造，打造运河家宴、漕帮菜等特色餐饮，培育一批具有运河文化特色精品民宿、主题酒店。

还要依靠科技给黄金线路赋能，开发出整合线路规划、语音解说、AR 虚拟复原、在线预订等各项功能的通济渠智慧导览 APP。在重要遗址点上，用虚拟现实技术使游客可以“看到”洛口仓的宏伟、板渚隋堤的壮丽，从而达到与历史进行跨时空对话的目的。将文化内核和现代消费体验相结合，是打造有持久生命力的文旅黄金线路的有效方式。

三、构建区域文化品牌与营销体系

（一）共同策划举办大型文化节庆活动

节庆活动是文化品牌最直观、最生动、最具爆发力的展示方式。通济渠沿线城市应联合策划一些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文化节庆活动，把其打造成区域性的标志性文化事件。活动要深入到通济渠的文化内涵之中，同时又具有现代的审美、国际的视野。开展隋唐大运河国际艺术节，聘请国内外艺术家沿路走访、创作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各类艺术作品，并巡演。

可以定期举办“通济渠漕运文化旅游节”，用大型实景演艺、仿古船队巡游、漕运古镇庙会、非遗项目展演等方式来活化历史场景，使游客沉浸式体验运河文化。活动可在沿线主要城市轮流设主会场，其他城市设分会场，形成联动效应，每年掀起关注通济渠的热潮。也可以举办龙舟赛、帆船赛等各类体育赛事，把体

育的活力同运河的韵味结合起来。通过这些持续性、高水平的节庆活动，一方面可以直接吸引大量游客，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媒体的广泛传播，不断加强通济渠作为一个整体文化品牌的社会认知度，使其成为区域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二）整合营销资源，提升区域整体形象

区域整体形象的提高要依靠系统、持续、多渠道的整合营销。应该成立跨区域的通济渠文旅营销中心，对沿线各个城市的对外宣传推广工作进行统筹协调。该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创建统一的品牌识别系统，即核心口号、视觉标志、标准色等，并保证这些元素在所有的对外宣传物料（宣传片、海报、网站、纪念品等）中的一致性使用，从而在公众心中建立一个清晰、统一、强有力的品牌认知。

营销中心的另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把营销渠道和预算进行整合。将各个城市分散的宣传经费集中起来，用一部分资金开展大规模、高层次的市场营销活动。联合中央电视台、国家地理等高端媒体平台投放形象广告，共同赞助有国际影响力的影视剧或纪录片，将通济渠文化元素巧妙植入其中，作为一个整体参加柏林、伦敦等国际顶级旅游展，与国际大型旅行商建立合作关系。捆绑出海的方式比单个城市零敲碎打的宣传更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成本效益。

在新媒体时代，营销体系必须与时俱进。营销中心应主导运营“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官方多语种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矩阵账号，持续发布高质量的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内容，讲述运河故事，与全球网友互动。可以发起“#重走通济渠”等网络挑战赛，邀请文化名人、旅游达人、历史博主等沿着运河进行深度体验和传播，利用其影响力带动更广泛公众的关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补充的整合营销策略，全方位、立体化地塑造和传播通济渠文化带的整体形象，使其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第四节 国际化视野下的发展路径

一、加强与世界运河城市的交流与合作

（一）加入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

加入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等其他有关国际联盟，是通济渠文化走向国际舞台的战略支点。既是身份的标识，又是信息交流、资源共享、项目合作、联合推广的一个综合平台。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之后，通济渠沿线城市就可以直接参与到全球运河遗产保护与发展对话中来，及时获得国际前沿的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组织内部定期召开会议、开展专业考察、共同完成项目，给通济渠管理者、研究者、从业者提供了学习、展示的平台，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申请国际合作项目或者举办跨国文化交流活动。

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提高通济渠的国际知名度和品牌价值。在全球旅游市场上，拥有世界运河组织成员标签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能吸引更多注重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的国际游客。依靠组织的集体力量宣传推广，比单个城市各自为战更有规模效应和影响力。这就要求沿线城市要积极准备，梳理通济渠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形成符合国际水准的申报材料 and 展示方案，在国际舞台上清楚有力地讲述通济渠的故事，让通济渠在世界运河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举办国际运河文化论坛与学术研讨会

将通济渠沿线核心城市打造成国际运河文化研究与交流的策源地，就是文化引领的关键途径。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举办高规格的国际运河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专题工作坊等可以汇聚世界上的顶尖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水利专家、遗产管理专家、城市规划师等，就通济渠乃至世界运河的共同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给通济渠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前沿智力支持，而且能将它打造成为运河学领域中的学术高地。

论坛议题应兼顾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可以从古代帝国的运河管理和国家治理入手，也可以研究运河城市的兴衰和现代化转型，也可以讨论土质运河堤岸生态修复技术、运河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公众展示、沿河社区的文化认同和经济发展。多样的话题会引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跨学科辩论、思想碰撞，也会催生新的研究范式与合作项目。学术活动产出的论文集、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等将会成

为通济渠文化谱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为全球运河遗产管理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持续举办这样国际性的盛会，它的意义远远大于一次性的学术交流。可以构建起以通济渠为中心的稳定的、活跃的学术网络，产生持久的影响。由于媒体大范围的报道以及学术成果的全球传播，通济渠文化价值也会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国际认可。这些活动本身就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旅游产品，吸引着对运河文化感兴趣的人来参会、考察、旅游，从而直接带动地方文化产业和旅游经济的发展，实现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的同步提升。

二、推动通济渠文化“走出去”

（一）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推动通济渠文化走向世界不应该只是一种单向的文化展示，而应该是平等、建设性的国际合作。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发起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既是文化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也是学习实践、贡献自己的一种最好方式。派遣水利史专家、考古学家、遗产修复师去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运河遗产保护修复工作，将中国在大型线性遗产治理、复杂水工遗址处理、保护与民生平衡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分享给世界。

这种参与可以是多层次、多形式的。

1. 技术、知识援助，对于泥沙淤积、水质污染、沿岸不合理的开发等问题的国外运河，中国专家可以提供技术咨询和解决方案，分享通济渠生态清淤、水环境治理、遗产廊道管控的成功经验。

2. 联合科学研究，同国外的研究机构就运河遗产所遭遇的全球性问题展开联合攻关，比如气候变化给古代水利工程带来的影响，数字化技术在遗产监测中的应用等等，一起发表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以此来加强中国在遗产保护方面的国际话语权。

3. 培养人才，对于通济渠沿线各国的人员进行培训交流，传授通济渠管理理念以及社区参与经验，提高当地对文化遗产的管理能力，传播中国的文化保护观念。

经过这样深入的国际参与，通济渠的文化价值就不再只是它的历史叙述，而是被赋予了更普世的现实意义。它证明中国是古老文明的继承者，更是积极贡献

者和引领者，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上，这样的定位会大大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国际形象。

（二）在海外举办运河文化展览与演出

组织高水平海外巡演、演出，是将通济渠文化直观展示给世界的有效方式。展览内容要精心设计，用现代化的、有吸引力的方式去表现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可以打造集历史、科技、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展览，内容可以包含通济渠开凿背景、工程奇迹、漕运盛景、沿岸风物、当代价值等内容。除珍贵出土文物（或高精度复制品）、历史图卷、文献资料以外，还需大量使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沉浸式投影等数字技术，让海外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舟行运河的壮丽、汴州、洛阳等古都的繁华。

文化表演也是一种打动人心的传播方式。组织一场以通济渠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品演出，包含船工号子等与漕运生活有关的表演、戏曲折子戏等反映市井风情的表演、民间歌舞等有地方特色的表演。具有生命力的表演艺术可以冲破语言的束缚，直接把运河文化的精神实质和情感热度表达出来。为了更接近海外观众，也可以和国外的艺术团体合作，以通济渠为灵感创作现代舞剧、交响乐、舞台剧等，用国际化的艺术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引发跨文化情感共鸣。这些展览、演出活动应该选择在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主要文化中心城市主流博物馆、艺术节、剧院举办，以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和文化影响力。

三、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升管理水平

（一）学习国外在遗产管理、社区参与等方面的成功做法

世界上许多运河遗产地在管理体制、法规建设、社区互动等各方面都有成功的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英国的运河系统是由专门的慈善信托机构“运河与河流信托”来管理的，成功地调动了数万志愿者参与到运河的日常维护、生态监测、游客服务中，形成了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共建共治的良好局面。该模式对于调动社会力量、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公众文化认同感有重要的启示。在通济渠沿线发展类似的非营利组织，发动当地居民、企业、学校成为运河的守护者、代言人。

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带保护实践当中社区参与是典范。其管理部门在制定有关运河景观的规划或者政策的时候，都会通过听证会、工作坊、在线征询等多种

形式征求居民、商家、专业人士的意见。将社区当作“遗产活化的核心伙伴”而不是“管理对象”的理念，使保护措施得到当地人的理解和支持，发展成果也能惠及当地民众。通济渠沿岸村镇的发展不能采取大拆大建的方式，应当实行参与式规划的形式，促使居民发掘自身的文化资源，创建小型的生态农场、手工作坊和特色民宿等文旅游点，使遗产保护融入到改善民生、共同富裕的大局之中。

法国米迪运河在航运、旅游、农业灌溉、生态保护等各方面的综合管理模式，加拿大里多运河在遗产解说系统、游客体验设计上的创新等都值得学习借鉴。通过建立“姊妹运河”关系、派遣管理人员出国考察、引进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手册等方式，把国际上先进的经验转化为适合通济渠实际情况的政策和行动指南，逐步建立起科学、高效、人本的现代遗产管理体系。学习借鉴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深刻理解了背后的理念之后，再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地方特色来实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二）引入国际标准，提升保护与开发的国际化水平

为了让通济渠的保护和开发工作真正走向世界，就必须主动引进并执行有关国际标准和行业准则。这是提高工作质量的需要，也是获得国际社会信任与认可的基础。遗产保护方面应该全面按照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制定的关于真实性、完整性的奈良文件以及文化线路保护原则来执行。因此所有的修复工程施工都必须进行审慎的价值分析、详细的探查病因，尽量使用传统工艺和材料，采用最小干预和可辨识性原则，保证历史信息不被破坏。

监测和评估方面要创建起一套依照国际标准的遗产监测体系。该系统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物联网传感器等现代技术对运河本体、水文环境、周边缓冲区等各方面指标实行长期动态监测。监测数据服务于日常管理、应急响应，并且按世界遗产中心要求定期公布给国际社会看并接受外部评价。旅游开发和游客管理要采用国际可持续旅游理事会标准来保证沿线旅游设施、服务水平达到国际标准。创建无障碍的旅游环境、提供多语言标识解说服务、控制游客数量以减少对文化遗产的损害、倡导负责任的旅游行为等等。采取上述具体措施一方面可以提高国际游客的满意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塑造通济渠作为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良好形象，从而推动通济渠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第五节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未来展望

一、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典范

（一）活态展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造力

通济渠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河段，它从开凿、兴盛到演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没有尽头的流动史诗，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未来通济渠文化谱系的创新实践核心要义就是“活态”。这就需要我们跳出静态的文物陈列、文献展示的传统模式，把运河的历史脉络、精湛的工程智慧、高效的漕运管理、繁荣的商贸景象、诗词歌赋的韵味、多彩的民俗风情等多元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到现代社会生活当中。依靠建设运河生态文化公园、精心复原重要的历史节点景观、常态化举办主题文化节庆活动等手段，使千年运河的生命力在当代得以延续，并且不断焕发光彩。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深度挖掘、精细阐释就是中华文明磅礴创造力的体现。宏伟的工程，规划思想宏大、水利技术精湛、组织能力卓越，在当时堪称世界奇迹，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新时代的创新实践要依靠前沿科技手段，对这份历史创造力进行再创造。运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先进的数字技术建立通济渠的数字孪生体，让观众置身于隋唐时期触手可及的壮观场景之中，也可以在虚拟空间里参与到运河的营造当中。这样一种把历史深度同科技创新深度结合的展示方式，可以使得古老的文明成果同当代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直接感受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

更深层的活态展示，就是把运河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内核转化成公众可以感知、体验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教育资源。设计出一系列富有吸引力的研学旅行课程，引导青少年在行走中阅读运河这部“大书”，鼓励艺术家们以运河为主题进行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各方面的创作，产生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精品文艺作品。通济渠文化谱系也从一种学术成果变成了滋养公众精神世界、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的一股活水，生动地讲述了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里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宏大故事。

（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豪感

文化自信是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刻、最持久的动力。通济渠文化

谱系的建设与创新实践,给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的提升提供战略资源。当人们了解到,一千多年以前先人就以如此宏大的气魄和卓越的智慧,开凿出贯通南北影响国运千年的通济渠的时候,就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自豪感,既来自于对于祖先伟大事业的崇高敬意,也来自于对于中华文明深厚底蕴的强烈认同。

对运河文化遗产展开系统的保护并加以深入的阐释,把宏大的历史叙事同生动的人物故事、具体的文化细节紧密联系起来,可以使文化自信的根基更加牢固。通济渠文化谱系里既有帝王将相的雄才大略,又有无数普通劳动者付出的辛勤汗水,它也表现出了沿岸市井生活的繁荣景象,歌咏着文人士子的诗意歌咏。立体、丰满、有温度的文化呈现使得历史不再是遥远的、抽象的。公众尤其是年轻人通过这些可以感知、可以体验的文化内容,与历史建立了真实的情感联系,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在经历磨难之后仍然能够生生不息,从而在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坚定信念。深深扎根于内心的自信,将会成为创建现代文明的精神动力。

二、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一) 以文化引领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新的发展阶段,单纯依靠资源消耗、要素投入的传统增长方式已经不能继续下去。通济渠文化谱系的成功塑造,给沿线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即要以文化为引领,坚定不移地走融合发展、创新驱动之路。这就把通济渠这个世界级的文化核心品牌,巧妙地转变为强有力的产业竞争优势,推动经济结构由“旧”向“新”的深刻变革。

具体的实践路径丰富多样,其中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无疑是关键的突破口。

1. 对文化旅游融合的新业态进行深入挖掘。抛弃单一的观光旅游模式,按照通济渠丰富的漕运文化、商都文化、诗词文化等元素,精心设计出一系列主题化、沉浸式的旅游产品。可以创建隋唐漕运实景演艺、推出运河诗路深度体验游、建设古代市集风格的文化消费街区。依靠创建独有的文化体验来全方位提升旅游产业的附加值与吸引力。

2. 培育壮大数字文化创意产业。依靠通济渠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文化符号来发展动漫游戏、影视制作、创意设计、网络文学等数字创意产业。深度开发以通济

渠为背景的原创 IP，制作通济渠题材的纪录片、电影、动画，设计有特色的通济渠系列文创产品，用现代媒介把运河文化传播到更广大的人群当中，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3. 特色农业和文化品牌相融合。通济渠在历史上是粮食运输的大动脉，沿线地区大多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我们可以从运河历史上的物产、贡品等文化元素入手，给本地特色农产品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打造出有文化特色、有地域特色的运河品牌农产品，从而提升其市场价值，有力推动乡村振兴。

以文化作为发展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条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它既可以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又可以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形成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给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劲的“文化动能”。

（二）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运河

通济渠文化谱系的创新实践，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多元化的需求，核心指向是把运河沿线区域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家园。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将文化建设、生态修复、产业发展、城乡规划等各方面统筹协调好，力求达到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

从宜居的角度来看，应该把通济渠的生态廊道功能同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结合起来。用高标准的生态治理恢复运河及支流水系的清澈和生机，建设连续的滨水绿道和精致的口袋公园，给居民提供亲水、休闲、健身的优美环境。同时将运河文化元素融入社区营造和城市更新当中，使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归属感。从宜业的角度来说，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吸引人才、集聚创新要素的磁石。积极打造高品质文化街区、科创园区，完善各项配套设施，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来此创业、工作，给区域产业升级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使运河沿线真正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宜游即宜居宜业的环境本身就是最好的旅游资源。当运河沿岸拥有清澈的河水、葱郁的绿化、便捷的交通、完善的设施、繁荣的产业、独特的文化魅力时，它自然就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了。集生态之美、生活之美、生产之美于一身的美丽运河，就是通济渠文化谱系在新时代价值转化所提交的最美答卷。

三、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

（一）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包容、创新的中国

通济渠的历史就是一部连接、沟通、融合的伟大史诗。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怀有沟通南北、巩固统一的开放胸怀。向世界讲述通济渠的故事，可以生动有力地表现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具备的开放基因。它冲破了地理上的重重障碍，在广大的地域里使商品、人员和信息得以自由地流通，这就是它的东方智慧，依靠互联互通来实现共同发展。这与当代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互利共赢的理念不谋而合，给世界认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赋予了深刻的历史注脚。

通济渠两岸就是文化交融的繁荣之地。不同地方的人们在这里汇集，南腔北调在这里交响，风俗习惯在这里碰撞，于是就形成了兼容并蓄、异彩纷呈的运河文化。洛阳、开封等古都因为运河而繁荣，一度成为当时的国际性都市，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使者、僧侣、商人。这段历史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向世界展示出这样一种文化谱系，可以有效地打破外界对中国文化是单一、封闭的刻板印象，展现出一个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明形象，从而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通济渠的建造和管理本身，就是古代中国创新精神的集中表现。河道选线科学规划、水工技术巧妙运用、漕运体系严密组织，都体现出很高的创造力。中国在保护、活化世界遗产的过程中也采取了新的理念、技术，并且开展国际合作。分享通济渠从古至今的创新故事，可以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中国有辉煌的创新历史，是今天仍然充满活力、锐意进取、愿意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力量的创新型国家。

（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

通济渠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说明它已经由中国的专属财富变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其中包含的历史经验、文化精神，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和现实价值。通济渠的宏大叙事，讲的是依靠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区域整合、实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成功范例。这与目前全世界为解决发展赤字、和平赤字而加强互联互通的做法不谋而合。运河的故事证明，连接而不是隔绝，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走向光明未来的正确道路。

通济渠文化谱系中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协力共济的集体观、经世致用的价值观，都是中华文明为世界贡献的精神产品。运河工程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智慧，给现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东方哲学参考；运河体系高效运转依靠社会动员和协同合作，给国际社会共同解决难题提供历史借鉴。通过国际学术交流、联合展览、跨文化对话等形式，把通济渠文化谱系中蕴含的普遍性价值与世界分享，就是用文化的方式为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来自古老东方的独特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 [1] 余敏辉.大运河安徽段文化标识,整体特征与当代价值[J].江淮论坛,2025(4):67-69.
- [2] 温昊宇.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大运河安徽段遗产保护研究[D].安徽建筑大学,2024.
- [3] 贾兵强.隋唐大运河与河南古都的变迁[J].党的生活(河南),2023(3):2.
- [4] 包伟柯.河南通济渠永城段文化遗存[J].大众考古,2021,000(006):14-17.
- [5] 徐金星.洛阳与隋唐大运河若干问题探索[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1):7.
- [6] 马均鹏.隋唐大运河郑州市惠济区段遗产廊道构建探究[D].河南农业大学,2015.
- [7] 董永立.郑州市贾鲁河生态修复的理念与实践[C]//全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单位创新发展交流会.2018.
- [8] 王金根,许继清.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沿岸聚落分布特征探析[C]//转型与重构——201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1.
- [9] 马文娟.隋唐大运河(安徽段)出土古陶瓷文化遗产价值略述[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4(21).
- [10] 冯并.洛阳的隋唐运河[J].人生与伴侣,2022(20):80-84.
- [11] 包伟柯.河南通济渠永城段文化遗存[J].大众考古,2021(6):105-107.
- [12] 曹闪闪,张婷婷.隋唐大运河桥段文旅资源的挖掘与利用[J].参花,2022(6):48-49.
- [13] 张甦.考古学视野下的通济渠泗县故道探究[J].东方收藏,2021(9):81-82.
- [14] 陈东川,黄晓东.遥感影像中所见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沁河故道遗迹[J].黄河.黄土.黄种人,2021(18):42-45.
- [15] 包伟柯文/图.通济渠永城段的考古发现[J].大众考古,2021,000(008):44-52.
- [16] 张秉政,李华锡.隋唐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个特点[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2.

- [17] 孙旭培.隋唐古运河的纸上博物馆——《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序[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1):2.
- [18] 马均鹏.隋唐大运河郑州市惠济区段遗产廊道构建探究[D].河南农业大学,2015.
- [19] 齐凤芹.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隋唐时期初考[J].文教资料,2018(20):2.
- [20] 王金根.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与沿岸聚落空间关系研究[D].郑州大学,2012.
- [21] 王金根,许继清.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沿岸聚落分布特征探析[C]//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2011.
- [22] 王修全.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遗产构成与价值分析[D].郑州大学,2011.
- [23] 张辉,宫希成.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汴河)唐宋沉船与沿岸古文化遗存[J].中国历史文物,2010(06):26-34+94-97.
- [24] 王金根.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与沿岸聚落空间关系研究[D].郑州大学[2025-12-22].
- [25] 鲍君惠.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历史考述[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1.